

张春桥文集

01) 张春桥同志简要生平 (1917 ~ 2005)

山东巨野人。1938年来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日报》、《新石门日报》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候补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历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期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将对其原判处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原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依法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2005年4月21日因患癌症死亡。

02) 《毛泽东之歌》的作者对批评的答复

张春桥 (1951.03.11) 《人民日报》

编辑同志：

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八十七期所载周巍峙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一九四一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一九四三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

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谢谢你们。

张春桥二月五日，上海

（编者按：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立即停止播送。）

附： 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

周巍峙（1951.02.11）《人民日报》

用诗和歌曲来歌颂和赞美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描绘领袖的英雄形象，表达人民对领袖无限的尊敬与深厚的感情，这是很光荣的但也是很艰巨的任务。陕北农民所作的《东方红》，已成为全国流行的群众歌曲；解放后的工人群众及其它劳动人民也写了许多充满纯真感情的诗歌来抒发对于自己领袖的挚爱。去年国庆节，各兄弟民族更带来了许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节目。我们的诗人和音乐家也写了不少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这些歌曲有的已在广大群众中流行。但在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当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严肃地认真地加以考虑。

我看了二十几个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有的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在这些歌曲里最常见的词句是“大救星”、“恩人”、“像爹娘”，或者“北斗星”、“帮助咱们把身翻”、“跟着他”，以及“饮水要思源”等等，仅仅有少数歌子提到人民的力量。这些歌曲虽然反映了群众对毛主席衷心的敬爱与感激，却没有充分反映出领袖与群众之间的正确的关系，或者反映得还不够恰当。领袖的伟大就依靠于他是真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群众的力量，因此他才能领导群众在十分艰巨与复杂的斗争中赢得胜利。陕北民间的诗人孙万福曾用：“高楼大厦平地起，蟠龙卧虎高山顶”这两句话歌颂毛主席，“蟠龙卧虎”要依靠“高山”，“高楼大厦”要从“平地”建起。这样他就把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正确地表现出来了。而不是把领袖写成了“超人”与“救世主”。

许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还不能完满地表达群众敬爱领袖的真挚的热情。与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我们要求用最热烈，最亲切，最富于情感的言语与音乐歌颂我们的毛主席。这种情感的发挥是由于作者深刻地感觉到人民革命事业的至高无上。他十分亲切地体会到胜利所带来的幸福与快乐，亲眼看到人们在新的生活中都变得那样的聪明、勇敢，富于创造精神，因而不可抑止地产生一种冲动，一种急切要求歌颂自己领袖的冲动。这是真情流露，毫无拘束地倾吐，要在领袖面前，在广大人民中间歌颂新的生活，畅述自己内心的欣喜与真诚的感激，表达自己对领袖的崇高敬爱。因此它的情绪是健康愉快，充满向上精神的。它是真正的颂歌，绝不是那种轻佻肤浅，矫揉做作的“流行歌曲”，也不是那种呆板的“仪式音乐”。可惜，我们的某些歌曲却存在着很不少的缺点。

如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词中虽也着重说明了毛主席刚毅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他所选取的形象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是“黑暗无边，夜雾茫茫”。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绘。加上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特别是：（曲谱图）则更带有感伤的成份。有人认为它的情调受了宗教赞美诗的影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这个歌曲是十年前的创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但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却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

有的歌曲是词句空洞，缺乏热情。如《歌唱毛主席》的一首叙事歌中（大民、朱孟词，耿介、怡明曲），作者从中国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像太阳，

毛主席像爹娘写起，接着就写毛主席如何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组织红军在井冈山闹革命，粉碎五次围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北上抗日，建立陕甘宁边区，深入敌后，打得鬼子投了降，后来又进行解放战争，农民们实行土改闹生产，翻身作主人，一直唱到“军民团结消灭贼老蒋，全中国解放，幸福永无疆”，总共七段词中，感情的描写极少，很不生动。另一词更是平板地写着：“毛泽东你真好，共产党你呀领导，你的呀队伍能呀打仗，你的呀同志本呀领高，爱人民真周到，打败蒋匪立呀功劳，咱们呀有你毛呀泽东，日子呀越过越呀是好！”像这样句子，简直不能算做歌词，怎么能感动人呢？另一种不好的倾向是用一种非常肤浅的与不庄重的情调来歌颂人民的领袖，如：魏风作词，贵彬作曲的《西北农民歌颂毛主席》一歌，整个情调也是不热烈的和无力的。开头几句和陕北民歌揽工歌相似，情绪很沉闷，特别是：（曲谱图略）

等句，更显得轻浮与滑稽。用这样的乐曲来歌颂毛主席是不相称的。又如吕訥作的《人民四唱》里，每段歌词，加了五个“龙格龙”，有的竟长到二十拍，

如：（曲谱图略）

听起来觉得油腔滑调，十分不庄严。

还有《歌唱毛主席》一歌，每段词中有五个“那个”——“太阳那个出来哎照四方，中国那个有了共产党。哎，共产党啊，像太阳。那个毛主席那个像爹娘。哎，他给人民出主张，那个辛苦日夜忙。哎有了毛泽东

中国就有了希望。”作曲者似乎为了求得曲调活泼，竟没考虑到加了这许多“那个”，对一个庄严的颂词起着怎样坏的影响！

我想，颂歌的情绪应该热烈也可以写得活泼，具有群众风格，但绝不是要用油腔滑调的口吻，用一些旧的趣味来代替人民歌颂自己领袖的情感，在人民群众中传布这种不健康的，肤浅的情调。上述不适当的表现方法虽不一定是由于创作态度不严肃所造成，但至少在情感掌握与创作方法上是值得加以检讨的。这里面还包括了对民歌曲调如何正确运用的问题。在民歌中有时加了一些“哎嗨哟”的语助词（有些是作感叹词）以及“那个”一类的虚字，有的是为了表现劳动的呼声，或者是由于民歌的语言趣味与补助曲调的不足而产生；在今天我们写歌颂领袖的歌词，也搬用这些东西，那就错了。过去甚至有人用山西的一种很坏的小调配上“毛主席是太阳”来唱，听起来使人十分难受。民歌中虽有不少健康的、明快的曲调，在集体劳动中还产生许多雄壮有力的歌声，但是一般民歌既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农村，思想情感无论如何都和新的生活有很大距离。用它来表现新的人民对自己领袖的情感，它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因此当我们采用民歌的旋律，来表现新的思想情感，如果不加以选择和发展，将无法达到我们的创作目的。特别是写群众唱的歌颂领袖的歌曲时，需要更大的发展。就是写抒情的独唱、对唱时，如果选用旧的民歌，也要根据新的感情，加以改造。对于那些不合适的、落后的、不健康的民歌曲调，绝不能无原则地搬用。

创作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本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人民对领袖的情感，善于选择某一侧面，某一角落来描绘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人民热爱领袖的情绪。本来在一首短短的歌词与乐曲不可能装进很多的东西去，我们不必写到许多事物，详述历史的发展。最主要的要求是深刻的思想与饱满的情感，生动的语言与有力的曲调。我们不一定都写大合唱，大器乐曲，也可以写成齐唱、对唱、与小的独唱，小型器乐曲等，不必强求一律。目前特别需要的是广大群众能唱的歌颂毛主席的齐唱歌曲。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多写些更好的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正是献给伟大的人民政党与人民领袖的好礼物。我想我们应当勇敢担负起这一任务，更多地学习，更多地思索，更多地写作，一定能够产生有力量、富有思想性，能够充分表达群众与领袖间诚挚深厚的情感的歌曲。*

03) 我所领会的 " 真理报 " 进行批评 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张春桥 (1954. 04. 19) 《人民日报》

报刊工作的一个不可破坏的原则

以“真理报”为首的苏联报刊的几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苏联报刊的一个不可破坏的原则。报纸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帮助党把人民教育成坚强的忠诚的战士。

苏联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特别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对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都作了明确坚定的指示。一九一九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报刊的著名决议，一方面强调指出了党和苏维埃的报刊是宣传、鼓动、组织的最有力的工具，是不可代替的影响最广大群众的手段；另一方面号召党的报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和苏维埃报纸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揭露在职人员和机关的各种犯罪行为，指出党和苏维埃组织的错误和缺点。所有这些，必须以实事

04)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张春桥（《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以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本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

原则 ” 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 ” 等级工资制 ” 、 ” 计件工资制 ” 可以刺激工人 ”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 ” 呀，可以刺激 ” 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 ” 呀，这种制度是 ”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 ” 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 ” 钱能通神 ” 。只要用高工资 ” 刺激 ” ，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 ” 供给制 ” 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些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 ” 钞票挂帅 ” ，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 ” 哥达纲领批判 ” 中所正确指出的， ” 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 资产阶级的法权 ” 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 ”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 ，还不能 ”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

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淨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淨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Q只因为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

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

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目。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附：毛泽东关于转载《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吴冷西的信（1）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

冷西同志：

信（2）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

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目。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

〔3〕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最早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六期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采用了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吴冷西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05) 姚文元张春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

姚文元 张春桥

1966. 07. 27

姚文元：

同志们！全体革命师生！

我们一块儿到这儿来，就呼吸到了一股革命的气息。处在革命风暴的中心，我们愿意同大家一起当小学生，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们也是同全体革命师生来干革命的。（掌声）

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在几次讲话里都谈到了，我们是来当小学生的，这是不是一句谦虚的话呢？不是。毛主席从来就教导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干部，他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能当官，当老爷。毛主席又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只能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这几天我们确实收到了很多东西，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上一次我们提出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也是从实际当中提出来的问题。工作组不能领导了，我们也不能再让它领导了，同志们，我们还能让工作组来领导吗？（不要）那么，左荧黑帮当然更不行了。那么，在这个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谁来领导我们，作当前这一个阶段的工作呢？我们认为这是实际工作当中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全体同志，全体革命师生，都应该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今天来了，有很多同志向我们提出建议成立一个临时的文化革命委员

会，来负责筹备正式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来负责领导在这一段时间内筹备工作以及开展文化革命，进行斗争，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很好的，也是从实践中来的，这是一个自力更生的思想！毛主席从来教育我们，干革命，搞建设，都要自力更生，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就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最好的，最有力的武器。同志们，我们能不能贯彻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啊？（能！）对！我们一定要贯彻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把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搞好！（掌声）

当然罗，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罗。我说了，只有坟墓里的人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他不干工作嘛。一个人最主要的看他是不是革命的，要革命，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把毛主席思想作为我们最高指示，这样真正的革命的同志就应该支持他，有缺点就应该帮助他，同他合作，刚才我们找一些同志谈话，还有一些同志也反映，就是这个相互之间，一个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名单的分配罗，比例问题罗，等等。

我个人觉得首先要考虑大局，现在不是考虑那一个系，那一个班，名额多少。当前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迫切需要一个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来把当前的斗争领导起来，这是本质的，中心的问题。所以我完全相信，我们这边绝大多数的师生，都是愿大局的都是能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来把这个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做行不行？（行！）

我们不怕。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我们敢想、敢说、敢闯、敢作、敢革命，敢把文化大革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搞到底！（掌声）在斗争当中涌现了很多好的同志，我们昨天在北大也听到一个革命小将，是一个中学生，讲得非常好，非常感动！她什么都不怕，充满了英雄的，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我们认为，干革命，最主要的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真正地为无产阶级，为贫下中农办事情。有了这样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什么人间的困难，都可以克服，毛主席说，我们要相信两条：一条是相信党，一条是相信群众，有了这两条，什么都不怕。

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革命师生，我们一定能担当起当前的任务。至于当前的许多矛盾，很多困难，很多问题，我看，从战略上都可以藐视他们，在战术上看，我们可以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一个个地一件件地解决它们，怕什么呀？不怕！天下会有革命嘛，就是打乱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旧秩序，建立无产阶级新秩序，乱一点怕什么呀！毛主席有一句诗嘛：“无限风光在险峰”。 “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这样，任何革命不能不冒风险，都不能不经过斗争，所以。只要我们大家都能照着这几天这样干下去，完全可以相信，广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出现一个更加蓬蓬勃勃的新局面！（掌声）

同志们！事情总是这样，就是过去出了坏人，出了坏事，把他打倒，就变成好事，打倒坏事就能够锻炼无产阶级，打倒牛鬼蛇神，真正的无产

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人民就能够站起来。我们揪出了左荧，还要集中斗争，把他打倒，让他爬不起来！（掌声）

我们揭发了工作组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揭发和批判，彻底清算工作组的错误路线！（掌声）这样，这些东西打倒了，批判了，我们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起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新制度，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出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参加会，充满信心，心里非常高兴，昨天到北大去开会，也是这样。只要我们大家一致努力，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周围，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我们，我们就一定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走在前面，创造出很好的经验！（掌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掌声）

张春桥同志讲话

他对原临时文革的成立表示支持，并说：“对于临时文革委员，量多的只见过两次面，我不能对哪个人打保票。有不称职的，经过群众讨论，随时可以罢免。”

大会结束后，春桥、文元同志接见了原临时文革全体委员。春桥同志说：“你们要走群众路线，对各种不同意见要善于区别，力争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团结起来。”当原临时文革负责人谈到临时文革委员都很年轻，没有经验时，文元同志说：“如果你们象在非洲，拉丁美洲，没有革命政党领导，怎么办？”春桥同志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文元同志说：“你们要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相信自己，必须建立在毛泽东思想和广大群众的基础上。”春桥同志说：“一，要破除迷信，时时处处依靠毛泽东思想，凡是与毛泽东思想不一致的都不能算数，谁掌握毛泽东思想就跟谁走。二，你们已经取得一些人的信任，大家是支持你们的，他们还要考验你们。许多问题在群众中商量，多数人还不是恶意的。真正要与广大群众结合起来，需要有一段过程。三，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困难是不会少的。”春桥同志又说：“你们要吸取工作组的教训，不能压制群众，只要你们方向对，我们就支持你们。”

06) 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张春桥 1966.08.06

〔八月六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小组成员穆欣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及河北大学来京参观的全体革命同学代表，举行了座谈会，并作了重要指示。〕

张春桥同志问：是哪几个大学来的？（众答：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什么时候到的？（众答：昨天上午十一点。于是，张春桥同志和穆欣同志向代表们互相作了介绍。）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不大了解大家要求谈些什么？各校不同，都是带着什么问题来的？

一个同学说：我们看到北大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回去以后，究竟应当怎么做？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看到了哪几个学校？（众答：北大，清华，还有师大）那你们跟我差不多。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到这里来开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我也是看了这几个学校。你们在天津有些什么问题？

一个同学说：北大的形势跟天津不一样，北大的道路是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那里和北大怎么不一样？（众答：我们那里由学校组织开大会批斗，和北大不一样。北大一次会就斗好几个，我们那里是由革委会组织的……）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的革委会是怎么选的？（南开大学一个同学讲了自己对革委会的看法。以下又有南大，天大，河大不少同学提了很多问题，递了很多条子。然后，由张春桥同志作了解答。）

同学们，我想这样，大家到北京来，是来学习的，我们到北京也是来学习的，是一个任务。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而且文化机关比较多，大专学校比较多。这个地方的同学在毛主席身边，他们受到党的教育很多，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来这里交流经验是应该的。我虽然不是北京的，但今天是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的，所以对同学们表示欢迎。同学们要求总理接见，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今天来不了，打电话给我，委托我们来和同学们见面，所以我还要代表总理对同志们表示欢迎。

先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北京的情况。

文化革命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如果说是从讨论《海瑞罢官》开始的话，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发展到批判“三家村”，一直到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这期间，经过了二百天，这二百天里，全国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家对国内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更深刻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并不是偶然的，它对全国来说不是偶然的。而大字报由聂元梓写出去，可能是偶然的。她不出，别人也会出的。毛主席看了大字报，立即就批了，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可见，文化革命的烈火是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从六月一日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北京大学在六月十八日发生了一个事件，即所谓“六·一

八”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件呢？因为工作组进来以后，没有领导革命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没有领导群众斗黑帮，而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运动不是斗陆平，到十日，连个斗争计划也没有，反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你们刚才提出的那些情况，这里都有。例如：班级之间不准串联呀，门口也不准随便进呀，校系之间不准往来呀，兄弟院校，工农兵来声援还不让进去等等，同学们耐不住了，自己起来革命，就出了个“六·一八”事件，打了一批黑帮分子。学生里面有没有不太好的呢？有。但那天打人的多数是好的，而张承先却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学的衣服。张承先借口说，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么？是反革命事件！六月十八日以前，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六月十八日以后，却转过去镇压革命学生，把参加“六·一八”事件的革命学生当反革命来镇压。工作组本来应该领导同学起来斗黑帮，但他们却来斗革命的学生，完全把方向弄反了，影响很大。此后，接连在北京出现了“六·二零”事件，“六·二三”事件，“六·三零”事件……经过调查，都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性质很清楚了。为什么有这个事件发生呢？最主要的是工作组不革命，别人起来革命。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

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这是第一句话。至於你们怎麽办，你们自己讨论。戴高帽子，我们也不提倡，戴不戴由你们讨论，青年人就是要革命的，他们最富有创造性。他们现在还没有地位，也不是权威；不怕罢官，也不会罢官，因为你们还没有当官，顶多是挨斗，戴高帽子。我看戴戴有好处，挨斗也有好处，这样可以锻炼毅力。平时说是忠于毛泽东思想，轮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你们不想给别人戴高帽子吗？人家也能给你们戴，不怕！

（有些同学递条子问：扩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学辩论使用？）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罢官都可以，连校长都可以罢，何况扩音器呢？（天大的同学提倡：既然工作组撤出，有的单位也有派出帮助革命的学生，调回来怎麽办？）派了学生帮助教职员革命，文化革命委员会有权决定，派人可以嘛！不是外边派来的，是你们内部的人嘛！

关于怎麽斗？斗谁？由学生民主辩论决定。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那么多框框。北大一万五千人的大辩论会都可以开嘛！南大可能多一些，（众答：不多，五千余人）也可以开嘛！

学生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应该占多数，教员就恐怕难教育，他们不大懂得革命，他们的地位跟你们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同学。学生不起来，恐怕革命难以搞彻底。

同学们要求八月十三日主席到你们那里去参加庆祝活动，或者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我们可以负责转达。有的同志还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你们那里去，现在中央同志正忙于北京的事情，先把北京的问题解决了，取得经验，当然愿意到处去一去。请相信我们能转达就行了。

关于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师和学生的人选，中央没有规定过比例。河北省委怎样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你们看怎么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容许在革命中随时改变，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不行就变动嘛！关于代表，绝大多数同学不同意，当然可以撤换。

（有人问：北京各院校的形势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委烂了？）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大妥当吧！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确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校党委也应该是正确的。这种论调是错误的。第一，上海市委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中央。主席是正确的，那前北京市委怎么烂了呢？党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来革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来革命。（穆欣同志说：你们还没有闹革命，你们闹嘛！）上面还有很多框框压着你们，现在你们希望我们出来说话，替你们把盖子揭开，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希望还是你们出来。中央指示很清楚，你们是主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革命师生，你们是主人，你们起来革命嘛！我们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有错误就改。如果你们学校的领导愿意革命，检查错误，也可以一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轰嘛，就闹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不来参加学校的斗争会和文化革命运动。）据我了解，子厚同志正在北京开会。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工作一直很忙。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贴他一张大字报。

（有的同学提出：刘子厚同志指示我校斗姜平的时候，让姜平和主席团并排坐着，大家不同意。）我们见到刘子厚我们传达，如果见不到，可以送他一张大字报。

（有人问：批斗怎麼结合，辩论怎麼结合？）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你们讨论，看看怎麼进行。

（一个同学提出：北大发动群众的方法是适合全国的，回去是否可以讲？）当然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你们还有框框，还没有起来革命，还没有！你们自己组织起来。你们就说，我们大了，我们现在是大学，不是幼儿园，用不着给我们安排座位。

（有些同学提出：学校曾经提出中央和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报上没点名。）贴在哪里都可以。一些框框规定，中央从来不知道，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们对我的讲话有意见，回去可以提。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常说，如果对我们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关于“内外有别”是国务院外办说过，现在没有必要了。总理讲过了嘛，不要用这个约束大家。外国人来，叫他们看好了。无非是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在搞革命。

（有人提出：学校一些党政负责人，不带头写大字报，理由是领导上写了好象是作了结论了。）等你们起来了，他就作不成结论了，谁也作不

了结论。别说是党委书记说了不算结论，中央一级同志讲话，不是也有递条子的吗？我们也不强加于人，你还是劝劝他们吧，你说了也不算定了，也不算结论，我们还不一定同意呢！叫他说嘛！你不说话，怎麼站在前头领导我们呢？他说写大字报不是时候，我们说，现在是时候了，叫他贴大字报，我们服从真理，不怕压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辩论一番，交换意见，我告诉你们，提这个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定有鬼。

有些人是不是左派，还要看看。有些人是左派，大家已经看到了，象毛主席，大家已经是公认了。但还有些左派，一部分人不承认，要展开辩论。认识一个人要看一个过程。我们党认定毛主席是领袖，是经过多少年的斗争的。过去也有些人自称领袖，象陈独秀，王明之流，但是大家不承认。我们一些自己认为是左派的同志，还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是不是左派，要看我们的（行动）。这样有益于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自己称王称霸。

（天大有人问：如果有人骂左派，贴大字报说你是“蠢驴”等等怎麼办？）那你也给他写大字报，你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左派。你们要团结多数。

（天大有人问：调查材料时，受到人事部门，组织部门阻扰怎麼办？）革命委员会真正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可以调查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动脑子，你们还要想一想，怎麼闹革命，权不在你们手里！又有委员会，又有代表，他们不代表你们，你们可以选一个委员会嘛！（穆欣同志插话：印把子还没有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不知道革命怎麼闹法，你们还

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二个人的代表会一直到进北京，新中国成立。革命怎麼闹法，不能叫领导小组出主意。

给你戴了高帽子，你还革命不革命？是共产党，共青团员，开除了你的党籍，团籍，你还干不干革命？有人提出对市委有意见，你们既然可以到北京来，就不可以到天津市委吗？你们对市委就毫无办法？我这可有点煽风点火了。

我今天谈的是一个精神，具体的话我不保险，具体的事情，我还不大了解。总之，从领导上说要放手反动群众，怕这怕那，统统是错误的。从同学来说，你们自己要做主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你们不是都会唱《国际歌》？《国际歌》的基本精神，就是号召群众起来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明确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站在你们一边。你们有个最大的支持着，就是毛主席！你们提了很多问题，你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精神，在革命实践当中，在向困难斗争当中，去想办法。智慧是在革命斗争中出来的，一个人的聪明也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的，有了困难，要想办法解决，没有什麼可怕的。只要有障碍，我们革命前进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都要彻底揭露批判！统统打倒。没有任何人阻碍了我们。只要有这种革命精神，办法就可以想出来。你们想的办法会比我们讲的办法更好。我给你们想的办法不一定好，一革命，办法就有了。

最後，请代我们向学校的革命师生问候！

07) 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张春桥

1966.08.27

【八月廿七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姚文元、王力同志接见了“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受害者，和北京红卫兵、天津红卫兵一百多名战士作了谈话】

同志们：

经过战斗，受到了锻炼。当然也挨了打，流了血。但是，正如你们说的，干革命就不怕流血，不怕掉头。这个流血事件是残暴的。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整成材料，我们上报给中央。要解决问题，还要靠你们解决，这样的斗争，还要靠当地的群众。关于天津市委和其它省市的问题，中央已经研究了。罢官很容易，中央下个决定就罢了官，但是，你们就没有对立面了。不能算胜利。所以我们要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同学们的气愤我们很理解，但是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以前这样做了，收获不太大……。

他们打你们，你们就可以打他们，重要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08) 张春桥关锋在接见福建部分赴京同学时的讲话张春桥关锋

1966.10.07

【十月七日上午 10：15 ~ 13：55 在中南海内接待站接见部分福建赴京革命师生的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陈伯达、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穆欣、叶群。接见时张春桥、关锋同志作了讲话，陈伯达同志和叶群同志还分别用闽南话和福建话和福建同学亲切交谈。被接见的单位有：福建医学院（东方红）战斗团、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团、等八个福建院校及清华、北大、北师大等校的代表共 70 余人。】

同志们：

今天听了同志们的讲话，材料很多，有的材料过去已经看过，有的还没有看过，回去再研究。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我想讲这样一个问题，明天是 8 号，十六条公布已二个月了，这二个月可以看出什么问题？林彪同志在国庆时说的两条路线斗争还在继续，在某些方面来说比十六条公布以前更尖锐更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十六条公布以前，有些地方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十六条公布后，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有些原来的矛盾表面化了更尖锐了。十六条公布后，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有的精神准备不够，至今的确还不理解，有的是坏人，十六条指出，有四种人而不是一种人。有些工人、农民很容易被挑动起来，他们保卫省、市委是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他们不会不去，如果我是工人，军队我也会去。有一条，军队不能动，这是中央的命令，要能动军队，那早就

开枪了。（笑声）全国还没有发生动军队。（同学插话：“有的公安部门已经动了。”关锋同志说：个别地方有动。）正因为个别地方有，所以中央立刻下命令，这样才能保证，斗争虽然很尖锐，但是没有发生更严重事件，这说明了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证明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不发动是不行的，要使我国不变颜色是保不住的。

同志们受到压力，受到迫害，是有困难的，这也证明这场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如果政权掌握在别人手中，那你们向谁控诉呢？你们将会怎样呢？你们还会到这里来控诉？（有个同学插话：“会被杀头。”关锋同志说：还是要革命的！）

同志们我们要把眼界放宽一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毕竟是暂时的，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但没想到会有这样复杂，你们也没想到吧！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们的传单可以印，我们的传单不能印？政治上扣了这样那样的帽子，斗几小时，十几小时甚至几天。（同学插话，在漳州市街上发现有铅印的反动传单）你们福建情况可能要复杂一些，对面敌人会利用，公开的国民党也会利用。这个革命非常不容易的。同志们，你们不是感到年轻，赶不上参加过去的斗争，觉得很遗憾生晚了吗？但是现在参加这场艰苦斗争还可以锻炼，全国的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你们还是能够到北京，还能到全国去串联，党中央完全支持你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要站在革命立场上，如果不站在革命立场上就要被推翻。

看了条子，有几种感觉，同志们受压迫很重，较苦闷，问我们怎么办？我们俩（指关锋同志）刚才讨论一下，至于该怎么办，我们还得问你们该怎么办？（同学们坚定地回答：斗争到底！）不是中央没说过话，十六条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他们也都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支持制定的，而且有的人也参加了会议，（同学插话：“叶飞也参加了。”关锋也说：不执行的还是不执行！）问题复杂就在这里，一开头中央就估计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时，毛主席公开指出有两种情况：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全国都是这样。现在出现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有的地方比你们严重，有的地方比你们差一点。这是有普遍性。中央说一句话，各人都可以利用。十六条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林彪同志说：不要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林彪同志说的完全对！革命的同志应当清醒。但有的人抓住这句话，说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打我，林彪同志讲的话并不包括革命同志批评省市委。（热烈鼓掌）应该说：违抗十六条，攻击十六条的人，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长时期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你们回去要紧紧抓住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指示，别人不执行，我们执行，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讲道理就是讲十六条的道理，林彪同志的讲话，是根据形势的发展，精神还是根据十六条。

你们要我们帮助。这些具体问题，对象是什么人？周围群众是什么人？左派是什么情况？中间派是什么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应当注意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极少数右派。左派当然人数少，现在少，将来也少。别想将来都会成为左派。当然罗要革命的是多数，最坚决、坚定

的革命左派毕竟是少数。马克思、恩格斯只两个人，谁给他印刷机、宣传车、录音机呢？当时苦得很。（关锋同志：连吃饭都成问题。）恩格斯只好跑到他父亲的工厂去，他父亲是资本家，不是红五类（笑声）！列宁还不是这？毛主席也是这样。毛主席被国民党写的传单那多了。你想想，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传单有多少？污蔑你们的传单有多少？（同学插话：单单福二中传单就卅万张。）卅万份不算多嘛！蒋介石一骂共产党文章比毛主席著作四卷还多，但蒋介石被打倒了！

革命的新生事物最初总是少数的，成长非常艰难的。我们应向革命前辈、导师学习革命的精神，现在，总的形势比他们好多了，国家政权在毛主席手中！（关锋同志：受打击是好事，不受打击怎能成为革命左派！）

（长时间鼓掌）毛主席过去被开除党籍好几次，被撤职、军权被剥夺，但是最后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方面，虽然是少数，但最后必定会取得胜利！（热烈鼓掌）我们今天在全世界还是少数，有几个党和中国党结合在一起？现在苏修一边还是多的。有一同志问，少数和多数的关系，这个是会变化的。（关锋同志：多数是暂时的、虚假的。）但只要是革命，你们就会胜利。真正革命派的少数是会逐渐增加的，如果一天增加起来是会垮台的，你们别以为今天拿到这个讲话，明天回去，队伍就一下子扩大，那样，风一吹就会垮台的，到后来又只剩下你们几个人了。干革命就是要作扎扎实实的工作，革命是没有捷径的，要准备走曲折、艰苦的道路，每个地区具体怎么走，不一样，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他们的压迫无非是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压迫，中央发出的通知首都三个司令部物质待遇应当平等，中央文革小组讲了，周总理也讲了，但没用。不要以为中央讲了都会执行。到前天，第三司令部发通知，还是用手写的，请我们去开会，后来我们查问，为什么中央规定首都三个司令部待遇应当平等，你们不执行？后来就送来了铅印的通知，我把铅印的丢掉，手写的留下，可贵！（热烈鼓掌）我说这话无非是说革命还是要靠自己。把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形成坚强核心。

昨天江青同志讲了要注意政策、策略，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注意灵活性。我们一些同志的弱点就是不太注意团结争取多数，这样会受打击，因为左派不可能很多，中间派跟谁跑就力量大。我们就要动脑筋和这些人打交道。如何去作工作，我们不要对过去围攻我们的同学闷一肚子气，大家都是同学么！（关锋插话：都是同学，都是阶级弟兄么，他们是一时受蒙蔽。）在北京，凡是说过这样的话的会争取很多同志，如果骂倒一切，对我们很不利。这一点你们要考虑，不但对工农群众，就是对同学，也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路线，这不是一天两天，有些人今天跟你们，过两天形势一变又跑了，就继续分化，不断改组。道路是曲折的，你们回去应该这样想问题。你们写条子上来，说要急着回去，回去前去北京几个学校去看，他们斗争比较尖锐，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有的被孤立时只剩下 10 个人。

（关锋插话：有的被关起来。）昨天去念通电的蒯大富那是翻身了，他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多，当然我们也有受压迫，今天我们不在这里诉苦了。（笑声）我们感到困难和你

们不同，你们和这样学校有些类似，是否和他们联系，学习他们。北航只要求工作组赵××谈谈话，到国防科委门口等了 28 天 28 夜。不谈，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谈。他还是不谈。后来，陈伯达同志说，你们二个住到学生中去谈，如果被打死，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下军令状。就是这样还不敢去。他们怕群众怕到这样的程度。十月一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辩论：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我们火了，我们说：你们再不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你。

（笑声，热烈鼓掌。）你们困难还不是最大，但你们受到的迫害，我们很同情。中央的态度很明朗，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多和他们联系，他们经验是什么，现在开始变化了。昨天的大会就是标志，主席台上的人好多就是戴过反革命帽子的，我念决定时，台下很多人都哭了。你们以后就不要怕，中央有指示，现在不是同志了吗？中央的批示你们听到了吧？（众：：听到了！关锋插话：如果他们再戴你们的帽子，你们就叫他们把指示拿出来，读给大家听。）这方面的压力，中央能作到的，中央决不会不管。但就是这样，革命还是靠自己，要有勇气，多动脑筋。从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四个多月来斗争是艰巨的，曲折的。可能现在形势又好转些，但斗来斗去还会发生变化，可能要经过多次反复，毛主席这条路线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觉悟，学习毛主席如何革命，作领导工作和分化敌人，他的天才还在于如何又斗争又团结，这里有许多问题，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最后，我希望同志们真正地锻炼成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愿望。（长时间热烈鼓掌）（此讲话由福医东方红战斗团、厦八中、厦大红卫兵独立团等单位整理。）

关 锋 讲 话

同志们：

刚才春桥同志已经说过，大家回去要坚决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福建也是大好形势，学生起来革命，少数派数目也不少。工人、农民被欺骗，被蒙蔽。围斗过你们的也出来揭发了，这不是大好形势吗？（同学插话：出来揭发的被压的很厉害。）越压越革命嘛！暴露也是个好事。

当然，不要这样想，到北京告状，党中央和毛主席就下命令，罢某某人的官，问题就解决了。这样就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简单了。如果都是那样自上而下罢某某人、某某人的官，那就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失去锻炼青年一代的意义。还是要靠工农群众、革命学生自己起来斗争。毛主席党中央对革命同志的最大支持就是十六条和林彪同志的多次讲话，应当掌握这个武器进行斗争！

至于没有印刷机呀，没有什么呀，我们讲几句话，一定要他们给，他们是不是就给呢？只要是真理嘛！传单印得再漂亮，不是真理，只是谬论，

也不行！主要在质不在量！举个例子，据我所知，北师大同学谭厚兰在批判工作组期间被打成反革命，是米高扬式的人物。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去开了个会，江青等同志都说了话，工作组也撤走了，形势该好了吧？好了几天又来了，说她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张春桥同志插话：那次我们小组全体成员都去了。）在斗争中慢慢她经验多了。现在形势就好得多了，“井冈山”红卫兵发展了很多，一批又一批的同学退出了原来的红卫兵师，加入了“井冈山”红卫兵。

那些所谓多数派是虚假的、是暂时的，多数人是要革命的，只是一时不明真相，受蒙蔽，对这些人好好地耐心地作思想斗争，要和他们讲清楚，我们相信大多数会明白、会清醒、会站在这边的。就是那些曾经骂过你们打过你们的同学，不要去计较，前几天接待中有一部分同学，他们曾经围攻北大同学，他们自己说了：“我过去围攻还打过人呢。”他也出来讲话，不是很好吗？绝大多数同学一定会站在革命这一边，他们都是拥护毛主席，只要我们作艰苦的工作，最后一定能团结大多数，左派队伍一定会在斗争中壮大起来。

就讲这几句话。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斗争胜利！（长时间热烈鼓掌）

附：当时有“厦门大学”革命师生代表队散发的《八·一九》事件真相，和洪乐等人给毛主席的“急电”给张春桥、关锋同志看，他们大笑起来，将几份传单拿起来扬一扬，很风趣地说，这么好的纸呀！（全体同学跟着大学）。

整理者：谢培坤等七人东方红大学（原清华大学）《北京公社》战斗队
印十·九·

09) 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座谈纪要

1966.10.09

总理首先问了我们学校各个组织的情况，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多少人？

同学一一回答。

总理：你们几个组织同意？（指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查之事）

同学答：七个，今天又来一个，八个。学校共十几个组织。

总理：你们说九日（指开会）没说八点。昨天才知道今晚八点开会。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正准备检查。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张春桥他是副组长，他也不能多讲。我把我能说的话说了，不能多说了。我说过中央全会解决了。（有的同学追问，总理回答：基本解决。）组织上、思想上完全通要有个过程。

张：你们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她应该检查。（张即张春桥同志，下同）

同学：不能压制我们的革命精神。

张：什么时候也不能压制，周总理昨天没有时间。

总理：还有个时间讨论，中央常委讨论，主席很忙，还要找时间。她最近去不去检查？检讨得怎样？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中央都必须讨论。你们大学生，明白嘛！（总理接电话）

同学：领导谈话可以印吗？

张：有个青年，他的传单说我主张武斗，我怎么能主张武斗呢？我不更正。因为这个印传单的打了人，一更正，这个人受压不小。最近这个青年来信说：“我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我印了传单未得到您的同意。”这样我就算了。

总理：我们讨论一下，王光美不去检查，不能当场检查，一去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就牵涉到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你们总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三大前提：党中央领导，听毛主席的话，十六条。不能拿这个问题为难党中央，不能说毛主席也做不了主。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大革命，放手发动你们，动员你们来做。大民主，四大武器，六大自由，还有放假闹革命……。我这里说的话，二十二号讲了，十一中全会解决了。党中央只能给这个范围。我们碰到澳大利亚共产党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王光美她若是一般工作人员，单一个人好办，随叫随到。她一检查，一追一问，问题就大了，势必牵涉到另外的问题……传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好处？你们考虑。有一张大字报说中央怎样，你们看了。现在全国广大人民都仰望北京，敌人也在仰望北京。《参

考消息》有吧？（同学答：有）有外国记者评论大字报有多少中央委员点了名，希望你们自觉。革命派的人听党的话，你们要努力实现革命目标。我们在开会，今天下午中央决定了，你们也有想法，我把中央情况讲清，王光美写了书面检查，明天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提出意见，满意不满意。

同学：这与蒋南翔有关。

总理：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蒋南翔他接触的主要两个人，一是中宣部×××，一是前市委××。这里面比较接近××，后期与×××有矛盾。不要再往上追了。

张：我到北京第一次开会就和蒋南翔在一个组，他对×××说得多，对××调子越来越低。

同学：陶铸同志六月十五日说蒋南翔性质定了，王光美七月还说蒋南翔性质未定。

总理：这是个人的看法。斗蒋南翔也有各种看法。

同学：我们可以和王光美谈话吗？

总理：这必然要和上面有牵连。你们把问题摆在她面前，会牵连到别的。

同学：……。

总理：错误路线就是这些。毛主席健在，你们还不相信他领导的中央和林彪同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中央全会十二日结束，后又开工作会议，十六，七日他们才回去，各省委还未传达到，你们红卫兵就围上去了。他们有的现在还未开省委委员会。要有个过程。这两个月很忙，你们闹革命，我们一方面领导你们，一方面向你们学习。我们先学习，后提意见。你们也这样。司令部常常碰不到头，几件事情一直到今天才商量到底。大字报那些问题，她不能全部回答，我们也不能全回答。廿二日我说全会基本解决了，毛主席说：也只能这样说。你们大学生知道的。现在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健在，全会又解决了。现在中央若是修正主义起作用，那你们起来造反，现在不是。大字报贴伯达同志在北大的讲的话，那是主席叫去讲的。关于主席的文章，未公布的，我们不能纠正，纠正等于肯定了。明天换个书面形式检查，不通过再检查。

张：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问题是检查范畴问题，换个方式，人不去，给书面材料。大家满意不满意，可以座谈讨论，把意见给她，再检查。

总理：把她不能回答的问题就避开，不然要我们陪着，那更麻烦。背靠背可以避开一些问题。

同学：内外有别是指什么？

总理：内外有别是指国内外。

同学：有的同学给破了。

总理：发展不更坏吗？那样的传单发出去，影响很不好。党未号召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那就是全会解决问题了。

（同学讲形势……）

总理：十一中全会后，各地为什么还很抵触，这是有个过程。你们现在大分化、大改组，浪潮一个一个的，经过十三期社论和十月六日大会，又大分化、大改组。毛主席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急，不是不革命。那样的传单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国家不能给印。你们的大字报，已把这个问题给贴出来了，再把它传出去，现在你们正在为正确路线而斗争，再搞会走远的。（电话）一个正确的路线，要在全中国生根，要有个过程，毛主席一句话能解决，必须大家认识到生根才行。文化革命重点在文化机关中，也是逐步深入。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毛主席还在总结新的经验，你们认识也有个过程。

同学：完全相信党中央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我们学校看十三期社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要批判解决，清华必须联系到王光美。

总理：那些事，你们可以拿出来批判。下面要解决还要经过长期斗争。大字报的问题，传单的问题，要牵涉到别的，而别的中央解决了。根据《红旗》社论，你们完全可以深入批判……。我们准备把蒋南翔材料全部交给你们。

同学：……他们（指谭立夫等）走了。

张：他不在也可以批判，批判吴晗，就是不在场，三家村也是一样，其实换个翦伯赞也同样达到效果。批判三家村，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他们的东西在，他代表一个阶级。（总理：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直接攻击他个人的，别的学校就不必，我们的目的不是解决一个人，我们的目的是放在观点上。同样，对王光美也是一样，她能代表路线的要批判她的观点、思想、行动、作风，这样就能肃清影响，不妨碍批判。既然形成了个路线，全国各种表现形式差不多。

总理：陈独秀他不在时，我们还要批判，这样还更深，不会在人事上抓得多，要肃清反动的路线，长期坚持不改，就会变到敌对的地位。群众万人大会上问了几个怪问题，就会下不来台，我们有亲身经验。几十年斗争证明，斗争刹车总是主席刹车，是组织上、时间上，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还要。党内的事都说了。

同学：她说可以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员。

总理：她错就可以批判，她有历史根源……。

总理：内部馆的问题那也不必，要贴我的大字报去贴。要你们认识到自觉地不出就行了。对联的辩论，刚开始，工作很难，就怕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后来发展到谭立夫的讲话，代表了。开始不是坏的，有的发展下去就不好了。慢慢发展，思想是有所发展的。分化，合并总是有的，青年的思想变化快，没有什么包袱。黑五类子弟，我们不同意这个名称，我们要改造他们，更何况子弟，他们不能形成一个阶级，不要造成人为

的阶级对立。要两好，出身第一，还要有表现，最后归宿还有个表现好。这个，谭立夫不同意……。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在继续。工作组去了，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除了几个特殊的，几乎都或多或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没派工作组の党委也是一样。党的干部，绝大多数还是认识问题……。

张：不点名还是一样发挥作用。

同学：我们要向反动路线开火，绝对树立毛主席の威信。

总理：对，而且要深入彻底批判，注意影响，路线要彻底批判。

张：书面往来。蒯大富他在群众大会上宣誓，大庭广众上恢复了名誉……。

总理：何长工的大字报在街上多了，政府是中央领导的，政府威信没了，不好。街道宣传两条路线斗争思想性多些，人名偶尔提到可以，不要把人的名字过分突出，让帝国主义、国际上知道了，会造成更多的麻烦。强调思想性、政治影响，北京、上海、广州影响大。今天我们讲中国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要注意影响。任何事情总是事实在先，认识在后，红卫兵就是毛主席及时抓住了。……社论是经过调查才写成的……。八月四号就不让王光美在清华活动。

张：你们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现在不要反过来，你们要注意团结犯错误的人。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以后犯错误的是你们。

总理：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是不革命的。……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查，中央其它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查，可以背靠背。……（同学谈到三个司令部）

总理：第三司令部我是最支持的……。

10) 张春桥在《西北地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6. 10. 14

〔参加大会的还有穆欣、戚本禹、姚文元三同志。〕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派我们四个人来，首先我受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委托，向大家问好。大家刚才送来很多条子，都是要求见毛主席，见中央同志。同志们，你们这种愿望我们完全理解，但是今天是无论如何没办法安排主席到这里来啊！同志们，你们这种愿望我们负责报告中央、报告毛主席。

同志们，我们在会场上收到很多材料，收到各个学校送给我们关于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问题有的是给中央文革小组，有的是要我们送给中央同志的，有的是要我们送给毛主席的，我们都给你们做通讯员，做到这件事。

同志们，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多月里面，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一方面看到文化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特别是我们的红卫兵在这两个月里面，破四旧、立四新，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中间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中间也包括西北地区。同志们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当然，革命总不是很平坦的，哪象我们面前这块草地（指工人体育场）那样平坦，而且上面长的草很软可以睡觉。革命不是这样，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复杂的、残酷的，是生死的斗争。因此，就不能不遇到从各方面来的阻力，而且这种阻力在某些单位、某些地区是很强的，而且我们看到不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步都不退让，他们多么顽抗，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斗争，甚至于经过艰苦的斗争。但是他们毕竟是腐朽的力量，是没有生命的。我们革命的师生代表着新生力量，有旺盛的生命力，他们总是要失败的。同志们都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我们制订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整的路线即十六条，只要我们按照十六条办事，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就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的。当然，同志们，你们还会遇到困难。你们过去遇到了困难，将来还会遇到困难。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有多次的反复的，不单在一个学校会有反复，一次二次反复，在一个地区是这样，在全国也是这个形势。要把毛主席路线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彻底的胜利，那还需要我们作艰苦的斗争，做细致的工作，阵地一个个占领，我们不能希望很快地取得胜利。但是很高兴地看到西

北地区，在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有这么多人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在予告着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们能够最后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的，我们要下定决心……而且我们要估计到。（同学们有的递条子说：打成“反革命”怎么办？）有的地方甚至祖孙三代都打成反革命，问我们怎么办？这个中央已经有文件，通知了各个地方，你们大概也听到了。怎么说呢？就是《中央军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急指示》，党中央所批准的，就讲了在前一阶段各个地方、各个地区、各个单位把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工人打成“反革命”，所有这些一律平反，这一条中央已经决定了，而且通知了全国了。同志们可能担心，中央通知是通知了，他们不执行怎么办？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十六条不是公布了吗？他们就有人不执行嘛！那这个情况也可能嘛！我说不要怕，如果你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被资产阶级叫成“反革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我们不必要担这个心。我们既然下定决心，戴着这个帽子照样革命，而且中央也不会说不要你们，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大会就表示了这个态度。同学们，我要说的话可以说得很长，时间已经很晚了，而且刚才接到电话要我们马上回去开会，我就不能再多讲了。

我们希望同学将中央文革小组对西北人民、对你们革命师生的问候带回去。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张春桥关于长征问题的讲话

1966.10.28

【地点：政协礼堂】

大连有十五位同学从大连跑到北京来，还有从上海来到北京的同学，（上海同学走的比大连还长，不登报是因为走了一段路，坐了一段车。）他们都很可爱。

蚌埠的同学十七号到达通县，问题出来了。（十八日主席接见）同学说：是坐车去见毛主席呢？还是继续走呢？还是走吧，下次再见毛主席。

有人说，瑞金 - 延安 - 北京，这个想法很好，现在看来雪山过不去，（谢富治副总理点着头用手比）雪山这么高，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吃什么，还要设粮站。你们坚持步行是好的，有时我们还要帮忙呀。

北京现在一天走出不到十万，很多还是北京的，外地的走的不太多。现在病号很多，（走出后）老乡是不是欢迎呢？我看有的可能不欢迎，要做好工作，可不能下最后通牒。

长征，有些人不敢，别的事情都勇敢，走这条路他不敢。

走完了怎么办？我说不要紧，原先我也想不通，怕字当头，都走了怎么办？现在看来一样，走了很多不是一样的办事吗？我看你们的观点，出去串联就统一了。有的在校保工作组的，在外串联就狠搞工作组了。因为工作组压了他，不压迫不革命嘛！

出外串联，对北京文化大革命不会有害处，只会有好处，不过时间拖长一点，没有什么，半年不行再来半年，（指文化革命）如果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国家搞好了，永不变色，那还是成绩很大了嘛！苏联搞了五十年还修了嘛！

出外串联不会影响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去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部分，长征能炼出一批走路的人，走路是不大容易的事。

（有人递条子问：长征经费怎么办？）这个问题没法答复，因为刚开始，我们正在研究，哪些地方有粮库，哪些地方没有，哪些地方有医院，哪些地方没有，医生怎么办？现在正在宣传长征的意义和好处，有的先做起来了，可能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

12) 张春桥接见 " 浙江金华北上控告 团 " 时的讲话

1966.10.29

同学们：

真对不起，你们到北京来，已经等了很久，有的等得长一点，有的等得短一点，由于我们时间难安排，一直不能跟大家见面。这里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张春桥（鼓掌），这位叫穆欣。（鼓掌）

关于金华的情况，同学们来以前，我们就知道一些，看到一些材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那边文化革命很关心。刚才和你们的代表谈了话，知道了一些最近的情况，他们也反映了你们到北京的要求。我想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最广泛最深刻的革命，全世界都没有搞过，譬如苏联，从十月革命到明年已五十年了，列宁在时想搞，但未来得及搞就逝世了。斯大林做了一些文化革命的事，但象中国这样由成千成万学生，群众参加的这么大规模的文化革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别人也不敢！象我们这样放手，大中学校都放假来搞革命，哪一个国家这样干过？没有！而且可以坐火车不买票，一批一批到北京来。原来我们预计到北京二百万人，可是现在将近五百万了。至于各地学生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的互相串联，这个数字还没法统计。搞这么大的革命，为什么？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思想领域里，意识形态里的资产阶级东西肃清，用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来代替四旧，改造世界。如果我们的国家，七亿人口都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那就不可战胜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空前伟大的意义，你们现在还看不大清楚，以后会看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

没干过的事，比巴黎公社的意义要大，比十月革命都更富有群众性，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的规模都大。正因为是这样一场大革命，因此，它必定会遇到各种阻力，这是可以想到的。

但是，具体如金华地区，会遇到那么大的困难，这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共产党的地委，怎么能压制你们？怎么能挑动工人、农民斗你们？我们估计会有阻力，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在全国，十六条出来后，这个阻力更大了，也就更表面化了，而群众则更发动起来了，有的地方发生在十六条以前，更多的地方是在十六条以后发生。对很多人来说有个认识过程，开始对运动不认识，但有一些人就不是，他们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不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角度看，那很多现象则没法解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本来就存在，但没有这么复杂，现在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了。

你们在北京住了很久，北京各学校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斗争很复杂，不是很容易的。看来会有反复，还会继续很长时间。也就是无产阶级起来，被压下去，又起来，又被压下去，双方的斗争，会有多次的斗争较量，不是一次，可能反复多次，最后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同学们应该有这个准备。因此，就搞文化大革命说，现在只能说是初期，是个开头。如从去年批判《海瑞罢官》算起，刚一年，但上半年规模不大，广大工农兵刚开始注意，学生作一般辩论，报纸上也只开展一般的辩论，打“笔墨官司”。今年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了北大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马上起了一个高潮，但这个高潮马上

就被打下去了，到八月八日，十六条出来，又一个高潮，特别是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后，又起了一个新高潮，各地学生革命大串联，炮轰省市委也起来了。金华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时候。全国从那时到八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这证明群众起来了。结果会遇到阻力很大。你们金华问题，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是一个很严重镇压学生的事件，完全违反十六条。我看了李学智的检查，检查太轻了，说什么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个“性”字要去掉，就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是完全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要我们表示态度，我们认为，同学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支持你们！

（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革命的同学要求见地委书记，一个地委书记，竟然摆那么大的架子！李学智怕的要死，共产党员怕群众的那个样子，那称什么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本来应该到群众中去，群众找上门来了，他还不出来，这算什么共产党员？你们在地委门口等了廿几个小时，这完全应该！但是我有一点不大赞成，就是不吃饭。他们吃饱饭、睡好觉，你们也吃好饭、睡好觉再来包围。今天你不来，我们明天再来，再跟你斗！不吃饭，身体要垮的，我们以后不干那傻事！你们出来，就没有道理。你不出来算了，为什么用那么多方法去挑动工人、农民、利用工人、农民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去包围学生，那还得了！这个不能怪工人、农民，这个责任应该归地委。（鼓掌）特别是中央发表了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不准挑动群众斗学生，三令五申，他们仍然这样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关系，这更加错误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完全和毛主席

席的革命路线相反的。（热烈鼓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来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指金华地委）是反革命的路线，是压制群众的路线，是反对群众的路线，所以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这条路线，你们要炮轰，要批判，我们完全支持！（热烈鼓掌）这一条路线不彻底肃清，不彻底批判，那革命就要受挫折。你们同学要坚决执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路线，才能取得胜利！

林彪同志在国庆节的讲话，以后《人民日报》、《红旗》的社论发表已一个月了，北京搞的轰轰烈烈，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金华地委呢？平反的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刚才了解金华还没平反，这个错误越来越严重，还没改正。因此同学们很愤怒，到北京来，要听听中央的意见，我们的态度刚才说过了，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而且全国都要搞到底，需要搞多少时间，就搞多少时间。现在搞了五个月，还可以来五个月，还不行，要多少时间就搞多少时间。一定要搞到底！这个决心非常坚定。是党中央的决心，是毛主席的决心！（热烈鼓掌）

如果同学们也赞成这个决心的话，那你们提出来的问题就好谈了。

一个问题是要撤李学智的职，罢李学智的官，金华地委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依我个人意见，这个人做地委书记是不行的。（热烈鼓掌）但是，

目前我们这里收到要求罢官的信很多，全国各地都有。这个人不行，是马上罢了呢，还是先斗一斗呢？刚才代表来说，不罢了他，我们困难更多。我说这也有道理，如果先罢了，可以顺利一些。但是很多地方要求罢官。为什么一般的据我知道的都没有批？是不是不能满足同学们的愿望呢？不是的。我们就讲一个道理，这事最好慢一点，好处就是一直可以保留一个对立面。如平反的工作，要他去做，挑动工农群众可以让他到工农群众那里来检讨。如一罢掉了，他就不干，同时同学们也就锻炼不出本领来了，因为同学们还很年轻，假如你现在苏联学习，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统治下你要起来闹革命，怎么搞法，你想过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经过文化革命挖掉了，不是说以后不出修正主义了，罢了李学智的官，是否就挖掉了修正主义的根子？列宁、斯大林没有想到自己的故乡会出修正主义，苏联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没有锻炼好青年一代，出了修正主义，就没有办法了。苏联人民是列宁领导下的经过十月革命的人民，我们相信他们能够取得胜利。但开始就没有精神准备。苏联人民到哪里去告状？到中央去告，不是告一个抓一个？所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大演习，在我们中国，如果县委变了，这个县的人民可以起来把他推翻。一个地委变了也同样，人民可以起来把它推翻，而不是靠上级，这个就比较艰苦。好在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中央，现在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来一个演习，在斗争中锻炼你们。如果要中央下个决心，不难打个电报就行了。但对你们来说，在斗争中锻炼机会就少了。你们不是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吗？你们要想办法，不但现在不出修正主义，而且还要保证以后不出修正主义。

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有办法对付了。同学们可能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想，只想中央同意了，高高兴兴地回去。你们到街上去，到处都有罢官的要求，象陕西要罢霍士廉，甘肃要罢汪锋，西北局要罢刘澜涛，中央都没有表示意见。为什么中央不批准？难道中央不支持你们吗？不是，北大陆平是修正主义，不行，一下子拔掉，派了张承先，北大同学说，大家含着泪迎来了工作组，但又受压迫。同学们，没有压迫就没有革命呀，没有压迫还算什么革命者？算什么红卫兵？我们青年就是要多受一点压迫，多受一些锻炼，也包括自己犯一些错误，这都不要紧。

你们怕回去交不上帐，回去怎么办？这没有关系，我个人理解这正是毛主席完全相信革命人民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解决了问题，影响才大，影响好几代，要创造一个不出修正主义的办法，而且有参加过斗争的人，学会如何正确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只要有了这种经验，这种人，才撤职，罢官，意义就更大了。我把你们的要求我们一定负责报告党中央，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考虑我们的意见。怎么去工作、斗争，你们考虑，这是不是不支持你们呢？不是。用这种办法才是最大的支持。如果只听上级的决定，那苏联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请同志想一想，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两个人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决定的。不罢官，这样去斗，斗起来才有味道儿，越斗越有办法，越斗越有劲，聪明才智是在斗争中增加的，现在你们受压迫，群众起来了，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一个意见是要求开展四清，这个方针早定了，最近中央开了会，省里同志也刚回去，这用不着担心，同学们的意见是要提早搞，关于具体如浙江金华什么时候搞，提早到什么时间，这个我不了解，我们可以转告。

还有一个意见，同学们要我们中央派人去调查、处理、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同学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有人会去的，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去了解，但是还是那句话，相信那里的群众自己可以解决问题，但要经过斗争。

你们送来的材料，我们要仔细研究，报告中央。

我们想，在浙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杭州是省会，金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好，靠谁做呢？靠那里的革命师生、工农群众。中央给你们的思想武器，是十六条，是毛泽东思想，有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管阻力有多大，就一定能把斗争搞彻底，使得我们的国家颜色永远是红的，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把全世界的革命推向前进。

我想向同学们讲的就是这么一点意见，不对的，请同学们批评。（热烈鼓掌）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对你们充满信心，完全相信你们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只要到毛主席著作中取武器，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党中央、毛主席都是支持你们的！（长时间热烈鼓掌）

13) 张春桥戚本禹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 讲话摘要

1966.11.01

〔被接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造反红卫兵总部、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北京第一、二、三司令部代表。〕

张春桥讲话：

红卫兵成立全国性组织，一定要通过中央讨论。你们有这种积极性很好，我们不反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条件如何，是不是没有这种组织不行，是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因为整个运动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中央都直接把指示告诉全国人民，每一次接见都提出了当时的中心问题，竭力避免形式主义。过去开会一定要作报告，报告三小时，现在都打破了这些，毛主席向来都不喜欢这些，不需要讲的不讲嘛！也可以用其他形式，如《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告诉全党，全国人民。党是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毛主席的路线是经过斗争得到发展的。现在上千万人在串联，到北京来了几百万人，有的来过几次，这就没法统计了。原来想分期分批地来，现在都打破了。这么大的运动也不能下框框，很多问题群众在串联中能解决。天南地北，从哈尔滨到海南岛，在群众大串联中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解决。

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我们要考虑，我看条件不够成熟。

串联的单位今天可能是左派，在大动荡中青年也允许犯错误，观点也可以改变。大动荡中建立这样的组织，有非常不稳定的可能性。现在你们要做艰苦，细致，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能满足于少数派，过去你们被斗是光荣的。在革命运动中如何把左派组织起来，团结大多数，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不是讲话，发通告能够解决的。现在就缺少艰苦，细致的工作。共青团中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改组呢？还要看一看，因斗争在发展中变化很大，组织问题放在后期比较好。现在不要急于建立全国性红卫兵组织。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实际上还是中国的，别的国家也不可能马上成立红卫兵组织，日本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扑灭了。墨西哥也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抓进监狱。说明中国红卫兵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在全世界还要有一个过程。

戚本禹讲话：

大方向是对的，潮流所趋，红卫兵是否代替共青团还得考虑。红卫兵全国组织是一种趋势，将来总会建立的，这是大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全国红卫兵的大事，对整个世界震动很大。因此这么大的组织不能仓促成立，要做很多工作。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主席不能做你们的统帅，这不是小孩闹着玩的事情，牵涉到国际关系……你们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发了大字报，外国人都很感兴趣。我们俩人建议你们不要用这个旗号打出去，打出去反而对

人家国家的红卫兵斗争不利。日本出现了，被抓了，就搞秘密组织，抓是抓不尽的，革命的大火是扑不灭的。你们搞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有联系可以抓，这样好心变成坏事，对外国（革命）并不有利。

红卫兵全国性组织，将来是要成立的，但要经过一定时期。文化革命运动，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大动荡，大分化，比较稳定的时期……你们要成立，不要比建立全国性的组织，要比做踏实细致的工作。现在不要急于成立这样的组织，到时候你们不成立也不行，那时候我们再听听你们的意见。

各地方还很艰苦，你们要更好地做些踏实工作，你们会讲话，会分析，都是风流人物……到各地联络，调查研究，哪些是左派，保守派是哪些，哪些人拥护毛主席。

你们要做踏实工作，不要打旗号，目标小有好处，懂吗？将来是要建立这个组织的，前途是光明的。

14) 周恩来对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电话指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

1966.11.02

〔按：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丁莱夫操纵广播局派到广播学院的工作组拒不执行紧急指示，并将工作组整学院革命师生的黑材料藏到广播大楼里，企图“秋后算账”。学院的革命小将多次要求处理黑材料，工作组不理睬，十一月二日 广院小将再一次到广播大楼要求工作组处理黑材料。工作组竟封锁大门，把小将们阻拦在门外整整一天，进行刁难，不予处理，最后小将们忍无可忍，冲进大楼查封黑材料。〕

周总理第一次电话指示

周总理命令学院工作组组长李哲夫（原广播局副局长、局党委政治部主任）：按军委紧急指示精神处理黑材料。

周总理第二次电话指示

（革命小将们打开了政治部的一个柜子，这时有人通知学生代表接周总理打来的电话。）

周总理：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同学们暂时撤出，你们找五个代表，我派一个外事秘书和你们一块搜查，你们看好不好？

同学答：好！

同学问：丁莱夫是您亲自派到广播局的吗？

周总理：不是，不是。我一个人怎么能决定派谁呢？

同学问：是谁派的？是罗瑞卿派丁莱夫到广播局的吗？

周总理：这个我不太清楚，是中央决定派人，具体是总政治部干部派来的，派谁由他们管。

同学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丁莱夫的？

周总理：他到广播局后，我才认识他的。

〔电话还未打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已来到广播局。以下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话纪要。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二十三时到三日凌晨。地点：广播局总编室。〕

开始，先到的同学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汇报要材料的经过。随后张春桥同志（下简称张）问李哲夫（下简称李）：你听到军委指示后怎么办的？你们几时传达的军委指示？

李：（含糊其词）正式见文件是五号。是十月十几号传达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是丁莱夫同志传达的。

张：什么时候传达的，你记不清了，……又记不清了，你们记性怎么那么坏？

姚文元同志（下简称姚）说：你们有些事情我们却记得很清楚。

（接着李哲夫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交待事件的经过。中间姚文元同志出去接见在门口的同学。）

张：你们的材料烧过没有？

李：没有。

同学：有。你们的组员有烧的。

（李哲夫继续交待。）

张：传达晚了，你说是丁莱夫，那就由丁莱夫负责。你们订立执行方案没有？

李：没有。

张：你们到学院传达过军委指示没有？

李：没有。从我们撤离后，就没管过。

张：军委指示来后，未去（学院）传达。你们研究过怎么办？按你理解怎么执行？研究过方案没有？传达后，你们应该研究工作组应该怎么执行。这个指示和你没有关系吗？（这一连串问话，李哲夫等无言可答。）

姚：在九、十月份你们办些什么？和学院有联系吗？

李：没有。

同学：杨子毅找过×××。

张：怎么执行，党委讨论过没有？有无执行方案？

李（吞吞吐吐）：不知道。

张：你是党委委员吗？

李：我是。我参加的会，没有讨论过。我经常出去。

张春桥同志又问王寿仁同志（下简称王）

王：我们党委会学习过一次。

张：制定过执行的具体办法没有？

王：四个人参加了，领会文件不透。去问一下，对这件事情不清楚。（说完出去了。）

这时，反对广院小将革命行动的一个人（女）递条子给姚文元同志，条子上写：“我是受迫害者，我是被打的，希望首长不要听一面之词（指接见开始时革命同学向首长汇报的情况），全面了解情况。”此人出去后又进来说：“我想跟首长谈一谈。”姚文元同志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专来解决材料问题的，明天还有事情，你写成书面材料好不好？”她坐了下来。支持广院小将革命行动的战斗团的一男同志和一女同志递上一条子，上面写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广播局问题很严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调查。”

姚文元同志很感兴趣，便和那女同志谈了起来，并将他们送上的两份文件拿走，说：“我们拿走，回去看一看。”

张春桥同志接着问：领会不透，你们向中央请示了没有？跟（学院）群众商量了没有？问问同学怎么办。

李哲夫哑口无言。

张：根据你们（指李哲夫）说的，你们第一不上报中央请示，第二不同群众商量。如感到没办法，一请示上级，二与群众商量，两头都不问，那算什么？

李（急忙解释）：我们向市委请示过。

张：你们什么时候才请示？他们找上门来才请示。这个指示（指军委指示）是比较原则，很多地方纷纷打来电报，说：“难以贯彻”。你们领会不透，也不上报中央。当时学生普遍感到有压力，反映这一条。我们写指示时，想得比较简单，认为同学自己写的检查交给本人，其余的全部当众烧毁。我们自己没当过工作组，没干过工作组的事，所以我们不知道整理过多少种材料，没想到这么复杂。后来我们发现有的同学互相写的，比如我写了你的，你写了他的。如果不知道还好，知道后宽宏大量的还好。但是年青人嘛，知道后就说：“你整我的材料，你是什么？”这样知道后，会引起群众斗群众，写材料的人大都属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护。这样解放了一批人，又有一批人背上了包袱。自己写的检讨退回本人。还有些材料，如工作组长讲话，也交给大家。其余材料先封存，以后烧掉好，免得引起新的纠纷。以后再别搞这些，同学间有意见，可以正常进行批评。

同学：有人整理的材料还交出来，怎么办？

张：没交出来的，先不要搜，免得同学不好团结，等他们觉悟了，他们会交给你们，或者自己销毁。

同学：有人还整理材料，并且扬言“后会有期”。

张：这是工作组的遗毒，不要把矛头指向那一派。你们一直叫少数派就不光荣了，当你们孤立时我们支持你们的，当形势变化了，你们应从少数派变为多数派。对那些同学要做工作。对工作组存在分歧不是一天，青年学生处在变动时期，如跟着跑就坏了。你们更容易受外界影响，还需要与工农兵结合。我们比你们年岁大一点，也是这样，有个时候，全国各地来电报都是说：“红卫兵尽干坏事、打人、闹事。”我们听了，也要考虑两天，要是不坚定，有一点动摇，就会犯错误。

姚：同学们和我们座谈，讲有人要秋后算帐，这样有人担心被打成反革命，到现在也不敢说一句话。

张：这是一个祸根，军委指示就是为了消除祸根，使大家能解放出来，共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开始我们想得简单了，后来就决定发一个补充的，但认为用中央的名义，就不能匆匆忙忙地发，发了个补充，再来个补充，所以一直没有发。关于工作组作的公开报告，有利于批判反动路线，拿出来批，其余的封存起来，烧掉，免得以后再斗起来，这是初步想法。

……（同学说话很多）

张：我们一直想到你们那里去。

姚：你们有个陈××跳楼的怎么回事？他们斗了这个人？

李：我不知道。

姚：你们干的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同学：有人让中央文革小组到我院作检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笑了。）

姚：我们是准备要去的，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播学院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广播学院不仅是黑材料问题，还有别的问题。贴了我们大字报，我们怎么能不知道？不是有人还“造”江青同志的“反”吗？我们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没有时间。

同学：《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一手打倒“临革会”，一手打倒“代表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又笑了。）

张：其实还是两派。

同学：现在过来的人逐渐增多。

姚：现在动荡很大，你们还要准备他们动荡回去。……

张春桥同志又把话题转到材料问题上来：你们（李哲夫等）在广播学院执行了什么路线，要好好检查。我们早就想找你们，我们感到你们有问

题，我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找你们。我们很想把丁莱夫……你，你们党委，找到我们那里开个会。你们的事很奇怪。这个事，第一你们没有认真讨论，第二没有一个执行方案。你们急不急？局党委不急，你是工作组的人，你为什么不急？也不请示市委，也不请示中央，也不与群众商量，这些事你们都没做。我的话是否符合事实？我根据他（李哲夫）讲的，我没做另外调查。你们广播局，是消息灵通机关，没有认真对待中央指示，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这些话？这三点是否符合事实？十月六号在第三司令部大会上，我宣读的已是正式文件，不是发言稿，全国都知道了，你们不知道？到十几号才知道？不理解又不请示，态度是不对的，才发展到今天，现在是不是这样？你们要保证材料不能转移，不能隐藏，允许现在不全。你可以说：可能现在有些东西不在。不在可以找出来，但要保证不能隐瞒，不能转移，不能私自销毁，可以把现有的封存起来。可以去查一查那些是同学的个人检讨，拿出来；你们的讲话都要拿出来，其余的双方（指同学，工作组）派代表，封起来。这几天我们有些焦虑，同学们弄材料的时间多了。你们要早一些主动解决，就不会为这一件事纠缠。消毒是很不容易，这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很好的消毒，大会是能壮声势，真正能说通一个人不容易，特别是影响大的人。

你（李哲夫）是说死话，还是说活话？现在允许你说活话。我们相信他们（指同学），也同意你说活话。

李：我们整了六个人的材料，已经给他们了。

同学：别人的也整了，有人看见有的组员已经销毁了。六个人的材料，你们交出来还后悔吗？

李：我们再让组员找一找。交出来。

张：以后查出来的，再找他们一块查看，再封起来，说我们又找来一批。开个目录，写上都是什么材料，谁的，多少。

同学：人保科，我们信不着，他们尽干坏事，我们已经把档案封上了，怎么办？

张：学院你们管不管？

李：不管。

张：各个学校分别各部管，不行的话找那个副总理管，现在总理很忙，我们担心他身体支持不了。你们再问一问中央。你们应该勇敢担起来。错就检讨，改正可以成好干部，这样不改就成问题，改不改头一条就看平反。《红旗》十四期社论讲得很清楚，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勇于改正，同学们会欢迎你们改正错误。广播局党委也应当督促他们把材料搞好。（王寿仁同志

连忙点头说：是，是，是。）同学们一块学习，过去说了那些错话，交给同学批判。

你们（指李哲夫）帮查一查档案。不能把材料往档案里塞，凡是从文化革命开始，从六月二日算起吧，塞进档案的都不好，一是个人写的，或别人写的，一块取出。

（李哲夫向张春桥同志汇报他们执行的具体做法。）

张：别这样详细的说了吧，我们很忙，封材料的事，你们双方解决吧！我们就不参加了。

（这时王寿仁同志忙说：还有什么指示？你就下吧！我们坚决执行。）

张：我们不是来下指示的，我们是来督促你们执行中央指示的。

同学：广播局对我们少数派不平等。

张：在组织上，经济上应该平等。

李：是，是。

张：至于在政治上嘛，倾向于谁，我就不好说了，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彼此之间是很了解的。

接着，张春桥同志把同学叫到一块说：我们一点也不责备你们，我们怕你们上当，怕你们吃亏，我们听到后，立即就来了。

姚：有人故意把材料从保险柜中拿出来，然后引同学翻，这样诬蔑同学抢档案，我们怕你们被动。

（大家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边说着，边往外走。走到门口，那位递条子的所谓“受害者”和一位干部反对中央首长支持革命学生，要求首长一定到×楼干部处办公室看现场。）

张：不去了，时间很晚了。

（但那女的仍旧不放，非要首长去看看不可。）

姚：好吧，我们不去看，你们下不了台。

张春桥同志生气地说：去，去。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转身往政治部走。这时王寿仁连忙挡住去路，齐声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首长没时间。）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就同大家一块走下楼。

15) 张春桥戚本禹与北航“红旗”五名战士谈话

1966.11.11

“红旗”战士：自从《红卫兵不怕远征难》那篇社论发表以后，大部分都长征去了，我们留下来的到北京社会上去，到工厂去。

戚本禹同志答：与工农结合，大方向没错。

问：我们到工厂去了几趟，看到真正工人的造反精神比我们好，现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我们迈开脚步到工厂去和工人相结合，了解社会。我们到工厂去写大字报，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工人谈心，替工人抄大字报，和工人一块劳动，搬到工厂去住。

我们是到光华木材厂的。工人同志纷纷要求我们去，那里路很远，我们准备搬到那里去住。

戚本禹答：到工厂与工人一起住，不要打破他们的生产秩序。当然有的生产秩序也是要打破的，靠群众去创，去打破，这样就可以了。

张春桥答：搞工厂是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至於怎么样搞，你们去闯，去摸索经验。

问：有人反对我们进工厂，例如：北京玉器厂，光华木材厂，红旗战斗团也对我们提抗议。

张春桥：这是一件新鲜事物嘛！当然有人反对，（笑）反对你们进工厂的指导思想是怕你们打破了他们的生产秩序。如果你们注意了，把革命和生产的关係处理好了，他们就不反了。首先你们应该和工人接触，现在不要到车间去，因为他们内部不统一，也谈不了多少话。我以前有几次到工厂去，也是这样，要等工人下了班再和他们谈话，否则你们到这派师傅那里去劳动，另一派可能全部停工，那就不好了。

问：我们想搞几个点摸索经验，是不是你们也深入配合我们搞点，总结经验。

戚本禹、张春桥同志：好！好！好！还是靠你们去闯吧！找几个工人谈心。

16) 张春桥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讲话

张春桥 1966. 11. 13

〔按：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接见了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由安亭部分回来的同志，同意了工人们提出的五项革命要求。这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一次重大胜利！工农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和这次胜利，标志着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最最坚决地支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最最热烈地欢呼他们所取得的胜利！向敢於斗争，敢於胜利的海上工人阶级学习！上海工人赴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最坚决地支持上海工人的革命行动！革命师生和工农兵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同志们：

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头一个问题：

（ 1 ）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 2 ）十一月四日 的大会後，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麼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 3 ）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後果，你们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了通知，你们回去後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你们回去但不能保证不受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 4 ）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理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 5 ）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象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承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大会後我还要找工人同志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遇到什麼问题，你们如何解决，如革命和生产的
关系，曹荻秋同志检查的时间，下一次会议的准备等，我希望上海文化
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最
热爱毛主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
海的文化革命运动一定能够走在全国的前面，如同工业上一样。

附件：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体工人要求：

- 1 ， 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
- 2 ， 承认 “ 一一·九 ” 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派代表——张春桥同志加的）
- 3 ， 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完全负责；
- 4 ， 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 5 ， 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同意张春桥（签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17) 张春桥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全体战士时的讲话

张春桥 1966. 11. 15

非常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到处找我。但希望这种方式今后不要推广。我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与你们见面，不高兴的是这样做影响我的工作。我回来是因为上海部分工人到北京请愿步行到安亭，影响了交通生产。为此我匆匆忙忙赶回，但是具体情况还不太了解，问题亦没解决完。这次回来匆忙之际本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后，再与同学见面谈谈，你们既已找到我也就很高兴与你们见面。我总想回来的，对上海的文化革命我们关心。从同学来信和与到北京串联的同学谈话中知道一些情况，但不详细。

首先嘛，要谈一谈陈琳瑚（原工作组组长）的问题。刚才同学与我谈了一下情况，当时讨论的焦点是陈琳瑚去检查。这个原则无问题，中央早已作了决定，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无论什么人叫，什么派要他检讨，即使很少的人叫他都要去。如果一派要，就向一派人作检查，那派不需要检查，那就不要听。现在听起来“红旗”（同济保守派）也想让他作检讨。我这次来是和大家见一次面。另外还有一部分工人在等我。你们把材料另外送给我，我看了再发表意见。你们原来是少数派，你们要注意他们那边过去可能保得很厉害。你们说他们说过工作组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下子转过来不那么容易，现在突然转过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恐怕还要具体分析。同学中问题，他们可能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较深，应按《红旗》十四期社论关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影响者处理，只要他们认识觉悟过来就行，要团结一致。同学一般是不检

讨的，但是如果个别人执行坚决，行为恶劣的，我个人意见也可以检查一下，因为太坚决了。但我们始终认为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原则上不能调和，思想上要划清，开展辩论我赞成。青年人嘛，思想是易变的。团结和批评是统一的。我们自己不会犯错误吗？也会的。

工作组检查，完全可以，要求他首先到东方红兵团（造反派）检查，也可以，因为你们要求积极。要陈琳瑚到学校住，原则上同意。

同学之间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不要为这些问题争执不下，不要在同学间对立起来。毛主席曾经讲过不要忙于派工作组。对工作组问题大家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过去无论搞土改，四清，什么都有一种习惯，要派工作组；还有解放军是战斗队亦是工作队，这已成为一个习惯的形式。因此派工作组本身不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是一种形式，土改派工作组就不是路线错误，四清也不是。问题是派工作组去干什么？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个提出工作组问题，又考虑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是陈伯达同志，而它又是北京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人民日报》），但它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大家公认的马列主义的工作组。因此不能那样谈，要具体分析。上海派的少，是受了毛主席路线的影响。但不一定看多少，天津不是亦没有派工作组吗？那里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也够呛！不能看形式，要看他执行的什么路线。不相信群众，不派工作组还是有犯错误的，这和执行路线的人有关。

关于材料问题，中央军委已作指示，最近还可能发一补充指示，今天我就不讲了。

（念条子：为什么我们少数派找陈琳瑚不容易，而他们红旗兵团一个电话就把他请来了。）

这说明他们联系没有中断，因此很容易。同志们要知道，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党历史上，从来未象这次这样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例如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路线都没有象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在党内外的进行批判。我希望你们在批判错误路线中学习好毛主席著作，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又是必须的。你们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著作，学会这一条很不容易。要知道，只要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斗争就必定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不会熄灭的。”就是没有阶级，也会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要学会主席思想。你们将来成了当权派后能否象主席那样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呢？

同志们一定要好好抓紧活材料（同济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多学毛主席著作，不能只看眼前的事，还要好好对照毛主席著作学习。

今天还有同志等着我，我看是不是谈这些，以后有问题再说。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平时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但我对”红旗”一点也不了解，我必须听听他们的意见，一点也不听他们的意见这怎么行呢？我不搞折衷主义，我是倾向于你们这一边的。

18) 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分工人讲话

张春桥 1966. 11. 16

〔录音记录于苏州铁路中学〕

同志们，我们又见面了，这次见面，你们的心情和我的心情都有了变化，当然我这方面的变化不小，我下面再讲。我接受任务，由韩哲一同志讲到他是在怎样一个匆忙之下，讲了放行的话。这的确是谷牧同志作出的决定。后来中央知道这个决定，认为是不对的，怎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因为，那几天，同志们都知道毛主席连续检阅接见，头一天六十万，第二天一百七十万，中央的同志就是为这二百万革命师生的接见日日夜夜忙着，别的事情一点也没干，总理忙得几天都没有睡，所以，有的事情处理比较仓促，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这个人 and 那个人都没有接头，仓促之间出了这样的错误，在那样的情况下决定派我来的，给我的任务也是非常仓促，拿我个人来说，我也没有来得及打个电话问问上海到底是怎么回事。伯达同志在那里写信，写了一夜，信确实是他自己写的，我看了一眼，我就去打电话，问飞机怎么样，因为飞机要临时调，班机没有。这样忙着出发，非常仓促，到了上海机场，也没有来得及，就急急忙忙向安亭去了。

同志们，这几天，在上海也好，昨天晚上也好，对我提出的批评，说我在安亭讲话不妥当，这个批评我是接受的，因为，我的精神准备没有这样的复杂，我是个共产党员，给了我任务马上要出发，可是，出发不是那么从容，不是那么从容地调查过，当时，同志们要知道为什么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统统在电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那时陈伯达同志匆匆忙忙写这封信是在什么客观环境下呢？我不是讲客观原因，而是要说明一下。

从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以来，铁路运输很紧张，而且一天比一天紧张，过去我认为上海南京路可能是世界上人最多的了，到星期天就走不过去，现在天安门广场就象星期天的南京路，随时开五十万人的大会，这要安装个喇叭就有这么多人。过去来北京的最高每天达十万人，到后来每天达二十万人，有一天达二十六万，火车载重到什么程度呢？车厢底下的弹簧有要断的危险，车厢厕所住了六七个人。中学本来是百分之十的，实际上那止百分之十，其他旅客车子停了，货也运不出去。这样的情况，就变成了好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好多不欢迎革命师生大串联的人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借口。他们一再向中央提出停止大串联，最好学生不要到北京去，交通太紧张了，这是普遍的，对我们的压力很重，我们是支持革命大串连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到北京，到全国各地，可是，我就抓住这个交通问题又来了，很糟糕呀，对中央文革小组讲，你看看，那攻击不知道有多少。这问题，不单单从生产看，还是从整个文化大革命形势来看，都是个焦点，好多道理，社论上反驳了，你

们看就是这个交通问题从来没有写过社论，这问题是难说的，我们就是这种心情，很焦虑，伯达同志当时更焦急，我就带着这种感情跑到安亭，我的感情比你们的感情相差十万八千里，你们的遭遇，你们碰到的问题，听说以后，跟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大概和韩哲一同志差不多，对问题没有估计那么复杂，当时文革小组只有我一个人，独立地一个人作出正确判断，这是困难的。所以我不是吗？当然，我反复想了同志们提出的意见，慢慢懂了，这个电报讲得不完全对题，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这方面写电报时确实没有多想，文革小组对这方面情况是没有来得及问。对文化革命来讲，当然是抓革命，文革小组对工厂生产问题是不管的，我们只是到时间问一下生产怎么样，因为唯恐我们自己工作有毛病，生产受影响，人家要攻击。我那天讲过这话，同志们应该记得。

阶级斗争一个方面之一看生产有成绩还是失败。如果生产质量下降了，那么骂娘的就多了，他不仅骂你一个工厂，他要说：“文化革命搞糟了，糟得很。”58年、59年上海轰轰烈烈大跃进，那是一场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先有思想革命，然后带来文化革命，这样好的形势到60年后就下去了，就是因为自然灾害、苏修破坏，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同志们应该记得，60年到64年，资产阶级攻击，三面红旗多厉害，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包括那么许多无耻的反动言论，什么“蒋介石不好，但是就是有大米饭，”那些话，同志们难道现在都忘了？这个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后来，同志们，你们回想一下，人家就是抓了我们经济上困难，来攻击我们的革命，要资产阶级复辟，包产到户，解

散人民公社，工厂里原来大跃进里破坏的制度，有很多都恢复了，不该恢复的，也恢复了。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竭力避免，在前次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文化革命小组在这方面为中央作参谋，也经常观察这个问题。

同志们提出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我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我讲：现在已经造成了这样结果，请你先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弄一个仓促的事情了，伯达同志又说：“是不是写第三封信。”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了一些意见，我还要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够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能够纠正，我从安亭回去后，那一天没有来得及，因为回上海深夜了，也没法去找他。第二天回到上海的同志在文化广场等我，我本来上午想和上海市委同志了解情况。结果没有来得及赶到文化广场，到了文化广场和那里的同志交换了意见，继续了解情况。到最后在那里达成了五点协议，同志们可以了解，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

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二十四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同志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我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最后就这个问题认识是有个过程的。那末，现在应该以最后为标准，最后那就是判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对这样一个组织，应该加以支持，那我们前一阶段时期的错误现在就改过来了。我们共产党人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可能随时都判断那么准确，处理那么正确，问题就是在于在最后作出比较正确，比较科学的判断，所以有些刚才对我说，怀疑陈伯达同志，我就想作些说明。我刚才说，我从出发到今天，经过一个长时期，我们彼此更了解了，我们处理的过程中，工人同志的讲话，发言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同志们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表达了上海工人阶级那种热烈的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对革命事业那种无限忠诚，你们这样深厚的感情教育了我，

感染了我，我想这一段时间内，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你们每个人来说，也许能成为终身难忘的事情，对我来说，也会成为我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认识的，不是在一个平平静静的环境里认识的。

我们第一次是在安亭见面的，第二次见面跑到苏州来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彼此谈论革命，谈论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谈论如何把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很多同志说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和刚来的时候不同了，我现在主要是想什么呢？现在主要是想大家很快回到上海后，赶快召开座谈会，来谈一谈你们厂里的阶级斗争情况，你们感觉到文化革命要解决什么问题，你们觉得怎么解决，这一方面请同志们想一想，就是你们厂里的阶级斗争是些什么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怎样的情况。工厂与学校不同，与农村不同，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你们有些什么想法，我现在想知道这方面的意见，能够及快地把你们这一方面的呼声、愿望、要求，尽力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中央，因为中央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同志们也知道，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使得人们思想革命化，然后推动我们整个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如果只抓生产不抓革命，那么，我们的生产可能大发展，但是，我们的国家就是改变颜色，我们工厂可以建设起来，在建设的时候是社会主义工厂，但是建设成了，他就变成了修正主义工厂，特别，我们上海的工厂，原来很多是帝国主义办的、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办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有封建主义压迫并没有完全消除，在所有制方面是解决了，但是在制度方面

各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制度还有影响，从苏联学来的一套东西使我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压制，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不能发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按毛泽东思想办工厂，把工厂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办成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是要经过斗争，经过文化革命，加以彻底改造，如果我们工人阶级不进一步革命化，不把那些阻碍工人实现革命化的障碍，阻碍工人生产积极性，阻碍发挥工人阶级创造性的东西，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甚至封建主义的，对这些东西彻底破除，不把毛泽东思想在工厂企业扎下根来，那我们的工厂企业搞不好，生产搞不好、但性质也变了，从社会主义变成修正主义了，所以，应该是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就是把革命放在明确的地位，政治是统帅，思想要领先，不是不革命抓生产，也不是停革命抓生产，更不是压革命抓生产，当然也不能抓革命不管生产，这二个东西一定抓，在这里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二个字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抓生产促生产，那就不行了，只能是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也不能把生产搞坏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促生产受某些影响是可能的，但是，要竭力避免的，我想每一个工人都是热爱生产、热爱劳动的，不爱生产不爱劳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四旧，那是要破的，我很高兴，和同志们接触中间，看到同志们革命积极性是很高的，你们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我想你们可能成为上海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中最活跃分子，成为骨干，成为带头人，我和一些同志接触，从你们的谈话和发言中，我有这么个感觉，经过这几天我们彼此更了解了，我觉得上海文化大革命在工厂企业中同样好，同志们，你们肩上责任更重了。

要真正把革命担子挑起来，使我们的生产事业得到发展，使我们上海二百万工人阶级更加革命化，在革命斗争中学会革命，学会管理工厂，学会管理企业，想出各种办法，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工厂不会改变颜色，这个重大担子就落到你们造反司令部身上，也落在你们每个成员身上，而且从这里开始，帮助更多人，使他们更好处理这个问题，把上海二百万工人阶级都发动起来，使上海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更好的贡献，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成为全国的榜样，因为这里工人数量最多，最集中，历史最久，象这样的城市很少，只有几个，老工人比较多，因此上海工人阶级担负着责任特别重大，革命责任重大，生产责任重大，经过这几天的接触，我这方面的信心越来越强了，对你们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们更加相信了。同志们能够这样的担子，我也就把这样的情况报送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中央，我想关于一般问题就是这些。

现在我谈谈几个具体要求：

- 1 . 承认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组织，从 11 月 9 日 以来，特别是赴京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是革命的，并立即颁发带有总部公章的袖章。这是第一条，一句话，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你们的组织也是革命的，这个我在文化广场和你们总部的同志已经谈过，这也不存在同意不同意，现在我再重复一遍，同意第一条，不过在后面还要说一下今后再碰到类似的问题，中央建议派代表的方

法，避免占用过多的时间过多的人力，派代表方法比较灵便，阻力较小，对于革命，对国家，对群众，对个人都比较方便。

2 . 绝对保障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证。这一条上海市委已发出通知，不准给你们扣帽子，故意刁难，你们回去后，应该受到欢迎，在这时期工资照发，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我完全同意。

3 . 要曹荻秋同志检查，并且把我们领回上海，并用公用大轿车送回家。曹荻秋同志不是来检查了吗？当然这个检查是初步的，将来还会要继续检查，他来了和大家见了面，这一条已经实现了，至于送回家去，这也不成问题，你们提出先集中一下再分开，这些细节问题就不修改了，我就同意这一点。

4 . 要开动除了广播和报纸以外的一切宣传工具，对前一段的谣言进行辟谣。再不许出现恶劣攻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谣言，否则，概列于非法。这个谣言是应该辟的，这一条可以同意。不过我觉得，同志们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干革命那有不受攻击的，没有攻击那还称什么革命呢？你要干革命就一定有人攻击，你说他是非法的，咱就把这写上是非法的，甚至说要抓起来。只要是革命的组织越是革命，越是正确人家就越要攻击你，如果你是那么正确，他反驳不倒你，他摆事实讲道理讲不过你，于是他就造谣，对一个组织是这样，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当前全世界共产党，受攻击，听到谣言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光荣的。我们毛主席的一生就是在人家的攻击、造谣中，

一直到现在还是受到攻击、造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内外反动派都攻击他，主席不是讲过吗？被敌人攻击的是好事不是坏事；这句话就是主席从他亲身体会中得来的，我们的心胸应该放宽一些，你讲你的，我干我的。因为，有辟不胜辟的谣言，有些无头案还不知从哪里刮了出来，你没有办法辟谣。你看攻击中国共产党这么多谣言，中央从来没辟过谣，毛主席的辟谣，人民日报总要登吧，你看见什么时候毛主席辟过谣。就这些事情要看得开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如果十分需要澄清的事，那也可以。我是同意写这么一条的，但又有一个建议：不在乎。

5 . 对上次上北京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这一条那天我完全同意过的，今天我还是同意。

同志们，你们提出的五条刚才我同韩哲一、曹荻秋交换了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而且我还希望同志们除了这几点以外还可以提，因为，你们还要干革命，就这么五条我觉得太少了，咱们这里有五百几十个人，我在这里也是一条，我希望你们每人给我提出一条，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要求，那我就可以收到五百几十条，那我的收获就太大了。如果每人写上十条，文化革命要注意什么，有些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这样就得到许多条，有的我可以在上海解决，有的可以当作研究的资料，留作中央考虑问题的材料，你们共同要求的东西可以把它集中起来，并且希望你们把与你们不同的意见也写给我，那就更好了，可能车间里，工段里，生产小组里对文化革命有各种不同意见，都告诉我，那就更好。

那我就不但满足了你们的要求，而且我又得到了几千条意见，那我非常感谢同志们了。我再说一遍，非常感谢同志们这几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帮助，还希望同志们今后对我继续进行帮助，如果有错误，你们随时可以向我提出来，不管我在上海期间，还是在北京期间，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只要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随时准备听同志们的批评，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我讲就讲到这一些。同志们你们都很辛苦了，要把身体搞好，因为我们搞革命搞生产都需要把身体搞好。同志们，我就讲这些，没有了。

19) 张春桥接见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北上控告第一兵团的讲话

张春桥 1966. 11. 21

【时间： 1966 年 11 月 21 日，地点：上海红都剧场。】

在长时期热烈鼓掌、口号声中工人造反队代表给张春桥戴袖章。

张春桥讲话：

同志们：（台下叫：曹荻秋靠边），我首先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到会的全体同志表示亲切慰问。（鼓掌）向全体同志致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高呼口号）

中央从知道同志们乘车北上，那就非常关心这个事情，立刻决定派我到上海来和同志们见面，帮助同志们解决问题，我到上海以后，算一下时间，我是十一号离开北京的，到现在十天了，时间过得很快，在这十天中间，同志们：你们走得最远到了南京，到了六河，那么这样我就非常不安，北京给我打电话，也是问，说南京的同志回来没有，这中间，中央文革小组还曾经直接打电话到南京，请江苏省委转告你们，说我已经到了上海，这个你们大家已经知道了，中央对这件事情极关心的。

对同志们的行动，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虽不知道前因后果，很仓促，因为只知道交通受影响，而那个时候，全国的交通，同志们都知道，现在是很紧张的，因为有大批的革命师生要求到中央去见主席，现在北京据我昨天听说，已经住满了，现在连中南海也要准备让出来让革命师生住了，因为实在是到处都住满了人，估计就是截止到廿日为止，大家不再上北京串联，在这几天里，北京可能有三百万人在里面，交通的压力非常之大，这三百万人到了北京，再把三百万人疏散出来那要占很多的火车，而工人同志们特别容易理解，我们上海的各种工业器材，煤呀，铁呀，都是要从外地运进来的，交通如果受到影响，那我们的生产，原料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那样地情况就会影响很大了，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心情，伯达同志写了这样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比较仓促，考虑得不是很周到，我到了安亭以后，到了上海以后，和工人同志们交换了意见，听取了你们各式各样的意见以后，就感到了这电报是有缺点的，预先我们的情况调查得不完全，不知道甚至于这基本的情况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这样写一个电报，仓促了。

伯达同志表示非常不安，他要我向同志们表示他的不安，同时他说，我们总要想办法来弥补这一缺点，所以这个问题，刚刚有的同志说了，说：“有的人利用这个电报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挨几炮这也没什么，我们挨得炮很多，那各式各样炮都有，我们也没什么，因为你要革命，还能不挨几炮吗？当然罗这里边有的（鼓掌）现在伯达同志的电报，一方面有人想利用这个电报来攻击陈伯达同志，这个刚才你们的代表和学生代表好几位同志都谈到了，我们完全赞成你们这样的意见，就是要维护伯达同志，这个不是因为我的上级，我要保他的皇，而是因为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之一，我们应该为了保卫中央，保卫正确路线，就不应该在他脸上擦黑。但另一方面，有人利用这个电报，来压群众，那是不允许的（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话应当说到二方面，第一方面，同志们，你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有任何意见都可以提，很欢迎，包括我在上海的工作，有缺点，也有错误，你们随时都可以批评，很欢迎你们对我们的批评，欢迎你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评，另外一方面，有那么一些人来自另一方面的批评，那就不叫批评了，那一种（原稿不清），可是我们决不允许用伯达同志的信，（原稿不清）错误的，因为陈伯达同志没有这个意思要压你们。（鼓掌，高呼：炮轰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气死老保！）

同志们，那么你们到北京去，是一个革命行动，你们这一次回来，也是为了革命。从这样一来一回，同志们虽然受了辛苦，有很多同志病了，有的同志没有吃好饭，挨了冻，饥寒交迫。可是这样十天里边，证明了

什么呢？证明了上海工人阶级对毛主席，对党中央是无限忠诚，无限热爱的。（鼓掌）我们就应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我们上海工厂里边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因为同志们都向我讲，你们要到北京去这不是你们的目的，你们的目的是要控告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派我来，要我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一定忠实地把你们的意见向党中央、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汇报，（鼓掌、呼口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正象很多同志都知道的：上海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我们上海的革命搞得好，对全国都有伟大的推进作用，我们上海的生产搞得好，对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伟大的贡献，也有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如果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的话，那么对全国也会起很坏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生产搞不好，那么对全国也同样会起坏的影响。因此，上海工人阶级担负的责任在全国工人阶级中间肩上所担负的责任特别重大，我们确实挑着两付担子，不是一个轻担子，而是两付重担子。但是，过去中央从来是相信上海工人阶级能够挑这两个担子的，现在、将来都会相信同志们能够把这两付担子挑起来！（热烈，长时期鼓掌）

当然，不是没有困难，阻力是很大的，因为要革命，有阻力，要搞好生产，有困难，这个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不知道同志们怎么样，我原来，拿我个人来说，我也知道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会有困难的，而且困难是很大的。但是，我的精神准备很

不够，我没有想到困难是这样大，阻力是这样大，原来没想到，那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我们几乎每前进一步，我们都要经过战斗，如果不经过艰苦的斗争，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那末现在，我们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就全国来说也好，就上海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头，这个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大的，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搞，他们，就是苏联，搞了这么几十年，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了，但是五十周年，列宁时代没有完成革命，列宁活的时间比较早地就去逝了。那么后来，斯大林同志领导，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使得将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资产阶级思想，就刚才在语录里所讲的，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里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末当资产阶级占了优势，占了上风以后，修正主义就要复辟了，资本主义就要上台了，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苏联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胜利果实要被资产阶级重新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经验教训，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重复。我们一定要使得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把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搞得彻底，搞得越彻底越好。

但是这一个革命会是相当长的时间，最近在中央讨论的时候，毛主席也曾经讲过，说我们现在如果从去年十一月份算起的话，到现在不过整是一年，在一年里，前六、七个月，就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五月底，这个呢，只能是舆论准备阶段，就是大家发动群众，思想要有准备。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这中间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还算

舆论准备阶级。从六月一日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那么从六月一日到现在也只是五个多月，还不到六个月，从六月一日算起的话，所以这个，这样下去要多久呢？那时间很长，一直要到资本主义思想在我们社会里完全肃清，把私有制肃清以外，还要把人头脑里的私有观念，用公字，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来代替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这个斗争是会很长的，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敌我矛盾，还有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这斗争，要解决起来就会有一个波浪、一个浪潮的进行起来非常的久，恐怕不是一个战役，二个战役能解决的，而且中间会有大的战役，小的战役，有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所以我们工人同志，要准备打比较长的仗，要这样重新组织我们的队伍，重新教育人，把我们，从领导机关，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领导机关，按照毛泽东思想，来重新检查，重新检验，看哪一些是紧跟着毛主席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哪一些不是，哪一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还要看哪一些愿意改，还有些不改，有的人犯了错误他愿意改，我们就欢迎。如果他改得彻底，我们就更欢迎。他有一部分改，我们就欢迎他这一部分，那么当然，如果要是一直不改，那就是另外一个性质了，这是毛主席最近也一再强调的，就是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别人改正错误。因为闹革命，总会犯错误的，我到上海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里边，我也会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有些话也可能说错了，有些事情也可能做错了，那我有一条，我反正，只要你们提出来，我的思想通了我就改，如果不改呢，那我也可能要变的，那就要变坏了，这只要是改么，那我们要欢迎，这是对干部。

对群众中间的问题么，我也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你们刚才喊的口号里边，有一个口号我也跟着喊了，我也举了手了，就是“打倒保皇派”这个口号，但是，这个口号，我应该对同志们说，中央是不同意的，因为这个口号是容易伤群众，因为这个口号是容易伤群众，因为什么呢？现在被称为保皇派的，不是那个当权的人，而是二派工人之间。

我最近，我也应该向你们汇报一下我的工作，我一方面从安亭回来了，回来以后做了些安排，和总部同志谈了话，交换了意见，随后订了五条，后来到苏州，又订了五条。然后呢，那就一方面通过北京给你们打电话，希望你们快点回来，一方面在这里继续做工作，也和一些和你们工人同志经常往来的同学谈了话，听他们的意见，也听工人的意见，我还开过一天的会，这和什么人开会呢，就是即强烈的反对我答应你们五条这一批工人开会，他们说我犯了错误，说我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叫我。几十个厂子，上千个人，现在还陆陆续续不断地有很多工人到这儿来见我，要求我谈话，前天我谈了一天。我和这一些工人同志接触中间，我也就深深地感觉到，就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我们要相信群众，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那么那些人，他们反对你们的行动，举了种种的理由，反对我答应五条，仔细听下来，同志们会知道，他们完全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他们并不反对党中央，并不反对毛主席，他们也并不拥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也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一时就搞不通。

从早晨九点谈起，一直到下午五点，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同志说是被我说服了，说可以同意我的观点。但同意也有各种各样的同意方法，同意也不完全是一个样子。还有一部分同志表示继续表示怀疑，同意一部分，但还有作问题怀疑。还有一部分同志，一直到散会的时候，还有说，我坚决反对。我也注意了这些同志，这些同志都是一些好同志并不是坏人。所以，同志们，我把这些情况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我还继续做他们的工作，我也有责任向他们做工作，正如我有责任向你们做工作一样，我也希望同志们，你们能在这一方面支持我，就是你们回到厂里边，对于工人同志要采取毛主席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工人之间的问题，只能按这个方针解决，只能是团结——批评——团结，不能用别的方法，这样，一方面他们不应该给你们扣帽子，说你们是什么、什么，那是错误的。同时，我也希望同志们，他们也不给人家扣帽子，现在北京，我们已经经过几个月工作，“保皇派”这个名称基本上不用了，街上的标语，没什么“保皇派”了，会场里唤口号也没有这个口号了，只是偶尔有时个别谈话，说惯了顺口说一句么，这个东西我看也不能过多地责备，因为这口号主要是不利于工人内部的团结。同志们，你们现在是少数派，少数派，革命运动最初总是少数，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少数派，满足于少数派就不好了，我们如果光是一直是少数派，少数派光荣，那又怎么革命啊！

革命是要靠广大群众，毛主席的伟大地方就是他不只团结了一批最革命的人，而且是他团结了那些愿意革命的，甚至犯过严重错误，但是愿意改正错误的人。如果毛主席不采取这个方针，那我们党就不会是今天，

就不可能把全党团结起来。同志们，要知道，在我们党中央里边，过去有很多人反对过毛主席的，但是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错误，毛主席都是和他们团结。比如很有名的人物——王明么，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么，那个反对毛主席还不是反对最厉害罗，但是不但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他做中央委员，但是第八次代表大会，八大还是选他做中央委员，我们八大的代表都思想不通，说：“这个家伙还选他！”毛主席亲自出来在会上讲话，说同志们应该选他，选他有好处，这样可以团结多数，毛主席的这一个思想，已经写在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里边，你们还记得吗？五个条件里的一条是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反对你，而且证明他是错误的人，不晓得你们注意了没有。如果反对你，他是正确的，他反对你，当然应该团结罗，问题有呢，他反对你，而后来证明他是错误的，还要跟他团结这是同志们，主席是当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我这个话一点不假，我身边没带，你们自己去查，上有没有这个话？（工人：有！鼓掌）

我的意思是说，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你们这个队伍如果想过，搞一浩浩荡荡革命队伍的话，就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你们如果不学习这个，或者口头上学习了，不执行，那你们就一直叫做少数派，而光是有一个少数，革命是搞不成，一定要使自己从少数逐渐变成多数，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才能够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倒，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掌）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熟了，而且你们给我戴了袖章，我想，我说话就坦率一点，我这个话你们鼓掌，我就很高兴。现在我戴袖章，我应该申明一句，因为有的同志跟我提，说作你们的政治委员，我觉得我应该申明，你们给我戴袖章，我很光荣，但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每一个约定，就是不担任群众组织的职务，因为如果答应，那么所有的组织都会要我们答应担任职务，我们也不能说：“我只支持一派”，因为我们要对各派都做工作，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工人阶级，把我们劳动人民的队伍，彻底地按照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组织，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间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坚强的、战无不胜的坚强的部队。（鼓掌）

因为同志们很辛苦，我想我今天不准备多讲了，咱们以后还有机会，我想同志们这二天是不是可以，有的身体好，当然就可以回厂工作了，如果有的有病，还需要治疗一下，有的同志还要休息一下，你们都回来了，我现在心里就安下了，我就可以和你们总部，你们大队部，我们一块好好地商量一下，把工作安排一下，这儿还有些条子，都是给我们提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正在那里研究，在起草文件，准备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讲了。因为到底怎么定，这问题要中央才能决定，我在这里，而且今天不是这样一个讨论工作的会，我是欢迎同志们我们大家来见面的，这些问题，我想我们都要专门开些座谈会，听同志们意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是让我在这里多听一些工人同志对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一定负责汇报中央然后中央加以规定。这样，我们中央再有一个补充意见十六条，

因为十六条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纲领，那些原则都适用于工厂，但是工厂毕竟有工厂具体的问题，完全用在里面，有些具体问题它没有，所以中央同志准备写一个文件，等你们回来，我和总部的同志就可以安排一些工作，然后我们可以安排一些座谈会，这些问题，我想今天就不答复了，而且因为这几天，几乎到了上海以后，就是不断的谈话，谈话，谈话，你们听，我的嗓子已经哑了，一直很痛，所以我想今天就不讲了，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祝同志们身体好！（长时期热烈鼓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志们，再见！

（以上是录音记录）

20) 张春桥接见上海和外地革命造反派 时的讲话

张春桥 1966. 11. 22

〔按：原稿是同学问，张春桥同志答，这里简为“问：”“答：”〕

问：上海市委不支持我们，不给提供方便，不给会场，市委同志不肯出席我们的会议。

答：我可以传达给市委。革命的新生力量生命力是强的，不会夭折，不必悲观。（大笑）

问：请张春桥同志谈谈对上海文化革命形势的看法。

答：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研究形势，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集中在党中央。

问：上海市委是否完全贯彻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谈呢！我是来甘当小學生的，要先听你们的。

问：外面现在有大字报，抄的是林彪同志《论左派》的文章，有这么回事吗？

答：林彪同志从来没有写过《论左派》。

问：聂元梓同志那张大字报（指《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吗？

答：……那张大字报我不清楚，你们去问聂元梓，她在上海。（另一同学插话：昨天我们问了，是她写的。）

问：我们整天忙着找会场，市委不支持我们，希望能给我们一个固定的会场。

答：我是主张刻苦些。所有的领导机关在对红卫兵组织的物质待遇上要完全一样。另一方面，所有的同学要艰苦些，搞革命就要艰苦些。那些是北京第一司令部搞出来的，它成立时，解放军那时是很热心的，支持摩托车。后来杨成武同志承认了错误，把车收回去了。物质上一律平等，政治上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北京第三司令部在成立大会时，给我们的请帖都是普通纸用手写的。我们感到这种精神很可贵。同志们这有深远的意义呀！我们要准备过艰苦的生活，还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哪有什么录音机、汽车！在北京城我们是到处这样讲的。

问：可是市委就是不平等待人。

答：不平等待人可以批评他。

问：没有（另一同学插话说：抢！）

答：抢的方法我不赞成。

问：他们还围攻。

答：搞革命不围攻几次不行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恰恰证明两条路线斗争是尖锐的，我们就是要在各种困难条件下锻炼。否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用以前的办法搞。中央文革小组的日子也不好过！（众

笑)有人支持我们,有人反对我们。因为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世界上既然划分两个阶级嘛!

问:中共中央补充规定上说的“监督”,我们认为是对黑材料,要了解其内容,确定其性质,查清数量。

答:这个已报中央,请他们解答,我无权解答。这个规定,我参加了前期的起草工作,最后定稿讨论我不在。这个规定是中央搞的,不是文革搞的。

问:这样查是否恰当?

答:原来意见是不看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改了。初期起稿是不看的,但目录可以开下来,例如:名称、数量。

问:现在东西烧光了,如何批?

答:规定的序言中要求抓活的,抓大的。我们只要抓住几件事就可以批透。批判王明路线只要抓几件事就可以。中央原来如此,不要详细弄。毛主席批判王明路线已给我们创造了先例,不要导入烦琐哲学。这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是斗争方法。这一个月来抓材料太多了,所以中央才发这个规定,否则就不发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时,就抓住他三个字“发财了”。这三个字就是资本主义,抓住了典型就把布哈林批倒,我这个人糟糕!又说开了。

问:我们怎么批?

答：中央文革小组不能发号施令，同学们可以自己讨论，集中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批判。不光是黑材料，整个档案制度中央准备来个大改革。毛主席鉴定干部靠群众。看档案鉴别、选拔干部肯定犯错误。我举个例子：一个人觉悟高，每次运动他都检查；另外一个人觉悟低，会吹牛。十年后，领导干部一看，觉悟高的人又是“左”倾，又是右倾，问题倒很严重。按此选拔，不倒霉了吗？（大家热烈鼓掌）

问：他们搞材料要整人。

答：这个北京同学有经验。第一，他要整你，没有黑材料也能整你，材料都在脑子里。第二，抢不尽的，一个人藏的东西很难找尽，要么小孩藏的大人能找到，而是从他的眼色上发现的。（众笑）最初我是支持抢的。第一个抢的是北京地质学院，后来一想这事被动，他藏着看你找，把包袱扔给你。藏起来的東西难找。最后还搞成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我们要从政治上批，造成压力。

问：没有材料怎么批？

答：要批判还怕没材料？北京有个谭力夫讲话，就够批的了。

问：我们要党委书记把他的平时言论，报告，讲话交出来，可以吗？

张春桥同志问：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答：科大的。

答：革命者胸怀坦白，觉悟高的可以交。有的人觉悟低，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又不可以下一个死命令叫他交。有的问题中央正在研究，如什么叫“革命群众”。

问：怎样进行路线斗争？

答：路线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如何从思想上批判，这个工作很难，材料不好搞，嘴巴长在他嘴上，我们还没有好的经验。抢的办法、逼的办法，主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都没有用过，请同学们看看主席的整风报告。主席是怎样教育那些干部的，主要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分析得越彻底，就越击中要害。一小部分是敌我矛盾，当然两样。大部分还是内部矛盾，包括一些提出的人。

问：目前要不要进行斗批改？

答：斗批改还要看一看。当前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林彪同志讲话，《红旗》社论发表快两个月了，但花在材料上的时间很多，没有好好搞批。北京是这样。砸柜子、抢材料，到底两条路线是怎么回事？主席是怎样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没好好学。

问：转入斗批改的标准是什么？

答：转入斗批改的标准是什么？中央也在研究，先别做这个打算，党中央这次发的指示很少，只十六条。这次大革命没有经验，它本身是有规

律的，大家不必急。不是到明年暑假吗？本来是到寒假的，党中央后来看看不行，还会出现什么情况不能预料。

问：曹荻秋某月某日报告中讲，上海前阶段运动是江青同志抓的。

答：去年到今年，江青同志在上海呆了六个月，搞部队的文艺工作，但中央没有这一说法：她指导上海的运动。我想江青同志也不会这样说的。

《海瑞罢官》批判，江青同志花了很大力量。

问：市委指示下达后（按：《上海市委关于各级党委停止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的决定》）党委仍在领导，这是一个花招。

答：你们怎么看？毛主席对罢官有新的指示，不要急于罢官。同志们，不要林冲误入白虎堂。他们如果把机密材料放在保险柜里，你们去拿，这政治责任负得了吗？中央这个规定主要是出于对你们的爱护。一罢官，双方都泄气了，没劲了。北京的刘仁罢了，很舒服，我们累死，他们十年后再给他们干。罢官是容易的，批判透是难的。主席说：通过几个月的经验，罢官放后期，通过大革命，干部队伍有很大调动，哪些是跟主席的，哪些是反对的，有些犯错误的干部改好了也行。

同志们的问题我都是临时答的，对的算你们的，错的算我的。

21) 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张春桥 1966.12.06

【地点：政协礼堂三层休息室，时间：六日晚至七日凌晨一时多。】

代表：我们这次到北京来有四点任务：（1）反映上海的情况；（2）谈谈对中央十二条的看法；（3）把在北京的同志带回上海；（4）听听中央对上海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的新指示。另外介绍一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情况及上海的新形势。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到工厂去了。（学生代表介绍下厂的情况）

张春桥：好啊！

代表：关于生产情况，我厂提前一天完成全月计划，其它厂也是这样，新新机器厂超额完成任务。（把新新机器厂的喜报交给张春桥同志）

姚文元：你们把宣传资料给我们一些，我们帮你们宣传。你们也印，来辟谣，做些宣传工作，搞些快报。

张春桥：国棉十七厂的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

代表：国棉十七厂关于封材料，烧材料问题，……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张春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代表：……再提一个问题，工作队到底要不要？

姚文元：工作队撤了没有？

代表：撤是撤了，但里面有鬼。

张春桥：是不是所有的都撤了？

代表：已经撤了，但工人要求批判以后再撤……。

张春桥：这不要紧，要检讨，还可以叫他们回去。

姚文元：有一篇文章《论造反者》写了我的名字，我没有写，这篇文章是假的。还有《论左派》用林彪同志的名字，陈伯达同志《答誓死卫东战斗队》，这些都是假的，你们要辟谣，搞些传单到街上贴贴，打破他们的谣言。

张春桥：赤卫队总部有多少人？共有多少人？

代表：不清楚，赤卫队有人到北京来。

张春桥：他们来了，没有找我？

代表：他们来是找周总理告你的。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一代表介绍“中国红旗军”情况）

代表：哈尔滨红旗军头子是全国人大代表，工人工程师苏广铭。

张春桥：现在他们都找劳模做领袖，这是一个特点。

姚文元：对！

（代表又谈到“中央文革十二条”问题）

张春桥：我们找了首都工人来座谈，八小时生产要保证，每周一次生产讨论要保证，其它由工人自己安排。

代表：工人同志要求长日班用六至七小时完成当天的生产定额，用剩下的时间搞文化革命。（汇报三个厂的调查情况）

张春桥：这样可以的，连续生产单位是困难的。十二条要大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我们想写的简单一些，越写具体越难，越没有办法写，争论越多，我们准备写那么八、九、十条有一般性的。例如，要保证质量，要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革命，不要扣工资……最近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

姚文元：这也是试行的。

张春桥：让全国工人提意见、讨论，中央过早作决定不好。

代表：对于中央十二条，工人说没有十六条那么亲切。

张春桥：问题解决还要靠时间，靠群众运动本身。

代表：我们希望中央下次写文件时，把我们的意见也考虑进去。

张春桥：你们对十二条不满意，反对的人可多了，他们革命讲多了，生产讲得太少，我们要在各方面都听。

姚文元：你们是从革命方面考虑的。

张春桥：有人说这也革命，那也革命，那太多了。这两种思潮随时反映在党内的……这个问题要从实践中解决，关于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社论，从群众中解决，我们想写的简单些。思想问题从社会中解决，关于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有些地方的提法要修改。要根据运动的特点，准备再详细地写篇社论。当前，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非常重要，也是很必要的。

姚文元：这是运动的必然趋势。

张春桥：农民运动还没有起来，不过开始冒头了。他们的问题要复杂，阶级关系复杂。对农村连这样的十二条也拿不出来，他们不是八小时问题，而是季节问题，这真是吃饭的问题，季节一过，一年就完了。

代表：我们欢迎学生有组织、有计划地下到工厂，既劳动又帮助我们总结生产与阶级斗争的经验，现在就是阻力很大。

学生代表：下厂阻力大，市委不支持，要月票也不给。

张春桥：他们就是怕，怕你们下厂。

姚文元：这个问题靠革命解决，我们提倡进宿舍。

张春桥：你们有一个点子，他们必然也有一个点子，你讲完成生产任务，他们把生产定额提高，不然就不要搞文化革命了。

姚文元：不要从纸上的条文来规定，这些问题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有两种情况。有的是好人，有的不是这样。一种是坏人要破坏，但有些老工人是由于旧的习惯势力。这种势力相当大，对于这种人更难办，这种人打不得骂不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他们不但在厂里有影响，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我们要做政治思想工作。

姚文元：包括赤卫队四十万人。

张春桥：中央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的，主席也是这样，决心下定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当然还有分期分批的问题。一个城市不能分期分批，象上海形势很好，可以全面铺开。有的就不行，象

中小城市、三线问题，现在大家都用个“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当然我们也不怕罗。同志们对于抓革命、促生产理解很好。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会出现各种问题，这是难免的，要以革命来推动生产。今天的争论是围绕着革命的问题，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无论如何要下定决心把革命搞好，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中国不是要变颜色了吗？现在我和你们有共同利益了，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这点我不怪你们，几时我回上海开一个十万人的大辩论会。但做法上要有策略，要争取多数，把中间状态的人不要当作坏人，赤卫队中间的大多数都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

姚文元：都是阶级弟兄嘛。

张春桥：有些人，薪水一高，有个不好，思想上容易出修正主义，怕丢饭碗，怕报复，自己有家小。有些人就没有这种顾虑。我们对那些人要做艰苦的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多数，形成多数才可解决生产安排问题。你们对生产、革命都要很好地重视起来。问题在少数，我们提口号要考虑到多数，有些同学提口号不注意多数，这样不好。对他们要一步一步地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要允许别人等待，允许他们观察。一切工作都是舆论工作在先，这些工作我们很需要注意，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否则要引起群众对立。我认为群众斗群众有些问题是我们有错，被人抓了把柄，当然根子归在领导，如果没有人挑动，群众是斗不起来的。

姚文元：我接触了一些青年人，在八月份只谈闯，只有三个月，现在他们头脑冷静多了，这是一个飞跃，将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张春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意见，对你们的情况听得比较少，我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情况。另外希望你们把厂里造反派中生产好、革命好的典型总结一下，要确实的消息，寄给我一些，我要给中央看，也可以在北京宣传。

对于打人的事，你们要观察一下，到底是谁在挑动打人。

代表：这很明显，头子是张琪，是总工会主席。

姚文元：我们的头脑要复杂一些。

张春桥：有人是公开指挥的，有没有地下司令部呢？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要尽量减少冲突。目前有人要解散中央文革，北京学生很愤怒，要上街游行示威。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给他们提过建议，这次提建议叫他们不要游行，因为这一游行要冲突。

（由于时间关系，春桥同志还未吃饭，所以由代表又提出几点希望后，就请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回去休息。临别时姚文元同志意味深长地说：工厂搞运动，工人起来了，这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前一阶段在薄一波领导下，工业交通部门有很多地方是修正主义的。）

22) 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6. 12. 09

〔按：我们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严厉声讨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在广播局的黑爪丁莱夫扣压中央文革指示，自觉紧跟刘邓黑司令部，疯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又一滔天罪行：丁莱夫对我们全局革命同志封锁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来局发表的有关我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是在我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发表的。讲话明确指出了纪念“12.9”是个大阴谋；指出了“4.16”反革命政变预演事件；指出了丁莱夫顽固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还对当时的三个群众组织明确的表了态，特别是从周××事件中，指出丁莱夫反对江青同志的严重问题。春桥、文元同志所指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有关我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局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但是，狗胆包天的丁莱夫，竟敢将这么重要的讲话封锁起来，扣压起来，并且继续挑动群众反对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致使广播局长期存在一股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丁莱夫如此反对中央文革，真是罪恶滔天！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这波，流恶难尽！丁莱夫死有余辜。现将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重要讲话发表如下。〕

1966年12月9日晚10：30，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来到丁莱夫办公室，会见了丁莱夫、杨祚铭、王寿仁、王永庆等人。关于广播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春桥同志问广播局有多少群众组织。丁莱夫回答主要有三个组织：战斗团、纵队、造反团。

春桥同志问：三派组织主要分歧是什么？

丁莱夫回答：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捍卫团（战斗团）认为我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自觉地执行反动路线的。纵队不同意他们这种提法。造反团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做法不同于捍卫团（战斗团），他们不同意捍卫团（战斗团）的一些做法，也认为纵队举的旗帜不高。

春桥同志问：党委同三个组织有什么关系？

丁莱夫答：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经常找（或揪）我们。

春桥同志问：你检查几次了？

丁莱夫答：三次。

春桥同志问：去纵队检查几回？

丁莱夫答：一次。

春桥同志问：去纵队检查舒服一点吧？有打成反革命的吗？

丁莱夫答：没有人被打成反革命。

文元同志追问：一个人也没有？

丁莱夫答：没有。

春桥、文元同志立即提出政训队的问题。提出周××事件。

文元同志问：周××是什么问题？

丁莱夫答：他们说（指战斗团）是把他打成反革命了，我还没有调查。……

五月二十五日 ×××用保密电话说，周××准备同其母亲去南方，任务急，今晚走。……周××回来后（五月底）讲，到南方见了大人物，对丁莱夫是后期处理。他写了张大字报，对我提了十条，没有实际内容。……还有几件什么反中央的事，都是没有的事。对他的怀疑，是否搞什么东西，向×××讲了，也向保卫处讲了，指出不要搞监视，出几张大字报没什么了不起。

文元同志问：实际上呢？

丁莱夫答：他说（指周××同志）技术处长监视他，最近捍卫团（战斗团）说围攻了他，把他打成反革命了。六月中旬，×××说他去上海见到江青了。

春桥同志问：你知道周××去上海见了江青同志，你讲了没讲？

丁莱夫答：向局文革小组讲了。

文元同志问：你们怀疑了布置了对付的办法没有？

丁莱夫答：没有布置。

春桥同志问：为什么把他打成反革命？

丁莱夫答：没有把他打成反革命。

春桥同志问：你们向张平化讲过怀疑，没有向下面布置过？

丁莱夫答：没有向下面讲过。

春桥同志严厉批评说：这不用布置，你们就会影响下面。

文元同志说：如果不知道是遇到江青同志你们会怎样？……捍卫团（战斗团）是什么理由？

丁莱夫答：捍卫团（战斗团）没有讲理由，把他叫到台上去了一下。

（周××同志被监视提审，引起战斗团战士的关心。在一次战斗团大会上，把周××同志请到台上和全体同志见了面，并宣布要为周平反，同丁贼做不调和的斗争）

（当谈到几个群众组织的性质时）丁莱夫说：我说捍卫团（战斗团），纵队都是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谁合乎毛泽东思想我就支持谁。

文元同志问：你觉得几个组织是否都符合毛泽东思想？

丁莱夫回答：捍卫团（战斗团）批判反动路线是正确的，但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有时只取一句话，就不合原意了。如有关中央军委指示传达的问题，根本不是扣压指示，抗拒指示、违反毛泽东思想。……我认为针对院校的，也认为局里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所以没有研究出措施。两次答辩会都是这个问题，是怎样就是怎样，不是自觉的。

.....

春桥同志问：运动发展的慢是什么原因？

丁莱夫回答：是领导的不好，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七月底以后领导被动。

春桥同志：是否“砸烂阎王殿”以后？

丁莱夫答：学院大字报出来后，局里有的单位群众还去过学院。文革选不出来，一批判反动路线，那些人（指战斗团）最积极。

春桥同志：你们是否积极、坚决？

丁莱夫答：不认为不积极，不坚决。

春桥同志：你们也积极、坚决，但同群众积极、坚决不到一块儿去。

丁莱夫说：同他们（指战斗团）提出的问题有分歧，发展到完全对立状态。今天的报告没有同我见面，就发到下面去提意见。他们（指宣教处在丁莱夫授意下为他起草的 12·9 报告）不是提意见，而是批判，说丁莱夫又放毒，帽子给我扣上了。

春桥同志：批判也是提意见。你事先不提意见宣教处怎样起草？

丁莱夫答：我没有提意见。

春桥同志：你算什么党委书记，宣教处领导你，还是你领导宣教处？

丁莱夫答：过去讲话是我自己起草或讲几点意见由别人起草。

春桥同志：你是推托责任，或者是不负责任，这比你发表意见还坏！

丁莱夫说：这次是自下而上。

春桥同志：你两者必具其一，第一，不是我起草的；第二，下面讨论的。

丁莱夫答：我也修改了两次。

文元同志：毛主席早就严厉地批判过这种作法。

春桥同志：自七月以来，你的日子不大好过，自上而下不行，自下而上也不行。……

丁莱夫说：日子不好过，被动了三个月。

文元同志：根本问题在什么地方？

丁莱夫说：思想水平不高，问题抓的不够，主观主义。

春桥同志：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元同志：你们在肃清刘、邓影响做了什么工作？

丁莱夫这时回避实质问题不答，东拉西扯，推卸罪责。

春桥同志：你不怕（成了）修正主义电台？我向你说过，四月十六日 第一个广播的是谁？还不是电台。

丁莱夫说：新华社也播了。

春桥同志：你不觉得这是严重问题吗？

丁莱夫说：我做了检讨。

春桥同志：你做了检讨？你当成什么事，你是孤立的看这个问题。

丁莱夫说：我不是孤立的看这问题。

春桥同志：你就知道检查工作组问题。你们警卫的很严，内部怎样？你们是听哪个司令部的？

丁莱夫说：根本是盲目性。

春桥同志：先不要讲盲目性。

文元同志：今天时间晚了，你们应该想一想。我们还要听听三个群众组织的意见。

23)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北京广播学院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6. 12. 10

〔按：一九六六年底，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把矛头直指刘邓黑司令部的时候，北京地区的右派势力策划大搞庆祝“12·9”

的大阴谋，妄图以此为刘邓黑司令部招魂，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这股反动逆流中，丁莱夫在陶铸的支持下，打着庆祝毛主席为人民广播事业题词发表一周年的招牌，在十二月九日大搞庆祝活动，为刘、邓、彭真张目。十二月九日当晚，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亲临广播局严厉批评了丁莱夫。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在中直礼堂接见了广播学院革命学生代表。下面是这一次接见时的谈话纪要。时间：1966年12月10日下午。地点：中直礼堂。】

接见时主要是同学们汇报情况。先从学院的情况谈起，一直谈到广播局的情况。谈到“11·2”事件。同学们汇报说：陶铸在接见广播局保守组织《誓死纵队》时说我们是错的，我们准备找他辩论。张春桥同志说：你们一天写一封信给他，把他逼出来，要他澄清事实。

谈到在“11·2”后，同学们进入广播局揪丁莱夫时，张春桥同志插话说：“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在天安门上，我们批评他，要他检查错误，他不接受，跟我们吵了起来。”

谈到丁莱夫纪念“12·9”时，张春桥同志对同学们说：“你们怎么没有造反？那天我们把所有的事都安排了，专门在家里等了一天，可是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接到电话，我们想，是不是消息被封锁了？是不是电话被控制了，打不出来？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坐车到广播大厦，在外面转了一圈，看到广播大厦灯火辉煌，我们就到广播局里去了。”找到丁莱夫和杨祚铭，我们问，你们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这么热闹？你们知不知道社会上有一股反中央文革的逆流？他们什么也没回答。我们又

问，你们把群众打成了反革命给平反没有？他们说，我们广播局没有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起毛主席为人民广播事业创建廿周年题词发表的问题时说：姚溱、吴冷西等人推说要等《人民日报》版面空了再发表，主席的题词是九月中，他们一直扣压到 12 月 9 日，这是他们搞的阴谋。

在谈到掌权问题时，张春桥同志说：广播局一定要左派掌权，中间派不行，右派更不行。

最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跟学生代表商量说：广播局搞起来会不会停播？

学生代表：战斗团完全能控制广播局，不会发生问题。

张春桥同志：我们先找你们谈，还要到广播局去找他们三个组织谈。

24) 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谈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6. 12. 11

〔按：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大造梅益、丁莱夫等一小撮走资派的反。丁莱夫为了维持梅丁王朝的反动统治，扑灭革命的烈火，操纵《誓死纵队》和《红色

造反团》，围剿革命派。在我们斗争最艰苦，最激烈的时刻，十二月十一日下午，毛主席司令部派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来我局，接见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十五名代表。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代表们亲切交谈了三个多小时，对《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下面是这次接见的谈话纪要。】

张：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找你们党委谈过。我们知道你们有好几个群众组织，基本上有三个，我们都想谈一下，先和你们谈。我们了解过一些情况，但不很多。你们各派都写过信。你们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打算怎么做，或者你们认为需要的，我们都想了解。

姚：就这样吧，你们说，我们听。

代表：要不要先挨个介绍一下？

姚：介绍一下吧，你们哪几个是主要负责的？

张：你们有没有团委呀？

代表：没有，我们只有联络员。

（代表汇报丁莱夫的“七·二九”黑报告，当谈到丁莱夫说群众批评他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时）

张：这是谁说的？丁莱夫？

代表：对。

（代表汇报丁莱夫搞假选举阴谋）

张：那你们局里现在还没有选举文革委员会？

代表：没有，还是旧文革领导。

张：是指定的，还是选举的？

代表：选举的，但实际上是指定的，基本上是局党委和各大口负责人。

（代表汇报丁莱夫在广播学院事件上，对抗中央文革的罪行。谈到丁说“不能说一千二百人都是右派”时）

张：那时特别对一千二百人讲了话，说你们是受蒙蔽的，包括工作组的大多数，都是好的。我们再三讲。

代表：他根本没有传达这些。

（代表汇报局文革迫害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当谈到有人问周海婴去南方干什么时）

张：是不是丁莱夫直接问的？

（代表介绍情况）

张：丁莱夫说他不知道周海婴是中央文革派去的。

姚：他们对周海婴采取了什么行动？

代表：准备开斗争会，会议程序，口号都拟好了。

（代表汇报斗争梅益情况）

张：梅益开了几天会？

代表：四天。后转入小会。

张：有材料可以给我们看，因为情况很多，先谈当前情况。政训队呀，软禁室呀，都是怎么回事？都解决了没有？现在还存在吗？

（代表介绍政训队情况）

张：政训队有多少人？

代表：九十多个。

张：黑帮占多少？

代表：六十三个。群众十八个。

张：政训队还存在吗？黑帮是怎么定的？这有六十多人，还有十八个人，还有工作人员，三种人。

代表：对。

代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被送进政训队的王××同志）：说我们是中间人物。

姚：中间人物？（笑）

张：中间人物和黑帮一样待遇吗？

代表：政治待遇上基本一样。

张：和工作人员呢？

代表：不一样。

张：现在这样的还有多少人？最多的时候多少人？

代表：十八个人。

张：软禁室怎么样？

（代表介绍软禁室情况，谈到走资派，原中控室主任景润身时）

张：他真有本领吗？技术上怎么样？

代表：他根本不怎么样。

张：你就讲讲软禁室内幕。

姚：软禁室有多少人？

代表：八个人。

姚：控制室一共多少人？

代表：××××人。

张：现在还禁闭着吗？

代表：没有，但没有公开平反。

张：多久的时间？

代表：最早是八月底去的。

张：其他单位还有没有软禁室？

代表：大楼里只有一个。

（代表汇报有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电视中出现丁莱夫，《誓死纵队》一些队员欢呼）

张：哪一次接见？

代表：大概第六次。

（代表汇报当前运动的阻力和几个组织的情况）

张：誓死队有多少人？

代表：他们说五百。

张：丁莱夫找过你们这些人开过会吗？

代表：没有，他不敢。

（代表汇报我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人，妄图用所谓“党纪”来镇压造反派。胡说什么“党员对党组织有意见，只有按组织系统向上级反映，不能公开贴大字报。”代表批驳了这种谬论，并请示首长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张：你刚才已经答复了嘛！这样答复就可以。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包括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造他的反，不然，就要陷于苏联赫鲁晓夫式的统治。向上级控告？赫鲁晓夫的上级是谁呀？（众笑。）

（代表汇报传达室刚刚摘掉刘少奇的题词）

姚：他们想毁灭罪证嘛！专家接待室是否还挂着？

代表：不知道。

张：你们大楼有多少人？

代表：×××人。

（代表汇报政治情况）

张：政治部有多少人？你们战斗团占多少？

代表：政治部×××人，我们只有一人。

张：你们开会是在剧场开？能容纳多少人？

代表：××××人。

（代表汇报“一一·二”事件，《誓死纵队》要首长上×楼政治部时）

张：那天非让我们到×楼去不可，气势汹汹。那天我们家里有事，不然就去了。

姚：后来我们要去，他们又不让去了。

（代表汇报《誓死纵队》派人到国务院告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状）

张：我知道。他们要找我辩论，我没理他们。

（代表汇报“一一·四”事件）

张：我知道。

（代表汇报“一二·九”大阴谋。）

姚：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嘛！

（首长上车时，代表说：“欢迎首长常来”。）

姚：革命还要靠自己嘛！

25)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中央广播事业局 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6.12.13

〔按：66年12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姚文元同志来中央广播事业局接见了原保守组织《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纵队》的头头们，并做了重要指示。《誓死纵队》的头头们却扣压、封锁中央首长指示，不向全局革命同志传达，更不向《誓死纵队》的群众传达。现将两位首长的指示，根据记录整理如下。〕

张春桥同志首先说：“我们想首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听你们谈完后再发表意见。今天，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先听，也没有带什么题目。”

姚文元同志接着说：“先从《纵队》本身如何建设，基本成份方面谈谈。”

《纵队》头头丁宝庭开始汇报。当汇报到丁莱夫的“6·3”报告，传达了邓小平一九六六年五月卅一号对首都新闻界的讲话，肯定新闻单位没问题时，张春桥同志说：“这话是站不住脚的，吴冷西就坐不住了嘛，怎么说没有问题呢？！”

由于汇报情况罗哩罗嗦，只谈现象，不谈本质，全是为丁莱夫评功摆好，为丁莱夫辩护，姚文元同志说：“有些情况稍微扼要一点。”张春桥同志说：“主要谈一下《十六条》公布以后的情况。”运动初期可以说很不理解，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一次一次的讨论这个问题，看情况怎么样？

丁宝庭汇报《十六条》公布以后，局里运动情况。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什么时间感觉到有两条路线斗争的？”在场人大都回答在撤销工作组时才有感觉。

张春桥同志说：“丁莱夫对五月三十一号邓小平的讲话传达这么快，同样，对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广播学院时的讲话却传达这么慢，为什么对正确的东西就听不进去呢？一个人的脑子不是真空的，不是被这种思想占领，就是被那种思想占领。为什么丁莱夫对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广播学院时的讲话传达这么慢？因为在他认为是不正确的。我们到广播学院那天，丁莱夫也在场，态度很坏，公开和江青同志顶起来了。”

当汇报到局里有同志贴出“彻底砸烂丁莱夫的阎王殿”的大字报以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丁莱夫表现也很不冷静时，张春桥同志说：“是很不冷静。各种事物总有两种不同意见，一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直存在的。砸烂丁莱夫的阎王殿有什么不好呢？”

当汇报到广播学院革命小将因为派工作组问题来局里贴大字报时，张春桥同志说：“这个我们完全懂。我们到广播学院时，群众说，我们是含着眼泪欢迎工作组的，但想不到工作组来后是整我们的。”

《纵队》头头们为丁莱夫镇压革命师生辩护，说什么丁莱夫是听了张彦的话等等。

张春桥同志当即严厉批评了《纵队》头头的这种错误，说：“不要把原则问题说成是枝节问题，应从当时的斗争环境里去看两种意见，为什么有的听得进去，有的听不进去，比如丁莱夫为什么对邓小平五月三十一号的讲话和张彦的一句什么话就听得进去？”

张春桥同志接着说：“一个人象在大风大浪里，可以把你冲到左边，也可以把你冲到右边，但阶级斗争还有能动性。我们现在也在研究，看到有些干部在革命战争时期作战很英勇，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站错了队。”

张春桥同志又说：“他（丁莱夫）的架子太大了，态度很不好，在广播学院，在天安门见过几次面，但谈不到一块去。‘一二·九’全北京只有广播局灯火辉煌。九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晚上我们去找他，听他介绍情况，没法谈，思想距离太大了，他根本听不进去。‘一二·一二’他还指挥警卫部队对付广播学院的小将。”

接着，丁宝庭汇报十二月九号纪念毛主席题词发表一周年的情况。张春桥同志问：“十二月九号纪念会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吗？”丁宝庭等说没有。张春桥同志说：“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贯彻中央指示，如何纪念主席题词发表一周年？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须进行斗争，在这样的大会上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能通得过？那天他（丁莱夫）光讲通不过，没说遇到什么阻力，我们也没来得及问他。”

姚文元同志接着说：“毛主席在去年题词正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谁决定在十二月九号这天发表？九月份题词来了，到十二月份才发表，这不是阶级斗争？还是版面问题？”

张春桥同志又说：“我们来审查片子时，已是十一中全会以后了，在广播局还看到刘，邓等的照片和他们的题词还挂着，为什么没有换？这是紧跟哪个司令部？为什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东西不紧跟，而对刘，邓的东西跟得那么紧呢？‘6·3’报告他就跟得很紧嘛！丁莱夫的党委是不称职的。电台是政治机关，是最灵敏的政治机关，外国人对北京电台广播的一句话都猜半天。广播局不是和毛主席同呼吸的。十一中全会这样的大事，为什么这么迟钝？我没有责备你们的意思。”

这时随来的秘书同志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去开会。张春桥同志说：“今天谈不完了，以后有时间再谈吧！”有人问什么时间再找首长汇报，张春桥同志说：“不是你们找我们，而是我们找你们。”

26) 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红色造反团》的谈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6.12.15

姚文元同志：

这次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当尖锐，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司令部斗争，跑到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司令部走，十一中全会以来，就是解决跟哪一个司令部走的问题。

张春桥同志：

你们想一想：丁莱夫跟中央指示跟得快，跟毛主席跟得快？还是跟哪个中央跟得快？要从这方面看问题。你们大部分是党员，也有些是团员，跟谁走，现在是很分明的了。五月份以前，中央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跟谁跟得紧，跟毛主席呢？还是跟彭、陆呢？十一中全会以后更明白了，那一条路线的胜利，关系是重大的。这是大方向。

广播局大方向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还要看到全国的整个党的斗争，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这个斗争胜利才能保证传播毛泽东思想。广播局跟彭真站在一边，还是什么，要从大局来考虑。

“4·16”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是政变的信号，这不是技术问题。当时，我们听了广播震动很大，广播在前，新华社在后，新华社跟彭真跟得紧啦！这是两个阶级命运的斗争，是最紧要的关头，彭真的最后的决战。他拿着一份报纸到毛主席那儿去说，我们是批判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同志们要从大局考虑。当然，我们对任何干部都要从善意出发，分析事实考虑大局，否则要看不清楚。我们希望干部都是好的，但如果不是那样，我们就要从另外来考虑，否则我们就看不清。譬如广播学院冲大楼的问题，那天跟我们打电话的很多，各方面组织都有，丁莱夫也打电话，当时我们不

在家。我们认为：丁莱夫如果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应该让他们进来。如果是我，我不那样处理，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廿来人可以让他们进来，我处理这类事很多。那时冲国防部，是学生没办法了，闹了一天一夜，我是学生我也要发火，我们要设身处地来考虑考虑，如果我们是学生该怎么想。我去处理这个问题时，国防部门口要我登记办手续。我当时说，我是中央文革的，他们还要我办手续。那里的火烧得很大，我是来救火的，还要我来登记。我们有许多东西是不适合革命的需要的。至于运动中出现一些乱子是很难免的，任何革命都要出乱子，资产阶级革命比我们出的乱子更多。至于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要把乱子都记下来，要积累厚厚的一本。

我和丁莱夫接触很多次，比你们接触得多，他对学生的情绪是对立的，对学生的感情距离很大，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水泼不进去，他总感到学生情绪很糟糕。我们谈了许多次，不是勇敢的和革命群众在一起，始终没有转变对学生的感情，如果和学生站在一起就闹不起来。从7月份跟他接触后，都是讲学生不好，半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扭转过来，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主席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可以作比较，每次接见他都要到群众中去，到金水桥，几百万群众什么人都有。我们为他的安全担心，不让去，劝过他。后来主席批评我们，这是错误的。主席对群众是什么态度，要学生到中南海去，住到他的院子里，那样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听群众的意见。革命靠群众，我们有最高的典型可以作比较，这样一比较就看出问

题来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根本问题是对群众的问题。希望同志们考虑，你们的意见我们还想听。我们也希望几个问题弄得很清楚。

我们的同志看问题，有些事不要就事论事，有些观点不要固定，要看得宽一点深一点。

27) 张春桥等在接见部分归侨革命师生 和红卫兵时的讲话

张春桥 1966. 12. 18

〔江青同志在十二月十八日接见了首都归侨红卫兵代表，她坚决地支持了革命归侨师生和红卫兵对侨务界和中侨委的革命造反行动。她对我们说：“我坚决做你们的炮弹。”并指定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和戚本禹同志在体育场电影馆接见了我们北京归侨灭资兴无学校（原华侨补校）、华侨大学艺术系和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等单位两百名革命归侨师生和红卫兵，并听取了我们对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最后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其他中央首长要求我们把将要在本月底召开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准备好，并说中央会派人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革命归侨最大的关怀和鼓舞。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一定遵循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积极地行动起来为开好这次誓师大会而努力，为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把侨务界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奋斗！〕

张春桥同志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

（同学们：请坐下）不用坐了，因为坐了一个下午了。

我们确实是这样，对华侨界方面的情况，接触得很少。最近嘛，就是在街上看到有一些标语是你们贴的。里面有廖承志的、方方的，还有林一心的，对于这些名字，刚才你们讲的，我们脑子里还有个印象，但是这些单位，我们确实都没有去过。材料呢，也没怎么看，因为我们人很少，我们觉得一天要处理的问题非常多。那么，现在看来，这个应该说是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于很重要的方面没有注意，现在是你们用行动使得我们注意了，这使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从同志们今天所讲的这些情况，我们感觉到，问题确实是严重的。这就证明了华侨这个名称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不管是在国外的华侨也好，回国的华侨也好，或者是在国内其他的人也好，总是分着阶级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理。这里边写着嘛，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嘛，这是最基本的。在华侨里边也是分着阶级的，也是有阶级斗争的。那管理华侨的部门里面也自然会有阶级斗争，或者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或者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我们的同学包括广大的归侨或者海外侨胞，我们总是相信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因为那里劳动人民是占绝大多数，决不会是资本家占绝大多数。（热烈鼓掌）不仅仅是说，象说什么三百年前是一家，那是讲历史；讲现在，也还是这样，也还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是主要的。我们如果忘了这一点，那我们就忘记了最基本的事实。

同志们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们不能够在这里继续听，因为晚上的会已经约好了。你们刚才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突然，我们也很突然。我们是正在开着会，就决定说江青同志要我们两个马上离开会场到这儿来接见你们，就是这样子来的。（呼口号）因为时间仓促，今天就不能畅所欲言，而且同志们还没来得及准备，有准备的也没有来，还有许多材料也都没有带来。（众：带来了）有的材料恐怕没有带来。所以，我想是不是这样，如果有材料呢，现在给我们也可以，如果现在来不及，也不要紧。我们希望是这样，第一嘛，如果你们有现成的材料，你们就比较早地可以给我们，送到中南海门口就可以，请你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如果写张春桥、戚本禹，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就更有把握地到我们手里，这样子没有什么问题的，不会被人扣的。这是一个。第二呢，还可能许多没有现成的材料，因为刚才所涉及的已经很多，比如说中央侨委，对侨务部门，到各地的侨务部门的问题，有的是农场的问题，有的是工厂的问题，有的是学校的问题，很多方面，有的是专门的华侨的学校，有的是在别的学校里边的华侨的问题，各方面的情况我们都愿意了解。（鼓掌）希望你们把这些各方面的材料给我们，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并且把情况报告中央。（热烈鼓掌，呼口号）至于同志们刚才提的具体要求，我们回去以后报告江青同志，文化革命小组再研究一下，然后我们……（高呼口号）

但是我们应该说一句，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靠自己。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高呼口号）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中央常委的一个办事的机关。我们人手也很少，我们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做的成绩也很少，

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好。比如象刚才讲的，华侨方面的情况，我们就了解得太少了，几乎没有了解，这就是我们工作上的很大的缺点。那么，我们能够为大家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做一些通风报信的工作。你们有什么消息，有什么要求，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但是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中侨委的问题也好，解决各地的农场、学校、工厂或者其它方面的问题也好，还是要靠那里的革命的工人、农民，就是归侨吧。归侨里面也是有工人、农民、学生、有教师。靠这些人，和那里的其它方面的革命的人民团结在一块，那么我们就能够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坚持这个路线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毕竟是一小撮，他们没有什么力量，干不出什么事情。（对！鼓掌）只要我们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是完全可以把他们彻底地揭发，彻底地批判，可以把他们打倒的。（鼓掌）

我想，我就简单地说这么一点话，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见面。（鼓掌，高呼口号：“把归侨界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彻底改组中侨委！”“坚决要求中央罢方方的官！，撤方方的职！”“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我不准备多讲了，因为时间实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谈。同时我们希望你们很好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很好地考虑自己的斗争，我们相信你们有力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戚本禹同志讲话：

刚才要讲的话，春桥同志都讲了。我想，下次有机会我还可以给大家讲讲。好不好？（同学们：说几句吧！）大家在国外受了很多的压迫，你们的父兄在外国也在受压迫，你们经过了千辛万苦回到了祖国，我们就一定要把我们的祖国搞成一个全世界革命的中心。有这么一个中心，我们的父兄，在国外的父兄，要革命就有了一个灯塔。怎样把我们的国家搞成一个革命中心呢？就是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一定要打垮我们国家里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鼓掌）他们是想使我们国家重新恢复到你们过去所呆过的那么一个国家，恢复资本主义的统治，搞修正主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变质，我们就要继续象过去一样的受资本家、地主、富农的压迫。时间的关系，我今天的话不能讲很多。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大家一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热烈鼓掌，高呼口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28) 张春桥对上海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

张春桥 1967.01.00

一、中心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

二、造反派要更好地团结群众，建立新的劳动秩序，有些组织有机会主义，如五七年成立派别，五八年成立级别，炊事员成立派别等等，这样会分散阶级队伍，建议工交系统组织阶级队伍。

三、上山下乡是大方向，应大力宣传？

四、多宣传打倒经济主义，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五条，逐条宣传，集中点便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样可以处于不败之地。可以召开上千人的大会，介绍新的先进事迹。

五、上海形势，外部矛盾转入内部矛盾，造反派内部打内战，造反派要整风，做到艰苦朴素，接近群众，不要有气，有些组织可以搞些条例。

六、游街多，打击面过广（注：上海最近游斗过多，当权派、保守派等被拉上街），有的出现跪的现象，这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七、左派掌权，左、中、右都可以使用。不然，左派就会被别人打倒。

八、要做群众工作，接管后，主要问题是生产问题。上海地方关系全局。

九、造反派要注意团结，在大方向一致下求同，小节可以有异。好好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北京市中学生要比大学生差二大截。上海也是这样，上海某些中学造反力量很弱。

（此讲话大致在一月下旬）

29)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讲话摘录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1.00

〔时间：一月中旬〕

张春桥：

“康平路事件，到我家去没什么，我早就有精神准备，早晚要砸，到柯老家，那天我问，柯老家去人没有，他们说警卫去两个，局长、副局长为什么不去？他们答不出来，我很气愤，你们只知道保卫曹荻秋，对柯老不关心。”

“这次上海工人阶级的确伟大，在历史上也将是很重要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市委实际上是瘫痪，或者说被群众推翻了。”“中央和毛主席一方面是支持，一方面是高兴，毛主席看到我们在经济上能打胜仗，在政治上能打胜仗，在无产阶级专政上也能打胜仗。”

“现在接管成风！有的有利，有的不一定有利。”“我建议把总工会接管，把工人造反司令部的牌子挂上，抽一部分来接待，快速调查一下，多少空房子，有多少炊事员……目前不做，（来沪串连的人）五十万人

的打算是要被动的。主席很关心上海，一是经济问题，全国都有，第二是上海工人阶级强大，在党政机关瘫痪以后，自己搞起来。”

（有人提出彻底改组上海市委）

姚文元：“那你们提个方案，谁当第一书记？”

工总司代表：“要中央派嘛。”

张春桥：“现在叫谁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样过两天就变成斗争的对象，黑龙江省委改组了，下面一套班子没动，思想没过来，潘复生同志是个好同志，现在压力很大。”“现在实际上担子已落到左派身上了，一方面要推给当权派，一方面要依靠群众起来，担子落在我们身上了，任务重了，就逼迫我们联合起来，不联合不行，大家要顾全大局，从大局出发，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不是号召我们关心自己、团体的大事。”

“分裂这个问题要做思想准备，我可以公开讲，我希望要把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个旗号举起来，不要把这个旗号放下，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不但在国内有影响，在国外都有影响，外国通讯社有影响，外国通讯社都转播了《告全市人民书》，说工人造反司令部是毛泽东一派，赤卫队是反毛泽东一派，蒋介石就不管你们什么内部矛盾，给你分开了。”

“你们总司令部搬到市总工会去，集中起来可以自己搞点警卫队员，不行可找公安人员，到必要时我要向中央提，叫解放军保卫你们，集中就

好保卫，现在正在进行经济方面的斗争，一定要把这仗打好。毛主席对上海关心很细致，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个口号都背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你们对电话局我不知你们怎样，那天开会为什么来那么多保字号的，就是电话总机中出来的。”

“对蔡祖泉同志提出的口号，我和姚文元商量了，恐怕不当。哈尔滨师范学院那篇文章，是毛主席亲自看过了，那是毛主席推荐的，哈尔滨两个团，一个造反团，一个‘八·八团’，那个‘八·八团’保的要死，拚命的保，保院党委保省委。蔡祖泉他不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要允许他改过，把他当做回到革命派方面的典型，这是很重要。毛主席说蔡祖泉不是过来了吗？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是左中右都要见面，当然要支持左派。到现在我们只见了左派。上海现在是最容易出经验的时候，要是个高潮，要敢字当头，放手解决。”

“要善于联合，毛主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这只有毛主席才能提出来的，现在不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要联合法国，打倒美帝国主义。”

“对待彭、罗、陆、杨也是这样，先解决罗，要解决彭，把彭的问题整了一半又来解决陆，陆到会场还不知道，但知要出事，……”

“希望上海的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30)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1.09

〔时间：1967年1月9日中午12时15分，地点：上海延安中路友谊电影院。〕

张春桥讲话：

今天报纸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者按语和你们红革会等十九个单位联合签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在造了反的《文汇报》上，毛主席看了这个材料，毛主席看过后，认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写得非常好，《解放日报》《文汇报》的反造得好。为此，《人民日报》为这篇文章加了编者按语，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上海革命学生、革命工人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关于这一点不要写大字报，可口头传达。（姚文元插话：这是毛主席的声音。）我们上海革命左派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这个编者按语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上海各工厂、街道、里弄家家户户进行最广泛最深入的宣传，把毛主席的声音告诉全上海人民，动员一切力量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把资产阶级的新的进攻彻底打倒，不只是把经济斗争转过来，而且要把革命左派队伍真正壮大起来，把工厂、农村的左派队伍真正壮大起来，使我们革命左派队伍在上海真正取得优势，这样上海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才能更深入、更广泛、更全面、更好地开展，这是我们今天来的希望。

你们红革会也好，其它革命组织也好，希望你们分分工，大家做做宣传工作，要把这个当作很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同学们对经济斗争没有经验，参加这个斗争对我们同学有很大帮助，人家还会以经济手段来向我们进攻，例如：一个码头停工，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仅在经济上有损失，政治上也有损失，外国已有二十几只轮船在中国开不出去，莫斯科的广播电台也在宣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上海的工人要求加工资罢工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我们要有勇气迎接他们的这个新挑战，老实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究竟是资产阶级力量大还是无产阶级力量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不会干事的，叫曹荻秋开汽车他会吗？能力、权力在我们工人手里，但现在被利用了，被蒙蔽了。所以，需要学生不只是到工厂，也要到街道、里弄，也要到自己家里去宣传，使群众了解什么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政治上揭露这一阴谋，如果跟这一条路线走，那我们文化大革命要失败，有的人搞了一千多元钱，但文化革命不搞好，我们眼前的这点利益也没有了。我们的矛头不指向工人，艺徒，不责备他们，不要抓小人物，要抓就抓大人物，要揭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搞阴谋，大家来批判揭发，可登在你们的《红卫战报》上，也可以登在《解放日报》上，《文汇报》上来揭露他们的阴谋，把矛头对准这些人。

我们要相信上海工人大多数是好的，最近有许多工人特别是革命造反派工人表现很好，不离开工作岗位，而且延长工作时间，顶别人的班，我们要大力表扬“抓革命、促生产”的好工人，我们应向他们学习，宣传他们的事迹，表扬“抓革命、促生产”好的单位。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我们要看到主流是很好的，要求加工资是一股逆流。

毛主席讲过：“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毛主席把上海放在这样一个地位，这说明，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很关心，并寄予无限希望，我们两人每天要打电话回去，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非常关心，他看到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很高兴，后来又看到上海的革命工人起来了，更加高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毛主席生日的前夜，我们到毛主席那里去，他说：“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的工人起来了，革命的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上海有了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有了这样好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不仅对上海有影响，对华东地区，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毛主席的直接支持下，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成为全国的模范。全国只有上海有这么多工人，上海的学生也是有革命传统的，上海的干部也极大多数是好的，我们完全有信心，把上海变成一个完全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新上海。

我和姚文元是奉命来到上海作调查工作的，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调查员，市委希望我们回来作他们的挡箭牌，我们不干。赤卫队要把我张春桥揪回来斗，我不接见他们，因为要首先说清楚一条：究竟是他们对，还是我对，说清楚了再接见。我们到上海来，是向上海人民学习的，我们主张快点把消息转给中央，我们当义务传递员，把《红卫战报》转给毛主席。（热烈鼓掌）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我们可以替你们传达、介绍。我们还可以给你们提些意见，我们不一定说得完全对，你们可以自己考虑，你们完全有权利自己去做，你们也可以不和我们商量，你们给我们商量，我们也可以不发表意见，你们自己去做，这对你们有好处，因为我们一发表意见，你们就会按照我们的意见去做，我们的意见不一定对，我们也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彼此之间可以谈谈心，交换交换意见，你们敢想、敢说、敢革命，我们有意见一定会给你们提的，例如，我们今天谈话不要用大字报贴出来，因为这样对你们没有好处，大家会认为都是中央文革给你们出的主意，我们有时说错了话，你们也可以批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要砸烂狗头，同志们的批评不属于砸烂狗头之类（大笑）。我们批评你们，你们批评我们，这是完全正常的。

下面姚文元同志讲话。

姚文元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们非常高兴，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关键时刻，我们又回到了上海，向你们学习，并对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非常支持上海的革命左派，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市委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妄想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办不到！毛主席的声音，定会传播全国全上海，现在上海的阶级斗争形势大好。我们一到这里就感到这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形势典型。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上海非常激烈、尖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上海反映很突出，很明显，并正在取得伟大的胜利。刚才春桥同志讲过，《文汇报》的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正象《人民日报》编者按所讲的一样：“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这个文件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发表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上海开出的一朵灿烂的花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是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相结合的产物，这也是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发表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资产阶级总要在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段他们用抓生产来压革命，现在用停生产来压革命，共同的一点是用压革命来对付我们，他们感到要垮台了，就从另外一条战线从经济战线上来压我们，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点进行宣传，每一个人拿着《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支部生活》（现在《支部生活》也造反了）到全市各个角落进行广泛宣传，我们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团结中间派，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人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本色，有许多先进事迹我们要进行宣传。电话局一批革命工人不拿补发工资，他们认为这不能拿。对于一些受蒙蔽的人，我们要做工作，对于什么市长啊，局长啊，这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他们应该进行斗争，应该让他们在群众的革命呼吁面前低头认罪。

这次来我很高兴，我们愿当小学生，你们许多先进的东西我们愿意传达中央。另外，毛主席、党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我们决不封锁，我们要把毛主席的声音传播上海每一个角落，我们首先要去各要害部门：码头、铁路、电厂，还有市场和银行，这些单位搞好了，歪风邪气就可以杀下去。我们完全有信心，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挑战，那里斗争很激烈，中国有句古话：“疾风知劲草”，在这样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会锻炼出一批坚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一定会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烧光，一

定会建立起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新上海。下面我们高呼几个口号：

打倒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全上海革命人民联合起来！

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浙江金华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总部驻京联络站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

31) 张春桥姚文元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 站人员座谈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 01. 11

〔参加座谈会的有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外地驻沪联络站工作人员〕

张春桥：

早就想与北京来的同学谈一谈了。大家无非是想听听消息、交换意见，你们可以先提意见。

（有人提到学校里军训，调回去的问题。）得到通知的是不是四个单位：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北大、清华？你们讲讲看法吧。

（三司的说北京要求明天就回去，他们想留点人在这儿。）大概不可能，军训只有两个星期到二十天。军训是这么回事，最初，从毛主席接见碰到的问题，队伍到天安门就走不动了，后来派解放军去。这样好看，时间也节约。他们说那一次最好按毛主席的指示编成队伍，根据这一点，今年四月又要接见，如果又恢复接见，又会碰到问题，这是最初的想法。后来想不仅如此，真正的红卫兵站队要象样，最近这半年也懒散了，睡觉、吃饭也不规则，有些人由于工作需要天亮才睡，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但有的人就是懒散。我们讨论时，不仅军事训练，也要政治训练，红卫兵正处于初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年，红卫兵八月才成立。红卫兵很勇敢、很革命，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但因初期，故有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中央考虑就要政治上训练。现在有条件了。以前看不懂的，现在能看懂了，除了“老三篇”和语录外，读一读古田会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和时局》，左派队伍中出现的问题与古田会议差不多，对红卫兵也完全适合。上海各红卫兵组织间，

一个组织内部，查一查古田会议决议差不多都有，有的只是稍变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一样。伯达同志讲“老三篇”讨论时，主席讲，大学生对马列主义基本的要读一读，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是必要的。经过这一段，学习一下，总结经验，把学习主席著作与总结结合起来，时间又不能长，又要总结经验，最初北京的不同意，特别是中学生不同意。因为中学生最近才回去，认为对两条路线斗争有妨碍，这个大概讨论了一个月，开一次座谈会不同意一次。最近形势变了，北京在一周内就变了，抓西城纠察队，许多保守的也解散了，如清华好多左派组织合成了一个井冈山，在新形势下，感到要军训了，组织之间问题不怎的……清华只余下了井冈山，地院只剩下《东方红》，北航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先在这些左派占优势的学校搞军训。我与姚文元商量一下，能否回去一部分，学习一下，因为全国都要准备推广。这个问题就这样，因为我们不能代替总部，我们可以向北京问一下。从我们两人在这里的意见。希望多留一点。也可能家里人少了，各地方不回来也不行。学完后也准备下厂下乡。（有人问起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联欢他（指日本政府）不发签证吗。准备了一年多了，来以前在加紧筹备，最后不发签证没法来。（有人提出在上海的联络站能否搞军训）因为上海学校没与他们商量过，究竟什么时候搞？你们可以向总部建议。（姚文元插话：可以提一个，也可以提两个。）

关于周总理、刘宁一讲话我们没问。根据我们知道，中央准备发一个文件，征求意见稿，他们刚刚起草出来，还没征求中央意见。如果正式稿，

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中央发社论、文件，因为全国都有类似问题。

（谈到按职业成立组织问题）我们主张按阶级组织队伍，红卫兵是革命青少年组织，应该是坚决捍卫毛主席路线的，无产阶级化的队伍。一九六五年、一九六三年毕业生有各党各派，我们主张按阶级分，不按职业分。美国分裂工人队伍是按职业队伍，十六条提出是组成阶级队伍。

（谈到支疆家长造反及回乡支农造反时）方向不对的。要到新疆去。到边疆去，上山下乡这是总的方向。

（谈到市场感到压力很大）这是必然的嘛。（有人插话反映百货商店情况）整个形势，经济问题，《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已作了基本分析。这个文件主席看了说：很好，又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编者按是主席的意思。对《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很赞成。同学们过去恐怕没碰到，那时来串联谁会想到这一手。冲市委，炮打司令部，特别我们同学没搞过经济工作，我们碰到了，见见世面，我们要很重视，看到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总的要藐视它，他们是没办法，最后挣扎。过去上海抓生产是举得很高的，过去到过上海的同志对我说，上海十六条只有一条“抓革命，促生产”，还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上次我来处理安亭事件时，最大压力是生产，对工人造反派是最大压力，对我也压力很大，说我拿原则做交易。这些人当时还觉得自己力量最大的，但革命没压下去，他们就连原则也抛弃了。我们没来时接电话听说，赤卫队“三停”，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衡山宾馆，

几万人上北京。赤卫队来电报很多的，压中央文革派人来，我们感到这是件大事了。但也预感到赤卫队要垮台了，他搞“三停”就完全脱离上海人民，几万人上北京，你要不要生产？！我们就与一些同志打电话赶快把抓革命、促生产旗帜举高高的，过去他们拿来压革命，现在拿来促革命，保卫毛主席路线，现在看来应该这样，把这旗帜树起来，因为这代表了广大群众眼前和长远利益，我们要有精神准备，甚至造成比这更大困难，也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应该相信广大工人群众不会去搞破坏，去离开生产岗位，这点要充分相信群众，他们要听主席和中央的，这点无论如何要相信，如他提出这就垮得更快。上海刚解放，问题更严重，现在码头上东西多，没法运，而过去是没东西。我们最关心粮食，第一位的是吃饭，只要上海人民有饭吃，就大胆干，饿肚子也可干，但有饭吃更好。那个钢铁厂停了，这个吓不住我们，停几天，革命照样干，以后再赶上去，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停工。但我们来上海感到左派压力大。我们没挣钱，没签字，没停工，压力不是对我们。

那一天对《解放日报》也说了，报纸上要表扬一些抓革命、促生产的好事，按工厂十条搞得好的，应该登报，个人、组织、一个单位。因为这些同志在阶级斗争这个关键问题上站在正确一边，应上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了，没框框了，过去不能上报，现在统统可上报。签字特别多的，胡开支票的，但是要找局长以上的，厂长、科厂不要，开斗争会斗他，让老工人发言揭发他，甚至让一部分觉悟的赤卫队员来控诉他。

刚才讲了战略上、具体工作上要艰苦，自发的工人运动总是要搞经济问题，我们任务是把经济问题提到政治上来，提到两条路线，国家变不变颜色上来，学生与工人结合，把马列主义、毛主席基本观点带去，这是需要知识分子帮助工人，但工人同志接受比知识分子快，他们文化上有限，知识少。这是学生光荣任务。你们下去在一个厂、一个车间看到的要登报，可能发现新的劳模，代替了他们，应宣传这些新的人物。

现在只能把力量投入要害部门。先稳定下来，码头已回升了，最低点是万吨，昨天达到六万吨，能把自来水、邮电、公安等部门左派真正动员起来，占了优势，“三停”做不到，然后发动更多的人到工厂去，这样更加广泛结合，我们去不能光谈经济问题，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经济斗争提高到阶级斗争上来看，这斗争有什么严重恶果，在斗争中不断揭露市委，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稍稳定下来，还要回头打政治仗，现在不能不抓一下生产，但用政治、用思想教育解决，不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就要犯错误。

（大家反映了关于社会青年、下放工人的问题）

马陆公社的农民为什么进城，就是宋日昌、宋季文签的字。有的家靠近城市，做些临时工，收入就比农民高，吃饭算那儿就成问题。于是就规定你在城里做工的，收入归公社一部分。签字就说全归个人，公社工业国营，于是农民就进厂，变成农业工人，闹国营农场要求。

（有人说这股风刮到农村影响很大）

我那天知道有一万，这完全是破坏农村文化革命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工资制有问题。是在进城后形成的，特别上海千差万别，有的是帝国主义工业，里面重体力工人给很低，要害部门工资很高，用这分化工人。这制度对我们也有影响，所谓保留工资，还有封建主义影响，解放后苏修影响，还没有按中国情况。主席一贯主张搞一套适合中国情况自己的，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的制度。讨论了几年始终没解决，这问题到文化革命后期一定要改。否则，也可能因为这犯错误，影响国家前途。同学们说理时要注意，不要一概否定。但也要提到，这工资不仅个人生活问题，而是关系前途问题，是按修正主义道路发展呢，还是按共产主义道路发展？这是在文化革命中间，在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定性胜利后才能解决，领导问题解决了，左派占了优势，正确思想占上风，才能解决好。目前不要上敌人当。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现实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先刹住，你们要注意哪些是合理的，现在做起来不难的，不解决就又走向另一极端，这也要注意，否则就脱离群众了，有的搞得好也可能有利于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之要与两条路线联系起来。最近我们还没有与基层工人接触，因为与各组织见面还没有完呢！

（有人提到公安局两派问题）我刚刚接触到公安局问题，过几天，找他们谈一谈。解放军接管，或分化他们。后想解放军接管不好，不是有个基本原理吗？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公安局的同志大都是好同志，否则变成公安同志都不可信，这在任何时间不要动摇。这问题看来要外地帮一下。他们中间总要有人起来坚持毛主席路线的。因彭真、陆定一搞好多年，有问题。但毛主席对这抓

得很紧。我们正在交换意见，都交给造反派，任务太重了，如接待站，造反了就出动串联了，后有一批造反派看不下去，眼看每天有许多人找不到地方睡，于是这些造反派找我们，我说搞一个革命的接待站行不行？搞起来很困难，因为机构都瘫痪了。现在造反不那么简单，一造反，各种压力困难摆在面前，如《文汇报》、《解放日报》也是，给压力很重。我们考虑，有的还是要当权派干，你不是要回到主席路线上？就干嘛，给机会嘛，最近干部要来谈的就多了，他们犯错误，检讨承认给工作做，在工作中看改不改。这样对造反派有利，造反派稍机动一点。公安局问题把抓的人送去了，可以告诉造反派去监督。否则他们自己要造反了，又搞业务，忙不过来。

（有人问：可不可以与公安局串联？）这问题没有研究过，原则上不采取串联。

（有人提到南京解放军接管公安局）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还没有撤，陈毅还是主任，随时可以管制。还是用大民主。西城区纠察队也没什么了不起，一个小指头问题，不要都压在自己身上。那几天北京同学几个司令部都很紧张，说他们要闹大事了，也没什么。一二·九要在天安门开大会，也没有开起来。他拿这个旗帜根本号召不起来，群众不会相信他，但工作上也要重视，要积极做工作，争取群众，他也要相信群众，保爹保妈这谁听，这口号叫不起来的。

（关于赤卫队）总部桌子砸烂了，思想没有砸烂，方向没有砸烂，你们的宣言、通令怎么办哪？那些事做错了，要在社会上说清。

我们来是以调查员、通讯员身份来的。一个是来不来？后来说来。来以什么身份？后来考虑以这个身份最好。这样是不是消极了呢？不是的，有些事完全可以商量的，有意见可以找我们，我们有的意见也有错误，我们刚到上海，不要迷信。有些事最好不要问我们，有的，不说一点不好办，说一点又不够，你们最好自由行动，我们也自由。如一月六日会，我们考虑不参加，要参加就要讲话。一些会也不参加，可以东跑西跑，了解情况，大会可以了解情绪。中央也给我们任务，给上海左派组织，包括外地在上海的，给以帮助。因为在北京，不管如何少，也可以一同谈谈，在上海就没有，各组织发生问题也没人帮忙一下。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上海工人革大《红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32)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1.11

中央贺电发出后，影响很大，人们要来上海学习经验，要接待。全国在向上海市学习。中午，中央文革小组通知我，中央四个组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署名发一个贺电，送到主席那儿去了，正经主席审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写好了，明天见报。我回电向中央表示感谢，这是中央对我们上海最大的支持，（姚文元：史无前例）以中央四个组织的名义给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是给上海

市委，这是从来未有的。上海解放时，中央与中央军委发过贺电，再也没有发过贺电。这是对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也是给了我们最大的责任。（召集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办）

（北航红旗王健良：我们上海各组织给中央四个组织发致敬电。姚文元：给毛主席。）

现在形势在回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不管码头、工厂、市场都在回转，但不稳定，困难还是不少。

（在谈到《紧急通告》上签名问题时）有些名称不妥当，本来想商量一下，来不及了。比如上海有些组织是毛泽东主义的，在北京已改正过来。毛主席不同意这个叫法。我提个意见，你们考虑考虑。（读贺电，从略）

我们来上海，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调查员。四日来以后，开过一些座谈会，还没有在大会上和群众见面，不是怕群众，而是为了争取时间，工作从容一些。调查员顾名思义是作调查的，不是来当保姆的，不是来包办代替的。主要靠我们自己，你们有什么工作最好不要和我们商量。我们没有来以前，你们不是干得很好嘛。上海的情况，我们可以向中央汇报，中央有什么指示可以传达，我们不会对大家保密的。

中央肯定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经验。在市级党政机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但是革命群众能够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你们现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操纵在自己手里。只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就会进行到底。我们应当相信上海革命工人、农民、学生的力量，上海市很短时间内就把形势扭转过来了。就港务来说，原每日八万吨，六日低潮仅三万多吨，现在回转过来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进攻打退下去了。

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中央作出了这么大的估价，说是全国的模范，而我们作的还不够。与其说是中央对我们这样高的评价，不如说是中央对我们寄托这样大的希望。我们怎么样作出行动来不辜负中央、主席对我们殷切的希望。

上海革命组织之间有些矛盾，彼此联系不紧，有些事情是不妥当的，如《紧急通告》的署名次序问题，光想争第一位、第二位签名，扬言要封《文汇报》，为了登一个广告，就想封《解放日报》。现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是新生了，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登的。这样就推迟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发行。

我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以全局利益为重呢，还是以个人、单位的利益，局部利益为重呢？中央说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形成了大联合，这是对我们的希望，但是我们这里确实有问题。我们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

上面谈到的事，我原来很吃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生，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件。毛主席刚刚肯定了的，有什么理由要查封呢，这算什么革命行动呢？老实说，现在有人要查封《文

汇报》、《解放日报》，包括《支部生活》的话，受到砸，我们每个革命组织都有权起来保护。砸烂狗头是对敌人，不是对同志。以后要变了，再造反，现在不行。

听说小教挨了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不要以为我们革命斗争成功了，斗争还会尖锐起来的，要做好准备，斗争有各种形式，敌人一手失败了，还会有另一手的。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如果小教挨了砸，我们能都去支援吗？我们不要互相拆台，勾心斗角，争名夺利，我们要想到现在斗争很尖锐，阶级敌人会用任何办法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要真正互相帮助，只要是一个革命的组织，革命的人，不要什么命令就要互相帮助支持。这样才能不辜负中央给我们这样高的估价，这样大的希望，才能达到上海市革命组织真正的大联合！

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中央贺电，学习中央对我们的评价。已经做到的，我们要保持；还没有做到的，就去争取，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中央对我们的支持。

目前，保守派，我一个也不接见。昨天晚上，有二、三十个不速之客翻墙进了我的住处，自称是造反派，大概是保守派。我没接见，我是有准备的，当然不知道赤卫队什么时候会冲进我那里。希望革命造反派能够把言论权、时间安排权给我们，工作会从容一些。上一次来上海，到最后几天，是无法生活了，而且干的也不是我所愿意干的。

革命造反派之间，有什么就谈什么。以后有什么问题最好是写信，托《文汇报》、《解放日报》社整理信件，我们去取。上海这几个组织不好单独接见，大会又不解决问题。

（姚文元同志感冒了，他不讲了，散会。）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上海工人革命大学红旗总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33)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欢呼中央贺电 大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1.12

【上海革命造反派召开“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讲了话。】

张春桥讲话：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略）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来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得出来。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们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地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了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

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那么今天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一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上海是我国无产阶级强大的革命基地，帝国主义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他们要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一定要夺取上海这个基地，上海解放以后十七、八年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我们全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斗争中间，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捣乱，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无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上海无产阶级在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万丈的灿烂的光辉照耀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

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于失败的，他们还会采取各种手段同我们较量。但是同志们，他们只是一小撮，他们是腐朽的力量，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藐视他们，在战术上重视他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贺电就是最新最活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方向盘和指南针。我们为了夺取新的胜利，一定要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我们要永远地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及时地识破和揭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给予粉碎性的打击。我们要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坚决地执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间规定的政策，把每一条都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执行。

我们胜利的保证就是伟大的毛主席撑我们的腰，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我们胜利的保证，还在于我们上海革命人民的大联合。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已经联合起来，我们希望你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这种联合，把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

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斗争，使得上海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个街道，都成为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经过我们的斗争使整个上海成为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国革命人民的强大的基地。

全上海革命人民的大联合万岁！

伟大的上海人民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姚文元同志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向上海革命的工人阶级致战斗的敬礼！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革命人民致战斗的敬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表达了我最最敬爱的伟大

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于上海的革命人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期望。今天，一千句话一万句话说不完我们心里的高兴。我们表示决心，一定要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夺取新的胜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

从这最近一段时候火热的阶级斗争中，从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英雄的革命行动当中我学到了很多。同志们，我学到了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活生生毛泽东思想，活生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活生生的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同志们，多少年以来资产阶级就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的进攻、挑战。现在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了全面的总进攻。上海是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里面失败了，他们看到了自己已经垮台或者将要垮台，就企图在经济领域当中发动一场新的反扑，想搞一场经济上的大破坏，来瓦解我们的革命队伍，来压倒革命造反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的烈火压下去，这就是这几天阶级斗争的重点为什么转移到经济上面的原因。我们看到，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内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同社会上

的地富反坏右相呼应，刮起了一阵经济主义的黑风，他们完全暴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

同志们，这种阴谋已经被我们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和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识破了，坚决地粉碎了。但是这是一场十分尖锐的政治斗争，我们必须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注意他们还想使用什么别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时地揭露它、粉碎它。同志们，在这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中，上海的工人阶级和革命造反派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你们挑起革命和生产两付担子，纵使有天崩地裂也敢上，你们坚决揭露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阴谋，你们把经济主义的臭家伙砸得个粉碎。这充分证明上海的工人阶级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吓不倒的，是骗不了的，是压不垮的，你们不愧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模范。同志们，这里我要指出：上海市委的曹荻秋、陈丕显之流，过去曾经把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写在自己的帐上，贪天之功，以为己功。现在他们当中有的人竟然要把上海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照耀下创造的伟大成绩算在自己的名字下，这种做法真是厚颜无耻！

毛主席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场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斗争中，我们再一次看见毛主席这个光辉思想伟大的力量。我们亲眼看见，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勇敢前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新反扑猛烈开火，我们亲眼看见，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亲眼看见，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发挥出无穷无尽的无产阶级首创精神；是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上海革命造反派“敢”字当头，一个又一个地攻克了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再一次证明，证明了什么呢？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战的关键时刻，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猖狂进攻的关键时刻，革命造反派应该挺身而出，行动起来，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把报纸和一切舆论工具的领导权，把经济命脉的领导权，把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牢牢地夺到我们自己手中来，提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采取果断的措施，放手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秩序，坚决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揭穿他们一切反革命的阴谋。只要我们现在这样做，而且以后永远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种种阴谋诡计，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最后让我们高呼：

全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全上海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抓革命、促生产！

打倒经济主义！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4) 张春桥谈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夺权斗争

张春桥 1967.01.18

〔按：1966年12月3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在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一举夺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梅益、丁莱夫等一小撮走资派的党、政、财、交大权，从此，广播局回到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手里，广播局新生了！就在这幸福的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肯定了我们的夺权，指出了我们要奋斗的方向。1967年1月18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革命群众的谈话中，谈了中央广播局战斗团的斗争和夺权。〕

张春桥同志说：

中央台有三个组织，现在变一个了，三派最初我们也搞不清楚，因为现在他们都打造反的旗号。后来，我们和每派人都谈了话，识别了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保的。在“保”的人当中，一般群众是热爱党的，不能都看成坏的。中央台多数同志是好的，丁莱夫党委是不好的。后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内部的革命派，那里的革命派要经过几个回合，把多数人团结起来，才能站起来。单纯来一个宣布是不行的。要我们宣布一下当然是简单的，但是不利于锻炼真正的革命派。

去年4月16日，我在上海，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都在上海。那天早上一早就听到广播北京日报假批判真包庇的编者按语，引起了我们很大的注意，我们一听就知道是假批判，很明显这是假批判嘛，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这就使我们感到，即使门口戒备再森严，里面照样可以发布政变的命令。你外面保护得很好，里面搞政变有什么用呀！所以权不在革命派手里，那就应该夺权。不过夺权的条件要去创造，中央台他们夺权也不是一天就夺下来的，他们经过几个月的斗争，是经过一段工作的，我们感到他们夺权可能是比较巩固的。

35) 张春桥在接见上海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1.20

【一月二十日晚上九时，张春桥同志接见了上海三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原三十二个加上红土司、教革会、公安造反派）。就上海当前任务作了重要讲话。此文根据“教革会”参加接见代表的传达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不要认为斗争胜利了。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严重的斗争，我们还要准备打几次硬仗。”（这句话张春桥同志反复讲了两遍，姚文元同志在旁边又重复了一遍）

张春桥同志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夺权，要接管。他说：“夺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权一定要夺回来，一定要夺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革命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我们一定要化很大的力气，化很大的功夫，把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中。”他说：“夺权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大联合。夺权是争取群众，联合要在斗争中联合，要在斗争中争取群众，现在还有一些阵地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有很多群众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

张春桥同志特别提到中学的运动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中小学一百多万师生都没有发动起来。如果发动起来的话，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中学的运动绝不能走过场。他指出，目前还有很多群众卷在经济风中，所以上海目前运动的焦点是反对经济主义。如果不反对经济主义，文化大革命就要中断。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通过反对经济主义，我们可以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可以争取群众，创造新的经济命脉，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张春桥同志接着说：“你们想一想在当前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有那些可干？”他说：“正象你们刚才说的（指他讲话前大家的议论）陈丕显还没有打倒，他还在活动，曹荻秋也只是表面上被打倒，他也还有势力。市委机关的阶级斗争盖子也没有真正揭开。赤卫队还在改头换面，转入地下活动。社会青年、里弄干部、下乡支农返沪人员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他还指出：“难道教育系统、文艺战线上就没有经济主义吗？为什么没有人去搞呢？”

张春桥同志最后说：“现在考验一个组织革命不革命，革命得彻底不彻底就是看他在反对经济主义问题上的态度。”

36) 张春桥姚文元谈上海高校“红革会”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2.01

张春桥：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组织还没有意识到。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姚文元：红革会两次要求警备区派队伍，并带有威胁性口气说的。廿四日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夺权派了队伍，廿六日开常委会要派部队保护他们，卅日下午开炮打张春桥会说：“我们要开大会，要派部队保护我们，要警备区副司令员和师政委及上次参加行动的部队听我们的揭发控诉。”一个革命组织可以调动军队对付别人的革命组织，那这种情

况发展下去怎么办？红革会恨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电话给公司，叫他们搞大联合。可红革会把住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为什么不相信红革会？

同学：破坏大联合的罪魁祸首是红革会。

张春桥：他们已到了无聊的地步……他们幕后有人，适应了陈丕显、曹荻秋的要求。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说要跟我个别谈话，早不写，晚不写，就在今天写了。曹荻秋曾对我说：你来上海尝尝味道。

姚文元：曹曾讲：你们中央在北京发号施令，到上海来尝尝味道。

张春桥：红革会的头头是什么性质？可以考虑。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中说：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

同学：（把红革会的情况谈了，略）

姚文元：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以武力来压别组织，发展到这个地步？

……红革会某些负责人非常怕别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最近马路上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曹荻秋根本不承认自己被打倒，陈丕显的问题根本没有揭透，这个行为适合谁的需要，自己很清楚，揪出幕后策划者，大方向转移了，转移了矛头，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两个首要任务：（大意）

1、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大联合大夺权。

这两个都给红革会破坏了。毛主席提倡大联合，要把红革会的战士和负责人分开来，只通过斗争才能团结红革会战士，不斗争不行。上海形势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在集中，牛鬼蛇神出笼了，另外在造反派内找代理人，红革会就是，我们要作好精神上的准备……（大意：红旗社论第三期第五段都分析）。要站稳立场，对大反扑要作好准备。大意：我跟红革会接触了两次，有一次把我们斗了六个小时，还叫我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想这是普遍真理，对任何人都适用。

张春桥：现在要好好学习社论，不要跟他们跑。要高举夺权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现在街上没有陈丕显、曹荻秋，标语是不正常的，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夺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目前上海砸风还很盛，互相砸，砸电话机……这是国家财产，电话机是无产阶级性的。要用摆事实讲道理来处理内部关系。

姚文元：红革会不愿摆事实讲道理。

张春桥：红革会把别人都打成反革命，自己最革命，要和他们辩论大方向，讲大道理。现在正适合陈丕显、曹荻秋的要求，不斗他们的，联合破裂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联合……。廿八日复旦红革会反张春桥，×××说：“以前我两面派，现在我一面派，坚决和红革会一道搞张春桥”，这并不是孤立的，总要爆发的，就是不派军队也要爆发，这样也好，

我们重新组织队伍大联合，没有分裂就没有大联合，和这部分人联合，就和那部分人分裂……。斗陈丕显、曹荻秋一定要干，只有这样联合才更好、更巩固。否则巩固不了，但将来还会分裂。在取得胜利时，易迷失方向。从夺权变当权。陈丕显在三年游击时很苦，但顶住了。进城后，政治地位改变了，他就越来越滑下去了。现在我们夺权，夺权以后就是当权了，你们大学生就要出来工作。但有可能半途而废，红革会就是这样。毛主席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只占百分之十几。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就在上海，上海两个阶级力量都很强，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这是大好事，我们要准备真正的反革命包围，开枪怎么办？那天我和姚文元议论了一天，到处都有反革命活动，可上海没有这一手，我们很怀疑。我们从来没有对红革会有恶意。同志们要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把红革会看作孤立的现象，应和其它现象联系起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很重要，政策、策略要注意，对干部也要分析，一分为二，打击面不能过大。有些地方一开会，就把干部统统跪在地下，现在形势变化了，要强调区分干部，社论中干部问题也就是这样，开始时区分是不行的，当革命群众占优势时，再不区分是不对的。

“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是反马列主义的口号，过去不批评，是因为当权派用这句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句口号来压制群众的。

希望同志们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部分。

学生要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37) 张春桥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2.05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农民同志们，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的指战员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战友们，同志们！

在今天欢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向上海的革命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战友们，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已经宣读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各方面的同志讲了话。千言万语，都是欢呼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回想一月以前的情况，真是惊心动魄呵！当我们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向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发动猛攻，眼看他们就要全线崩溃的时候，他们刮起了反革命救济主义的妖风。他们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转移了大方向，就

会挑起全市人民对革命造反派的强烈不满，就会把革命造反派压垮。即使他们失败了，留给上海人民的也是一个混乱的局势。这一手，也算不得什么大发明。上海解放以前，以及解放初期，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就是这样整过我们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永远也不懂得这条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猖狂反扑，只是更加激起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万丈怒火，只是更加促进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更为重要的是，是唤醒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认真地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能刮起这场经济主义的妖风？是因为他们乱签字。他们为什么能够乱签字？是因为他们有权！党权、政权、财权、文权，这本来都是属于人民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夺取来的。而今被这帮资产阶级老爷们窃夺去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把这些权夺回来了！于是，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文汇报》《解放日报》新生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发表了，一小撮赤卫队头头扬言要“三停”的码头，车站等等要害部门的权夺回来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签字权作废了。在这场伟大的阶级搏斗中，无产阶级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伟大的一月革命万岁！

一月革命的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上海革命造反派、我们上海革命人民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指

挥下夺取来的伟大胜利！让我们再一次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战友们，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旧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着上海无产阶级率领广大革命人民夺了权，当了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失败的。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一月革命的结束，而是上海无产阶级有了一个统一的，战斗司令部，可以更好地根据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继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要时刻记住，这是斗争的中心，斗争的焦点，成败的关键。

因此，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我们上海革命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红旗》杂志第三期《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所阐明的毛主席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今天宣布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这篇宣言和第一号通令所规定的上海革命人民的任务，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寸权必夺”。我们一定要把全上海一切还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汉派窃据的权力统统夺回来！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是革命造反派的上海，是革命人民的上海，是全国革命人民的上海，是毛主席的上海。不把一切权力夺回来，誓不罢休！

阶级敌人不但不肯让权，我们夺了权，他们还会反夺权。他们还会玩弄各种文的、武的阴谋手段，给已经夺了权的革命造反派，给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制造种种困难，施加压力，妄想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告诉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的这一套，我们早就领教过了。你们是腐朽的力量，是一小撮，把你们这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等等统统加起来，也还是一小撮、在一千万革命的上海人民面前，你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革命造反派已经作了准备。还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同我们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谁胆敢进行反革命活动，就一定砸烂谁的狗头！

为了继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我们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在伟大的反经济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就是用“抓革命，促生产”的铁拳打败了敌人的。让我们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新成就，来庆祝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吧！我们一定不要放松了抓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我们一定要大抓革命，大促生产。事实将会证明，我们上海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各个生产、工作岗位上的革命人民，不愧是挑起革命和生产这两副重担的英雄。英雄的上海人民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产物。为了继续夺权，为了巩固和发展上海人民公社，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应当继续巩固和扩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这个大联合，不是大杂烩，不是联合国，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从来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

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拥护，就赞成，就支持。我们应当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一定要不断地整顿思想，整顿组织，象我们公社的名字一样，打倒“私”字，确立“公”字，使我们的队伍不断革命化，使上海人民公社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定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革命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同志，都坚决地同上海人民公社站在一起，用最大的努力来支持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和革命工作。对于犯过错误的工作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不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我们都允许他们改正错误，欢迎他们突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罗网，站到革命人民方面来，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

让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一月革命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万岁！

上海人民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8) 张春桥姚文元与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等谈话摘要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2.10

〔接见单位：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市第一医院星火燎原兵团、华东工学院红旗兵团、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北大文革驻沪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院驻沪联络站。〕

关于目前大联合问题

张：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人民日报里有句话，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

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这里有谁参加起草。（同济大学东方红回答：我们参加了。）

姚：只有大联合才有权力，一个组织讲话没有人听，三十个组织讲话就有人听。在当前正需要，这是我的感觉，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能不能通过斗争先弄成锥形。

关于红革会

姚：到街上去看一下，街上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几乎不见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中央指出斗争的大方向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红革会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大方向错了。陈、曹的问题原本没有揭开，曹荻秋还不承认被打倒。红革会还破坏了大联合，在上海有两种大联合，左派之间大联合，而右派之间也在有意无意地凑到一起，现在有些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了，要有思想准备。对红革会的认识，以前对它负责人还是认识不清的。斗了我们六个小时（指元月二十八日在中苏友好大厦红革会等组织召开斗争张春桥、姚文元的会议一编者）也是一个好事，认识一个问题。

张：关于成立新市委问题，是赵全国（原上海的头头）已被捕入狱，赵全国到北京回来就反对我，不知是什么道理，我在北京时陈丕显一定打电话到中央要我回来，说市委支持不住了，是不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线，设陷阱，我总觉得这里面有玩意。当前在街上没有打倒陈丕显的大标语，这是不正常的。真正革命的同志，应该掌握革命的大方向。

目前，我们仍要抓斗争的大方向，取得真正的大联合，否则联合了，没有思想基础，以后还会分裂的。我们党的历史，开始党代会十二人，现在呢？陈公博是个大汉奸、张国焘……，你们都是青年，要注意在大风大浪中锻炼。陈丕显参加革命时，还是红小兵，在那艰难困苦条件下，受得了，他们还想到今天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们以后当权了，要注意。条件变了，不注意就会慢慢滑下去，现在分裂了，可能你们人少了，少没有关系。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左派总是少数。红军原来几十万人，后来只剩下几万人，到底什么时候强大的呢？长征以后强大……一月革命干了几十天，现在二月了，不知是谁个胜利了……现在有的人说：“我这个组织好，即是科长以下的人组成。”把科长当成当权派统统拉来斗，这是非常错误的。当前怎么搞，红革会是不是会作为斗争的一个内容。前一阶段有些打击面太广。对红革会要把某些负责人和红革会战士区别开。

矛盾会转化，有一点你们意识到了吧！本来是革命的也会走向反面。

姚：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用武力来压个别组织，会发展到啥个地步？……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非常害怕别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方向转移了，转移了矛头。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两个任务：（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大联合、大夺权。这两个都给红革会破坏了。毛主席提倡大联合，要给红革会的战士和负责人分开来。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团结红革会的战士，不斗争不行……我跟红革会接触了二次，有一次在中苏友好大厦把我们斗

争了六个小时，还叫我们念：“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任何人都适用。

张：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就是反马克思的口号。过去不批判，是因为当权派用这个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个口号来压制群众的。希望同志们思考一下，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个方面。

学生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上海人民公社早些成立好呢？还是晚些成立好？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性机关。

姚：大联合之所以有必要，集中起来有威力，有必要集中起来，成立一个“上海人民公社”。

39) 张春桥姚文元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附：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2.24

【上海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姚文元张春桥在会上讲了话。】

×××：现在欢迎姚文元同志主持会议（掌声）。

姚文元：

现在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东方红！（《东方红》）。大家请坐！

同志们、战友们：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三结合夺权斗争的经验正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我们应当满怀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进一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胜利。（口号）

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我们自下而上地从市委、从市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成立了自己的三结合的最高权力机关。最近，张春桥同志和我到了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上海的工作，参加讨论了现在已经发出来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同志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口号）

我们亲自听到了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亲自听到了毛主席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更大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的支持，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革命征途上的指路明灯，是我们革命人民的无价之宝。毛主席指出：二、三、四，三个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我们当前的工作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声音广泛传达到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心中，坚决地贯彻执行，化为我们的实际行动。毛主席说过，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形势，总结工作，明确当前的斗争任务，要继续发挥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那种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我们要继续前进，我们要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潮，提高我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巩固和扩大人民的大联合，按照毛主席的一贯的指示和政策，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普遍地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及时地识破、坚决地粉碎阶级敌人的各种新反扑。

同志们，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就当前形势和任务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了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把讨论的结果报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且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口号）

今天，将由张春桥同志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且布置当前的任务，会上要宣读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草案，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讨论和试行用。

张春桥同志的传达，希望大家不要去张贴，希望大家不要去张贴。因为今天讲的一些东西还是作为内部传达来讲的。现在我们就请张春桥同志作报告。（口号、掌声）

张春桥：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讨论问题了。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口号）

现在街上有一个大字报说，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去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到北京的。（掌声）我们十二号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的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口号）。而每一次的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问题，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总理、

中央军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党中央各个方面的同志，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关心的，使得我们非常感动，你们知道我们两个人，主席在三天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感到是光荣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着上海革命造反派去的，是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口号）

毛主席对于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取得的成就，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一些同志们都会知道的。过去，已经给我们很高的评价。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组织所发出来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都是毛主席在当时一接到这些文件他很快就看了，而且很快地就决定了向全国广播。在这次谈话里面，毛主席又说：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他就讲了一下这一段历史，比如说，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的那个时候，他讲，你上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了，工人组织起来一百万了，本身就说明上海的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毛主席对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我们，学生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机关干部的情况、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机关的情况，甚至于还问了一些市委干部的情况，我们都汇报了。他还问到，比如象一些细节他都晓得的，他问，你们那个时候学生不是到了码头吗，那现在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呀？我们告诉他说，当我们陪康生同志到码头上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学生还在那里，主席说，很好。他对学生的关心，对工人、对农民、对机关干部、对解放军的上海部队的情况，都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对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好的创造、每一个革命的行动，主席都无微不至的关怀、了解。我

们感觉到主席对上海关心，这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来说，对上海的革命群众来说，对我们上海人民是最大的光荣，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口号）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有了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阶级敌人还会玩弄多少花样来反对我们，但他们都没有办法来阻挡我们上海市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我想下面来分别地说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夺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主席那里谈得比较多。这个问题我想讲的多一点。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到了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从上海革命群众夺权开始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讲的一月革命风暴开始的（口号）。我们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解决政权问题。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夺权，就其任务和一九四九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夺政权是不同的，有它不同的方面。毛主席这次和我们谈话中间说，我们现在的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同志们注意主席的这一句话，他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自己亲身领导的。最近，他又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一句话，我想，就我们的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

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

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许多复杂的事物，最后归结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一切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了主席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口号）这是关于夺权里边，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第二、在夺权斗争里面，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成为中心的是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夺权、夺了权以后能不能巩固的关键。（口号）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我们上海，对我们上海旧市委、市人委这个权已经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号，上海市二兵团，他们夺了一次，发了通令。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又有其他四个单位夺了一次。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又夺了一次。那么他们夺到了一

些什么东西呢？他们夺到了几间房子，有的就到市委、华东局，把大印抢在手里，就以为这个印拿到手就算权夺到了，但实权呢？根本没有夺到！恐怕在座的同志也根本不知道。他夺了权，那么应该可以发号施令了。而我们不知道，夺算是夺了，但是他说了话没有人听。（口号）市委的权是这样子，华东局也是这样。我现在讲的华东局机关也夺好几次了，但现在你说权夺到了没有呀？我看也就是这样，占了几间房子，还有些人就强迫魏文伯、韩正义签了字，要点东西，找个汽车什么的，这些东西大概得了一点，别的东西得不到呀。好比我们在上海工作，没看到他那里对我们上海也没有影响。所以，我看劝夺华东局权的那些人还是不要夺了吧！要夺你也要搞三结合，而你又没办法三结合，这个事情将来会专门跟他们谈，我在中央也讨论过一下，华东局的权不能这样夺法，因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是不能夺的。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那么你夺权就是向党中央夺权啦。那末要夺只能夺华东局机关的，而华东局机关就是一些房子，有什么好夺呢？我现在是讲一个市委、一个华东局机关，其他单位，同志们，你们知道得比我多。有很多局、有些县、有些区、有些企业、工厂，夺来夺去谁也没夺下来，那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不了权的。没有这个大联合，几个单位、一个单位、两个单位或几个单位去夺权是夺不来的！那种夺权那种小联合的夺权只能够产生小团体主义。这儿有一个单位去夺权，夺了什么呢？只夺了个印刷厂，以为这个印刷厂就算我们单位的了，人家再来印东西就不给印。这样的夺权，我说是一种小团体的夺权，实际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小团体所有制，这是破坏社会主

义的，我们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个人，怎么能够属于一个小团体呢？如果那样的话，这是小团体所有制，从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这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口号）我们这个话说得尖锐一点，是为了告诉这些同志：这条路是不能走的，这是南斯拉夫的办法！有些什么工人自治呀、小团体呀，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那末，我们现在都懂了，就是都懂得要大联合夺权。大联合夺权还不能够完全说明，道理还不是说得很清楚。要实行大联合，关键还在形式，在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这个恰当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三结合。（口号）三结合，同志们现在都知道了，就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的代表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够算大联合。说大联合，并不在于有多数的群众团体都参加了。当然，凡是革命的组织应当联合，这个思想我们已经宣传了很久了。现在的问题是，不只是说群众团体越多越好，而是说，如果缺少另外两方面，只有革命群众组织而没有解放军、没有革命领导干部，那末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夺下来也不巩固。所以主席这次对我们谈话，谈得最多的三结合问题。我们很好地学习主席的指示，考虑了，想了这个事情，和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在北京恰巧碰到山西的同志、山东的同志都在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山西同志汇报的一天我们参加了，山东的汇报那天我们就回来了，没有能参加。所以，从各方面来看，山西当然十分明显了，有军队的作用，山西的夺权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那根本夺不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省委，山西省委反动透顶，而且已经准备拉武装呀！搞了那么一些

便衣特务，发了枪，给刘格平同志领导夺权的领导班子来了个（不清），就在他住的房子对面就有两个特务，有枪，枪口就对着他的门口，随时准备把刘格平捉起来的，只要他们没夺权，再过两天这些现在出来的领导干部就要都被捉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地站在革命派这一边，支持革命派夺权，这样，这些手里一根枪也没有的革命群众才把权夺下来了。刚我们念语录不是念了主席的这句话：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军队的政权，在世界上、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的。又要讲夺权又没有军队，那怎么行呢？我们夺国民党的权要有军队，那时候靠军队打天下，今天我们把一部分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夺的权夺回来，那还要靠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来支持，没有这个力量是不行的。没有领导干部、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因为群众，它只要是采取革命行动，它必然要有干部。比如说，有那末一个革命造反派，或者建立一个战斗队，总要有一个负责人，不管名字叫什么，大家说的，有的叫“服务员”，有的叫“勤务员”，因为大家有些人不喜欢这个“长”字，他不愿意叫战斗队的队长，不管叫什么，因为总要有领导，总得有干部，现在我们要夺权那总得有干部，无非是有新的干部、有老的干部，有新的过去没有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还有那些过去担任过领导工作的。为什么要一批担任过领导工作的革命的领导班子呢？因为事情很明显地摆在这儿，一个工人同志，不管他多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又很有工作能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边有很多贡献，让他马上在一个城市，比方上海市，或者一个省，象江苏省，交给这样一些工人来管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经验，

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去管一个车间可能比较熟练，管一个大的工厂这已经困难了，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他，那困难还更大，这个道理用不着多解释的。比如说，好多工人造反派、造反队的同志们，你们里面很多很好的同志，很有才能，可现在马上交给你们，你们有困难，现在，就说象我吧，我总算做工作还做了一些年了吧，现在你说要我负责上海市的工作、全市的工作，我也是感到非常吃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我过去没怎么管过，我这个经历并不那么宽，现在，一大堆问题就摆在面前。过去，有的时候，我也顶多参加了一些讨论，但是决定不是我决定的。很多事情根本没有碰过，没有摸过。经济工作、生产、工厂工作，我知道的很少，商业，知道一点也不多，象财政税收这些事呀，我从参加工作以来，我也可以很坦白地向同志们讲，我从来没有兴趣！我过去对有些文件送到我跟前来我都不想看。好多事，零碎知道一些，也不多。本来嘛，这种感觉呀，譬如说，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虽然也担负着很重的责任，和我们的能力也不相称。但那时候，有些事都觉得好办，到最后有些问题不好办了，就跑去找柯老，跟他商量一下，他下个决心就办了。自柯庆施同志一病倒，六四年一病倒，六五年去世，那时候我们就突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挑不动了，这个担子突然往我们身上一加，我那时候就感觉到一个人没个地方商量了，担子一加挑不动，那末，何况现在是面临的任務哪，比那个时候要管的事情多了。那么一个普通工人同志、学生，我想他们遇到的困难会比我还要多。

我在主席那里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还刚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他就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这个学校很复杂呀！你是作为学校里一个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学校里全面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主席甚至于讲，他说，我看呀，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那么，你这学生，专业还没有学完，或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他说要搞个系主任那恐怕总是……，我们也已经培养了一些助教、讲师及一些原来的领导的干部，所以都要这些人出来。针对大家刚才讲的，主席说：“有一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啦，他也说了，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说“周谷城啊，如果再教书不行了吧，看那一些人还行哪”，主席很关心这事。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啊！你们不要泄气呀！怎么主席又怎么说了这些话啊！主席又说：“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些班子，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还有些困难，这有个过程，还得学习。“三结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不是老是考虑怎么样培养接班人吗？这个班怎么样接呢？看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工作，学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廿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作省委书记，那还是很年青嘛！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就是很热爱的，对青年人评价很高。但现在呢？不能够单单强调这一方面，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三结合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到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说到青年工人同志，

我们的学生同志，在现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事我刚才已经传达了，主席做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第三个人民公社已经在那里筹备了嘛。他不要砸掉这块牌子？在外滩的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的那个地方啊，警卫连的同志他们都向警备区的首长请示，说这个牌子有人来砸，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当然是反革命，抓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那末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过高地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我们参加了工作，这么一点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的权就夺不过来，为什么我们只要三结合这个权就过来了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权也是夺不过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它今后也是这样，也是三结合的。我下面还讲这个三结合，它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反正基本力量是三方为代表，这种基本形式已经形成。那我们再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它，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这样子，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有威信的、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机构，

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会更加有权威，会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是想来试一试，想来反对，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来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来试一试吧！我们也准备好啦！谁愿意要来碰一碰，我们就会等着他们，对付他们！（掌声、口号）以上这一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要实行三结合，三结合是主席跟我们反复讲的一个问题，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要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在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

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三结合呢？上海市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处长以上的干部有六千多人，难道说我们从六千多、六百多人中间找不到三结合的对象？这也不可能的，可以找到的，而且，应该说，这个六千多人我是讲处长，还没有讲科长，科长就更多了。这么多人里面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一点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当然啦，上海革命的干部，或者说整个的干部造反的比较少，而且造反比较晚，上海机关干部造反是一直到 12 月 18 号开大会那天算是开了炮，这样子是相当晚了。但在全国还算好的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啦！当时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说上海的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但是整个数量来说不是很多，在 12 月 18 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付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个事情当然不能怪革命造反派，这个不能怪革命群众，这个事情他们自己负责，谁要你不造反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替他们负责的，但

是呢，我们也还应该看到，首先，应该是陈丕显、曹荻秋来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他们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大批干部带坏了，总为首的吗。同时呢，据我们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的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的群众，或者一般的干部没有传达，包括那些中层以上的干部，甚至于市委里边一些人，也没有传达，这样就使得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不能够传达到群众和传达到干部中间去，十一中全会回来以后传达了什么啦？没有很好传达。据说市委的会，开市委还是委员会曹荻秋传达了一个小时，那怎么行呢，那样能传达出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也没有很好传达。据我们听说，象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根本没有很好的告诉群众，没有很好的告诉干部。所以当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一冲的时候，一提炮打司令部，上海的很多干部莫明其妙什么炮打司令部，所以很多事情是应该由领导负责的，是应该由为首的人负责的。有一些事情他们根本没有传达，比如，同志们知道的安亭事件，那个事件他们传达谁的指示呢？传达陶铸的指示，那末他，曹荻秋就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就是给他说了一通，用了那一种口气，中央嘛，既然已经承认啦嘛那就只好这样子吗，再继续作工作呀，再把他改过来吧。就这样，曹荻秋就是根据这个来办事的，他就听陶铸的。对伯达同志的意见，到后来主席的意见，我都告诉了市委，市委不但没有向一般干部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嘛。马天水之所以特意跑到工交会议上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和他谈话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不知道啊，主席的意见？不知道！所以他才敢于跑到

中央会议上继续来攻击我。他如果知道主席的意见，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他就是不知道。而这个陈丕显、曹获秋这些人呢，就是鼓动他：“你到了北京，好好的讲，什么话都讲！”这样子鼓动他，对这种人哪，你说，你说到底，同志们也可以看一看哪，象这个陈、曹这样的人，他们欠债实在欠得多，不但对上海的人民欠了债，对干部欠了债，我看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后来他们又用什么内外有别呀，要组织纪律呀，不能够什么东西都讲呀！所以把干部都拚命压在里面嘛，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有许多干部，包括些领导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我前面先讲了，首先要他们负责，但是领导也要负，这个不能怪我们，不能怪革命群众。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这六千多人处长以上的，还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我们相信他们的多数，是愿意革命的，是愿意跟着毛主席走的。不然的话我们怎样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同志们为什么当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还是这些干部，那为什么在柯老领导之下就能够执行主席的路线，就能够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上海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嘛，特别是在柯庆施主持工作的时期，特别是五八、五九以后这个时期，上海的工作在全国是比较好的嘛，还不是这些干部，还不是目前这些领导干部，还不是这六百多个付局长？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一小撮坏人，但是，我是讲多数，现在这些同志，那个时候跟着在柯老领导下，他们做出来很好的成绩嘛，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主席的指示，我们要看干部不但要看他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吗？那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而且呢很多我们

干部那个时候，在柯庆施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毛主席这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地向我们讲，说我们应该相信 95 % 以上的群众，相信 95 % 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这里讲的，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走的，特别讲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这个中农啊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一批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毛主席说我们要善于引导，他们也会跟着我们走的，主席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一再地强调：“我们要相信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相信大多数，就是不相信大多数人是革命的，结果失掉多数，使得自己完全孤立起来。那么要实现三结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对待干部问题。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里面有一段就专门讲了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第四期专门写了一篇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这两篇社论党中央是讨论过的，毛主席看过，头一篇主席作了许多重要修改，正确对待干部的一篇哪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我们只知道我们走的那一天，是当天送给主席了，他看了。有很多重要的修改。譬如，说象这样的话，红旗第三期，现在大家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句话：“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就这一句话，后面那几个字是主席加的。原来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允许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主席又加上：“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后面又加上“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这样就体现了主席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如果他不坚持错误，或

者他不是屡教不改的这句话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所以强调出来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又坚持错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这样呢，刚才我们念语录里也讲的不是不可救药的人，都要治病救人。那主席加这么几个字，政策界限就很清楚了，那就宽得多了，现在同志们我是已经在别的会议上说过，好多同志最近比较忙，特别夺权以后据说夺权以前学毛主席著作还好说是有时间，夺权以后现在忙得一塌糊涂，不看书、不看报，这个危险啊，象这样两篇社论和中央最近发的很多文件，都要逐字逐句考虑的啊，那里面常常是两个字的改变，在政策上就很大的不同，因为革命总在发展在变化形势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头脑不适合于这个形势的变化，我们就可能犯错误。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派内部有了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在这个，这个我们理解呢，说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种顽固劲哪，就使人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到处都是坏人，所以因此呢，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其实啊，同志们，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

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呀，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主席）直接研究了一个单位，就是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啊，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哪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问，你们那个造反派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那个造反派很好，一个科长都没有，（笑声）就表示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啦，我们一说这些话主席就说啦，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单位呀连付科长也不要”。那个单位三十多个付科长，也不是个很大的单位，一个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呀，而是根据职务，从担任的职务，那一级职务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现在有好多不讲阶级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市一级的市人委的机关什么造反委员会，我们在

北京就看到国务院转给我们的材料，下了一个通令用电报发给国务院要取消一切“长”，这个单位你们要提出建议向中央要取消一切“长”，也未尝不可，但是他是给国务院用电报发了个通令，而且里头有许多话是完全错误的，说什么说历来的就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那么将来还是处长管科长，不能叫那个科长管处长，除非他们把关系改变过来，把现在的科员改成处长现在的处长改名字叫科长，那又有什么意思，本来就是叫书记，在国民党时代是最微小的官职，到了我们这里变成了最大的当权派了，这个都是名字问题嘛，而且说什么，一切带“长”字的都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我说这句话是反动的，那么我们的国防部长林彪同志也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根本没有阶级性。同样的一个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叫国防部长，林彪同志叫做国防部长，属于两个阶级的，怎么能够这样子来呢？搞这一套呢？如果不讲阶级，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搞三结合，一讲阶级呢，那么就能把我们的队伍重新来看罗，把每一个人都重新来考察。主席说：“付科长都不要的人，这些人啊，搞不了几天的。”他说得，毫不含糊，那种“一脚踢开”，最后一定也要把自己踢开。“一棍子打倒”的这种风气万万不可长。我们同志们，主席过去一再劝，说要读一读鲁迅写的《阿Q正传》，里面有一章，叫做不准革命，看一看，我们不要不准别人革命，不要学那个里面的赵太爷，要允许别人革命。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一，就是不但是要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合作，而且要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合作，还要和那种意见对自己不但不一致，而且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人，他又反对过你，而又证明他是错误的这种人合作。这是无产阶级政

治家，是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毛主席是这样的模范。大家也来看一看吧，现在事情都已经揭开了，大字报都上街了，其实这些事呀，很多事情党中央过去没有公开就是了，那么你比如象这个朱德，总司令，这个是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嘛，我们现在学习的“古田会议决议”，那个里面好多条就是讲朱德的，那里面就是纠正错误倾向，谁代表错误倾向呢？就是朱德代表！但是毛主席对这种人是拉着走，总希望能够多团结一些人嘛，对这一点也希望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向主席学习，我们现在就应该根据主席这样的思想，对本单位的情况作一个具体地分析，究竟那一些人是什么情况，作阶级分析，同时呢，我们要对他们创造出条件，给那些领导干部有机会来检查错误。

在上海有这一点，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人始终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应该给他们机会。当然一般干部不要搞人人检讨，人人过关，不要搞这个。就有些人他如果不作一个检讨呢，他没有办法出来亮相，还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给他机会，让他亮相，让他出来表示态度，欢迎他们出来发表造反声明，也欢迎他们互相之间去串连，也可以找一些知心人交换意见。假使他们要造反，要革命，想回到毛主席路线这方面来，我们给他机会。但是给了机会，有的人也不干，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应该创造这个条件。或者我们不要等到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才搞三结合，也不要搞得那样十全十美，还非要搞那样好的干部，那可能是不多。我们只能够根据不同的人，来区别对待，有的人是要打倒的，有的人可以请他参加领导的，有的是要他可以作工作的，有的人参加一般的领导，有的可以参加核心，或者还有其他方式，这些在三结合这个问题上，同志们还

有意创造些是可以的，要有首创精神，但是目的是要搞三结合。但是有的同志害怕，怕有的人投机假造反，怕我们认错了人，怎么办，同志们不要紧的，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革命造反派是应该什么都不怕的，怎么能够忽然怕起来了呢，他投机吗，投机他将来总会暴露的嘛，如果人家一直也没有暴露，你怎么能说人家投机呢？如果弄错了，认错了将来我们再改嘛，我们就不能犯错误啊，这个也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造成的结果，这样同志们我们将来就不准犯错误了，一犯错误就打倒，我们还是也会犯错误的，还是会经常犯错误的，造反派的同志，也会犯错误的，犯错误咱们就改，拉倒，坚决改（笑声）没别的，有什么办法。只要我们有这一条，我们就不会变成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又是坚持不改，又屡教不改的，只要不作这种人就行了。第一不要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其余的你就不怕了嘛！你无非不要坚持不改，不要屡教不改，所以我们今天认错了几个人，不要紧。那么都这样怕，那我们将来自己犯了错误，那怎么办啊？现在我们也不能用了，那没人作事情了。所以可以请各单位考虑一下，排排队，最好先选择几个标兵，某一个人站在那一个位置，当然有了这个标兵就好办喽。

当然刚才讲的都是给革命造反派说的了，我希望我们大家要向那些干部那里去做工作，我们希望他们要坚决站过来，光是我们做工作他们不站过来也不行啊！他们现在也有很多顾虑，说“晚喽”，“早没有站过来。你既然承认早不站过来是不对的，那么你现在还不站过来那不是越来越晚了吗？还等到什么时候，党和人民是欢迎他们归队的。党中央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鲜明的，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只要坚决

地改，党还是欢迎的嘛。而且犯过错误也有好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可能因为犯了一次路线错误就增加了免疫力，那么在以后就少犯路线错误或不犯路线错误，也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但是现在双方就我知道感情上有些过不来，有的同志也说，斗了一场，斗了怎么还去给他做工作？我们说，谁斗的还是谁去做工作好，因为我们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嘛，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都是执行毛主席路线，而现在搞三结合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在这一点上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己应当首先把感情转过来，我们不能够对革命造反派记仇。什么秋后算帐啊，打击报复那是不允许的，自己挨了些斗嘛，如果真正接受了教训，那就应该更快地觉悟，回到党的路线上面来，毛主席的路线上面来。那么斗了一下，可能有的是过分了，应该这样的，我们对你们说，我们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难道你对革命造反派就不执行这条路线啊？你要无情打击？那当然不行。小将们有一些做得过分的地方，那也只能够谅解。任何一个革命都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决定中国的命运的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革命，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我们看我们这个代价并不大，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付出代价并不大。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他们那个反复，夺权反夺权，那个代价大得很。我们现在代价不大，那么自己挨了斗这也算有代价，我看有的斗的完全对，有的斗的有一点过分，那么也不过就那么一“点”嘛。那么算有点代价吧，就算你对革命的贡献好喽！（笑声）

老实说，如果没有革命的小将们那么英勇、那么敢想、敢说、那么英勇的冲锋陷阵，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揭不开的，这个功劳谁也不能够抹煞。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毛主席领导，象有些事我们就觉得出来呀？那么我们上海的面貌象今天这样子的改过来，不可能的，谁如果看不到主流看不到主要的方面，那就证明这些人现在还没有了解现在的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劝过一些人，你们想想大局吧！想一想这一场伟大的革命使得我们国家的面貌，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是几天，而是决定我们几十年几代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想一想这一些，自己即便有点什么不愉快，也应该改过来了，这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搞三结合，我们也希望造反派的同志，积极去做工作，坚决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也希望所有干部，包括那些领导干部，包括市委书记处的那部分人，如果他们还愿意革命，还愿意跟着毛主席走下去，那我们都准备根据主席的指示来考虑他们的问题，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也希望这些犯了错误，甚至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在这紧要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还愿意不愿意跟着毛主席走，还愿意不愿意改过错误，是坚定不移、屡教不改呢？还是准备改，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不能够再拖延了。我们也请他们考虑，这样子我们的三结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会更好地进行，这是三结合问题。

（口号）

下面我想谈一下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也讲一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改名字。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谈话中间也作了详细的指示，大家都说巴黎公社，我们不是都讲搞巴黎公社式的新政

权吗？主席说巴黎公社是 1871 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呢， 96 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他依据我看呢，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长久，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他还举很多例子，这个南越呢，是总统制，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而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国。那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个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罗！他说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那是叫”王”，秦朝叫”皇帝”，秦始皇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而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高宗嘛，这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我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个名词，在英文里边和”校长”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字，那考虑校长就和作总统差不多，其实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汉朝、前汉，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他当了皇帝就把所

有的官职，就象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长”啊，都要改，他是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所有的县统统改了。主席说在那一天下午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差不多改了，以后他又不记得，还是记不好名字。那么这个王莽下诏书，就是皇帝下命令，都困难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县改成什么了，下诏书还得写上，比如说邢阳县，河南有一个县叫邢阳，改成了齐由，诏书里还记得写上邢阳即齐由，不，齐由即邢阳，还得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得这个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又讲话剧，他说：这种形式外国也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他说主要的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他说，可以设想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斗争，以后他说，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能不改名字，也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了，就象苏联那样，它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它都不改，但是变了。

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这个问题主要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所以他说，是不是咱们稳当一点好，不都改名字了，因为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也学我们上海一样，也叫了，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如果各个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么国务院又叫什么？国务院叫什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么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任？还是叫社长？（笑声）就出来这个问题了，不但出来这个问题，还出来一个问题，紧跟着如果改，大家都要改嘛，那我们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发生了一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又出来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倒可能承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利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那么，也跟我们研究，大学是不是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面规定了嘛，工厂里面或者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就简单一点，叫革命委员会也可以，工厂的“三结合”这种委员会也有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应该有工人，不但有青年工人还应该有老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这个名称，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上规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是叫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里还叫市人民委员会，他说，也

不要改了，不过，毛主席又说上海人，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他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跟上海人民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嘛！

一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他说，缺点呢？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么你们不是很孤立吗？（笑）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登人民日报，人家都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认上海人民公社，登到人民日报上，全国都会说：“你要叫，你为什么只让上海叫，不让我们叫”（笑）这样呢，不好办，依主席这个办法呢，就是不改，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

第二个办法是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上面讲的一些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多麻烦的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上海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它就是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他说，这个事情你们想一起看，又不要伤害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你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一个问题到了他那里，他就反复考虑的，考虑得比我们细致得多，他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这个包括我在内。同志们，恐怕你们也没有想，我是没有想，什么国号问题呀！承认不承认

的问题呀！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事，那个时候，还有大家哪！有很多单位主张搞公社，我们也觉得不错么！改名字叫公社也可以，那一下子就干起来了，干起来了我们当然就报告中央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往下想，有些时候，脑子里转过一下，唉呀！我们说什么人叫做社员啊！比如农村一个社员问题，农村人民公社，恶霸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在我们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啊？脑子里想过一下，但也没有想下去，因为忙得不得了。脑子里有点热了。主席呢？他考虑问题反复地考虑。同时非常注意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最后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就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文件上面特别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给上海的革命人民留下了一个余地，给你们上海人自己考虑考虑。（长时间鼓掌，口号：毛主席万岁！）所以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考虑的非常周到，非常细腻。特别是对上海市人民群众的热情，（他们就是怕，我们没有阻止他们）主席说：“你们看怎么样啊，能不能说得通呀？”我们说，上海人民都是听主席话的，主席讲了，大家会听的。（口号）我们回来以后就向公社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了。大家一致地，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就是中央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我们考虑的结果，还是按照全国一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成上海市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口号），从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来看，就更加证明了：我们向主席说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群众组织、全上海的革命群众一

定会同意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掌声）

（口号声）

那么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没有批准的，还有的说，因为红革会没有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才没有登。还有什么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也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都收回去算了。（鼓掌、口号）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政权、党权、财权、文权统统地从旧市委、旧人委手里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这个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口号）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会上说，一切权利归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更确切一点，我说开了，就是没有包括他在内的。（掌声）那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口号“一切权利归人民公社”如同现在“一切权利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样。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掌声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实际意义就是说，他是把一切权利归于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上海人民。也就是说把一切权利从资产阶级、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来了，那么这样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权是不同，不会和任何一个人野心家、小集团来共享政权的。他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没有资格来讲话。（口号）那一种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人，如果他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上海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革命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工人阶级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不愧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英雄，他们冒着极大的困难，英勇地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月革命，我们还在想，实际上上海的夺权是从去年十二月下半月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的夺权绝不是等到成立人民公社委员会才开始的，而是我们当时看到了，铁路不通了，港口堵塞了，赤卫队要搞三停这样的威胁，而市委在那里继续搞经济主义的妖风，使得上海已经陷于瘫痪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夺权哪，同志们，不是说还有一个月不夺权，如果我们一月初不发告全市人民书，如果不发紧急通告，那我看不要一个月，再有十天，我们上海就不可收拾，或者说我们收拾起来就更困难了，我们的夺权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自下而上的夺了权，人民公社成立夺权时候，（我们的夺权已经，）那个时候市一级的权实际上我们拿到手了，市委已经停止活动了么，市长一月六号的大会就宣布不承认了么。一月六号的大会上，宣布不承认曹荻秋是市长嘛！我们早已夺了权了，而人民公社的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利，是把一月革命的成果从组织，给一个组织形式来表达就是了。正因为这样，它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所以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一看到这个现象，他就发现了这个新的事物，就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毛主席发现的，他才亲自批准了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四个单位的贺电，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怎么能够说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还有人说什么是我拉起来的，我谢谢你！我没有这样大的本事。（大笑）如果没有上海的千百万群众起来夺权，谁也搞不成这样的局面。我们的同志有这样的口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我说这是一个庄严的革

命口号，他表示了我们有决心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把名字改一下，这个并不是改变了我们的决心，我们还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掌声、口号）有那么一小撮人、人很少，只是那么一小撮，他们被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倒没有把他们说成那么坏，至少被这种思想、被一个“私”字迷了心窍，这种人你们永远也不懂什么叫做用鲜血生命保卫人民公社，如果还有一些人想在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还作一些文章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有什么文章好做，在这方面做文章，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口号）上面主要讲了一些夺权的问题，后面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因为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报纸上已经发了告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和这几天陆续发表的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小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工作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机关保密档案的文件，还发了很多很多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讨论写出来的，你象小学开学不开学的问题，我们没有回上海以前，十二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了好多次座谈会，反复地征求意见。征求小学教员的意见，征求学生的意见，征求家长的意见，调查了几个月才下决心的。中学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文件里边，象合同工人这样的文件也是调查了很久。这些文件我想不在这里一一解释了，都有文件发出来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问题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贯彻，这个问题，首

先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得到贯彻，这里边，除了今天到会的各县都来了的同志，但是毕竟到会的农民同志少，他们现在听广播了，不是在这会场里边，在这个会场里边的是城市的人多。我们希望全上海同志，首先是贫下中农同志他们很好地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来保证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同时我也希望城市的同志从各方面来支援农业，因为农业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比如说，晚了一天就要影响到收成，我们不管搞什么革命，都离不开一条，我们今天到会的同志，我们大家都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要吃饭，如果吃饭成了问题，那么别的问题都谈不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但是搞农业也好、搞工业也好，其他的很多问题也好，都是要抓革命、不抓革命生产是上不去的，我想在这里应该解决一个思想问题，好象一讲抓革命促生产嘛，那就要把时间花在革命上，就侵占了生产的时间，而且用的很多，用的时间多，用的劳动力多，好多基层组织大量的人脱产，好多人民公社的群众组织，一个生产队的人不多，而脱产的人员很多，这个是不对的、不好的。林彪同志曾讲过，说我们抓革命、促生产，那抓革命嘛就要放在第一位，革命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时间的安排，不能够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那么工厂就先按八小时安排生产。否则的话你这个生产如果要打乱了，那么促生产就没有办法促了。商店不只是八小时，农业它不是按八小时工作制的。特别是春耕大忙也来了，时间、劳动力更加紧张，这个时候我们抓革命，就要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考虑，在这里，我特别想对现在还留在城市里的农村来的同志讲几句话，这里包

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和许多支援内地的工人同志，他们这些不是从农村来的是从内地来的，还有一些回乡支农的工人同志还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还有他们的家长，我希望你们能够很好地学习中央的文件，你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内地去，这个大方向是非常光荣的，过去这样做，今后还要这样做。如果不把农村搞好，不把内地的建设搞好，不把边疆建设好，我们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上海今后的任务，仍然是要支援全国的农业、支援全国的农村、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我们的生产是为全国服务的，我们的工业也是为全国的，我们同志应该记得，柯庆施同志就是关心内地建设，才抱病到四川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在那里去世的，他最后还是那样关心内地建设，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呢。有些人现在抛弃了自己的光荣的工作岗位，跑到上海来，有的人跑到上海来要求报户口，要求重新安排工作，要达不到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就去斗那个工厂的干部，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有些人吃了国家的饭，不为人民服务，在城市里干了些坏事，那更是错误的。

新疆建设兵团那里，因为内地去的人，大量地回到本地区去了，比如象回到上海来了，他们那个地区的农业一定受到影响，我们崇明岛、长兴岛一些国营农场，因为有一些青年同志跑回市内来了，那里的生产就完全停顿了，有的农场，去年的稻子都没有收，一些棉花还在地里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痛心。上海有些学生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非常痛心，现在已经有几千人跑去抢收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原来应该在那个岗位上的人，还不应该快点回去呢？我们特别听到在几个大饭店里

面，听说在和平饭店里，那里就住着有一些国营农场的工人，那么我们就请问这些工人同志，你们住在和平饭店干甚么，你们的岗位是在你们的农场么，你们住在和平饭店，我说你们要学坏的，你们应该快点回去。而且在你们中间，在上山下乡的青年中间，或者其他从外地回到上海的人中间，我们知道，有那么一小撮是坏人，他们在那里不干好事，我们的青年同志、工人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应该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回到自己的光荣的岗位上去，现在春耕已经开始了，应该回去了。

你们是有实际困难的，我们知道，但这些困难应该按照正常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这种事情作借口，就不回去。那些同志，比如从贵州回来的同志，或者四川回来的同志，我们也知道，在北京就看到一些电报，那个时候贵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厉害，压得过你们，那么现在那些地方改变了么，贵州变成先进的地方了么。你们应该回去和那里的工人团结一致，闹革命，支持贵州的革命委员会，去进行夺权斗争，也不应该再在上海留着了。有一些人，显得劳动纪律很不好，一天啊，名义上说是出来造反，实际上出来是没有甚么反可造，只是逛大街玩，我这话不是说所有的人了，是讲有那么一部分人。我还是觉得，如果同志们你们是真的支持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话，那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因为这样子懒懒散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色，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都顶上去的，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回到生产岗位，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违背这个方针。也不能违背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那些规定，我们赞成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对有些人，他们这样不顾劳动纪律，那就应当加以考虑。第一、如果教育了、劝了，

还不回去，就应该停发工资，因为国家不能这样子拿钱养人的，实在不行，应该开除，如果再干坏事，就按法律处分。

我们上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上海今后还是会往外动员人口的，至于想在上海市内安排工作，就不要抱这种希望，没有甚么希望，死了这条心吧！（热烈鼓掌、口号）所以抓革命问题，我不想多讲了，我就讲这么一点。我把话说死一点，是为了这样子，他就死了心么！促生产的问题才好办了，才好回去。那么镇压反革命，这一方面就用不着我多讲。

上海这个地方，同志们总还记得，阶级斗争是尖锐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人数是不多的，只有那么一小撮。在战略上我们藐视他们，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他们。镇压反革命问题，不能轻心，不能粗心大意。现在有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观察，特别是我们广大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情况的复杂性，就是由于有许多反革命。他们如果要是说：“我是反革命。”这个就好办了。他们，其中有一些是打着造反的旗帜，有的是削尖了脑袋，钻到了造反组织内部来了。这一点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同志，都应该提高警惕性。我们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从来是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靠专政机关、靠人民军队、靠公安局，同时要靠专政机关和革命人民的结合，这样的充分的群众路线。如果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那就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用什么方式的活动，他们搞秘密活动也好、搞公开活动也好，我们就容易识破他们了，这是一个。希望同

志们提高警惕。第二、希望我们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要加强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要全力地支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讲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上海的文化革命的最强大的支柱是人民解放军，不但有陆军，而且有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掌声、口号）我们上海的陆、海、空军，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在这里代表革命委员会，向上海的陆、海、空军的指战员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谢！（热烈的掌声、口号）同时我们向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保证，如果有人攻击你们，如果有人想着对你们采取那种冲击，冲击军事机关的那样的行动我们全上海的革命派坚决地和人民解放军站在一起！（热烈的掌声、口号）那么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地方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军事管制，但是那个地方有的组织他们也说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有的我谈过话，予先谈过话，本应该服从中央的命令，要实行军事管制就实行，但是那里的组织里边的，当然是很少的人，竟然不支持军事管制。甚至于把军事管制的命令图了叉叉。而且对军事代表围斗、围攻，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单位的犯过这种错误的人，他们如果表明是革命造反派的话，他们应该写出检讨，向军事代表赔礼道歉。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将采取别的措施！（口号）

我在这里还应该说一遍，就是现在市面上谣言很多，这些谣言造得越来越离奇。有一些人，人也不多，但是是专门靠造谣吃饭的。有那么一位是机关市委的，他公然发了一个所谓的总理的四点指示。我看了那个指示不奇怪，我说中央要有这样四点指示不会不告诉我们的吧。后来我们

就打了电话到北京问，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可以假冒中央的名义到处散发，是中央总理的几点指示。当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说，不是总理的，是陈伯达同志的，再问又说不是陈伯达同志的，又是在哪听来的（笑声），固然可以这样，冒充总理的名义到处造谣，红革会的人也干这个事，说是中央文革一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是假的，然后从北京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什么总理经过总参，经过总参又告诉上海的红革会，又是总理，也恰好又是四点指示。总理好象专门发四点指示（笑声），说什么红革会是不对的，张春桥派兵也是不对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样子，真的是胡说八道！总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四点指示。上海的红卫兵还发过两次特大喜报，一次特大喜报是总理讲毛主席林彪同志讲，复员转业军人不要再成立什么单独组织，但是总理说：“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报说是总理说：“全国的红卫军都不好，就是上海的红卫军最好。”（笑声）这些东西本来我们一到上海一看就知道都是谣言嘛，这一次，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是当作笑料，对总理说了一下，大家就笑了一场。关于这个彻头彻尾的造谣，毫无一点影子。还有一些谣言也造到我身上来，我最近看到关于我的谣言，多的我简直都没办法。比如说，有张传单说我对商业厅三军的同志谈话，谈话的时候强调什么工商业司如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声明，我和商业的同志谈话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谈过什么工商业司。

谣言多了，有些什么我们在北京，突然国务院那个接待站打来电话，上海一二三兵团工商司的代表来告状，告上海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告王焕文、谭得干（音不准）和我。他告我，而且里面说嘛，而且说上海有

一天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你们在上海的，你们知道有哪一天上海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嘛，这两天又有什么有好几个离奇的电话，又说什么王力同志分析上海的形势有五点指示，我算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正在北京，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事。我也没去问王力，因为用不着去问这个事。还有一个说什么是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复的，说上海人民公社如何说一通，中央不承认，我在这里说一句就行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本没有一个接待站，还有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呀！

（鼓掌、笑声）在北京不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吗，那个地方是什么呀？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文化革命接待站，文化革命小组没有接待站，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什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联络站，还有一个什么又有几点新的指示，那更是胡说八道！哪里有这些东西！连个接待站都没有，你怎么在那里听到五点指示呀？真是碰到鬼喽！

（大笑）所以现在有些人就是靠这个，就好象说北京有什么消息到上海街上一贴，就谁也不能辟谣。我说实在的，是不愿意辟谣，也不值得辟谣。如果要辟谣也很简单，你以为你可以造谣，我们就不可以给总理打个电话问一问吗？让你造谣吧！这样的人要再造谣呀，就小心一点。假冒中央，给国家（录音脱落一句）（口号）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理你就摆出来，不要搞谣言，靠谣言吃饭是吃不饱的，（大笑）有道理你来讲嘛！对于红革会那些头头们，你有道理你完全可以讲嘛！不要搞造谣，我们相信红革会的战士们是要革命的，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们曾经向我们打电话要求，说他们要开请罪大会，要我们参加，我们说你们战士没有什么罪呀，你们请什么罪呀？红革会的战士

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一小撮头头。（热烈的掌声）就是对那些头头，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改正错误，我们并不准备一棍子打死！但是，那还是老实的态度，不能够采取蒙混的办法，或者故意挑动红革会的战士们，使得战士们继续上你们的当！我们还是一月二十九号中央文革小组电报的态度，我们支持红革会的战士们起来造反，我们欢迎红革会的战士们造反！（掌声）现在还有那么一股风，故意挑动我们革命干部子女、军队干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叫做革干、军干子女联合战斗兵团的传单，这是一张反动的传单，他们故意挑动军事、革干子弟，说现在好象社会到处斗你们、斗你们的父母，这是胡说八道！我们革命干部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我们的军政干部更是绝大多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军干、革干子女绝大多数也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这些孩子是党的、人民的、是毛主席的！（热烈的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们即便是有缺点、有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你们想着挑动他们的感情，把他们拉到一条错误的道路去，去搞什么“联动”呀！你们是得不了逞的！我们希望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很好地对待这些青年同志，因为他们是党的，他们不会一直跟着他们父母走的！他们会跟着党走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做对他们的工作。这样才能使得“联动”这样的反动组织不能在上海扩大活动。

最后我想说一下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整顿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准备多说啦！我已经讲得时间相当长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要执行主席的指示，要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到底，那我们需要把革命造

反派的组织能够加以整顿，特别是要从思想上加以提高，我们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为上海的人民、为全国人民建立了功劳，这是谁都看得到的，抹煞不了的！但是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问题，我这里是讲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我们队伍里也有不纯洁的，有的需要清理一下。同时哪，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现在有些革命组织跨行业的很多，他又是工人组织，里面又有农民，又有机关干部，又有学生，又有文艺工作者，这个很杂，有的学生组织为主，又吸收了别的，有的工人为主吸收了别的。这样的话不好，还是按着产业来组织好，同时不是按单位组织也有问题，那大家搞的都在上面，混进了坏人也不知道，如果是在本单位组织就比这较好，坏人不大容易钻进来。同时从整个斗争，从批判或者从改，“斗、批、改”嘛！从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呢，比较适宜。你比如说，纺织系统工人组织，如果他们搞成一个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那么他们在批判、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者冶金系统的问题，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好多革命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用协商的方法解决，现在有些办法。有很多行会性的组织，有些专门搞经济斗争的组织，那实际上是分裂了工人阶级。比如说有的搞年分，那些东西怎么能够造反呢？比如说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生一个造反司令部，我就劝这样的同志，你们考虑一下，因为一九五六年也好，五七年也好，六五年也好，多来一年吧，不管那一年吧，反正你那一年哪，总有左、中、右吧，有

两个阶级吧，你们那一年都是左派？都是革命派？我不相信。我们要搞，就要按阶级，按左、中、右来组织嘛。我们是革命造反派，就按革命造反派来组织，怎么按处分哪。说五八年，你不管你那一年也好，四九年的也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也不能够划分阶级呀！有的更神，那一看名字就知道，那时搞经济斗争的。还有些特殊的单位，那天我听人家说，什么东西呀！不是头些日子有一些公墓呀，有些坟哪被挖了吗！当然这个事情应该解决，那么被挖了的这些家的这些人就组织了一个造反司令部，我也不晓得到底要造什么反（笑声），又要经费，又要刻图章，又要搞什么，这个不成为一个什么革命造反组织嘛！象有一些组织呀，是不能够承认的，不应该组织的，我希望他们最好自己自动解散。

（鼓掌）有些机构脱产人员太多，刚刚我讲了，要加以解决，要将来逐步地做到按巴黎公社原则来选举，有一些组织，在市内名誉也很大，你一问也没有几个人，但是也要房子，也要汽车。这些人我还是希望回到原来岗位，去好好地生产、好好地革命，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单位的革命搞好了，我看就不错了。咱们现在还有好多单位的权没有夺下来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说一下，这是讲组织，第二要很好学习，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够借口忙不看书。对旧市委的有一些领导人，不讲别的，就这一点，就非犯错误不行。就是不学习，要想让他学习毛主席著作，那就真是难了，什么规定星期六学习了，你到那时，一个人也找不到，这个东西，要靠自觉的。

我们同志们哪，知道《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说有一句话，说希望有一些人，不要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志很好地想一

想这一句话，因为我们最近发现了一批人，当然总数不是很多的，当然了，北京也有，外地也有，我们都是很欣赏的几个人，实际那几个人真是不错，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很有才干，但是在最近都犯了比较大的错误，这句话是对这些人讲的。在座的同志们，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上当，刚刚取得一些胜利，就冲昏了头脑，原来个人主义就有，在这个时候，个人主义突然大发展有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要很好地读毛主席的书，不是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念几段语录，要真正学会主席的思想，语录要读，主席的有一些重要的著作也要读，特别是已经当了权。同志们，你们中间的很多人，过去不是当权派，现在夺了权，自己是当权派了，究竟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这个问题我们面临着考验！如果我们当了权，我们跟着毛主席走，真的读毛主席的书，和我们头脑里那些不好的东西经常地、不断地作斗争，那我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当权派；如果我们头脑里，资产阶级东西发展了，那么，我们也可能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要被打倒，那个时候，就要有另外一些或者就是在座的一部分同志起来，要打倒我们。这个话，我在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时候我讲一讲，有好处。为了使大家不会被打倒，因此先要想到被打倒！（掌声、口号：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在学习这一点上，我们要很好地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现在一天花在读书、看报的时间，那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全国的红卫兵报纸，他现在都要，而且都在看！各种传单他都要。每天秘书都给他一大罗报纸和传单。他为什么要了解那么多情况哪，很多情况从这了解的。他对中央文化革

命小组的同志讲，他对我们讲：不管你们怎么忙，你们要拿四小时读书、看报。同志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是不是能拿两小时呀？（笑声、鼓掌、口号：听毛主席的话！）同志们，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有信心，我们不管阶级敌人多么猖狂，他们是打不倒我们的！但是堡垒是容易从内部突破的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如果我们不是坚决的、完全的按毛主席指示做，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地、不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地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那么可能，坏事就坏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我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有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在毛主席的关怀之下，在党中央的指导之下，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掌声、口号）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祝同志们在工作里边取得更大的胜利！完了。（热烈掌声、口号）

南开大学广播社、资料组根据录音整理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天津市财经学校一二·二六战斗组再印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附件： 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2月12—18日，毛主席请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到北京。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接见时，毛主席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一）三结合问题

毛主席讲：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的问题也不大，内蒙的问题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 53% 是革命群众， 27% 是部队， 20% 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是关键，更重要。

毛主席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现在都不愿叫××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要有长，要看内容。主席说：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都要改变”这是反动的口号。

（二）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你，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的大使馆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还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主席还说：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抓人前门进，后门出。

主席说：学校的权力机构，可为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三）关于中央文革紧急指示

毛主席说：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有造反气魄。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抓人。

（四）有几笔帐以后还要算

1、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 2、红革会问题。 3、广革会反对电台军管。 4、龙华机场反对军管。

（五）

1、现在用得很多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注：这条语录是毛主席在 1920 年讲的），自己也记不住了，以后不要用了。

2、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主席问：“同济大学的学生是否还在车站，码头？”张春桥答：“还在”。主席又问：“你们来的时候是否还在？”张答：“还在”。主席说：“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4、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现在我们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不能老是“砸烂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点文章批判。

5、文艺界也要回原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

6、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不斗争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

张春桥同志说：“文汇报压力很大”。毛主席说：“要支持他们。”

40) 张春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

(1967.2.24)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文化革命广场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友们：

你们好！我们好久没有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了。

十二号毛主席叫我们去北京的。毛主席当天很快接见了我们，以后又召集、主持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问题和其他工作，发出了一系列决定。临回上海时，主席又接见了我们。

首先要向同志们汇报的是毛主席身体很好，每次谈话时间都很长，但精力始终旺盛、愉快。对上海非常关心，非常了解，使我们很感动。毛主席对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贡献给了很高的评价。这次讲：“上海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上海工人在安亭事件时才几千人，现在一百多万了，这说明上海工人组织得很快。”主席又问了

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的情况。这是对上海革命造反派、上海工人、上海人民的最大信任、帮助和支持。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有再大的困难，阶级敌人耍出再多的花招也休想阻挡我们前进。

一、关于夺权问题

1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由上海的 “ 一月革命 ” 开始的。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如此。这次夺权和一九四九年从国民党手里夺权是不同的。毛主席讲： “ 这次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我们发动的。 ” 那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写一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很重要。我们的理解是，毛主席在这里指明了十七年来，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而不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那无产阶级专政下又为什么还要革命呢？毛主席解释说： “ 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有一部分被篡夺了。 ” 毛主席的话是辩证法的，先肯定了整体、后否定了局部。毛主席还指出所谓 “ 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 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自己搞起来呢？因为我国建国十七年，十七年来都很稳定。中国经过一百多年动乱，终于统一了，稳定了。大家都很满意。但和一切事物一样，统一和稳定有它好的一面，又带来了不好的一面。一部分被篡夺了，稳定中包

含着不稳定，搞这次革命可以把修正主义根子连根拔掉。毛主席的概括力很强，把很深的道理归结成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2 . 在夺权斗争中，成为今天的关键的是“三结合”的问题。这是夺权和巩固好权的重要条件。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已经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日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夺过；一月二十二日上三司等四个组织夺过；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又夺过，但他们夺了些什么呢？夺了几间房子，夺了大印，自以为有了权，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到实权，他们也发表声明了，但他的话根本没人听。华东局机关也是这样。夺了几间房子，向魏文伯要了几部汽车，别的东西都没有得到。我看这样的权还是不要夺了。中央指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不能夺，因为它是党中央的代表机关，夺就是夺党中央的权。华东局机关的权可以夺，尽是些房子，夺过来也没意思。这说明，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才能真正夺过权来。一个、两个组织夺权，只能发展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实质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他们那里不是在搞工人“自治”吗！我们把话说的尖锐一些，目的是让这些同志明白这条路是不能走的。要想夺权，就必须找一个大联合的最好形式——这就是“三结合”的形式。缺少一方，就不算是大联合。大联合不是说群众团体多就算，缺少另外两方就不算大联合、就夺不过权来，夺过来也不会巩固。毛主席这次谈这方面最多。

我们旁听了山西省代表的汇报：如果没有山西驻军的支持，山西根本夺不了权。山西省委反动透顶，组织了便衣特务，发了枪。刘格平对

面住了两个特务，枪口对准刘的窗口。刘随时有被捉的危险。因为山西驻军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才使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夺了权。因此，必须要有解放军的支持。

那么没有革命领导干部成不成呢？也不成！一个战斗队还要有个负责人嘛！现在夺权也要干部，无非有新有老。为什么要有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老干部呢？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些工人表现很好，敢闯敢造反，很有工作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贡献，但如果把一个城市，比如上海；一个省，比如江苏，交给他们，他们就会感到很困难，因为没有经验，他们管理一个车间也许会熟练一些。不要说工人同志，我总还算做过一些工作吧！现在让我一下子管全上海市的工作，我也感到很困难。我过去也参加过市委的讨论，但不是我做决定。柯老在世时，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就跑去找他请示。他病倒后，我们便感觉担子很重了，现在更重得多了。对许多东西我了解很少，比如财政税收，老实讲，我过去根本就没有兴趣。对农村有些了解，但很不够……。毛主席讲：一个大学生当大学校长不行，大学还没毕业，对整个学校还不熟悉。当个系主任我看也不行，因为没有教过书，没有领导全系工作的经验。还是应该由过去培养的教师、助教来担当。在座的青年同志，不要泄气，毛主席还说：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让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我个人的理解也是这样，“三结合”的方式是对青年的很好锻炼。青年人二十几岁跟着老革命干部学习它七年、八年、十年，三十多岁当省委书记也还是很年青的。

拿上海来说，主席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开始成立时没有实现“三结合”的话，牌子恐怕老早就让人家砸了。没有这个危险吗？人家不是早在筹备第二个、第三个公社吗？连守卫公社办公大楼的警备连都向上请示过，如果有人来砸牌子怎么办？因此，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支持是不行的。我这里不是过高估计我和姚文元的作用，我们个人没有什么。但是由于我们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也使得某些人在砸人民公社时多考虑考虑。这说明“三结合”的重要性。有的人总想试一试，过去，有人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现在，有人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态度也很鲜明，谁敢试就让他来吧！

上海人民公社已经有了一定权威，今后还要加强它的权威。

上海市部（局）长以上干部六百多名，处长以上干部六千多名，难道这六百多和六千多中还愁找不出“三结合”的对象吗？这里面的大多数同志还是好的。当然，他们起来造反得很晚，直至十二月十八日开大会，但这在全国还算早的呢！主席知道了很高兴。那次造反的也多是一般干部，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中没有一个。这当然不能怪造反派，只怪他们自己，也怪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些干部带坏了。许多主席和中央的指示他们根本没有认真传达，使得许多干部听不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八届十一中全会，曹荻秋在市委常委会上只传达了一个小时。据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根本没有传达，因此北京红卫兵小将一冲，许多干部有抵触情绪。“安亭事件”，曹荻秋只传达陶铸的指示，而毛主席的指示连市委书

记处都未传达，马天水就不知道。因此，在曹的鼓动下，竟然跑到中央工交会议上去放炮。所以陈、曹这些人不仅对上海人民和广大干部欠了债，而且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他们又利用“内外有别”、“组织纪律”来限制干部，由此，我们才理解到为什么柯老在世时，也是这批干部，把上海的工作做得不是还比较好吗！特别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期间，上海工作在全国还是比较好的嘛！还不是这六百多部（局长，六千多处长吗！毛主席讲，不要只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而且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态度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很多，但只要我们引导很好，他们也会跟我们走。毛主席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相信群众的最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不相信最大多数。《红旗》第三、四期社论很重要。其中第三期里面有一段原文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毛主席改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主席加这几个字体现了最伟大的思想，政策界限清楚了，宽很多了。

有的同志夺权以前还注意学习主席著作，夺权以后忙得一塌糊涂，不看书，不读报，这是很危险的。这两期社论应当逐字逐句地体会呵！“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的。这不是我们造反派的思想，但对我们有影响，因为看到许多人那么顽固，十分气愤，于是在人家宣传时就听信了。其实这个口号根本不成立。首先喊这个口号的人就不打

倒他自己，不怀疑自己，也不怀疑这个口号是否错误。阶级斗争就是两个阶级的对垒，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也打倒资产阶级吗？除非他们内部有矛盾。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走向自己的反面，被人家打倒。

在上海，当我们问到造反派组织怎么样时，他们总是说：我们组织很好，连一个科长也没有。中央有一个机关连副科长都不要，还自以为纯洁。简直没有一点阶级分析。最近，国务院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材料，一个市委机关造反总部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令，要求取消一切“长”。里面不少话是错误的。如“历来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我看将来也还是要这样。“带长的历来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林彪同志是国防部长，他也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这是反动的。毛主席毫不含糊地讲：“连副科长都不要的，呆不了几天。”毛主席在五项接班人条件中讲：“……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就反对毛主席，《古田会议决议》中许多就是反对朱德的。毛主席对这种人多年来就是拉着他走。我们要向主席学习。

据我们了解，在上海，有些人一直没有发言机会，我们应该给他机会，让他们出来亮相，让他们串连，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然，也一定有一部分人就是给他机会也不行。我们不要等条件完全成

熟再三结合，我们也不要一定找十全十美的干部来结合。可以区别对待。有的参加核心领导，有的搞一般工作，还可以有别的形式。

有人担心他们“投机”，这也没什么可怕的。投机迟早会暴露的，革命造反派什么都不怕，怎么现在怕起来了？这也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影响的结果，如果我们将来一旦犯错误也会立刻被打倒。回去以后，各单位要排排队，选标兵，也要对干部做工作，要他们站过来。他们之中，有的也承认站晚了，那就赶快站过来吧！”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可以这样办。

现在双方感情上过不去。斗了半天，现在又要结合。感情上不通，认为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斗是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天结合也仍然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首先要注意不能记仇，斗了一下，有时过分了，应当谅解。造反派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干部对造反派、对革命小将也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任何一次革命都要付出代价，这样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怎么能不付出代价呢？我们的代价并不大，比英、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代价小得多。有的斗完全对，有的斗过分了，也算是你对革命的贡献吧！老实说，没有革命小将的冲锋陷阵，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这样一次伟大的运动，上海市委的盖子能揭开吗？一些人能揪出来吗，不可能！这些伟大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还是看看大局吧！从国家的、世界的前途着眼，不要光看到自己。包括省、市委书

记处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跟毛主席走，我们就欢迎。那些犯了错误的甚至是犯严重错误的同志，现在是你们选择道路的紧要关头。

3 . 毛主席说：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到现在已经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当时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我看现在也得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允许无产阶级公社存在这么长时间。十月革命创造了苏维埃，列宁很高兴，但没有料到这种形式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结果让赫鲁晓夫利用了。……南越是总统制，邻国柬埔寨是君主制，我看还是柬埔寨的君主制好。印度是总统制，尼泊尔是王国制，我看还是尼泊尔的王国制好。以后，毛主席又举了周、汉等朝的例子，谈到王莽时说他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就和北京的红卫兵把所有街道名称都改了一样，结果，新名字记不住，还用旧的。因此名字不易多改，形式是次要的，内容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哪个阶级在掌权。比如苏联变了，但名称却仍然没变。我看我们还是稳当点好，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呢？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它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甬管叫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叫一贯道……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的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也还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吧！是不是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你们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优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

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上面一系列的问题。你们回去以后和大家商量一下，如果一定要叫，就叫是了。总之，既不要挫伤上海人民的热情，又不要影响大体。

从上面，我个人体会到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什么问题一到主席那里，他总是考虑得很细致、很多、很远。而且总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热情。以后中央会议决定一律不叫人民公社，但给上海人民留了余地，指出“除上海主席另有指示外”。我们回到上海后开会时，大家一致同意改名。

现在，有不少人讲，由于没有实行三结合，没有“红革会”参加……因此毛主席不同意叫人民公社。这些人请你们收回你们的言论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是不可抹煞的。

有一个人在会上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是少数人搞的。说穿了，就是因为没有包括他，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表明：“一切权力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一样，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的权力决不能和一些个人野心家分享。

那些喊“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也是根本不了解什么是一月革命。上海的夺权斗争在十二月下旬就开始了，那时“赤卫队”搞“三停”，如果再不夺权，只要一个月，不！二十天，上海就会不可收拾了。实际上远在公社成立以前，一月六

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上海千百万群众起来夺权，这么雄厚的群众基础怎么会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有人还说是我搞起来的。谢谢你，我没那么大本事。我们今天只是把名称改一下，有的同志提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是一个十分庄严的口号，现在可以提“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了。

有那么一小撮人，只是一小撮，搞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被“私”字迷了心窍，老实说、谁想从人民公社改名字上做文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劝你们不要枉费心机了。

二、抓革命、促生产

中央最近发出了一系列文件，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执行。我们革命造反派要下定决心保证党中央的指示得到贯彻执行。首先是农业。因为农业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强，晚一天就会影响很大产量。不管搞什么革命，大家都要吃饭，因此要促生产。但是要搞好生产，又必须抓革命。不要一提抓革命、促生产就无限制地增加革命的时间，抽出许多人脱产。林彪同志讲：抓革命是第一位，但在时间上，生产是主要的。特别是春耕季节，要按照现时的具体情况处理。

对于支农、支内、支疆的同志，我希望你们用心地领会中央的指示，你们去那儿是十分光荣的。那里不建设好，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用。我们应该记得，柯老正是因为关心内地建设才到四川去，而在那里逝世的。有的人想回到上海来，达不到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安置干部，

有些人吃人民的饭，不为人民服务，而且在城里干了许多坏事，就更成问题了。新疆因为许多青年都返回原地，生产已经受到很大影响。……在和平饭店住着一些国营农场的工人，你们在干什么？你们的岗位在农村，你们再在这里（饭店）呆下去，会学坏的。我们知道，你们之中有那么一小撮人是坏人，广大的工人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

懒懒散散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色。

三、镇压反革命

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则要重视。现在情况很复杂，而要我们认真观察。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有的更是削尖了脑袋钻到造反派组织内来了。镇压反革命，毛主席的方针从来就是专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我们要坚决支持人民解放军，不仅陆军，而且包括海、空军。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对上海革命造反派支持很大。在这里，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上海还有那么一小撮人反对军事管制，这些人如果是真正的造反派，那么首先应当向军代表赔礼道歉。否则，我们将采取另外的措施。

现在，社会上有那么一批人，就是靠造谣吃饭。如市委有人假造了周总理的四点指示，又如关于“红革会”和我全不对的总理指示，“红卫军”的两次大喜报，王力同志关于上海形势的五点指示，全是伪造的。更可笑的是最近有人传出所谓中央文革接待站关于上海形势的指

示。只要说一句就够了。中央文革根本没有接待站，连接待站都没有，哪有什么几点指示呢？真是见鬼了！我们辟谣很容易，但我们不愿意，也不值得。这些造谣的人自己要小心一点，假冒中央和国家首脑的名义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有理就来讲吗！不要靠造谣吃饭，造谣是吃不饱饭的。“红革会”那一小撮头头，你们有理就讲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是革命的。他们打电话给我，讲要开请罪大会，我说，你们有什么罪，有罪的只是“红革会”的一小撮头头，对他们也要争取，要看他们自己的表现是否悔改。

目前有人在挑动革干、军干的子女，我们告诉你们：革干中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军干中更是如此。这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我们绝不允许“联动”在上海扩大活动。

四、组织整顿

上海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是全国人民都看得到的。我讲的是造反派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我们内部有些不纯分子，同时，我们要按斗争形势的要求进行调整。按系统、部门、单位建立组织。有的组织里面有工人、学生、干部……，很杂，大家都浮在上面，混进坏人也不知道，如果按系统组织起来，如纺织系统、冶金系统，那么解决本系统的问题就好得多。此外，有的组织本身就具有分裂的性质，如有的按年份，如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生组织一个造反司令部。不管你是哪一年毕业的，总有左、中、右之分吧！我们要按阶级，按左、中、

右来组织，而不能按别的原则组织。有的组织则更明显地带有经济主义性质，如迁坟的那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什么造反司令部，我真不知道，他们要造什么反？我劝那些浮在上面的人还是回到本单位去搞斗、批、改，许多单位还没搞好。

革命造反派必须抓紧主席著作的学习，不要当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在北京和外地，我们发现有这么一批人，当然还是少数，我们很欣赏的人，很有才干，但现在都先后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这个教训大家都要记住。我的话，就是对这些人说的。总之，要去掉盲目性，加强自觉性。夺权以后，大家成了当权派了，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看今后的表现。弄不好，又会被别人，也许是这里的一部分同志所打倒。为了让同志们不被打倒，现在要记住打倒。

毛主席每天读一大迭报纸和传单。他再三嘱咐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出四小时读书读报。在座的能不能拿出两小时来呢？

我在结束讲话时，我想讲，我们应当想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 320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出版日期：1988 年 10 月

41)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3.12

〔张春桥最近抓川沙县、黄埔区基层夺权。会上先由川沙县同志介绍了一些情况。〕

张春桥：

组织机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再拖上两三个月，群众非造他们的反不可。区和县夺权后，不要急于先改造机构，建立新的机构，因为过去的机构已经瘫痪了两三个月，建立要花很多时间，而且群众又不熟悉。还是把原来的搞好。所谓打碎国家机器，是要把里面的坏人除掉，组成三结合的班子。

文化革命是从学校开始的，但现在大学已落后了，社会在扩大夺权，大学还没有斗批，怎样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应从大局考虑，学生还是要回学校去。

这些组织（指革命委员会里的各小组）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庞大的机构，把事拿到局里去做，把原来的机器开动起来，把它加以改造，努力建立三结合，不要新设立科，把原有的加以改造。这样是不是恢复到旧市委，旧人委？只要实行了三结合，那就不是的。如果不实行三结合，那就有可能。必须要把事情更快地办起来。这样是否没有群众基础呢？工人阶

级当权，不是把革命委员会都变成工人，根本的是要看它是执行什么路线。当然，要把工人中的优秀代表吸收进来；同时要不断地提拔一批新干部。考虑干部首先要从革命不革命，是否忠于毛主席来看。当然，也不排斥这一点，一些局吸收了一些工人成立了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只能议论一番，商量一下大事，到执行时还是各个部门去执行，要有分工，现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状况请大家考虑一下，里面真正的劳模一个也没有，农民代表也没有。到底要多少委员？大家讨论一下。我倾向于多一点，委员会下面设常委，处理日常工作。各个群众组织要加强组织纪律，代表要考虑把队伍带好。有些事情外面很快就知道了，上次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外国通讯社都报导了。更重要的要把队伍带好。例如工总司，上百万的人，这个队伍怎么样？怎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政权组织与群众组织是有区别的，有些事情不应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面。革命委员会发言要负法律责任，现在有人谈到摘桃子问题，毛主席是指两个阶级而言，不是指个人，个人有什么桃子可争？搞革命要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这个桃子应落在无产阶级手里，而不是落在个人手里。如果落在个人手里，就把这场斗争的意义看错了。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如没有毛主席的指示，权能夺过来吗？有一天人民日报四版的都是上海的消息，我看了有点担心。人民公社改名如果不是毛主席指示，早就被砸烂了。我们这个权是党、群众、毛主席夺的，不要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最近上海的同志骄傲劲不得了，老子天下第一，其实至多是第二，毛主席第一。要是内部的人互相干起来，用不着阶级敌人出动就非垮不可。最近有的人头脑中“我”字大大膨胀了，毛主席和党、群众都没有了，

敌人也没有了。我们要总结，要整顿思想，这样才能一致按毛主席思想办事。有的人想个人多，不把革命放在第一位，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前头，要开门整风，不整不行，关门整风也行，总之是要整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些组织一整就打架，一开口就是“大毒草”、“大阴谋”、“捞稻草”，这是对敌人讲的，对同志哪来的大阴谋？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和，这当然不是和稀泥，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全市性的组织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决议草案上已经讲了，根据这个精神办事。我认为各组织首先要了解自己组织的情况。有些组织既有革命派，又有保守派，还有反革命，司令员要回连队，摸出经验来，把自己单位的大联合搞好，这样才能有发言权。都回去，下去干，把自己的工厂、学校的大联合解决了。市一级组织要保留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妨碍下边的大联合；如妨碍、干涉的话，主张把这个总部推翻。市一级的组织对下边的联合都要支持，不管以什么名义联合。

姚文元同志：

文化革命到了非常重要的时刻，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整个形势很好。但从全国来看，市一级的夺权还不多，有些地方夺权了，但没有实现三结合；有的地方阶级阵线不鲜明。上海夺了权，还存在着把革命进行到底，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把毛泽东思想扎到每一个人心里，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解决组织机构问题，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

题。有一个事项要讲讲：前天，浙江有人来开座谈会，说听到谣言，“文化革命要急刹车”，这种说法完全错了，现在华盛顿、东京也在这样造谣，他们站在反动立场上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进行到底。现在有不少涣散军心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争权夺利，要一扫光。革命在进一步深化发展，而不是停顿。今年主席概括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学生回到学校去夺阵地闹革命，是非常重要的阵地。这个阵地夺下来，对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都有重要意义。学生总是要和工农相结合的，到斗批改还是要出来的。革命在前进深入，对过渡时期产生的种种现象应用革命的眼光去看待。

（张：现在有这样的说法，“把学生赶走，先赶走学生，再赶走工人”这样还了得？这样革命委员会要下台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大家想一想，建筑工人造房子是不是自己住？还是交给群众住嘛！无产阶级要有这样的风格，为阶级、为群众、为人民争权，不是为个人争权，否则就不配称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团体主义是忘记了人民，忘掉了阶级利益和斗争大方向。夺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改变了形式，阶级敌人还是想复辟，刘邓陈曹都想复辟。头脑里要有敌情观念。整风一定要整得好，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同志的缺点要指出，要允许革命；不要用抓、砸，开除的办法。一个组织不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否则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各个机构要迅速地把工作抓起来，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注意依靠群众、抓典型、抓政策，把上下线赶快连起来。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42)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3.20

〔地点：上海中苏友好大厦。〕

徐景贤：自从二月五日我们夺权以后，大家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工作，作出很多的成绩，干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参加我们工作的有革命的学生，各群众组织（38个造反组织），还有各地的革命学生。因此，今天的盛大集会也是欢迎他们。大家老早就很迫切希望和要求见到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今天有春桥同志在百忙中抽空来和大家见面，下面张春桥同志给大家讲话。

张春桥：

刚才听说大家都在革命委员会工作，在同一个机关里没有见过我，那就很糟糕了！看来，这也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我们很官僚主义！实在对不起。每天给我们的信很多，要求见我们的人很多，如果坐半天在那里看也看不完呢？刚才交大反到底给我一个条子，说从安亭事件答应接见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时有人在搞录音）春桥有些生气说：何必录音，搞得很紧张，又这么现代化，这个习惯不大好，大家随便谈谈嘛！一次我和华东局的一些同志随便谈谈，一下子传单就传到北京。

这一次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也传到北京，其实看了里面很多东西不是我讲的，这不大好，现在我们掌握政权了，在我们内部还得内外有别嘛！

还是回头来讲。我们大家在一块工作，可以说，很熟悉了。我们回到上海二个半月没有做什么事情，主要听了一些汇报，见的人也很少，许多工作主要靠在座的同志和上海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和革命的干部做的。比如火车站通车这件事就是这样嘛，我们又不会开车，火车的通行还不是铁路的工人和同济东方红战士干出来的！我们顶多提了点意见，而且有时还是错误的呢！大家的工作集中起来成绩就是很大的了。

现在上海的形势很好，全国的形势也很好，我觉得一天时间有时过得很快，也过得很慢，我从北京返来又要一个月了，想一想许多工作都还没有头绪和眉目，这样想又觉得时间很慢，急的很。不过总的时间是过的很快的。现在上海的天下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天下，谁敢说不是！这几天我们又在搞领导干部的造反，上海的旧市委书记处除我一个分裂出来以外老是铁板一块，怎么会是如此，我就是不相信，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嘛。现在总算是开始分裂了，大局是好的，但是阻力有来自上面和下面的，以及自己头脑里的。上面的就是刘邓路线，刘邓实权已经没有了，但能不能说完全打倒了呢？还不能这样说。刘邓路线在全国批判还很差，上海就更差。过去开大会也提提，根本不彻底，比如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流毒 20 ~ 30 年而且很深，62 年还再版了一次，影响极坏，到现在还没有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中央文革人少事多，有时连一篇“红旗”社论也很困难，这就希望在座的同志

去搞了。刘邓只是二个代表，代表一小撮人，陶铸也是一个，是继刘邓下台又上来的。是不是这三个人？当然有，上海不是就是陈、曹，刘少奇作报告还有些“理论”，曹荻秋没有什么理论。我们如果不把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那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彻底完成。因为社会主义内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肯定存在，资产阶级也肯定会反扑的。所以，我们既要看到一片大好形势，又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还有阶级敌人。这是个大方向。现在大家马上杀回学校去闹革命，就有斗争方向的问题。我们的矛头还要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现在不管是工人运动也好学生运动也好，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工人运动的兴趣转移到对另一个群众组织上去，有的拼命想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学校里也是这样，同学和同学之间争论的非常厉害，不是把矛头对准陈、曹，这样学生斗学生的现象还会存在。有的同学认为陈、曹倒了，没事就是打内战，提出“内战到底就是胜利”，有的人还说有根据哩，主席也讲过的呢？不行。对人家动不动就说是“反革命”、是老保，你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人家一讲话就是“老保翻天”，你要老老实实向毛主席请罪，人家不讲话，又说人家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和稀泥，这怎么可以！讲也不行不讲也不行。这种情况是不是斗争的大方向？比如南京的 1.26 夺权，当然是一个大组织，可是搞小团体主义不搞大联合，把人家组织，不少是左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是什么夺权？还有浙江也是如此，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没有如此严重的情况。没

有过什么命令把一些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包括红革会在内，应该考虑到他们有那么多战士，他们大部分是革命的，搞了就会使他们背上很大的包袱。

大家一定要明确革命大联合的必要性，不要小团体主义。大家要想到面前还有美帝国主义敌人在那里，都觉得斗争需要我们联合起来，不认为需要当然联合不起来，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感到工人、学生活动中间大方向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不能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实这个口号也是陶铸当时在北京搞的，他说：“除了毛主席，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炮打”。上海红革会的头头是犯了很大错误的，他们方向错了。不是说我和姚文元不能批评，我们有什么批评不得，还可以炮轰的，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在于上海当时处于革命大联合的时刻他们破坏了大联合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我们希望大家回到学校后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大方向。大方向看准了，各个组织之间的问题就能正确处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比如浙江二个大组织都是中央接见过的，吵得很，一抓大方向说服了也解决了。不能说“就是我最革命别的都不革命”这样势必走向反面，走向历史的反面。现在我们革命刚刚开了一个头，都在学习，特别是青年一代世界观正在改造。下去以后听说中学生里搞得很凶，有的人人过关，这怎么能行。一个中学生怎么能不犯错误，不犯错误才见鬼哩！大学生也应该犯错误，列宁曾经说过：上帝赋予青年犯错误。犯了错误，检讨一、二次就行了，哪能老检讨。要让大家去实践，让大家有思考时间，不能象对敌人一样对待我们的同学，如：“你说，你说……”（作状，大家大笑）。

大家回去，大学也好，中学也好，应该靠自己安排。我从来是没有上过大学的，而且离开学校很久，学校的问题靠你们自己解决，这样创造性就来了，但是大方向一定不能丢。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不要怕犯错误，不要认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回去犯了错误怎么办？不要紧嘛！主席最好的学生也难免犯错误的。大家回去一定要贯彻执行主席的路线，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红卫兵问题也不大，过去有市红革会这个大的组织，现在没有了，大家就更有活动的自由，更能实行由班组自下而上的大联合。

这几天大家都在问，市一级的机构还要不要，实行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可以不去考虑它嘛！在上海我到想可以保留几个大的组织，这到不是为了大家打内战，因为上海有特殊性，与外面联系很大，比如美帝打了我们的人，支援越南北京集会上海也少不了，就可以由群众团体发起嘛，所以从这个角度市一级机构有保留的必要。如果从大联合角度我也主张撤销，不过不撤销也行的，只要这个组织实行大联合的方针，可以的嘛。我有一次到工厂里和一个组织谈起对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大联合的看法，他回答说一不提倡，二不支持，三不承认。这不行，这还不是陈、曹的路线了！要知道群众会前进的，我们不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如果如此，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仍然被打倒。有人说，毛主席党中央支持我们的，这也没有用，刘少奇，毛主席过去不支持，没有毛主席他的威信会那么高，毛主席还公开宣布刘少奇做接班人，但现在他站到历史的对立面，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就是被打倒！

同学要回去，拉拉扯扯谈了这么一些，就是一个意见，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要实现大联合，打击一小撮最大限度孤立敌人，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

姚文元：

大家要我讲话，没有什么话好讲，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

大家参加革命委员会工作，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刚才春桥都讲了。这一段应该说是难忘的！从一月革命开始，上海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干部都和我们战斗在一起，大家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工作做的最少最差。虽然是难忘的，但是革命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大家还记得吧！1949年刚刚解放时，解放军刚进城，那时我还在地下，春桥同志是接管员，我们当时和这次一月革命胜利一样多高兴呀！但革命仍然继续前进，我清楚记得当时的一些老战友，现在有的跟毛主席继续前进，有的在十字路口彷徨动摇，有的变质了！走的无非是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大家回到学校后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革命事业。我们能永远战斗在一个战壕里，继续把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不是教育干部要保持晚节吗？对我们青年一代是不是还有一个早节！应该说，在一个革命高潮时成为一个革命者是不难的，但是革命到了转折时，到了关键时刻才能考验人，这也是对人的最好锻炼。我希望我们共同战斗下去！

真理是不怕火烧的，我希望第二个就是大家回头好好学习十六条。现在去看有很多地方是写得很好！现在里头有很多具体的政策和社论，但是十六这是一个总纲，我们要坚持的就是这条路线。现在说的许多问题其实十六条都定了，比如群众路线，党的阶级路线，干部的政策等等。这里边第二节“主流和曲折”也说的非常好，都是主席的思想（读了“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这一段）阶级斗争以前有过几次反复，对我们来说确实吸收很大教训，增长了阶级斗争经验。以后运动会不会反复？十六条说：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就是肯定有的。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应该这样去想。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会甘心于死亡的，他们还会伺机反扑的。但在看到敌人反扑时也不要吧前途看成漆黑一团，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们是不堪一击的。在胜利时看到困难，困难时看到光明，这二个方面都不能忘记。我们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按毛主席的路线走到底！这一段时候有一点自己教育很深刻，就是我们毛主席始终支持群众中的新生事物，红卫兵也是毛主席首先发现给予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全国广播，点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从那以后毛主席还支持很多。从上海来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都是他老人家支持的，如“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月九日“紧急通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直至最近（3月6日）文汇报的反对风头主义的社论也是毛主席批准在人民日报以显要的地位刊载！大家返校闹革命会遇到许多问题，大家还要敢于革命，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要敢于

提出革命的倡议，要敢于把运动推向前进。因为世界是决不会停止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界，事物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因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我们的革命要发展，只有依靠毛主席思想掌握群众，所以第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革命首创精神，树立我们无产阶级的权威。无产阶级的权威就是把千百万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红卫兵的发展就是如此，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从一个城市发展到全国。

现在大家杀回去是去闹革命，不是别的，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关键的时刻，大家杀回去就是要把你们的革命基地建立好，真正做到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再也没有了，那时大家还可以杀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春桥：

我补充一点，现在大家回去很好，上一次在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上我讲过：最近红卫兵的劲头好似没有过去大了，有的还觉得灰溜溜，这不行。要杀回学校好好整顿再杀出来！我说的是大家现在杀回去好好整顿一下思想、整顿一下组织，将来士气更大，人数更多，还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杀出来，而且一定要高水平。因此，我的话是鼓励大家杀回去的，回到学校去。想不到同学的劲头很高，听到以后第二天就上南京路破四旧，把小脚管给剪了，人家有意见的跟他辩论，大概他辩论输了，问他谁叫剪的，这个学生说是张春桥叫我剪的！（大笑），我怎么会叫剪呢？现在谣言很多，我也无须辟谣。

有些学校根本还没有建立一个权威的组织，怎么能杀出来？现在还是回去好好整顿，将来出去是不是我们再商量一下。其实，我们是早有建议和打算，是不是能在五月一日开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五四”召开“红卫兵代表会”，红五月嘛开门红，不过最近工作忙，也没有很好地搞，总的困难是不少的。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43)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3.26

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做了系统的讲话，他的讲话我们两个是商量过的，他的讲话写了稿子，这个稿子我们两个共同修改了五次，那么我今天就没有准备稿子啦，因为说好了，他的讲话算我们两个的。刚才在这儿坐着嘛，条子很多，还提了一些问题，我想还需要补充一点。从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间，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存在着不少问题。那么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首先当然我有责任。因为有些事情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抓得不紧，不深入，工作不深入，有些情况不大了解，或了解不准确，有些问题，我们感觉到了，但是，是在小范围谈的，找了很多人谈过话，开了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话没有直接和全市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同志们一块商量，一块谈，有些话传

来传去，就不晓得传成什么样子啦！有的就传得就是完全相反啦！有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讲过的话。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地来讲，也不需要讲，总而言之我们有责任，这一方面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是我们话讲了，或者我们的意见还对，那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有许多事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些人我帮他很多，一再谈一再谈，但是无效，包括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那我们谈过很多次话，毫无效果。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发表的这一些意见，包括姚文元同志讲的，有一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有一些意见可能不完全妥当，也可能是错误的，同志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是整风嘛，整风就要敞开思想，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说出来，对我们的意见不同意，也可以提出批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我们两个人还有个共同的希望，我们还比较希望尖锐的批评，因为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平常不大说，我们批评人也批评是尖锐的，我们也希望别人对我们如果是批评的话也是尖锐的。我们每天收到很多信，一天几百封信，从来信中间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提了各种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都答复，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有的同志要求我们谈话，这个愿望我们到现在实在是无法满足，我们希望同志们不管给我们写信也好，或者谈也好，对我们可以提意见，也可以批评，这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是正常的，这个不会混淆起来，就是不要在上海造成这样一种空气，好象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能批评的，那就糟糕啦！批评我们，决不等于炮打中央文革，也决不等于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善意的批评是两事。

在批评中间，毛主席所讲的，有两种，一种是敌对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这个人民群众也可以分得开，我们可以分得开，对同志的批评我们欢迎，对敌人的攻击，那我们当然有对付的方法。这是我想首先说的。

第二想说一下整风。我们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的这些意见对不对，观察的正确不正确，刚才讲了。我们整风的时候，首先主要的是要靠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著作作为主要的学习文件。我们的讲话，只能作为辅助的，不是有的地方说吗，我们是市长，有毛泽东的思想作为武器来学一学，错误的思想，我们说得对不对，那还要同志们来判断。同志们自己也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以毛主席著作为主。姚文元同志讲话里已说了，有一个风气很不好，有些人是靠马路新闻过日子的，听到个风声，看到街上有张大字报，或者是北京传来的什么××首长讲话，他们也写。这个是不妥当的，要上当的。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中央同志讲话，好多大字报，我们都看过了，一看就知道，有的记录和原意根本不对头，不能靠那个。我们在这儿，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对同志们有所帮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的知道中央的意见，我们一定给同志们讲，但这个也要区别开，那一些是毛主席的意见，那一些是我们的意见，这还是要区别开。至于大家在整风里边学习，还是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说有的同志要我讲的需要补充的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有的同志要我讲讲形势，因为说是最近比较闭塞。这些马路新闻少了，街上大字报也少了。北京的同学又大部分回去了，消息不灵通了。我们现在形势究竟好不好。我们说形势是大好的，我们看形势的时候，就应该遵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要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因为

现在当然还有一种逆流，逆流也是一种支流吧，我们要看全国的形势，看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现在第一个大形势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决定今天的世界的形势，而且是决定全世界在今后多少年的形势，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那我们现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的来看都是很好的，好不好，要看比较，我们可以和一年前比较一下，不要再和一年多了，因为昨天我们突然想到了，这个月的29号，再过三天，就是毛主席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个口号的一天，现在正是一周年，去年这个时候，主席到了上海（……）杨尚昆那时候住在上海，陆定一是三月八号还在上海，去年三月八号在这里，在我们上海的，彭真是二月在上海的，那时还是这些阎王飞来飞去很活跃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形势，全国那时在干什么呢？还是在贯彻执行彭真二月提纲，就是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彭真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这样一个形势。也就是去年的三月底，这个时候，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那时具体指的彭真，陆定一，小鬼是指的青年的青年，那时还是讲学校，文化界，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准备阶段，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天主席所提出的任务，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这一年，那天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散中宣部，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陆定一的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陶铸的中宣部已解散了，已经换了两个了。要解散北京市委还有个解散那个时候的文化小组，五人小组，这三个任务都解决了，只有一个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要把国家机关精简，他给我们谈话，但是集中起来就是那么几句话：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精简机构。同

志们想一想啊，这一年变化多大啊，不但是彭真、陆定一，这些人打倒了，再向下发展嘛，把刘、邓的问题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月革命，开始了夺权，现在凡是夺了权的，而且经中央批准的，就是报上登的几个：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这都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这些地方夺权以后的形势，虽然斗争很激烈，但都能够站得住了，山西的形势大概是这样；所有的专署地委级和市委级，比如大同市，阳泉市这些地方都夺下来了，县绝大部分夺下来了，还没有完全夺下来，贵州现在是这样，贵阳那里很好嘛，当然专署还没有完全夺下来，有些县没有夺下来，整个的形势有斗争，不要想没有斗争了，斗争都存在，但是形势都很好，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我们上海的形势同志们都看得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大发展，比一月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强大了呢，还是减弱了呢？当然比一月革命的时候，上海的形势好得多了嘛，有一个同学写信给我，他到外地去，到另一个地方去，他说到了别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夺权的地方，就感觉到在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在这里过得挺舒服的，一天心情很愉快，到了另一个地方心情就感觉到不同了。我们希望我们上海永远是这样，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每一个跟着毛主席走的人，在上海都能心情很舒畅，过得很愉快。当然我们愉快总有人不愉快嘛，你说上海一千万人都愉快啊，那就糟糕了，一定有人不愉快的。陈丕显现在愉快嘛？当然不愉快，曹荻秋也不能愉快。还有一些人，他们总是不舒服的，有舒服的人，如果他们愉快了，那我们大概今天这个会就开不成了，那就是说在座的如果你要坚持革命的话，那大概就要打

成反革命。这是已经夺了权的，夺了权得到中央同意的，这些单位都是形势很好的，还有一些呢，是条件逐渐成熟，夺权的条件逐渐成熟，或者过去夺了权，夺得不太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或者还没有实行三结合，是单方面夺权，是一部分单位夺权，有的地方没有夺权，现在条件逐渐成熟了，同志们从报纸上可以看见北京的条件，那就逐渐成熟了嘛。北京大家可看到嘛，只要你把报纸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三结合的条件已经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来，只是哪一天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因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名单，后面已经有好几个了：吴德、刘建勋、高阳文、丁国珏，还有什么李清泉，市委书记处已经有五个人站出来了，因为他这个书记处跟上海书记处不一样，他是叫作北京新市委，北京新市委就是把彭真的市委推翻了，成立的新市委，新市委又犯了错误，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军队的名单也已经有了，群众团体嘛。现在红代会了，工代会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也开了，主要的群众组织已经选派了代表参加市委革命委员会。所以他们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据我们知道天津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所以条件成熟的单位逐渐地增加，当然也有比较多的曲折的地方困难更大的地方，譬如我们最近的江浙两省现有条件都不成熟，所以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大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革命形势这样，生产的形势呢？也是好的，但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究竟今年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呢，全国的生产形势根据我们从各方面看到的材料总的方面很好，譬如最使得人担心的煤矿的产量下降，因为那一阵经济风刮得好多煤矿大批工人都不在井下，都上来了，上来了到处串联，那个煤炭生产就受了影响，从一月份开始下降二月份

继续下降，那几天我们是相当担心，因为上海咱们这个地方又不出煤又不出铁，如果要是煤不来呀上海的威胁就大了。

从最近得到的材料都开始好转，三月下半月以后譬如说山西大同煤矿就同我们上海关系很大，因为他是全国最大煤矿之一！阳泉煤矿从夺权以后产量就回升了，所以一切问题还是革命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那你就没有办法，那个产量非要下降不可，这样一夺权，条件成熟了夺权生产就恢复，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个话，好象生产下降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恰恰相反，产量的下降证明必须搞文化大革命，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这个责任落不到我们身上。我们上海的局面，谁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继续管下去呀，如果我们一月不发生夺权，那现在上海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这是和革命形势的发展直接联系着的，这是主流方面。我们看到主流是这一方面，但是有逆流，有支流，支流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有问题，随着斗争的发展，这个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东西发展，但这一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流，这也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谁如果夸大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来整我们，那就证明他立场错了。主流方面还是好的，这是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对立面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呢？他们当然是不甘心下台的，同志们大概注意到了为什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职工代表会议讲话里提出了那么几个绝对不许呢？周恩来同志说阶级斗争还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希望亲爱的职工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

持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逆流，下面就讲了四个绝不许，绝不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绝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不许四清运动中那些下了台的分子反攻倒算，绝不许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分子乱说乱动，我们要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当然是有根据的，因为确实斗争还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因为这一场斗争是生死斗争，这究竟是无产阶级在中国胜利，还是资产阶级在中国胜利？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胜利？究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还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胜利？这是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关系世界命运的问题，两个阶级都是下了决心的，我们下了决心，以毛主席为代表，代表我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全国的革命的群众下了这个决心，一定要把这一仗打胜，一定要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呢？他们难道说甘心失败吗？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吗？当然也不是，不会，决不会！刘邓没有死心，象陶铸那样的人也没有死心，那也还有群众面前没有充分暴露的人，因为资产阶级他总要找出代表人物，他们会起来搞复辟搞反扑，他们不投降，那么就用各种办法来搞复辟搞反扑，就是说有的地方打算利用大联合还可以搞复辟么，在大联合中间把领导权拿过去，名义上还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或者是造反派，实际上变了。没有经过批判斗争，没有经过检讨，群众也根本没通过，那里或者全同群众接受，这里要有一个三结合，这当然是少数的，也有的地方，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整风，或者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作里面犯了错误，就大整，抓人抓得很多，

随便地宣布一个组织是反革命，这实际上是搞了白色恐怖，这样的情况下边，是姚文元同志刚才讲的话，要我们时刻警惕，是需要警惕，因为上海的形势特别好，我们就应该警惕。

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不要只是关心一个小团体，也不要关心一个厂，要关心我们全市的工作，我们要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我们应该有这个决心看到上海的革命派肩上的担子很重，上海的同志我们对全国人民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我们是有义务的，不能推卸的义务，一定要把上海搞好，我们现在的局面决不允许什么人来破坏，一定这个地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什么反扑什么复辟在这个地方不能得逞。不但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下这样的决心，现在当然中央已经通知了停止大串联，各地方夺权嘛，我们也相信各个地方的革命派他们虽然遇到了困难，我们相信他们有力量能够转变这种局面，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整风更加强大了，只要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支持那个地方，我们立刻可以去。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要求，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把上海搞好，我们一月革命搞得早么！而且毛主席给了我们那样多的支持，我们还不应该搞好！全国的产业工人，数量最大的最集中的是在上海，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难道不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来吗？应该和可以的，我们过去做的工作有成绩，现在我们应该做得更有成绩，现在全国的革命和生产形势都是好的，但是有逆流，有人在那里想复辟，这也是我们预料中的事，你要革命，革命就有反革命，你要夺权就有反夺权，这才合乎辩证法，这没有什么奇怪，包括在上海我们都欢迎有些人出来要夺权就夺权，要打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你就打倒好

了！有些赤卫队的头头，改头换面搞组织，我说你有胆量最好是不要改头换面，你把旗子拿出来，戴着袖章出来。（鼓掌）我们进行光明磊落的正义斗争。你把你的胆量拿出来，到全市人民面前辩论，电视台可以让你发表电视演说。（鼓掌）陈丕显不是也是讲话了，为什么不可以给你：可以！我们相信上海的革命群众，会懂得如何答复你们的。我们上海一月革命以来，工作太顺利了！曲折太少了，这个不过瘾。（鼓掌）你们如果出来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战士多打几仗，使得我们锻炼得更强一点，我们非常感谢（鼓掌）。曲折只能锻炼我们，有复辟活动只能使得我们反对复辟的斗争搞得更彻底。使上海的革命更彻底，使得上海的资产阶级消灭得更干净一些！（鼓掌）这就是形势。

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坚持革命的大方向，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表一点意见，同时答复几个问题。

我们的任务很重的，我们不仅要上海人民应当担负责任，我们要对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担负责任。不管担子多么重，我们决心下了一定要担负起来。那么靠什么呢？靠群众，靠上海的几百万革命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实行大联合，我们由于有一小部分同志，好同志，但是这一个时期，的确里边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多了，眼界就狭窄了，看不到我们的任务是多么重，看不到我们对全国全世界的责任，看不到我们还有敌人，有人还要搞复辟，不想这些事了，而结果死想着自己的小团体，那就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任务这么重我们靠什么人呢？我们的革命队伍究竟是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参加革命的人多一

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我们究竟是要组织一个浩浩荡荡的大军，还是就这么几个小团体，这些事情想没想到？因为想的这些东西少了，有时候而不是讲任何时候，有的时候在处理有些问题的时候就迷失了方向，就不去担心大方向，有认为大方向搞错了，那个事情就是一个好同志也苦恼得很！我们现在还不是讲那些坏人，这样迷失了方向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一切都颠倒了，方向一搞错，一切事情就颠倒了。我这个坐火车到北京，几十年前第一次到北京就迷失了方向，一到浦口我的方向全部错了，明明要上海到北京去，一过浦口铁路向北走吗！我总觉得向南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一到天津我就迷失方向，就东西颠倒过来了，南北全部错了，心里知道那里南那里北，你的感觉就不对！这都颠倒了，东西南北都弄错了，这不是坐火车，不管你迷失方向不迷失方向车子总把你带回上海来，革命就不是这样了，同志，革命坐在车子上，那个车子要转变的，要摔下来的，而且会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把敌人当同志看。把资产阶级思想当作无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思想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否全弄颠倒，那就糟糕了，刚才听了念了几个信，都是宣传停止内战的，这个单位实在是内战就是不停，而双方争论得有的看不出来，原则分歧有那里，有的互相把对方打成“反革命”，你是反革命，发传单，另外一个组织他是反革命，那里有那么多反革命。反革命总是有很少的人，还有大批的。这是个老保，那个是老保，这个是保皇组织，那是保皇组织，那有那么多保皇的。革命的群众总是多数嘛！当然觉悟有不同，有的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是在那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单位那个地方开会是难开的，我们了解过，因为什么呢？

一批是保皇派不能发言，另外一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不能发言，还有新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人，这样一个学校里边都没有正确的了。那么你保过皇也好，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好，你炮打中央文革也好，这里边总有区别嘛！有一个程度。性质严重不严重，程度深还是浅，还有一个人家改了没有，是头头还是一般群众，头头改了没有。对犯严重错误的人、领导干部，我们都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什么一般的工人同志，一般的学生就不应该采取这个方针呢？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领导干部最最大嘛！因为领导干部，他领导的嘛！全国的责任是刘、邓，上海主要负责的是陈、曹。真正把大方向纠正过来。对于革命群众内部的问题，当然革命群众里边有坏人，而且常常是发生在武斗事件上。如果同志们出去看一看，这个地方不说十个有十个，总有七、八个是有坏人挑动。我们革命委员会从成立以来，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没有挑动过武斗。什么人在挑动呢？在工人与工人之间非要武斗不行，工人同志能接受这个意见吗，总是有人在挑动的，有人利用的。看来想搞他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有人想达到他自己的个人的某种目地。象头几天，心里气愤，突然间到中国福利会去，那里的群众告诉他说，这里是外国同志住的，不让人进去。偏偏要进去，到那里把人家钥匙拿走，把抽屉打开究竟是干什么？不对。这我不相信是革命群众。在那里要搞辩论，这里有鬼。所以，什么武斗、内战、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分析。当然也有两方面都是小团体主义，两方面都有错误的观点而武斗了。那我们也希望不要武斗。说过多少次不要砸，你砸他干什么呢？电话机是国家财产，它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通

道说陈丕显用过的电话机，我们就不能再用了？我们可以用，为什么不可以用？把它砸了有什么好处？好，造反派有理，就把它砸了，这究竟谁吃亏呢？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吃亏。电话机、广播电台、凳子，什么都砸掉，你砸掉了，把房屋统统烧掉了，烧得光光的，资产阶级还是照样要复辟，他再盖一个比你的还漂亮，不触及灵魂，不作政治斗争，用这种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各个革命派之间的问题只能够协商解决。就是对反革命组织都应该是用正当的方法来进行斗争。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你砸也砸不掉，解决不了问题。若不解决大方向的问题，不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那我们就不能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搞三结合；而没有大联合、三结合，我们的政权是巩固不了的。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那就是看我们双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究竟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如果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那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复辟。如果我们不团结，而是排斥，那当然我们这边是不利的。搞三结合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三结合搞得不好，我们革命的力量就组织得更加好了，就能发挥无穷的力量。不搞三结合，不搞革命的三结合，那我们的工作是有困难。当然了，有的干部翘尾巴说：“你看，搞来搞去还是对我结合吧！”我在这里帮助他，你如果是好同志，就不该说这种话；你如果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请你走开，不要你（鼓掌：呼口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三结合。我们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有原则的，凡是愿意革命的，我们都应想一切办法帮助他们。但是你说你在那里还要摆个架子，好象离开你不行啦，放心吧！离开你我

们照样革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没有什么本事，他也不会开火车，不会开轮船，坐汽车还要别人开，有什么了不起（鼓掌）！但是我们这个话是要说给那里那些在那儿摆架子的人听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我们对于所有的要革命的同志我们都要想一切办法尽最大的耐心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根据我接触的情况来看，有些同志经过半年的斗争，而搞的有些昏头转向了，不知道怎么办，有些同志不知道怎么办。过去有些人谈话还满好的呢！过去谈话还蛮好的，还能谈，现在我看到有些同志，我就觉得有些同志变得木头了，什么意思也说不清楚了。他该检查，不知道怎么检讨了。我这里讲的是一些好同志，他们不是反对主席的方针，也不是摆架子，更不是反攻倒算，不是，而是不知道怎么办，而再加上我们一些同志对这些人总是不放心，就不敢去和他们谈话，就不敢下定决心，去和这个人结合。因此，只好去找一些错误还不大，办事也不大能办的人。那样的人，当然罗！对任何人都要给予出路，给以适当的工作，可是他来三结合，还是不能解决咱们的问题。老实说，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真的肯改，真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我看三结合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人还好一点，为什么？他有经验。他对群众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我理解得还深刻，因为他自己有实践经验。在这个条件下他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学校怎么整的，如果他真正决心改，他以后就不能这样干，这个同志可能变成很好的同志。所以不要把这些看死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帮助他们，这个不叫资产阶级复辟，这个不叫复辟。那种匆匆忙忙，也不要检讨，连承认错误都没有，就把他和上来了，那

个有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复辟的味道，那个要警惕，要看我们现在这个搞法，我们搞得相当细致了，象陈琳瑚同志，王少庸同志，他们先先后后开了多少次会，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的啊！而且不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吵架，而是在电视广播里面，在全市人民面前表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这样的同志，我们就应该信任他们。有一种思想很糟糕，他们误解，以为“三结合”这三个原则……（录音坏了）那到不见得。比如说他原来是当局长的，三结合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当局长，那就要看了。如果他确实原来的错误不很严重，检查得又好，他的能力和各方面都是恰当的，那当然也可以。有的就不一定，可以先做些思想工作。现在听说有的单位所以没有三结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就建议是不是过渡一下，他们不一定马上就恢复原来的工作，将来谁作第一把手，那再看嘛！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死。要对干部不是一个办法处理，在这当中，有的是要罢官的，但是还有个别的极坏的甚至还要抓起来的，那不是一般的罢官；还有那些留在原来的单位上，用刚才那个说法就是要搬回原处了；有的要调动一下，现在不一定要调动，将来可以调动。比如说有一个县委书记在这个县里当县委书记，困难了，就是检查的好也有一些困难。双方都有一些困难，群众对他也有一点难办了，这样的人还是个革命同志，不过调到另外一个县还可以。有这样的事，革命嘛，在哪儿都一样革命，可以调动一下。有的需要提拔，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好，需要提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处理。并不是三结合就是按照原来那个班子，恢复原状，那不行。我们现在仅仅是这一点结构，我们现在主张不要大

动，动多了不好，等到将来再动，等到斗、批、改的时候再动，这一段已经走了一些弯路，机构变来变去，结果秩序越来越乱。我们意见现在各个局，局的机构最好能够早一点实现三结合，把这个机器开动起来，使局、公司、厂这个指挥线不断。有个同志问，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厂里三结合了，但是公司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三结合，市革命委员会不是有个规定吗？说要经过批准。我们说这样好不好，如果一个车间先三结合了，你就先干着嘛，只要群众批准了，这个事就不大，就怕我们批准了，群众不批准。群众只要批准了，我们革命委员会意见就不会多了。如果是厂里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公司先三结合了，那怎么办？我们说你们也可以先工作起来，如果说你不批准我们没法工作，我看这话靠不住，你这三结合群众路线不够，群众路线够了，群众为什么不批准呢？群众批准了，你们可以工作啦。所以不要等，不管是厂也好，公司也好，局也好，县也好，包括区以下都是这样，能够大联合自己搞起来就搞，三结合能搞起来就好，不一定要等他批，但是我们还保留一个批准权。为什么要保留一个批准权呢？我们不是为了妨碍群众运动，不是为了把革命同志的手脚都捆起来，不是的，同志们，我们是为了防止假夺权。（口号）我们规定了这一条是为了防止假夺权。你们那个地方人家搞了个假的，群众没办法，推翻不了他，他如果势力很大，我们市革命委员会就掌握了一个否决权，到那个时候不承认，自上而下地支持群众。我们是为了这个，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放手去工作，不要受到什么约束。凡是革命的行动都会得到党的支持，应该相信这一点。相反的，我们现在希望全市的同志们要发挥首创精神，不要照抄照搬。现在搞大

联合、三结合都是照抄照搬，这个不好，因为各工厂、各单位情况不一样，不要抄那些，不要什么都照抄照搬嘛！连开个大会都照抄照搬。因为市里开会，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发了个宣言，发了个第一号通令，还有一个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川沙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也是照样告全县人民书，第一号通令，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都是一样。后来我们到黄浦去开会，拿文件审查，一看也是这三项。后来我们给黄浦区的同志建议，你们革命一下好不好，不要什么一号通令，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海市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只发了个一号通令，二号通令也没有，你何必学那个形式。所以不要学那个形式，因为各个单位的情况不一样嘛！下一次你只要一个通告就可以，不要通告也可以，发个通知也可以，按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也不要说因为黄浦区是某一个人做第一把手，我这里也照样找一个那个条件都不一样（似应为“都一样”——编者），你看人家是副局长也来三结合，我这里就不敢找个正局长。那怎么行呢？各个单位要很好地发挥创造性，来考虑自己的问题。我在这里顺便提两个问题让同志们考虑。现在我们手边的材料很少，到处问到底有没有一些单位不需要夺权，到底有没有？现在不需要你们回答，请你们回去想一想。现在好象是到处都要夺权，而实际上上海革命委员会那一个决议草案里写的是，要各个革命组织讨论一下，究竟哪些单位需要夺权。文章里还是讲吗？凡是需要夺权的地方如何如何。如果那个地方当权的同志或者多数同志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一定要夺权啊！我看就不需要。不夺权是不是也要发动群众啊？需要建立一些监督领导的机构，那倒需要。用什么形式，去发展创造。这是一个问题，

请同志们考虑的。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各个部委、各个局、各个县、各个区、各个工厂、各个学校，等等这些单位，究竟有没有第一把手不需要打倒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市里开了一个电视大会，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的罪行。现在各个单位都在照搬。一个局就把局长和党委书记两个人狠斗一下，象这样，一个单位是不是都是打两个？那就恐怕不适当了吧？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念了几段话，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分析你们那里的情况。也可能你们那个地方第一把手是好的，第二把手是坏的，也可能第一，第二把手都是好的，第三把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可能是相反，第三把手是好的，第一把手最坏。情况怎么会是一样呢？要分析。（录音脱落）搞革命要有勇气。如果他确实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有这个勇气不是啊呀，我说了，会不会被说成是保皇派（录音脱落）。

第三个问题，我们也不必那么匆忙。各个大学、中学的红卫兵能够多数的学校已经能够统一了，他们选出代表来开全市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如果中学先联合起来了，那中学先开也可以，不必定得那么死，大学的红卫兵如果先联合起来了，也可以，将来再开始全市性的嘛！如果时间差不多，那就等一等，开全市性的红卫兵代表大会，来选举全市的领导机构，这样比较合适。在这种情形之下，现有的第一级机构，有的已经宣布撤销了，我们觉得也可以。有些机构自己觉得还是保留好，我们也不勉强他们撤销，因为有关群众团体的事，我们不好作决定。最近大家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吗？他们为什么说那段话呢？我是说过的（录音不清）。

还有一些组织，你要搞大联合，你的上级不答应，怎么办？我就在这个地方对工交系统的工人讲过，不理他，自己干。我说过这个话，因为不能妨碍群众的革命行动嘛！我们不管做那一级的领导工作，同志们要记得，永远跟革命群众站在一起，不要站在对立面，要同革命的群众一块前进！群众总是要前进，人类总是要前进，而我们呢？也是要不保守。所以毛主席讲，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群众当然是要起来革命的，什么样的理由也不能压制群众。现在这个问题的分歧不太大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如果还有人要压制，那你就自己革命嘛！革命不要人批准，从来不要人批准。本来二司成立，根本用不着曹荻秋批准。要他批准干什么？不应该叫他批准。只要是革命，就不要人家批准，可以造反，大家可以发挥创造性。从各个方面来看到新的形势，这是大联合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讲讲生产。这个问题没有多少话好说，因为现在关键问题还是革命。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里面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大联合，三结合不解决，我们生产上不去，现在已经妨碍生产。好多单位就是在那里打内战，把生产打糟了。有些科研单位还说什么中共中央的信不适用科研单位。我不晓得你算哪一派。你算是革命职工，革命干部，总有你的份吧！科研单位据说还没有坚持工作时间，一天到晚还在那里辩来辩去，把工作完全抛掉了。有的科研部门几个月没有干工作了，这是不适当的。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科研发展得快一点，我们现在是同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争，争时间，抢速度，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压倒（录音断）。

在业余时间闹革命，这是中央的方针。如果坚持不改，屡教不改，那怎么办？那就不应该再发工资嘛，这是天经地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不劳动，为什么拿工资啊，现在崇明农场还是宝山的一些农场，还有一批人在市内逛，不回去。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是要在市里分配工作，我今天再重复一次，上次我讲过，你死了心吗！你不回那里去，市里决不会分配工作的。

还有现在短途运行非常紧张，海港很多仓库的运载量都很大，有些运不出来，船上的东西运不下来。为什么，因为车子不够。车子到那里去了呢？今天到会的同志去想一想吧！我们占用的非生产的车子太多了，有些单位，凡是从生产单位要来的，统统退回原单位，为生产服务。有些不应该坐小汽车或吉普车的，好多机构都有车子。我们建议大家把车子送回去。你从那里来的，送到那里去。我们也建议公安局交通处把全市的汽车牌照都检查一次，重新搞。在街上如果发现了不是属于你们单位的车子，一律扣留。这样，对我们生产有好处，对我们革命的同志有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军队的同志现在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根据的指示，（脱落）我们解放军同志到各个单位，希望各个单位的革命同志们表示欢迎，第二要向解放军学习，这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很好的机会；同时也要把本单位的情况如实地向解放军讲，不要隐瞒，不要歪曲，也不要夸大。但是，应该说上海单位太多了，工厂有八千个单位。学生是二百万。把我们警备部队和野战军统统分掉也分不过

来，因为你一个地方不能去一个人，我们跟三军的同志商量，也跟南京地区的同志商量，先只能够来参加要害部门，最紧急的部门，比如交通部门，运输部门，这是关系到全市的，其余的地方就看了，不可能都去，所以上海的同志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包括军训。军事训练也不能等着解放军来再军训，而且解放军也只能帮助你们一个短时间，不能老住在你们那里，所以基本上说以自力更生为主。你那里总还有民兵，基本民兵嘛，还有复员军人嘛！自己为什么不能搞军训呀！可以搞的。而且军训和政治训练配合作用，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去发挥创造性，自力更生，自己来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口号）今天到会的军队同志，我也是穿军装的，我想给军队的同志来说几句话，因为军队的同志有的在上海住了很久，有的不是，有的虽然在上海住了，但是现在与要到的大单位并不熟悉，同时军队……（此处录音脱落约十分钟）领导之下，或者他们自发的，怎么不管他了，反正是斗了他们。斗了他们嘛，后来就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这些青年都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好，那么那一批牛鬼蛇神或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就自己站出说自己解放自己。我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那批青年同志关进牛棚。我说就是不正常的现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我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你们自己想一想。我建议把牛棚撤消，不要搞牛棚，让那些青年出来说话，让他们有错误自己检讨，关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呢？关在牛棚里他又不变成牛，还是个人，他们的思想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而且可能把好人关在里面。我建议文艺界的同志，如果对别的单位有牛棚，我赞成你们不要搞牛棚，

不要关起来，有道理辩论嘛！我们跟陈丕显、曹荻秋辩就辩嘛，有什么好怕？真理在我们手里，不要用这种办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问题，我上一次传达，24号传达的时候讲过，毛主席说过，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只是一种暂时的，没有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党，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毛泽东思想的党，我们的革命是没有法前进的。有些人说现在不要党了，看到党员就骂。我说，这种人至少感情上有点问题，有的就说：“你们这个党就是刘邓的党”那里是？我们党中央的主席是毛主席嘛，我们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关于青年团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中央没有最后决定。讨论过，无非是几种想法：一种是保留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改造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代表青年团。究竟用哪一个方针中央没有定。当然，现在的团员还是团员，现在的党员还是党员，那些群众大会上开除党籍一律无效，群众大会怎么能开除共产党的党籍啊？有的强迫叫某一个组织把某一个党员开除啦，那当然无效，有的非党员接管党支部，而且封自己是支部书记，这当然是无效的。有的新发展了非党员自己封自己是党员，又发展新党员了，这个当然都不能承认的，我们认为上海市委是垮了，它的权革命委员会夺了，新的市委还没有建立，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向中央请示过，问过毛主席，这种情况之下，党的问题怎么办？毛主席的意见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因为你们现在抽不出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问题向同志们说一下，同时我们想说：希望所有党员，不要忘记是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

不愧于我们这个称号，就是我们一个人，也应该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已经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共产党员应该在里面起模范作用。用这样一种标准要求自己，那末等到党中央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指示以后我们再详细地讨论这个事情，现在只能这样说：应该做模范，应该象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象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来工作。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党的同志和团员同志，你们是不会忘记自己是党员是团员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那就快点改，如同我们对别的人一样，还是有错误就改，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最后，我想说几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上海（脱）……成为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模范，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成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我觉得这个话对我们上海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所有的革命群众，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的红卫兵，所有的解放军的战士，指战员，所有的干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来成为这样的模范，使我们上海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使得上海成为无产阶级最强大的堡垒，成为资产阶级没有容身之地的最好的城市，是我们毛主席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是我们全国的模范。

我今天就讲这些，完了。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44) 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1967.04.13

戚本禹：蒯大富，听说你支持刘刚拆中学红代会的台的大字报？

蒯大富：没有看这张大字报。

李冬民：蒯大富很“关心”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大笑）

戚本禹：原来大家对你的意见很好。现在为什么对你有这么大意见？

群众：蒯大富可以代表刘刚。

戚本禹：不要这么说，蒯大富怎么可以代表刘刚？怎么样，你们双方各派一个代表把你们的观点简明的说一下，简单一些。中学生最近打得很厉害，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派我们来讲讲意见。意见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指定由我来讲，谢富治同志是市革委会筹委会主要负责人，他有些看法和意见和我们一致，他也来讲讲。总的意见经过讨论，具体讲法没一块讨论过，仅供你们参考，有意见就不要在这儿讨论了，下去讨论。这并不是压制民主，对的接受，不对的可以不听。

下边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如何对待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二）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

（三）中学红卫兵的光荣战斗任务。

（一）如何对待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个问题一说大家都知道，要爱护解放军，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怎样对待理解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中学红卫兵应正确对待我们的光荣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满街贴炮轰李钟奇的大字报，我们是不赞成这样做的，当然我们也不赞成说炮轰李钟奇的人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不赞成把矛头指向李钟奇。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同志都不赞成……，蒯大富也不赞成……。四月四日会上讲过一次没有引起同志们足够的注意重视。有人说炮轰李钟奇不是反对解放军，但是李钟奇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参加军训的，他是卫戍区副司令，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市贴这么多大字报不利于斗争的发展，不符合当前斗争大方向。当然贴大字报的同志可能出于好的动机，但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经过了解和考察李钟奇是好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热烈鼓掌）杨成武同志亲笔给我们写信，介绍他的经历，李钟奇同志是在六盘山带领小部队的起义过来的。三五年冬在骑兵连里当连长后来当营长，参加过震动全世界的平型关战役，三八年当副团长是平汉线上八路军有名的副团长，日本鬼子很害怕他，后来又带部队到延安，

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解放战争是在华北，解放后先在中央军委工作，后来调到卫戍区工作。这个同志有错误有缺点可以善意地提出，但我们不主张打倒他，不主张炮轰他。他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希望同志们考虑这个意见，我们也不强迫大家接受这个意见，我们希望大家都考虑这个意见。

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工作中作了大量成绩，造反派有困难，解放军就支持，山西、贵州、黑龙江等地都是在左派困难时期支持左派的。有的部队指战员为了支左，挨打、挨抓，腰被打伤。解放军不仅过去有功勋，文化革命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左派有很大的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闹经济主义时，解放军挺身而出，反对经济主义，军事接管，夺了权，对铁路、工厂起了很大作用。接管后迅速恢复了生产。部队在支左过程中，把毛泽东思想带到那里。与同学一起学习毛著，他们作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红卫兵战士都应该看到这些伟大成绩。如果不看到这些，就会迷失方向。但是，解放军在有些单位支左过程中，出现了毛病，如青海、四川、内蒙就出了毛病。少数是坏人操纵的，多数是具体工作同志对两条路线斗争不了解，对运动不理解，对他们来说应该很好的认识。但我们认为多数是认识问题，跟不上，不能这么简单的看问题。这个情况，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情况就可以理解。出了一点毛病怎么能说是刘邓司令部的，你们就是一直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的吗？蒯大富就曾经犯过很严重的错误，错误不小，你们的错误比他的小，谁还有不犯错误的？大风大浪里学游泳，谁还不喝几口水？我想你们这回回去检查一下，看是否都正确。我小时学游泳喝了不少水，我

们不能因为现在正确就看不起人家，否则就会走向反面。我就犯了很大错误，叶向真我曾经认为是左派，但看错了。你们为此就能说我就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你们不会这样说的，你们对我好。（张春桥插话：上海蔡祖泉开始有些“保”，后来自己改正了，我说了几句公正的话：“既然人家改正了，就不要揪了。”人家说我是蔡祖泉的后台。）

戚本禹：什么东西不要乱上纲，否则就不好办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不要看成一大片，这样就会打击群众。我们自己喝了一些水，也要允许人家喝一些水，他们是老战士，你们是新战士（傅崇碧：我们也是新战士！）解放军犯了错误，你们要指出，但不能一棍子打死，怎么样，谢副总理？不能光允许红卫兵喝水，就不允许解放军喝水？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不清），我们中国人民靠什么？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要爱护这个军队，象爱护眼珠一样。解放军是光荣的，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没有她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四大”要靠解放军来保证，我们现在打倒刘邓，苏修是吃干饭的吗？没有解放军苏修早该进攻了。彭、罗、陆、杨正是和苏修里应外合，有些情况这里不必说。没有人民解放军，苏修就会捣乱，在任何地方都不要不爱护解放军。李钟奇本人也说：“这些小将很好，打倒我，我也不打倒你。”因此我们更应该爱护他们。解放军有他们的具体困难，他不能轻易地发表意见，无论如何不能做不利于他们的事，你们不要要求他们象你们一样。李钟奇是我们部队的一个好同志，是好样的，是革命的，我们不能拿红卫兵的要求来要求他。

有些地方对解放军不分析，把支流当主流，这是不对的，把解放军的事，公布在大街上是不对的，我们不赞成。不加分析不对，不能说青海不好北京也不好，有些地方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后来又请罪，又承认错误。林彪同志说：不要请罪了。现在又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就更错了。有些保守组织更危险。军队内是有坏人，但是是极少数，有些地方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是同心协力，而把他们当成打击对象，不把他们当成阶级兄弟，这是错误的。林副主席当国防部长以后，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取得了伟大成绩。毛主席提出的口号：“向解放军学习”不是随便提的，就因为解放军好。毛主席从来没有提向四川省委学习，向旧市委学习，现在象轰西北局那样轰解放军大方向对吗？！毛主席号召向解放军学习，你偏轰，大方向对吗？！解放军在青海支左问题最严重，但在全国绝大多数是好的。别的地方怎样估计，一定要看主流，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方法不是革命派所采取的。要全面看问题。我建议你们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不然就会重犯历史错误。你如果重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和解放军的矛盾公开化，那就不错才怪？！那时就不好对你讲话了，因为已经有先例。

上次有些学生冲国防部，刘志坚要镇压，结果叫我给劝阻了，第二次又去冲，也叫我给劝阻了，第三次还去冲，就不好说话了。如果哪个部队有错误，人家正在改正，你还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别人就很难办了。这点我希望同学们注意。最近我发现中学生水平很高，但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大学比中学高。（群众：蒯大富可不高！没有调查胡乱支持。）蒯大富的问题你们可以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就允许人家改正嘛！（群

众：他怎么老错呀？！）刘刚给红代会贴的大字报不好，他只要收回就可以。（群众：有人说李冬民是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亲联动……）我不赞成说李冬民是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李冬民是反联动的嘛，他怎么能亲联动呢？但不能去反对刘刚，她也是好同志，大家通过讨论分清是非就算了。我建议你们两边不要再算这笔帐，不要再打了，好不好？你们对解放军和军训提了很好的意见，李钟奇支持你们，但贴李钟奇的大字报不是有功，傅崇碧不要整他们，他也不会，他是好人。两派不要互相埋怨了，我看你们有些同志还不如五六百年前的好汉，那时候没有毛泽东思想，不打不成交，李逵和张顺打架，后来宋江来了，说别打了，都是弟兄，上山喝酒去。你们不要去喝酒，但你们一定要联合，你们不要一点毛病就算老账，否则太对不起毛泽东思想了。那时李逵没有读毛选，毛主席语录一条也不会背。

现在新北大公社和地质“东方红”打架，我特别不满，干架，你们都是一家人，你们内部有矛盾，可以和稀泥，内部矛盾分清是非，就要和稀泥，你们不要怕和稀泥，这不叫右倾投降主义，这不叫和稀泥，他叫，你就和吧，你别怕。

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解放军，解放军从在井冈山建立到现在都是正确的，敌人很害怕，威震天下。不能给解放军抹灰，我们一定要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解放军，眼里有沙子，我们应帮助洗掉，不要把眼睛挖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反帝反修的工具，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是大的错误，就象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一样。解放军是人民的一切，没有

她就没有一切。我们要向解放军学习，个别的部队领导同志有错误要帮助他们，但极少数军队坏人可以轰，象罗瑞卿和他这样的人物就可以斗争，因为他不能代表整个解放军，因为他是反革命两面派。（谢副总理说：“是国民党。”）你们可以轰，轰得对。我们从来没说不对，但不能轰解放军。一个意思，不能给解放军抹灰，有错误有缺点内部解决，如果他们不接受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反映。

另外，我们希望同志们注意，中央文革不赞成大批同学出去，你们应该发一个通知，不应该再派人出去了。因为中央有明文规定，停止全国大串联，这是中央的指示，请遵照执行。可派几个红卫兵记者，但不要以中央文革的名义，了解一下情况就可以了。

（二）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林彪同志最近有个录音报告，以后再讲。林彪同志说：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不搞阶级斗争就不是共产党。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着阶级斗争，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阶级烙印，我们要自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事物，指导行动，离开阶级斗争观点，就会犯绝大的错误，我们就容易看不清方向。对每一个问题的评价，对每一个问题的看法，如果离开了阶级观点就是错误的。如对待出身，青年等问题。青年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有资产阶级的，干部子弟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应该用阶级观点来贯穿中学运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知道，中学运动一直就围绕阶级路线在争论，开始是反动血统论，后来是反动的出身论。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仔细讲究了这个问题。

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也必须用阶级观点来对待成份。毛选一二七九页说得很清楚：“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这两边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开始是反动对联的出现，唯出身论，伯达同志说，这是封建的。但这不是独创，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也讲血统论，它认为德国人血统高贵，日尔曼人血统高贵，蓝眼睛的人血统高贵，黄种人血统低贱。古代也有，帝王将相的儿子血统高贵，奴隶的儿子血统就低贱。由于这种宣传长期统治人们的头脑，劳动人民认为自己的命运不好，不敢造反，农民起义领袖认为要请姓刘的作皇帝，因为姓刘的命运好，这是骗人的。现在有些人，接受了这些反动的血统论。有些人长期做官当老爷，影响了自己的子女，使他们自己认为血统高贵。人家不同意他，他就“打、砸、抢”来压人，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他们生活条件优越，忘记了劳动人民，走上了反动血统论的道路，所有的同志，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更要特别注意，但这悲剧还没有结束，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觉悟，还搞“打、砸、抢”，有些人被关到公安部，有些人还没有放出来。

清华附中红卫兵写过“三论”写得比较好，我对他们有感情，就到他们学校去了。找他们座谈。会后他们散发传单，说我没有汽车，坐王力的汽车，还不知从哪儿听说我是十七级干部，说他们家趁俩。我没有汽车，我很高兴，他们分三、六、九等真可悲！”八一”学校的同学，连玻璃自己都不擦，出来见有人扣子没扣，就说是流氓，把人打一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确实很可悲！还和他老子一块看帝王将相的影戏

受影响很深。做了廿世纪的唐吉柯德，他们还想翻案，说什么十年翻案，二十年掌权。我看他是掌不了权了！

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我们不少唯成分论者，我们号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风大浪中改造思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们本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群众：中学文革报已被取缔。）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想，（群众：现在有些学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统论），说明有些人在反对血统论时想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我们要注意这些。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席的两点：既对唯成分，又反对忽视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

(三)中学红卫兵的光荣战斗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对刘邓路线的大批判，每个红卫兵战士都应积极投入这个大批判，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学的斗批改，打倒联动。昨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汇报》的社论，中央文革小组认为这个社论是好的，向全国推广。听说有人不赞成这个社论，向《人民日报》社提意见，提意见是可以的，我们表示欢迎，但这个东西是正确的。上海女六中小将的作法是有普遍意义的。有人不理解。有些学校大联合还要经过一个阶段，现在多数学校分为两派，有的是革命派与革命派；有的是革命派与保守派；有的是革命派与反革命派（联动派），革命派与革命派有原则与非原则的问题，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摘桃子的问题。有些革命派不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这是错误的。为个人摘桃子不是无产阶级思想，而是资产阶级思想。有些作法不对头，“私”字当头，不能团结，这错误不小。他能代表无产阶级摘桃子，我们就拥护他，如若代表个人或小团体，上纲的话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些作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学习。革命派要联合，完全按《文汇报》社论办事，为什么要打内战呢？革命派与革命派应按社论去作。

革命派与保守派。有的派比较保守，全部检查这个方法不好，应该通过自己教育自己，革命派和保守派也可以联合，要在批判刘邓的基础上联合，把批判刘邓落实到学生是不对的。保守派保了几天也保不了。就是对错误有所认识，落实到保守派组织和班上也是不对的，不应该把矛头对准人。革命派和保守派联合也应按《文汇报》社论搞联合，时机不成熟，以后再说。革命派和反革命派（联动）不能联合，如果联合就是和

稀泥，你喊“刘少奇万岁”我就不能和你联合，这种必须认识错误。必须用实际行动批判联动。但对于一般成员与头子要区别开来，多数是受蒙蔽的，和顽固分子要分开，不是和他们联合。对于这点《文汇报》社论没提到，除此之外，《文汇报》社论适合一般情况。中学的任务是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要好好学习主席著作，认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刘邓路线的毒害。

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要与本校的内部斗争结合起来，斗争学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与刘邓有关的。大批判、大联合也要结合斗、批、改。在进行斗、批、改的工作中，大中学校要有典型样板，将斗、批、改搞得象个样子。现在很多学校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清楚，现在打内战大方向不对。在斗、批、改方面必须有经验。清华大学没有，你蒯大富太不高明，你们学校也在打内战，现在“井冈山”某战斗队又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蒯大富没有领导好，你怪谁？怪你！本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应该好好学习。

《红旗》是代表党中央的，不是代表林杰或某一个人的。学校斗，批，改很重要，你们能作好就是完成了大任务。中学革命派必须大联合，在大批判中提高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在批判斗争中搞联合，我们不要打内战，最主要是参加大批判。通过大批判，在大批判中内部问题必须解决。

中学红代会不要学习大学红代会，他们那样不好，反刘邓路线没那么大劲儿，可打内战却那么带劲儿！放着整个刘邓路线不管，口号喊批判刘

邓路线，可实际上不管。现在你们中学内战还在扩大，联动不管，却打内战。谢富治同志很生气。他是个老好人不爱生气，但也生气了，生了很大气。地质“东方红”，新北大公社打得火热，对联动，中央文革提了好几次，让你们调查你们没干（群众：兵团战报没有反联动），应该写些批判联动的文章在小报上发表，不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兵团战报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同意。（群众有人说：红代会是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我认为红代会（中学）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时群众较乱，群众：大家安静一下，听首长讲。）我不是首长，他们二位是首长，我是普通工作人员。四中杨××来了没有？（说：来了。）你能给联动作些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吗？（杨：我不认识联动的，也找不着）联动讲“老子英雄儿好汉”，你老子是英雄，可以和他们多接触，但你不一定是好汉。你可以请些大学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帮你作些工作，让联动的老百姓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敢不敢？（杨：敢！）不要怕！好了，我就说这些！好不好。

张春桥同志讲话：

我没有多少好讲的。我们商量过的戚本禹同志都讲了。我讲一点意见，全国红卫兵都在看着北京，我既在中央又在地方，主要在上海。你们住在北京，对全国红卫兵不大考虑。去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今年中央决定不串连了，全国红卫兵不能到北京来了，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对全国影响很大，我这几天在北京有一个感觉，大学、中学的红代会都成立了，我们希望你们一定走在前面，随时给我们提供经验，

成为我们的模范。我说几句心里话，这两天我真有些担心，大专院校那样打法是错误的。

有同志递条子说炮打李钟奇不是炮打解放军，刚才戚本禹讲了，李钟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李钟奇是好同志，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十六条已经讲过。要把讲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人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严格区别开来，今后你我都会说错话，现在满街都有说李钟奇是联动后台的大字报，联动后台就是反革命，那你还不如说他是反革命。

有的同志递条子说今后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力，我希望同志们不要压人，这是一个大辫子，你们整人家，下次就批评你们，我们要讲原则。我们的意见并不强加于你们，我们所谈的问题都是大问题，望你们考虑。现在一定不能离开大方向，离开一点，航向就错了！有些单独看来还是对的，但要和大方向联系起来看就不对了。我没有更多的话，我希望首都大中学生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全国作出榜样，全国都会跟你们走。你们一开红代会，全国都在准备开红代会。红代会的大方向应该肯定，你们要求改组，我不了解情况，我们常常在念一条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只要大方向对，不要怕有缺点，有错误，已经做了的就不能象文章一样改来改去，我们可以经过共同努力，搞好一些。现在天津也正在闹这件事，三个会，中学闹得最厉害，里边有缺点，我想这是难免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搞得那么好。我们也希望你们在这方面搞好。总之，我希望你们能成为全国的模范，全国的榜样！

谢富治同志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刚才戚本禹同志和张春桥同志都代表中央文革讲了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依靠群众，依靠解放军，依靠革命干部的三结合。依靠群众，当前最主要的，就是依靠革命造反派。三依靠，依靠解放军不可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的军队，在保卫文化大革命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错误，有缺点可以在内部提，这条很要紧。我们要对解放军有正确的认识。

有人递条子说炮轰了李钟奇应不应该检查？炮轰了李钟奇要以高姿态自我批评，我看不必了，轰一轰对解放军也有好处，今后不要再轰了，明天不轰就好了。解放军对你们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检查了。（戚本禹插话：愿意检查就检查，不强迫。江青同志最近坐汽车在北京转了一圈，看了炮轰李钟奇的大字报后很不满意。中学红代会应用大字报给糊上。）我不同意检查，我不同意，不同意轰李钟奇的人压轰李钟奇的人。另外，别的同学也应高姿态，不要再提这些人贴大字报的事了！我完全同意刚才两位同志的发言，刚才张春桥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张春桥主要在上海，他讲这番话是为了北京，也是为了上海，伯达同志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北京红卫兵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北京红卫兵要在这场大风大浪中继续起带头作用。首先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站在中央文革小组一边；坚决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这点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起了作用，特别是当前同刘邓的斗争必须彻底打垮，搞臭联动！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也要结合斗争彭、陆、罗、杨，旧市委大大小小反

攻倒算的人和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学运动的关键，同联动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打胜，必须从理论上、思想上把联动思潮批深批透，从组织上把联动打击瓦解，联动的头头儿还没有完全打败，他们还在活动；同时要把联动中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

对联动，中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须相当努力。内部问题应该内部解决，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全力对敌。大方向一致，小问题保留，千万不要转移大方向！犯了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但只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得到解决。今天来的人很多，戚本禹同志也讲了很多，没有听取群众的意见，时间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再讨论了，明天回去再讨论吧，就这样做了。

傅崇碧同志讲话：

同学们，刚才戚本禹、张春桥同志和谢富治副总理讲了，我认为同学给卫戍区贴大字报是好事情，对我们是一个鞭策，我们认为很好。有些意见我们认为很对、很好。我们一定要改正错误。前一段军训时间长了点，（即每天时间多了点）有些学校强行推行延安中学的经验，我们有些人说了一些错话，我们欢迎大家批评。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欢迎大家提。我们已经找负责军训的同志作了一些整顿，我们犯了错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你们对解放军是爱护的，但不要在大街上贴大字报了，可以把大字报送到卫戍区，送给我们。已经贴了大字报也没什么，改了就好。贴了大字报的人也要放心，解放军把你们当革命小将看，不要想得太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解放军坚决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坚决批判刘邓，把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垮、斗倒、斗臭！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批评一下没什么，有问题多联系，多帮助。

（精神符合，仅供参考）

45)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4.14

〔时间：下午〕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

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

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上海很有希望”。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把大、中学的学生动

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一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就是九个工人组织了一个指挥部，抓起来的。他们本领够大的了。就这么九个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你说这九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也不见得，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

曹荻秋，是那些局长、党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旬，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竟属于那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它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

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

再讲一个对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局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是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市委在开头就利用上海市委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利用毛主席领导批判《海瑞罢官》时造成的好影响，迷惑了群众，迷惑了干部。又强调“组织纪律性”啊，“内外有别”啊，害了好多干部，好多党团员。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解放这批干部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也是群众问题。究竟实行什么路线呢？能包办代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搞“三结合”，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施令是没人听的。“三结合”，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过程、斗争的过程，不能随

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特别是有一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江青同志上次讲话中说到陈丕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很难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谈到了，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对他做了那样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还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必要时，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的很大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个饶漱石。

（江青同志：所谓请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候完全可以出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他可以很主动，但后来越陷越深，没办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他的话，都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这个人，我们过去也了解一点，但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后

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的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发出来了，《紧急通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制可能改变，谁要违反要以反革命论处，但他在十一日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十六日他还给“红革会”签发一万块钱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转移到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犯罪行为。他到处藏，最后藏到那里，我给他打了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怕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了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总觉得他过去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对革命有利。但现在毫无结果。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一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错？让他在小会上检查，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的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他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副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好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给他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里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限。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表现好，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

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是真正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一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一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而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了广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干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

考验的。它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有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的警备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从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那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一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那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确实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份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太难的。我们自己也还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

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46) 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04. 20

【张春桥同志代表五省、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战友们！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也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我们，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和上海五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应邀参加这个大会，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受这五个省市革命委员会和革命人民的委托，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北京市的革命战友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战友们，北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走在战斗的最前列，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建立了特殊的功勋。你们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动猛烈进攻，取得了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你们贡献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你们发起了震撼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你们热情地接待了来北京串联的一千多万革命小将，你们还派出了成千成万的红卫兵战士到全国各地，把毛主席的号召带到全国各地，把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作风带到全国各地，同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结合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遍全国。我们各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同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全力支援，同首都红卫兵小将们的英勇奋战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向同志们、战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斗争高潮中。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正在全国兴起。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大的鼓舞。我们深信，这个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一定能够领导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走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前列，对夺取北京市和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更出色的贡献，一定能够把我们伟大的首都，建设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永不变色，成为全国的模范，世界的榜样。

战友们，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我们是在一条战壕里向共同的敌人作战。我们各省市代表团在北京期间，学习到了很多很好的经验。特别是你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过程中所创造的新经验，你们建立工代会、红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的新经验。今天我们又听了谢富治同志的报告和各方面同志的讲话。我们将继续向你们学习。你们也一定会象过去一样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彻底胜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肩并肩地奋勇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47)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舞蹈学校部分 师生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4.22

《丛中笑》战斗组的成员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说：“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张春桥同志），现在向你请罪。”张春桥同志说：“我干吗不能怀疑？可以怀疑，炮打嘛！”姚文元同志说：“用不着请罪嘛！”张春桥同志说：“不过这里面有个是非问题。我们没有离开主席去做坏事；炮打中央文革，不都是好人，也有坏人。”

《卫东到底》《井冈山》《小学生》等战斗组成员请张春桥同志谈谈关于芭蕾舞剧《白毛女》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1964年，最初我没参加，我在搞京剧。搞芭剧《白毛女》中间那段时间找过我。《白毛女》电影始终没能搞到看。在改编芭剧《白毛女》过程中，我想看看电影和歌剧《白毛女》（以前曾经看过）两者都看，凭我自己的印象，民间的传说。我过去在晋察冀边区，《白毛女》传说也开始于晋察冀，一直到后来变成歌剧、电影。头脑中有印象，一直强调传记性的没必要了。传说《白毛女》最初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地主阶级创造的，当时要搞减租减息，地主阶级用《白毛仙姑》来

吓唬人民，后来人民将她变成革命的，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变成我们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没有进行（没听清可能有差错）现在应该高一些，不仅土地改革过去了，而且到人民公社了。

把大春和喜儿之线削弱，我过去大概说了一次，要加强阶级斗争提高喜儿阶级斗争，提高限制还可以再提高，还可以再高。喜儿比以前高要承认。恐怕中国农民不知道《白毛女》的不多，基础浓。过去有人看了电影哭了，在民主革命时期起过作用。杨白老改了后（不是我改），林默涵看了后就反对。到了陈毅、周总理看了后，我同总理说：“林默涵不同意”，总理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支持改”。去年春天，阶级斗争联系到喜儿、杨白老。武装斗争原戏看不到，想通过大春人物情节联系起来考虑，通过大春把八路军形象突出，党的领导我也提出。最初谈了这些话，看戏时也提了意见。最后喜儿同大春分手了，电影结束在劳动上，这是小农经济的劳动，让喜儿去参军吧，斗争未结束，喜儿自己解放了，没有真正解决农民问题，经过这么一场大斗争认识提高了。就提过这么一些意见，你要问我自己记不清。

这戏比原来电影、歌剧应该承认提高了，缺点吗，里面缺点还是有，在这个基础上再想想，还可以提高得多。人对事情的认识经过这么久，尤其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对事情的认识的提高，可以提出许多设想，我听过观众的意见，说四场变来变去看不懂，可能有艺术上的问题，喜儿一个人在深山里怎么办？一个人总是难办的，有人说黑《修养》（开玩笑）一个人锻炼修养有没有办法增加一个人？增加一个人又出现问题，喜儿

不会成为“白毛女”了。因为《白毛女》有个限制。芭蕾舞剧《白毛女》比电影改了许多，还可以改，不要否定一切。说大毒草，无论如何不妥当，否定得太多。如果这是大毒草，那电影、歌剧更是大毒草，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的成绩否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有一批文艺工作者作了很大努力，尽管后来有部分人变坏了，有的当时不好，现在也不好。今天看那时的有些作品，水平是不高的。譬如“小放牛”。当时有些作品水平不高，代表我们革命文艺初期的萌芽，而且我们也加过工。十七年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的事，统统否定掉，每一件事人民在行动、创造的，包括你们总是愿意按照毛主席文艺路线，一方面成绩那么大，一方面问题又那么大。“不争朝夕”杨永直写的我提过意见的。他始终不改，我也没坚持不是非改不可，但提过（七场的似梦似醒）提过一些意见记不清楚了，不要否定一切，说大毒草是敌我矛盾，如果承认它的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作彻底地修改没有问题的，闹翻天都可以。《智取威虎山》京剧同64年水平相比，64年水平不高，现在高得多，似乎×个人物改了，场次改了但并不等于64年戏是大毒草，我们经过思想水平提高，重新搞可以说大毒草就去掉了，就不能改。你们那时偏急得很[某《卫东到底》成员说：“将古老芭蕾进行革命中央肯定了，对我们是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不能骄傲和自满，另外我们要来开座谈会”]春桥继续说：跟我们开可以，你们一块开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组织派别，只要不是恶意攻击，争论很激烈尖锐完全可以，你们要知道善意的也可批评得很尖锐啊！（某

《小学生》成员说我们这儿有毒草，香花派。全场同志笑了。）发表不同意见反面意见受压力大。

春桥同志说：有一点压力没有关系，你们受到多少压力，要是你们发表意见没有反对有什么意思？热烈地赞成也是压力，说多少好，多少好将来就要摔下来，讲政治标准时，讲我们自己东西时，要有正确态度。这是你们有缺点。基本倾向好，说要爱护它不容易，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差一点就被打下去。《红色娘子军》是陶铸、王任重提的反对意见。原来海南岛《红色娘子军》最后全部被打垮，连长同指导员最后都叛变了。”琼花”的名字在海南岛这样的名字很多，有的说《红色娘子军》是歌颂叛徒的，你们总不是叛徒，后来我们反对陶铸的意见，为了避免那个将”琼花”改成”清华”。”琼花”在海南岛有好人坏人。总给我们作为一个榜样，作革命戏，要保护，尽管是这么大问题。那时他们陶铸等还没揭，我们还是没听，搞了这么久，艺术上独立了，将名字隔断了，那时要打下去很容易，说歌颂叛徒就完了。我觉得在这点上你们有缺点，把杨永直等搞得拉在一起，如真琼花和假琼花混在一起，他们派人去调查，我们也去调查，结论差不多。《白毛女》也是这样，这个剧去掉，电影、歌剧都要去掉。要爱护它。在这个前提下，你们闹翻天也没关系。姚文元同志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六稿，七稿，争论激烈也没关系。当时你们改《白毛女》的时候（上海一月）也不看看社会环境怎样，人家在攻，你们也攻，我们当然是可以批评自己的东西的，但是敌人力量来攻我们时，就不能作自我批评了，那时就应说好。我们从来不回避自我批评，上海每个里弄写 500 字，那

加起来缺点可写几十万字的一本，但是要看什么情况下。比如讲中国文化大革命，先讲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们好得很，在苏修面前不能讲我们有缺点的。你们在一月份至少没有看清什么环境，人家攻（姚文元同志说：特别有人攻到江青同志、总理）什么周××，江×，这些在北京要挨打的，甚至抓起来，怎么能攻江青同志？再攻下去是毛主席了，你们攻江青不行，最多攻我。（大家齐回答：也不能攻你。）

姚文元同志说：“对戏的争论，怎么你们有同学说保卫毛主席重要，还是保卫江青重要？我说现在还不能相信。”（某《井冈山》成员说了这方面的情况。）

张春桥同志说：“还是叫陈×同学回来，住在这儿路费公家报销，还是应该叫他来，昨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他们开个会。联动带个大口罩，夜里秘密活动干吗？给他们一间房子，挂个牌子‘联合行动委员会’，公开嘛。（姚文元同志说：工商联和民主党派不也让公开嘛）叫他们拿出政纲来，对联动是这样，何况陈×，陈×无非是提大毒草，叫他回来，这样可以教育大家，也可以教育他。”

你们双方经过争论有很大好处，在上海希望你们争起来，要是我们一讲话，就将你们压下去。（《卫东到底》，某成员说，具体问题还没真正开过辩论会。）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可以开辩论会。”

（有人提到陈×首先刷标语之事）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可以批评他，他要刷你有什么办法，他也可以刷嘛”“陈×不象孩子干的事，这个青年……”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对学生，我们始终相信绝大多数青年会跟毛主席走的，不会反对中央文革，不会反对我们的，我们不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会被打倒。有的很猖狂，适应了资产阶级要求，在夺权的关键时刻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象大水来了，卷进去了。”

（有人提到潘国平负责之事）

姚文元同志说：“以后潘国平不要插手了，不管芭蕾舞的事”。

某《卫东到底》成员说：“我们对首长给《白毛女》指示都不清楚。”

张春桥同志说：“对你们我也有责任，一直没跟你们谈。”（问顾××同学）“你怀疑我几天？”

顾××回答：“七天”。张春桥同志笑着说：“七天不要紧。”

张春桥同志对《小学生》《井冈山》《卫东到底》等战斗组同志说：“对喜儿的事你们可以考虑，喜儿被抢走，杨白老被打死。改好这个戏经过广大工农兵审查，把好的集中起来再加以分析看看那些可以接受。工农兵意见各式各样，他们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有的是萌芽，从细节带出许多问题来，希望你们一方面保证演出，另一方面提意见，现在不可能马上改，江青同志现在很忙，不能马上开座谈会。江青同志她要想，如果

要改戏就不能只看一遍，江青同志很忙，待上海秩序，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一些，请江青同志到上海去住。”（全体热烈鼓掌）

现在你们两派可以不存在了吧，不再坚持不再分了，如果个别同志要保留大毒草，那不成为派了。希望你们双方都接受教训，不要到什么时候又刮起来“北风吹”，被风一刮一会儿偏这儿，一方面偏哪儿，大水来了，我作个旁观者不行，双方要接受经验教训，两个月前你们讲接受不了，现在谈比较容易谈了。

（大伙儿谈到这次总理没来看戏）总理是看戏积极分子，现在还没回来（群答：已回来，赶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还讲了话呢。）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先保证演出，改的问题可以在内部酝酿，不一定等。江青同志已在考虑了。四月十八日看戏时已经发表了，她是内行，艺术上考虑，不一定在今天详细地谈。《白毛女》这个戏不是绝对地完美，世界上没有完美，越是好的作品越要修改，无非是从内容，形式方面考虑，想办法将阶级斗争，武装斗争怎么搞得更突出，喜儿的形象塑造，江青同志谈了形式上服装的设计，颜色太‘深’色调，颜色上要重新考虑。江青同志认为偏蓝偏紫，有些地方之色调不明朗。大春的绑腿太短，显得腿太短。绑腿高一点，显得腿长，如绑腿高动作起来不方便可以绑松一些。现在我看未必急于去改，把它搞好。现在的京剧《海港的早晨》的背景变成‘一月革命’，但不能说以前的就是大毒草。”

张春桥同志对顾××说“你演喜儿的可以继续发表意见，”又说：“你们提出修改方案”。

有人提我们要批判黑《修养》，张春桥同志说：“等你们内部争论缓和点才能搞黑《修养》。你们时间安排一下，保证演出，还要保证一定的练功时间，舞蹈学校将来怎么办？一方面要接近工农兵，另一方面有特殊性。”

《卫东到底》某成员说：“以前我们下乡才三星期，又挑中了农闲时分等等。报上宣传我们深入工农兵群众，和工农群众建立了深厚友谊等等，老吹牛。”张春桥同志笑了。……。将来都要考虑。

张春桥同志说：“文艺界的特殊性，同工农兵要结合，又要考虑特殊（练功）整个问题我没好好考虑，腿娇怎么办？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就不能接近工农兵，我们又要接近工农兵，又要练功，不练功不行。象京剧演员我看《智取威虎山》老担心翻不动，站不稳，这样非要出工伤事故不可。”

你们安排一下，广州还是要去的。

姚文元同志问：“你们这里共演几场？”

众答：“十几场。”

张春桥同志说：“希望你们不要象以前那样（指那次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上台来，我们拥上去）千万不要再拥了，否则以后有人来看的话，那时你们又要控制不住了。”

大家提出要求加入军委编制时。

姚文元同志说：“江青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大家热烈鼓掌）。不过有个条件等到这段搞完，等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搞完”。

春桥同志说：“你们要不愧于人民解放军，这次演出总理可能也看，不能象上次那样拥了。加入军队，我们回去再商量，可以考虑几个单位，经过整顿……”

有人说：“我们现在没有权威”。

张春桥同志说：“自己树立权威嘛，你们过去太听话，现在是向反面太不听话，再走回来可不要走到原来的位置，你们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我们希望上海几个单位搞得好一点。”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排过没有？”

众答：“没有。”

现在《红色娘子军》去广州演出了，如学不到，可以派人来排。北京芭蕾舞剧团编导，最近打得落花流水。

当大家谈到文汇报三战士写的文章，姚文元同志说：“是刘××，戴××等写，胡××没有写。可以争论社论，跟萧望东连不上，完全可以争论。”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跟你们等社论登到报上才看到。各单位，剧团，学校情况不一样。一方面文艺界搞文化大革命，另反面还得出去一下，（到工农兵中去）什么时候去可讨论。”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还要有点雄心壮志，上海的纺织女工，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呢？”

张春桥同志说：“找个比较好的小说，找个已经承认的，观众已经熟了，搞个芭蕾舞剧，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编剧。”

《小学生》《井冈山》提搞《刘胡兰》一剧。

张春桥同志说：“今天不定这个好吗，现在搞一个社会主义现实的，如再搞一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无论如何要碰到《白毛女》的问题，《白毛女》同“雷锋”同样品质，可以同雷锋同样高，但观众看了，无论如何认为《白毛女》不高，《白毛女》品质高，但没表现地方感觉离群众远。”

选择题材有的适合电影，有的适合歌剧，各剧种有长处和短处。《卫东到底》某成员说：“过去宣传《白毛女》多，超过《红色娘子军》”。

张春桥同志说：“多吗？那和我有关系，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我有意压低一点（京剧会演推迟到十月，文化革命推迟……没听清）宣传多，宣传怎么怎么，观众看不过如此，再猛攻一下我们就很被动。人家说上海怎么怎么好，我们自己少说一点，那时有意不多宣传，（京剧）那时对《白毛女》我也说过不要多宣传，宣传多我有点不放心。因为中央负责同志，江青同志都没看。”

《卫东到底》某成员说：“某本舞蹈杂志里登的六六年四月十八日纪要，未提《白毛女》是样板戏，但里面是《白毛女》，里面内容又是说《白毛女》好的文章，好象在那里围攻江青同志”。

张春桥同志说：“他们围攻也影响不到江青同志。”又说：“原来写纪要（一九六六年，四，十八解放军报社论）将《白毛女》写上去可能有这个想法。纪要写的时候，去年二月还改。（刚刚立起来）原来说《白毛女》就不要写上去了，江青同志那时也没看过。”

有人提到原来报上余晋元写的一篇有关《白毛女》文章，问“元”是否姚文元同志。

姚文元同志说：“不是我，但这件事我知道的，好象抽几个人去搞，登在人民日报上。”

有人说：“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拍照就不拍嘛。”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要真正学好毛主席著作。”

某《卫东到底》成员说：“喜儿现在是一种自发反抗。”

张春桥同志说：“是啊！”另外还说：“那时写部队纪要名单（样板戏）考虑到江青同志没有，原来先要写后来我说不要写吧，江青同志没看过，江青同志说过“白毛女”她支持过，她提过意见，柯老也支持（这段没听清）江青同志是同上海恽迎世谈的。”

石西民最初对“白毛女”不赞成，不太欣赏，反对加伴唱，“白毛女”这么大的音乐基础难。《红色娘子军》音乐没过关，搞好一个作品难，想办法逐步提高。芭蕾舞剧《白毛女》黑帮利用是一回事，不要黑帮那一条线，将舞剧同电影，歌剧比较，想办法创作今天工农兵的舞剧，《红色娘子军》反映的是兵，《白毛女》反映的是民，如果搞新的创作考虑纺织工。外国芭蕾舞男演员少一点，我们的芭蕾舞不是一个完全不变的。

希望男演员努力一点（笑）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说：“行了吧，走了！”

握手，再见！

48) 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军区机关以上 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5.05

张春桥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你们好！

我和姚文元同志这次到济南来，刚才杨司令员讲了，是毛主席决定的，是上个月，即四月二十九号，毛主席当时看到济南军区给中央的电报，讲这里有些问题要求中央能派人来。于是，毛主席就决定要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来了。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还有中央其他同志都在场，毛主席并指定我们，说你们到济南后就住在部队，住在济南军区，主要的是要帮助一下部队同志。这样一个事情，很能够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对山东的文化大革命，对济南的部队、对山东的部队是非常失心、非常爱护的（掌声，欢呼声）。我们来到济南以后，刚才杨得志同志已经讲了，主要的是和军区的同志开了三次座谈会，听他们的意见。到会的有几十个人，另外，还找省革命委员会的八名常委，后来，又把部队的同志和各革命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这三方面凑在一起，开过一次座谈会，送一次会干的时间很长，从下午二点半开到夜里一成半。另外，我们还收到了很多信件、传单、报纸、刊物，数量很大很大，我们尽一切可能看，但是随看随来，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完。在这些信件中，有的是直接要我们转送北京的，要求我们送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江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其他同志的，我们准备凡是写给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写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和中央的，我们都负责的把它送到北京去。在这些座谈会上，我们一开头就讲了，可以什么话都讲，各种意见都可以谈，包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批评，对中央的意见，也可以谈。言者无罪嘛！但也只能限于在那小范围里谈，有些话如果拿到大街上那就不妥当了。所以会上的谈话都是比较深入的，而且很坦率，什么话都讲了，只是最初的时侯，谈话都很激动，很多同志过去打仗的时候没有流泪，而谈起目前碰到的许多问题时就很伤心，哭了，后来慢慢地情绪也就平静了些，我们也就是在这个条件之下，才把军队、革命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这三方面的代表找到一块谈话的。如果第一天就把这三方面找到一块。那很难谈啊。到最后三方面在一块谈的时候，我们觉得整个会议的气氛还是很好的。造反派的许多小将们，谈的也很好，他们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部队的同志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王效禹同志和其他同志也讲了话，也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这样对调整我们的内部关系，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本来想找更多的同志谈谈，但时间来不及了。因此，还没有能够听更多同志的意见。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还很不够，特别是你们在工作里边的成绩，你们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方面的经验，都还没有来得及谈，几乎都是谈分歧，谈对各小方面问题的意见。同时到现在的止，我们和各小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见了面的也只有两三个人，其他的人都没有谈话，对他们的意见我们听的还很少，听的很不够，再加上我们的水平很有限，经验很少，因此，今天来讲话感到有相当的困难，很可能讲不好，而且，可能讲的对你们没有什么帮助，或者

还会讲一些错话，这都是可能的，不过我们是同志嘛，我们可以交换一些意见。我们听了一些同志的意见以后，我们虽然还不可能对很多具体问题马上发表意见，这个现在还不可能，不过我们想着就我们所知道的。在全国所碰到的一些和这些类似的问题，根据一般的经验也根据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一些情况，说一点意见，好在这些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在大的原则上都有明确的指示，如果讲的不对，完全可以纠正。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因为据我了解，上一次中央军委干部会议的精神虽然你们已经传达过了，但是学习的还不是很深入的，这一次军委会议，也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详细的传达和讨论，因此我们感觉到现在有些同志对目前的问题，思想一时搞不通甚至有一些看法不完全妥当，这也是没有什么奇怪，是很难避免的。

有的同志问现在形势究竟怎么样？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管是全国还是山东，以总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大好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计。讲它好，并不是说我们总是爱讲好听的，而是说我们应该看到形势确实是大好的。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的革命群众进一步地发动起来了。因为这个革命是个伟大的群众运动，看这个运动的形势好不好，主要的是看群众是不是发动起来了，特别是《红旗》杂志发表了清华大学的关于“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那一个调查材料后，那个调查中间提出来批判《论修养》这本书，接著戚本禹同志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以后，全国的形势就更好了，群众情绪很高，一个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轰轰烈烈地

开展起来了。但是这个运动还会进行很久，我们还需要进行很多很多的工作，不过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和这个时候差不多前后，四月六日军委又发表了十条命令，这个命令发表以后，把我们前一段工作里面所碰到的新问题恰当地解决了。这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全国的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地方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说很不平衡，是说有的地方已经夺了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讲省市一级，到现在是六个。夺了权的省市革命委员会那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他所面临的问题和没有夺权的也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但就是这六个省市发展也不平衡，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还有些地方是实行了军管的，比如我们华东地区安徽、江苏、浙江，已经军管了，福建已经决定军管，江西也军管。这样华东就只有山东、上海两个革命委员会，其余的都已实行了军管。有的地区比如华北地区，北京和山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他的地方也还没有军管，也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还在那里酝酿，有的地方也可能军管，有的地方也可能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在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关系处得一直比较好。比如像黑龙江省，那个地方的军队，省军区他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很早，可以说从去年八月就介入了。潘复生同志，就是他们现在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原来黑龙江省第一书记，他在保守组织攻击他的时候，他没地方休息，就是到军区去休息的，军区支持了他，所以他们的大联合，“三结合”，实际上是从去年八月就开始联合、开始结合了的。因此，他们现在的关系，据我们了解，双方相处一直是比较好的。也有些地方开始是比较好的，但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些问题。问题大小不同。山东

省的形势，总的来看，也是好的，大好的。这一点，那天三个方面的同志在一块谈的时候，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山东也是夺权比较早的一个省，“二·三”夺权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同时是现在全国仅有六个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个，所以有这样一个好的形势（我们在座谈中间，同志们都谈到），这是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有党中央的支持，也是山东的革命群众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所得到的结果。同时大家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一致地、毫无分歧地认为山东的夺权，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驻在山东的部队的积极的参加、积极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大家一致的认为，在夺权斗争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在这里的部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分歧，都是一致的。因为确实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革命，他都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而政权那是和武装力量分不开的。我们 1949 年以前，中国无产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组织了自己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这样就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十七年以来，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有一部分政权，就是我们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中间，有那么一部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所以才有重新夺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武装部队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道理在座的同志当然会很清楚的。我们也反复的向各个方面讲过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所以能够开展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样放手地来搞群众运动，就是毛主席，也只有像毛主席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他才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搞法，全世界从来未有过。但是要有一个条件才敢这样搞，

就是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我们的国防，保卫着我们的祖国，不至于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击。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能保证我们国内地、富、反、坏、右不敢那样大规模地公开地破坏文化大革命。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哪敢这样搞！在山东地区当然也是这样。因为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且在夺权的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也说明了因为我们有军队，在需要我们军队参加的时候，采取行动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领导干部，就能够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之下，从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把权夺过来，恢复自己的权力，建立自己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在夺权以后，我们山东的部队，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五个方面，都是积极地参加了的，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像同志们所说的，大家去参加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全心全意的，非常热情，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确实取得了很大很大的成绩。支工、支农这方面的成绩没有什么争论。大家现在争论的就是在支左这一方面了。下面我再谈。但是，就是在支左方面也是有很大成绩，这是主流方面。这一点我们和三个方面的代表同志一块谈话的时候，大家也是一致的，都认为这是主流，缺点错误那是支流。有没有缺点错误呢？这个没有人否认，我们部队同志也都承认有缺点错误。如果说有一点分歧的话，就是那个缺点错误大呀，小呀，多呀，比如说十个单位是支持错了一个呀，还是支持错了两个呀？有人说是三个，有人说是四个。反正是这样的分歧，缺点错误总是有，主流是好的，这个没有什么分歧。那么说到这里好像就没有什么话好讲啦，这不是意见比较一致了吗？但是

同志们一谈到具体问题，那个分歧就相当大，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感情上的对立也确实相当厉害，我看我们说话说得坦率一点，谈起问题来距离不小，不过这个距离不是越谈越远。好在我们毕竟都是革命的同志，我们没有基本的利害冲突。不管是红卫兵小将，还是革命领导干部，还是部队的同志，这三个方面都是革命的，大家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在这些问题上谈的结果还是逐渐缓和，逐渐接近。今天是我们来了第五天了。从总的趋势来看，形势是在缓和的，不是越来越对立。我们来的当天夜里，坐着车子出去到马路上转了一圈，那个时候马路上还是相当紧张的，大标语很多很多。后来，第二天早上那些标语都没有了，你看这还不是个好事吗？！同志们，这正是说明我们互相关系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嘛。有的同志给我们送去了好多关于这方面的传单，说是出现的这种现象是杜春胜同志在半夜里去布置的，我觉得他这样连夜去布置也是好的，是对的，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我们也应该连夜去布置。因为应该正确处理我们的相互关系。现在有一个说法，说是我们革命委员会和部队之间如何如何，我说这个提法本身不太妥当吧，大家考虑一下，这个省革命委员会，她是一个“三结合”的权力机关嘛，我们军队算一方嘛，不能说革命委员会不包括我们军队。同样，我们军队谈问题的时候也不能说我们不算在革命委员会里。省革命委员会有我们的代表，是“三结合”嘛！如果不是“三结合”中央不批准的呀。现在各个方面都采取了措施，济南军区也采取了措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其他方面也都采取了措施，省军区也采取了措施。济南军区党委定了三条，这三条我们认为是很及时的，很好的。因为这样就不至于使矛

盾向更尖锐的方面发展。我们下面会讲到，如果矛盾再向更尖锐方面发展，对我们的革命，对我们的人民是不利的。在革命过程里边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有敌我矛盾，有人民内部矛盾。刚才我们学习最高指示里面念了一段嘛，遇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嘛！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据我们观察，济南军区的同志有参予夺权处理那样局势的经验，还没有学会处理这样的发生在人民内部这种矛盾的经验。这就要咱们在斗争中间，在实践中间学会它。以后还会碰到的，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永远会存在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要惊慌失措，我们有了经验就好办了。矛盾总是存在，旧的矛盾处理了，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这样，矛盾就成了我们事业发展的动力，会使得我们的革命向前进。现在我们所碰到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好了，我们的革命一定会大大向前发展。现在大家还没有经验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才只有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那是很短很短的。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文章的发表，到今年已经十年，十年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那一篇文章，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包括我们在内，也还并没有完全懂，每次重读，都觉得好像是针对着当前的问题说的，针对着我们的问题说的。我们现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不过才有三个月，经验还很少，出一些问题，甚至出一些乱子，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总结出经验教训来，那么就会变成好事。在这里我向同志们传达一下毛主席的指示。因为最近各个地方，军队在支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最近开了个会议，就是为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处理这些问题。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四月二十三日批了两个

文件。这两个文件据说已经向同志们讲过了，我想还需要再讲一下。一个就是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一个报告。毛主席作了批示。陕西省驻军的工作还算做得好的，但是也有些问题，我们采取司令员、政治委员、还有野战军的军长，一块出面，连续召开了很多次座谈会，听工人、学生对部队支左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在这些座谈会中间，学生、工人都提出了很多批评，有些批评也很尖锐。毛主席看了这个材料以后，就建议把这个材料印给这次军委会议。毛主席说：“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这是从正面向我们推荐了一个榜样，多次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听取批评。所以毛主席说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这种做法。主席在这个批件里面，还加了很多注，就是在中间写了一些话。在看到批评部队这个、批评部队那个的地方，毛主席就加了这么几句话：“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主席强调不要怕批评，这个批评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在这个过程中，在群众批评我们的过程里边，我们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有各式各样的意见会帮助我们认识客观世界并改造世界。因为我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学生批评军队的好多意见，就是一个叫李世英的同学批评的。毛主席对这个人非常熟。他大概怕部队的同志不熟悉，还在这里特别加了一个注，说李世英同学是“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主席对全国这些人物非常熟。他在这个地方特别注明。这个同学对军队的意见很多，提出军队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要明朗等等。其中有一条，要部队的同志相信大多数

干部和群众。毛主席在这一条后面又加了一个注，说“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后面还谈到这位同学讲的一些意见，就是要搞一些谈心会，开一些小组会，互相联欢、谈心，这样增加互相的了解，增强团结，增强两个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西安地区有两个大造反派，那个地方的保守派已经被搞得差不多了，垮了。现在这两个大派都是造反派，但过去就是联合不起来，团结不起来，所以就提出要部队帮助他们开展谈心的活动。毛主席说：“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就是赞成这种办法。陕西地区他们准备不断开这种会，因为这种方法把部队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可以处理得更好。所以主席说这个办法在全军都应该采取。另外一个文件也是同一天批的，是讲四川的。四川的问题，同志们大概也听到一些，错误比较大一些，抓人抓的比较多，而且还打死了人。对这样一些情况，他们送来一个材料给中央，说他们原来抓了多少人，已经放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人没放。毛主席就批了：“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中央一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就放，就把人放了。所以主席认为他们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对四川一面批评了他们，捉人太多，把一些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是另一方面又称赞了他们，因为他们改正的快。在指出这些方面的问题以后，毛主席又说：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最近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毛主席说，

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就是要沉得住气，听取各种意见，然后实事求是的是多少就是多少，公开的向群众承认错误，而且要立即改正，马上改，像四川那样。这样就取得主动啦。另外要向军队和群众双方进行正面教育，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毛主席说，我看现在这股风，（就是指上面说的一股风，说军队作的事情都错了）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一月底二月初那股风全国也是相当严重的，好多革命造反组织犯了错误。起初是革命造反组织犯了错误，但是后来军委八条一出来，部队的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自己又犯了错误。先是学生犯错误，后是部队犯错误。现在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所以毛主席就认为这次不会像二月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学生、群众他们有了犯错误的经验，上一次冲军区不对，他知道了。军队在处理群众冲军区问题上又犯了错误，有的地方人家来请罪，请好几次还不同意，检讨一次不行，再检讨还不行，把人家宣布为反动组织。这样的地方有那么几个。所以主席说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就不会像二月那么严重了。最后这一句话毛主席是充分相信军队也相信群众的。他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虽然现在有这么一股风，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措施，沉住气，实事求是地检讨，公开地承认错误，改正，并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这样就可以走上正确的轨道。

毛主席的这两个指示，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解决面对着的这些问题所应该遵循的方针、办法，主席都讲了。从这里我们看山东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觉得主席都给讲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工作里的一些缺点错误，毛主席就讲了嘛，犯错误是难免的嘛。现在有一些群众组织对我们提出批评，我们要沉得住气嘛，不要一听到批评就沉不住气了，就光火，那就不行。要按毛主席的办法，沉住气，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有些话说得过分了，过分的话经常会有的。谁说话能说的都是那么准确呀！参加革命委员会的许多负责人，他们名义上是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实际上他还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还是小将。当然里面也有几个不是小将，是中将，老将，但是他基本的情绪，那些小将最起作用了。据我看，同志们现在对小将接触的比较少，我感觉到有些同志对他们不大理解，不大懂。他们对你们接触也少，也不大懂。双方互相不太理解。所以不要怕批评，像毛主席讲的，要沉得住气，不要怕批评。不但不要怕批评，还要像毛主席所推荐的，我们到处去开座谈会，去征求意见，征求批评，听他们的意见，包括那些非常尖锐的意见。很尖锐的意见都要听，耐着心听，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出来就不挨攻啦，就不挨批评啦，那才不见得呢！这一方面，我们有一点经验，我们挨攻呀，受批评呀，当然各派都有啦，我这里讲的不是坏人批评我们。坏人攻击我们那是意想中的，他们不攻击我们，我们就糟糕了。我这里讲的是革命派，我在小会上和有些同志介绍江；我在这里也可以和同志们说一下。比如去年十一月我到上海去，处理一些工人要上北京告状的问题。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车站找工人代表谈话。夜里十二点到的，谈到天亮，毫

无结果。我劝他们回上海，我们一块到上海去谈。不行，达不成协议。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没法谈了，要他们把我的意见给群众谈谈，他们说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见面给群众谈。在车站广场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四点，才把他们说服了。就这样连着开了十六个小时的会，中间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十六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十五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闹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骂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经验。我也没有发火，没有抓他们的人，也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听了他们的意见，感觉他们讲的有道理，承认了他们有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四点钟才回去了。现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领导骨干和领导人，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有那十六个小时，我就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了。现在我回到上海去工作，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我到

那个工厂里边，总有人见了我说，唉呀，你好呀，我们在安亭见过面的呀（那个车站叫安亭车站）。这就建立了我们特殊友好关系。不打不成交嘛！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同志们，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大概只有挨骂的经验，没有挨过骂又变成好朋友的经验。和革命造反派不打这个交道，我看我们的同志缺一课，这一课应该补上。你这一课如果过了关，以后的事就好办了，日子就好过了。还有一次我和姚文元两个，也是今年一月底嘛，我们到上海。在济南我们看到杨得志、杨国夫的标语固然不少，不过我说你们两个的标语没有我的多，上海比济南大，标语贴的也是满城都是，而且贴了十几天，不是那么一天两天，又没有人去给他们说：你把它刷下来吧，你把它贴掉吧。没有。造反派当然反对这些标语，因为那是一个造反派犯错误的组织干的，其余的造反派组织反对他们，就到处去贴，他贴了标语，给他再贴上，造反派也贴另外的标语，标语战斗了半个多月。那种日子我们过惯了，觉得没有什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去看，看看贴了什么，也就过去了，我们照常开会嘛！还照常找那些人谈话。他们攻我们最厉害的时候，我们找他们谈话，那次我和姚文元也是去呀，一去整整地骂了我们六个小时，什么话都有，说我们是反革命两面派。那个时候正在搞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因为陶铸的问题刚刚揭开，因此到处流行着要抓什么人，揪什么人！什么式的人物，他总要在式头上安一个帽子的。那时我就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那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听一听有什么不好呀！听一听也很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头两天，忽然一个晚上就大整谢富治，谢富治同志现在是北京市革命

委员会的主任。大概就是你要夺权了，或者是在夺权以后，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它是要在我们内部出一些事。遇到这种事，要沉着。谢富治同志他也有经验了。也是造反派贴他的，不是坏人贴他的。谢富治他是公安部长，他也不抓人。他说，咳，让他贴吧。别的造反派说，我们把它撕掉，他说不要撕，让他贴在那里好嘛！他态度很开朗，也不紧张，还是找那些人谈话。谈一两次，彼此谈通了。贴他标语的人，我不讲他的名字，就是他们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是著名人物，那有什么关系呢？发生一些这样的事不要紧，不要一时要沉不住气了，一时就紧张了。多经历几次，再碰到这样的事就好办了。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有带兵的经验嘛，新兵第一次上战场他就没有经验，老兵碰到打仗他有经验，他不慌。我们在这一方面，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间，有许多特殊的形式，我们许多同志没有经验。在这一方面，虽然是老将，可能像新兵。再多打几仗，那就行了。这个本事是容易学的。只要记着毛主席的话，沉住气，不要说，就有办法。你们等到和这些小家伙搞好了，你就会觉得他可爱了。你不要看他骂得你很厉害，他要是跟你好起来，那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还是青年嘛！昨天我们就谈了，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久经战场的，带过各种部队的，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以前带的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呀，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刚拉起的游击队是什么样子，就是那么觉悟高，就那么整齐，就那么守纪律，就没有打砸抢，我才不相信呢！都是些新兵新队伍嘛！我们的红卫兵，最老的红卫兵，他们吹牛，我是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一年的年龄都没有嘛，最老的红卫兵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嘛！一年的红卫兵搞到这个样子，就很不错了。我们同志

们想一下自己的经验嘛，最初带队伍，你刚拉起游击队，一年你能带出什么样子。他们现在阶级觉悟高啊！毛泽东思想学习的有时硬是比我们好。有些东西他不如我们，我们有经验，我们懂的事多，但是有些事，你跟他辩论，你辩不让他，最后是他对。我有这个经验。你最初觉得他没有什么道理，后来听听他很有道理，真理在他那边，你不要小看他。所以要沉住气，不要怕批评，同时，要按照主席的指示，要快改，能够马上改的马上改，千万不要顶牛。我们总是要相信大多数，相信大多数的干部，相信大多数的群众。不要把群众对我们的批评，或者人家说了几句话，就说是矛头指向解放军；或者是我们说了革命委员会几句话，就说你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或者说一批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那就不允许。北京满街上都是这个标语，“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这个标语出现了几个月了。我们当然都向他们解释过，我们说不能这样提，有人反对中央文革，并不一定都是反革命，里面有反革命。可是没用，他们一定要这样贴，我们还是到处给他们讲，中央文革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人家不管贴不贴，该批评还是批评，你说不准批评，人家照常批评，怎么能不批评，不过是背后批评就是了。叫大家公开对我们讲嘛，那关系就好了。所以主席的几点指示，已起把问题都解决了。我就不要多说了。

有些同志写信提了些问题，我想再谈几个具体的问题。我今天的讲话，是和姚文元同志分了工的。今天我讲，明天他去给群众组织讲。我们两个讲话的重点不同，我今天主要是讲部队自己的事。你们不要认为我老是说部队的事，不公平呀。群众团体的缺点他们的毛病，我今天不想在

这个会上讲，那一些话，我们在另外一个会上讲。我们刚才念过语录嘛！要各自进行自我批评，所以现在就光讲咱们的事。他们那个会，我们另外开，这样子，双方才能更容易接近一些。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攻下面的革命，因为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军队的作用，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非常重要。因此，中央就连着发出几个指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支左的决定，后来又有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四月六日的十条，还有其它的一些具体规定。最主要的是这些。这几个都是强调军队一定要支左。强调一定要站在左派这一边。因为在夺权以前，左派的力量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从少从弱，到慢慢地发展起来，强大起来。在紧要关头，如果军队不参加，这个权就夺不过来。这一方面，同志们有经验了。这一点和山东的造反派谈起来，他们对军队是非常有成情的呀！想起那一段，他们就说，那个时候和军队的关系多好呀！在夺权以前有一些同志遇到困难，去找部队帮助，甚至在有被抓起来的危险的时候，跑到部队来避难，他们回想起这些事情来，还都是非常感激部队的。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工农的子弟兵，我们当然是站在左派一边，也只能站在左派一边。应该是只能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个本来是不成为问题的。那么，等到夺权以后，这个政权要巩固，没有部队的支持可能不可能？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政权现在还是临时权力机构，她要完成很复杂的任务，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完成整个斗批改的任务。还有很多很多的项目，将来，还要过渡到正式的权力机构，要建立省人民委员会，还要建立省委。现在是临时性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

程里面，如果得不到解放军的有力支持，是不行的。同志们，我们永远记住这一点，我们是责无旁贷的。我们对革命委员会，只能够支持她，不能够采取别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巩固这个革命委员会，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如果不支持这个革命委员会，她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对我们整个革命是不利的。特别是像山东和其它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市，因为现在只建立几个嘛！这几个革命委员会我们只能把它搞好。如果搞不好，或者革命委员会垮了台，同志们哪，那我们脸上就无光。这个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山东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的。人家外国通讯社天天在和我们算账啊。同志们！他们用语就叫做毛林派，说毛林派现在仅仅是控制六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当然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根本不符合事实。不让他们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表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们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搞着搞着垮了，同志们想一下，那是个什么问题呢？当然，如果个别的垮了，真的出现了那么回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我们总还是不希望出这种事。我们要想一切办法来加强她、巩固她。使她能够站得住，能够把工作做好，不但能够夺权，而且能够掌好权。用好权。这是我们的责任。当然这里面也确实会有困难。主要的困难是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间比较短，支持左派，那个是左派呀？不大容易搞清楚。不是那么一眼就看准了的。有的一看就很容易看准了，很容易判准，没有什么争论；有的就很不容易判断。有的原来看他好像是个左派，以后看看又不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碰到许多了。我们也有支持错了的。在

上海有个大厂子，六千多工人，分两派，一派四千，一派两千，两派都互相说对方是保皇派，互相说对方是反革命。又都说自己是左派，经常武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分成两派，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还是两派，还是武斗，一打就可以去几千八，从外面厂子调一些人，一方是两万人，一方是一万人地干。经常打。为了想识别一下究竟哪一个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几个左派学生组织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机关的，都介入了。结果，别的问题左派组织都很一致，就在这个问题上一分为二，两派弄的谁也做不了结论。我们收到关于这一工厂的材料就一大堆，我们现在也判断不清楚。不要以为一下子就能判断清楚的，有些单位不大容易弄清楚。我们最近在北京开会，各省去汇报，碰到了好多这样的组织，各种说法不一样，一时就是难以判断清楚。大方向对不对，这是区别左派、中间派、保守派、右派、反动派的主要标志，看他是不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他是否执行资产阶级路线，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这是主要的。但有一些组织也很难说他以前一段保过，后来又不保，后来又保；有的是在本单位保，在外边不保；有的到了外边，犯了个错误，在家里还是很革命的，情况非常复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些同志，一口咬定我支持那个就是左派，我说你不要说得那么死，还是得再分析分析，看一看。因为有些情况是不容易判断的，脑子要灵活一点，要多听各种不同意见，然后再仔细分析一下，有的一时判断不清楚，再看一看，不要急。

有的同志觉得他打砸抢很厉害，就常常因为这一点说某一个组织不好。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分析。我们是不赞成打砸抢的，是反对武斗的。但

是，不要把这个问题一般地提，要作分析。因为这种打砸抢，有时候包括的内容不一样。例如抢，有很多是得黑材料。那个事情完全应该由工作组，由原来的党委负责。因为不按照规定把材料拿出来嘛！有时候弄点东西，地方过去山东省委或者其它一些党组织对他那个保字号的，要什么有什么，而对其它组织，要一张纸都不给，人家没有办法就去抢一点。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赞成。不过就因为这个说他不好，我看也不必去责难他们。不要脱离开阶级斗争来谈这个问题。有时候打伤了一些人，甚至打死了人，这当然是不好的。我们并不赞成打，不赞成武斗。但是说归说，他要打，你怎么办？又不是我们要他打。这种事情，不要怕，咱们只能想开一点。林彪同志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清楚了。他不是作了很多比喻吗？这样一个大的革命，没有点伤亡，这是不可能的。同志们，不出一点事，不出一点乱子，那么文雅，那么细致，一点纰漏都不出，世界上的革命不管哪个革命，都是没有的事。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封建阶级革命也是这样，十月革命也是这样，我们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更不用讲了。总会有牺牲，总会要付出代价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伤亡的人很少。比一个小小的战斗的伤亡都少，更不要谈一个战役了。淮海战役死了多少人？解放济南死了多少人？那不过是解放一个济南城。我给大家说个消息，最近流行性脑炎非常猖獗，发展很快，来得很猛，就这样一个病全国死了十三万人。山东省也死了一万人。打砸抢是不是打死了一万人？没有，肯定没有。大家想一想，这样子大的一个革命，中间出一些乱子，打伤了人，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的同志，看了很难让，当然，看到好人挨打嘛是会难

让。不让这些都是没法避免的。你劝也没有用。党中央从来也没有主张过打砸抢，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从来没有主张过打砸抢，相反的总是讲不要武斗不要武斗。十六条已经写上了，林副主席在天安门讲话，每一次都讲不要武斗。你讲归讲，他说听毛主席的话，其实写在那儿他也不听。他就在这个事上不听，打完了以后他又听了。他说，我还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要武斗要文斗。一碰到了事，他又要动拳头。就是这样。你说，中国人民爱好和平，那才不见得。有一些人就是想动拳头。所以这个问题，不要看得太重，要从大局来看。

对于党、团员问题，成分问题，同志们提了好多。我们对这个问题，态度向来是清楚的。成分好坏这个事是应该重视的，不重视成分是不对的。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嘛！但是，也不能一去就先看他的成分怎么样？一看成分好，就认为是革命组织，一看里边有一部分人、或者个别人成分不好，就说是牛鬼蛇神。我们还要看在整个阶级斗争中间，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间的表现。就是对成分好的，对党团员，也要看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间，究竟站在哪一边。不是说我们的党员团员不好。我们的党员团员绝大多数是好的，这个中央一再讲过了。但是，表现并不全一样，有一些党员表现很好，有一些党员表现不好。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整个党来说，就是一个锻炼和考验。如果有人说，我们所有党员团员都是坏的，应该排挤掉，不要，都要打倒，那当然是错误的。不过我们的党是都是在阶级斗争里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间生活的，他总要站在这一面或者那一面。我们的党今天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统一，不是铁板一块。刘少奇不是共产党员吗？邓小平不是共产党员

吗？陶铸不是共产党员吗？你能说：一看他是党员，我们就要依靠他，这样那不就错了吗？而且我们有些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面，当保守派的。特别是在运动初期，成了保守派的，数量不是很少的。这没有什么奇怪。一个就是刘邓路线的流毒，毒害很深，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我们党里面流传了那样久，二十多年了。多少共产党员看了那本书，按照那个去修养的，这不是越修越糟糕吗？刘少奇那一套什么“驯服工具”等在我们党内流毒很深。毛主席的思想，在有些党员里面并没有扎根。再想想，我们有些党员，包括老党员，在入党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那个时候他并不想搞社会主义，或者口头上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想搞资本主义。所以社会主义这一关就是过不去。刘少奇这一些人就是这样，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真的要搞社会主义了，他搞资本主义。有一些劳动模范，为什么变得保守了呢？除了那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地位变了。原来苦大仇深，阶级感情非常深厚，但是后来呢，他地位变了，生活也好了，有了权，不受压迫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不觉感到有革命的要求，别人感到受压迫，要起来革命，他不感到受压迫，反而觉得应该维持这个秩序，不要动。他就有一种保守倾向。所以要分析。我讲的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党团员，一部分原来的积极分子，一部分原来的劳模。他们为什么变成保守的呢？是有原因的，没有什么奇怪。所以济南的情况，据我看也可能是这样。我在别的地方都碰到这样一个情况。在

平常，到那儿去工作，当然要先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成分，是党员还是团员，这是工作的习惯，而且也应该了解。但是这仅仅应该说是了解问题的第一步，不能到此为止。了解他是党员，就觉得没问题了，那不行，还要再了解他究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怎么样？他执行什么路线？否则的话，他明明是个保守派，你就可能当革命派来支持他，当左派支持他。在这方面，我们同志可能吃了不少亏。就是因为这几个概念有点模糊，对党团员多呀，成分好呀，看到另外一些造反组织他们打砸抢啊，里边有坏人啊，有时候弄得自己支持错了。我接触到好多个单位。都有这样的情况。在北京看到有这种情况，在上海也有这种情况。在北京和外地来的同志交换意见也碰到这种情况。不从阶级分析，不从两条路线斗争观察分析问题，有时候就支持错了。人家说你支持错了，还不愿意。还有些老工人，他生产就是抓得紧，革命他就不带劲，就是有保守倾向。当你启发教育后，他也能干革命，但是比起青年小伙子差劲。这一方面，我觉得不难，只要我们能够多去接触一下，这个问题可以解决。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老坚持着一种观点不改变，说我这个观点就对，那靠不住。如果要是搞不好呢？就会出现一种很不好的局面。一个内蒙古，一个四川，都可以提供这个经验。内蒙古，就是我们的部队支持了一两个保守组织。这两个保守组织的特点，大概也是这样，党团员多，成分比较好，比较讲政策，但是这几个组织，就是不肯狠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者他斗这一批，不斗那一批。当权派里面，有的好一些，有的最坏，他不斗那个最坏的，甚至支持那个最坏的。这样一搞，问题就发展得很严重。我们可是要当心啊！因为军队的态度，影响太大。我们一说支持那个组

织，不用花很大的劲，这个组织很快就发展起来。内蒙古就是这样，几个保守组织很快就发展了。原来是很小的组织，自从部队一介入，一直发展很快，发展到最后，那就大了，造反派和它双方就武斗，武斗中间，部队又支持了保守派，说它是造反派。到最严重的情况之下，后来就开枪，打死了一个造反派，这样，中央才出来干预，派人去调查。中央派人去调查，到那里被保守派扣起来，那么狂。因为他觉得部队支持他。最后中央要双方都派代表到北京来谈话，部队同志也来北京谈话、开会，搞了两个月，最后中央分析清楚了，作了决定。这个决定同志们会看到的。中央这个决定传达到内蒙古，不承认。部队的同志态度已经转过来了，部队的同志已经发现支持错了，但是那些保守派呢？就是原来以为是造反派的，不听部队的话了。同时，我们有一部分战士，思想上还转不过来，战士也跟保守派搞在一块，带着枪上街游行，反对中央的决定，说中央的决定是假的，毛主席没有看过，林彪同志没有看过。后来，中央为了说服部队一部分同志，派飞机去散发传单，说明关于内蒙古的决定，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看过，是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批准的。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搞了四五千，跑到北京来，跑到中南海静坐示威。那天，中央决定由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同志接待他们，总理给他们讲话，他们居然退出会场，说要见毛主席，只有毛主席的话才听，并喊打倒周恩来。我讲这一点，就是提醒同志们注意，开头我们的错误不大，不改正，到最后大起来了，你觉悟了，你想改变这个局势，那就难了。内蒙古就是这样。就是这批保守派，四五千，最后，我们还是说服他们，你们还是坐下来，听一听我们讲的到底有道理没有，最初他们不愿意听，总理讲

话老打断，最后还是多数人听了总理的讲说，说我们错了，回到内蒙古再搞革命。但还有那么几百人，就是不走，还在北京。我离开北京那天还在那里。你看，可以造成那样局面。当然里面可能有坏人。我讲这样一点就是请同志们头脑一定要冷静，处理原来这个局面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认为我支持过的不能改，一改就糟糕了，那可就要坏大事。如果自己支持的，表面上，或者你们认为是左派，实际上是个保守派，那如果搞错了，将来你想要甩这个包袱，你就甩不掉，变得他拉着你，你想前进也前进不了，他拉着你和中央处于对立的地位，同中央的路线处于对立地位，那样就很不利了。昨天我上了一次街，今天又注意了一下街上的标语，有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倾向，有一些贴拥护解放军的标语。这种标语，因为我没有下车，不知道是哪些单位贴的。不让我看他用的语言，根据我的政治经验，我觉得这个味道不大对，我没有看，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单位。我从那个标语上看，我感觉到那是保守派对着造反派的。这个对你们想一想，我完全是凭感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很容易利用我们的情绪，利用我们现在这个局势，希望把我们解放军拉住，使解放军和造反派之间的关系继续紧张。那样对革命不利。希望同志们冷静地想一下这个事。我这里没有做任何结论，我只是一种感觉。我觉得要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主席讲了那样许多方针，我们可以解决了。现在难一点的呢，我觉得还是感情问题，有些是认识问题。像刚才讲的，对党、团员多呀，这是认识问题。另外，我觉得同志们对造反派接触太少，因为在一个厂里，只有看到这么一个局部，历史知道的也不多，全局知道的也可能不多。现在我们可不能只听到一点意见就相信，

要多听一听，各种意见都听。中央解决各省问题都是这样，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次主席提出解决的问题是河南问题，主席说河南现在闹的很厉害，要他们三方，各个方面的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区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实际上谈一谈，就清楚了，有些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所以后来又有军委十条命令。我觉得我们同志们是否可以考虑，一个是根据中央关于支左的第一个指示的最后一条，要很好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刘、邓。整个济南，我们感觉到这一点，也给省革命委员会提了，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虽然他们也抓了一下这个事，但抓得不紧，没有花很大力量做。批判刘、邓，我们部队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管过去怎么样吧，现在都应该很好地来参加这个斗争。这个对于我们辨别左、中、右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我们看毛主席著作，要带着这个问题，就是带着刘、邓路线这个问题来读。过去你念过四本，和现在再读，就不一样。因为现在有个对立面，就是刘少奇。把刘少奇的著作和主席的著作一对照，你就看出来，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同时，刘少奇的影响在山东是相当深的。因为他做过新四军的政治委员嘛！而且他几次到过山东。全国都要批判，我们这里也要批判，也要学习，在批判中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之下进行批判。这是一种大破大立。同时，我们要接近群众。一个是学习，向毛主席学习，在批判刘、邓中间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另外呢，接近群众。我觉得我们和群众，接触得还是太少了。这次我们来还前，主席谈到这个问题，谈到我们的党，谈到我们的干部，也包括军队。在四九年、五零年、五一、五二，这几

年，我们的党员、干部、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比密切，那时候群众比较喜欢我们。后来，拿部队来说，就逐渐地进了营房，和群众就隔离了，不是住在一个院里了，见群众不多了。后来，我们军队一出来，不是就讲吗？老八路又回来了。可见我们离开得很久。我们现在就是要到、目前特别需要到那些工人的造反派里边去。那些有争论的，暂时不去也可以。当然要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指挥部呀，工人指挥部呀，请他们给推荐一些单位，推荐一些人，和他交朋友，和经过斗争考验的造反派交朋友看。懂得了这些人，你就懂得了整个造反派了。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感情上的距离，越是不能解决。千万不要只听一种意见。特别在目前，不要只听人家说，哎呀，你们好呀！我看街上什么“济南部队支左好得很”，“就是好得很”。那种话听起来满舒服，是吗？那个不行啊！光听那些话有危险！这是捧我们的，你当心点好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敏感。各种意见都要听，也可能骂我们的，倒是骂对了。这个时候，所以会沉着，要很好分析这个形势。

一方面可以去交朋友，一方面可以去请他们来做些报告。以前我们不是找老工人、贫农到我们连队做报告吗？现在可以找一些受过原山东省委迫害的，那些大家公认的造反派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是怎么样斗争的。因为，我们不大感觉得到受到压迫，他们受过压迫。这个感情，要想达到一致，恐怕感觉得到受到压迫，他们受过压迫。这个感情，要想达到一致，恐怕是要多接近。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考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个文化大革命里边，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里边，需要学会怎么样正确地来对待文化大革命中间出现的各种问题。

这样，有利于把我们的部队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加以提高。这个文化大革命。它能够改造整个世界，也包括改造我们自己。毛主席讲的，在听取批评的过程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个改造世界，包括改造我们自己。我们要虚心，不要看小家伙，都是些毛孩子、娃娃，他们在某些方面，这个本领比我们大，需要承认。很多他们懂得的事情，我们不懂。你看嘛！读毛主席语录，这个办法，就是红卫兵没有几个月在全国变成制度。以前，你怎么提倡都不行。就这些小家伙，他就有这个办法。好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叫红卫兵去干，一定能够给你解决。毛主席经常说，好多事，我们解决不了，只有红卫兵可以解决。主席是那樣的喜欢红卫兵呀！那样爱护呀！从来主席不责备他们。有些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干得不好，主席总是说，有什么关系呀！他不过是个别的现象，要看主流嘛！主席总是保护红卫兵的。当然，他也不纵容他们，有缺点错误就给他们指出来。他们是听话的，你们不要看他们不听话，大的方向他们很听话。所以现在我们要信任这些小将，他们对解放军非常热爱的。因为他们从小孩子的时候就是叫解放军叔叔嘛！刚刚不叫解放军叔叔，没有几年，现在变成大人了，二十多岁，头几年还喊叔叔。是这样一些人，非常可爱的下一代，很有希望的下一代。我们有责任和他们交朋友，信任他们。要相信他们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有缺点，他们可以改。领导干部也是这样，要相信他们。我今天在这个会议上就这样讲，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这是最根本的一条，我们部队主要是解决这一条。我们到那边去讲，主要的是要他们相信解放军。要信任我们济南的部队，山东的部队，我们的缺点错误我们可以改，能够改。建

立这样互相信任的空气，才能够坐下来好好地谈。也包括王效禹同志嘛！王效禹同志应该说是个好同志，在去年，第一个向毛主席、向中央提出来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是他，这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样一个局面之下。有一个人能够察觉这个问题，而且向中央提出来，不是很容易的，而且后来受到打击，仍然能坚持下来。他的困难很多，我们应该帮助他，他有缺点，应该帮助他，应该爱护他，热情地帮助他。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这些干部，他们有缺点、错误，也可以改。譬如说，我们有缺点错误，我们也在改嘛！大家都改，都采取这种态度，各自批评自己，不是指责对方。主席讲，拥政爱民那一段，不是指责对方，而是首先批评自己，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就是革命委员会里边，或者群众团体里边有坏人，同志们也不要急，应该相信群众，坏人总是隐藏不了很久的。刘少奇这样大的坏人，最后还不是揭露出来了吗？而且爬到那么高了，还不是揭出来了吗？因为有的人，你说他是坏人，大家不承认，看不清楚，也或者是我们看错了。要相信群众。所以现在整个的口号，主席提的是拥政爱民。对地方的同志我们着重给他们讲要拥军，向我们部队方面，就是要强调爱民，强调支左，在支左当中执行十条，要支持革命委员会，支持那些革命造反组织，支持那些革命领导干部，要真正地巩固“三结合”。遇到分歧的意见要学会协商。那天我们开座谈会，彼此都同意，就是过去商量不够，互相不通气。三个月了，像我们前天那种会，由三个方面坐在那里谈了十几个钟头，还是头一次。三个方面从来没有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商量一些问题，分析形势。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嘛！我们向三方建议，最好以后一个月三个方面的负责同志坐在一起研

究研究问题。如果自己处理的事情，涉及到三方面的一方，譬如我们军队，要处理一个问题，涉及到了群众团体，或者涉及到了革命领导干部，我们一定要跟他商量，或者三方共同商量，这样，把我们三方的力量真正结合起来，不叫三结合吗？这三种力量如果结合起来了，那我们就变成无敌的，我们的力量就是强大的。如果三种力量不结合，那三种力量都没有力。我们军队，不是要备战吗？备战头一条工作，就是要把群众工作搞好嘛！这是林彪同志讲到的，如果我们山东这个战场，群众条件没有准备好，那将来打仗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解决地方文化大革命，既是支持了地方，同时又是准备了战争。如果各级政权、各级权力机构，都掌握在真正革命左派手里，掌握在和解放军紧紧站在一起的组织手里，那么，将来打仗我们就要方便得多了。如果掌握在保守派手里、坏人手里，那就糟糕。所以同志们要学会协商，要善于协商，不要听那些流言蜚语，更不要受一些坏人的挑动。我们要当心敌人会利用。江青同志在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讲话里面已经讲了，那是给红卫兵讲的。要当心敌人利用我们。他故意挑拨我们这些关系，我们就要特别当心。现在，根据济南军区党委的几条决定，我们的支左宣传队撤回来了。撤回来，我们觉得是需要的。因为这个原来在北京就商量过，最近，各个大区，都需要把支左的队伍，根据这一支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进行教育。要把几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当然，这一次，事情比较急迫，因此有些同志思想不通，所以有人提出：是不是杨得志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呀，被迫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措施还是正确的，需要这样子，否则那两天，可能发展得比较严重，那就更不利。现在已经回来了，我们就要

抓紧这个机会，学习一下军级干部会议的文件，和这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把我们的思想提高一下，统一一下。这样并不是说我们以后不搞支左工作了，我们是要把支左工作搞得更好，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因为有了经验了嘛！经验虽然还不够，但是毕竟比头几个月经验多了些。所以会把它搞得更好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时间很短，了解情况也不多，我讲话开始时候谈了。今天能够讲的嘛只能够说这么一点点，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因为现在有个好的开头。三个方面都有这样的愿望，都想把关系搞好。这种愿望是正确的，应该搞好，这样就有可能像毛主席所说的，经过这样一段工作以后，我们的整个文化大革命，包括部队的支左工作就可以走上正轨。我们相信济南部队有这个能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改正我们工作的缺点，发扬我们的成绩，比较快地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提高一步，走上主席希望那样的正确轨道。这样，可以使得整个山东省的文化大革命也大大地向前发展。因为山东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说还是走在靠前面的，我们希望它一直能够走在前面，这个也要靠我们部队的工作，我们希望并且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能够在不久的时候，就能够把你们总结工作的情况，把你们好的经验也总结出来，把你们的缺点克服了。能够把更好的成绩，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和报告林彪同志，我想毛主席、林彪同志和党中央都会很高兴地在那里等待着同志们会送去胜利的消息。我想今天就讲这些话，讲得错了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完了。

姚文元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刚才杨司令讲了要我作指示，没有什么指示呀！到这儿来，是毛主席要我们来的。我们到这儿来了解情况，也向同志们学习。今天我们有一个分工，主要是由春桥同志向大家来讲，我没有准备要讲话。刚才杨司令一定要我讲，就临时想了一下，我想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同志，都是战友，我想随便讲一点意见，讲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我只想很简单地说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点希望。就是希望我们共同在当前这一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这一个思想。我觉得当前人民解放军所担负的“三支两军”的这样一个光荣的艰巨的任务，是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个极其重大的发展。我们只有深刻地掌握和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才能够把这样一个完全新的、艰巨的光荣的历史任务搞得更好。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军队，是一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这是我们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特点。毛主席在万古长青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其它的一系列文件当中，规定了我们军队的性质是为人民服务，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这里我想重温几段语录。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惟一的宗旨。”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指战员，以至于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就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能够无敌于天下。”毛主席还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我们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按照毛主席人民军队这一光辉的思想，按照这一条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发展、成长、壮大起来的。无论是在国内革命战争当中，在解放战争当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解放以后在保卫祖国的斗争当中，又立下了新的功劳。在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倡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为全国人民、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把毛主席这一个人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了。正因为这样，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当中享有崇高的荣誉，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个威望、这个荣誉，最

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工农的子弟兵，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拿我自己来讲，我是从心里热爱解放军的。我接触位很多红卫兵的小将，他们也都是非常热爱人民解放军的，很多革命造反派，他们也是热爱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回忆一下。为什么红卫兵要叫做兵，为什么他要叫做兵呢？就是因为他热爱解放军，要以解放军为榜样。红卫兵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多生龙活虎的、生气勃勃的青年同志们、小伙子、革命的闯将，他们都是千方百计要找一些旧的军装穿上，有的没有帽徽，还千方百计地去做一个帽徽，因为他们觉得人民解放军光荣。正因为这样，同志们，你们要懂得小将的感情，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要求也就很高。很多地方革命造反派的同志，红卫兵小将，革命的左派，是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是他们最有力的支柱。那一天我们跟造反派的负责人开会，有的小将也说，我们怎么能不热爱人民解放军呢？我们怎么会去反对人民解放军呢？我们希望解放军的同志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这一种感情。正因为这样。我们觉得有一些时候，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时候，他们觉得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的时候，批评也就比较严，这是很自然的。要求高，所以批评严。假如对于一个同志完全绝望了，认为他是一个坏人，那何必还要去批评他呢？有一些左派犯错误、冲军区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席讲过嘛，他到军区来，是信任你嘛。他们相信你解放军不会开枪，所以他才来，才来包围嘛。要求解放军的负责同志接见他们。如果晓得会开枪，那就根本不会来了。当然，那是个别的情况，极个别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将红卫兵小将对我们的种种批评，对我们的缺点错误的指责，从根本

上来说，还是对解放军的爱护。我们革命同志之间，大家是懂得这一种感情的，有的时候很严厉的，很尖锐的批评一个同志，就是因为爱护他，希望他好，希望他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所以说这么一点，是希望我们在“三支两军”的工作中，特别是支左工作中，能够了解到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威望，能够了解到革命造反派的这种感情，不要把他们的批评，看作是对解放军的攻击。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管他怎么批评，怎么讲，他从心里是热爱人民解放军的。只要同他们多接触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同志们可以想一想，世界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有什么人敢批评吗？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解放以前我在上海，那个时候，群众都恨他，看到国民党的兵油子，就恨死他，谁还敢去批评他，那才不去批评，批评了就把你抓起来。所以，一定要理解到这一种感情。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看到我们的利益和革命造反派的利益、红卫兵小将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在支左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是能够解决的。看到了我们是一个人民的军队，就可以对主席的最近的最新的指示，理解得更加深刻了。我想把刚才春桥同志念过的主席的几句话，再念一遍，我自己已经看过很多遍了，而且也反复思索过，每次对我都是很大的教育。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怎么理解这一段话，对于我们当前搞好支左工作，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的军队，只有人民的军队，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怕批评的。世界上难道还有别的、剥削阶级的军队能够不怕批评吗？没有。剥削阶级的军队，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去巩固剥削阶级的专政，他就是

要镇压人民的。国民党的军队，美帝国主义的军队，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都是这样。毛主席说，不要怕批评，这个首先是因为我们是一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是工农的子弟兵。这样，我们当然是不怕批评了。为什么说，全军在这种批评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呢？这就要回顾一下，我们当前的状况。解放以后，我们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但是也要看到，在进城以后，解放以后，在有一段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一些隔开了，不是完全隔开。这一次从兵营里出来，从机关里出来，恢复我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跟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结合在一块，这是我们人民军队在解放以后，和人民结合很伟大的一个飞跃。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改造客观世界，就是说改造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种种反动的、错误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和扫荡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和群众结合，也一定会促进我们部队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我们就不能前进。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真正地认识世界。而我们认识世界的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改造世界。按照什么去改造世界，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去改造世界，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向去改造世界。所以在听到了很多批评，实际上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群众的呼声，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懂得阶级斗争，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揭露矛盾，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克服缺点错误，就可以使我们懂得怎样才能真正地在工作当

中贯彻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种批评的过程当中，这样去认识了世界，就能够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改造世界。我们一个人的成长。没有批评是不行的。假使光听表扬，没有批评，那就非犯错误不行。我们做好一件工作，改造世界，也需要不断地听批评，批评就是一种矛盾嘛。解决矛盾，我们的工作才能前进。所以，毛主席的这一段指示，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要，在搞好当前“三支两军”主要是支左的工作当中，一定要经过这么一段批评的过程，这个对于我们是一个光荣的考验，是不奇怪的，这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说明人民群众信任我们，希望我们做好工作。我们理解了毛主席的这一段话，特别是从毛主席人民军队这一个光辉的根本的建军思想来理解这一段话，就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的批评，我们就能够把当前各种矛盾处理好。我们学习、贯彻毛主席的人民军队这一思想，有很多方面，我觉得当前还有一点，就是要提倡局部利益服从全部利益。毛主席有一段话，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在当前这个形势下，反复地来思考，来学习，来贯彻。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我们是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的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全局。我们要从这个全局出发，来处理一些具体的矛盾。拿当前来说，在全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把刘邓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垮批臭，对修正主义的根子来一个总的清算，这是一个全局。我们要从这个全局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山东省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是全国六个最早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之一。从全国无产阶级总的利益出发，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利益出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一定要使她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好。决不能使她垮掉。这是我们的根本利益。是全国人民当前的根本利益。要从这一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毛主席发出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这是为我们指出了方向。这也是我们当前的根本利益。这一些全局的东西，都是表现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无产阶级的方向。所以我们在处理一些具体矛盾的时候，虽然你在具体局部来看，有很多理由，但是，如果违背了全局的话，我们还是要提倡局部服从全局。识大体，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辉的传统，也是我们人民军队的一个光辉的传统。我们决不要被一些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所挑动，要冷静，要沉着，对当前这个矛盾，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按照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全局利益来妥当地解决。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感想。总的说来，这些感想，都是说明在当前的斗争当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这一个光辉思想，这对搞好我们“三支两军”工作很重要。我们希望，也相信同志们一定会以立新功的新的成绩来回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希望。同志们能不能？（众答：能。）

49) 张春桥在山东省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5.07

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和姚文元同志到济南来，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们这次来，是毛主席要我们来的，因为毛主席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所以在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开会的时候，得到材料知道济南的形势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毛主席就决定要我和姚文元到这里来看一看。我俩到这里以后，因为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主要的要我们帮助一下济南和驻山东的部队，使得他们接受过去的经验，如果工作里边有缺点，能够早一点改过来。所以我们到这里以后，主要的时间是用在和部队的同志谈话，向部队的干部做报告，放在这方面。但是我们始终也没有忘记红卫兵小将们，我们原来是很想找一个机会，和大家见面讲话，但是，不是因为你们的错误，也不是因为我和姚文元的错误。我们就始终没有开成会。这个事谁的责任？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但是，我们心里总是很不安。如果到了济南一次，又知道省的红代会在这里开会，我们居然不来看你们。那么，我们怎么能离开济南呢？所以无论如何今天要来一趟。

我们有些话，昨天曾经找一部分同志讲了。因为那个时候估计到也可能不来了，来不成了。把我们对济南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的意见，包括对红卫兵小将的意见，我们已经讲了，他们会给你们读，所以我们在

这儿不准备多讲话，主要是来跟大家见见面。我们来跟同志们见面，是表示我们对济南的山东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支持，你们可以相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永远会和红卫兵小将们在一起，同时，我们也经过你们来表达我们对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对王效禹同志的支持。因为山东革命委员会是山东省革命群众，革命的领导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种革命力量加在一起。经过长时间的英勇斗争得来的胜利果实，这个胜利果实不应该被任何人所破坏。问时，我们昨天也和一些同志谈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就是对我们地方同志来讲就是拥军。对干部队来说就是爱民。这样就是把拥军爱民的旗帜大家高高举起来。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的命根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依靠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奋斗所得来的。我们最主要的是靠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着我们的祖国。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个样子来搞。所以，我就这一点无论如何要记住。再呢，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我们的胜利果实也要靠解放军来支持，来巩固，没有军队的政权，是不存在的，没有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人民解放军在工作里边，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主要的方面。（会场高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爱解放军！）

刚才喊得对！我们那天和部队同志讲过，我说：你们应该懂得，最热爱解放军的是红卫兵小将，不要因为街上有那么几条标语，好像对你挺恭维，说你顶好，顶好，那个东西不可靠，最可靠的还是我们小将。所以同志们，当然我们解放军在工作里面有缺点、有错误，这个是在任何一

个工作中，任何人做事情都是难免的，都会有缺点有错误。所以现在我们要一方面要使得别的人看我们红卫兵小将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你要看大方向，你要看主流。这个我们天天讲，经常讲。谁如果要是把我们红卫兵小将们的缺点错误夸张起来，那我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同样的呢，如果我们对解放军的工作，我们也是应该看他的大方向，看主流，不要把缺点错误夸张起来。有缺点，有错误，如同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一样，我们就会感到痛心。我们要想一切办法，热情地、诚恳地帮助他们改正这些缺点错误。而且我们相信他们可以改正。我们觉得，我们国家所以有力量。就是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全国革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动起来了。人民觉悟越来越高。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保证。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大批的领导干部站到革命人民方面。这两种力量还不够，还要再加上人民解放军，这三种力量缺一个不可。缺了一个，我们的革命就无法进行。只有群众没有领导干部可以吗？不可以。只有领导干部没有群众他算什么领导干部呢？单单这两个力量，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做我们的后盾，我们还不是有力量。这三个力量加起来，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就无敌于天下。

本来我不准备讲话了，但是，好像见了面嘛，就有些话要说，所以就说了那么多。最后我祝山东省大中学校红代会开得完全成功！祝同志们，你们回到各个地区，回到本学校、本单位以后，能够把你们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让我们大家共同地把文化大革命，经过我们共同努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好！

50) 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杜平 1967.05.14

〔地点：南京；杜平：江苏省军管会主任〕

张春桥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亲爱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同志们好！（掌声、口号声）

我们这一次到南京来，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叫我们来的。（掌声、口号声）

我们带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南京和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限的关怀。（掌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早在二月中旬，我和姚文元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示我们，说你们回到上海，要关心一下江苏和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江、浙两省的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你们上海啊，有些孤立。要我们能够关心这一方面的事情，能够对江、浙两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所帮助，对于这两个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有所帮助。我们接受这个任务以

后，感到很光荣，应该来看望同志们，但是，那个时候上海的事情也确实忙乱一些，一直等到三月底，我们说再不来不行了，我们下决心到南京来了，火车票也买好了，但是就是那一天，北京又打电话来，要我们马上到北京去。我们就估计到，江、浙两省我们一次也没有去呀！见到毛主席是没法交账的。果然不错，我们到北京以后，第二天，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见我们的头一句，就说：你们没有到南京去呀？（掌声、口号声）这是毛主席对我们两个人的批评，同样，也就是毛主席对江苏的关怀。（掌声、口号声）

这一次，我们要走了，我们就向主席请示，说我们要回去了，要南下，主席有什么指示？这一次，大概主席怕我们不来吧！主席就把路线给我们划清楚了。（掌声）就说你们这一次回去，先到济南，然后到南京，然后到上海，然后到杭州。（掌声）同志们，上次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坚决地执行，犯了错误，这一次最高统帅的指示，我们就坚决执行，有错误就改么！（掌声）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完全按着毛主席指定的路线，到南京看望同志们了。（掌声、口号声）

我们到这儿来，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做同志们的小学生的。（掌声）我们到这儿刚刚是七天，今天是第七天了。在这个七天里面，我们和南京军区的同志、省军管会的同志见了面，谈了话，交换了意见。但这个时候花的不多，我们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同南京的，也就是全省性的一些主要的革命造反组织的领导人谈话、开会。同时，看材料，看信，看你们的传单。我们的桌子上，从这里算起，大概这么一堆吧！我们看了，

当然还没看完，因为天天往这儿送来，刚才一坐又是一堆，又送来了。我们也到街上去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标语，也参加了一点辩论会，不过他们不认得我们就是了。（掌声）我们没有参加，光听了。也看了你们打架，打的挺热闹。你们武斗这几天可是带劲哪！真是斗得上劲啊！我们就是看了这么多，谈了这么多。从这中间受到很多教育，学习到很多东西。不过，时间总是太短了，同时我们的水平实在很低，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很少，接触到的群众也很少。一句话学习得不够，调查研究还很不够，还没有发言权，或者只有很少的发言权。但是，很多同志要求见我们，要求跟我们谈话。如果我们都接见呢，而且都要求单独谈，那我们时间实在安排不过来，最后也想啦，还是像今天现在这样，大会上咱们见面谈话吧！

我们到这儿，很多同志问我们，现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怎么样？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象，总的来看，是大好的。特别是四月初开始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黑《修养》以来，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意志更加旺盛了，斗争更加深入了。可以说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这样一个大的批判，最大规模的批判，促进了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也促进了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革命的大联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一步一步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原来所预计的，二、三、四、五几个月就可看出眉目，那么这个眉目，现在我们看得更清了。除了有六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外，还有一些省市已

经建立了筹备小组，他们现在接受了这些最初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的经验，他们的工作现在做的细致一些，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从报纸上看，好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少哪！实际上都有进展，包括有一些地方曾经曲折比较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遇到的挫折比较大，那些地方现在的局势也都在改变。所以，整个形势是很好的。生产形势，也是好的。全国的农业今年整个形势都很好。北方，往年总是春旱，今年，华北地区、济南地区我们看了，山东地区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山东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今年春天都没有发生旱，只有少数地方有旱，雨水比较好。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农村干部，贫下中农，公社社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了。所以，今年农业形势是好的。工业生产整个形势也是好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吃饱了饭，就可以放手闹革命。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各个地区所面临的任務，所碰到的问题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是发展的顺利一些，往前走的远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这个倒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事情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平衡。也可能现在发展得比较顺利的地方，过一个时候，又要遇到了新的困难，发生反复；也有可能。这是讲全国。

那么江苏省的形势究竟怎么样？这个问题当然是应该你们答复罗！是应该我们问你们的，你们知道的比我们清楚。我们从这几天接触中间，和根据我们过去的了解，我们觉得总的看，江苏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吗！生产的形势也是好的。比如四月份的生产，三、四月份都好的，五月份有一点问题。革命的形势呢？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省军管会的领导之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很好的工作。人民解放军驻江苏的部队，在南京军

区的领导之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有力的支援。应该说比起军管以前全省的工作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要我们对这里的工作发表一点意见，我们这个意见很难提，因为事情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不过我们也感觉到有些问题，想提出来和大家商量一下，看看是不是一些这样的问题。关于工作，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前的任务、工作，这些，人民日报的社论、红旗杂志的社论，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想做全面的讲解，我们只想说这么几个问题。我和姚文元同志有个分工，我说两个问题，他说一个问题。（掌声）因为刚才都是讲的好听的话，你们都鼓掌，我下边的话有的不见得那么好听哪！（掌声）不过我还是希望不管我说的你们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希望你们还是耐着心听一下。（掌声）

同志们，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主席台，主席台这儿为什么都是当兵的呢？你们当然可以得出一个答案，因为是军管会么，所以都是当兵的。但事情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和姚文元同志给你们的各个组织的负责人谈话的时候，他们都要我们跟大家见见面，讲讲话。我们就有一个建议，说这个会可否由你们双方联合召开。他们当时说可以，我们说到会场上会不会打架呀？他们说保证不打。那么结果呢？一直协商啊，协商，没达成协议。所以，最后由军管会的同志来主持开会。那么你看，又是好事由军管会来主持开会，你们想鼓掌，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事，就是革命群众组织呀！这种对立呀！相当深了，同志们啊！就是

都上一个主席台都有点困难了。按这样子搞啊，我看你们这里成立革命委员会呀！那就要相当长了，就一直是当兵的坐在这儿了，就是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坐在这里，那么这个老百姓上不来。或者一上来么就吵架！就从这儿说起吧，我的话就从这儿说起。

请同志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在江苏地区，首先在南京，我们是不是紧紧地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我希望所有的今天到会的同志，不管那一派的同志，包括今天到会的，也希望你们散会以后，跟他们一块，郑重其事地来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南京，究竟是不是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掌握的紧不紧？这是头等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大方向呢？这个中央的同志都一再讲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讲了。就是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处在夺权的阶段，全国还都是这样，都是正在夺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现在是处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当前的大方向，就是要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要和本地区、本单位的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经过这个革命的大批判，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子来为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必须紧紧掌握住的革命的大方向。简单地说，就是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就是要掌握这几个东西。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里究竟怎么样，你们掌握的怎么样？我们问过一些同志，有的同志承认说掌握的不算太好。我们跑到街上去看一看，你们街上的标语呀，大字报啊，真多呀！那倒不是

冷冷清清，而是热热闹闹的。但是，这里边究竟那一方面多呢？批判刘邓的有多少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不多。你们当然也可以批评我们啦，说我们有一些，你们没有看到。但是，至少我可以说一句，你们那些最重要的贴标语、写大字报的地点，这一方面很少，主要的街道我们不是看了一次，每天我几乎都去么，我们来的当天，第一件事就是看大字报、大标语，因为这非常灵。到一个城市，你转一圈就知道这个地方当前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一看，你们对刘邓不大关心，你们关心的什么？这一个派说那一个派某某人是罪魁祸首，某某人是罪责难逃啊！那个都是小厂，以厂为单位贴来贴去。当然一个厂的事情么也是国家大事罗！但头等的国家大事是什么呢？是批判刘少奇么，是批判刘邓，这是总后台么，如果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地摧毁啦，你那个厂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啦。如果你那个厂都是你的天下啦，但是刘邓上台，同志们啊，你那个厂的天下就维持不住，那维持不住的。你们的广播站我们也听，一直到深夜，还在广播，也都是两派互相在那吵啊吵啊，就是听不到你们批判刘邓。这个我觉得我不冤枉你们。这是讲全国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这个批判究竟怎么样？我们再看一看批判省的，江苏省的。据说都进行了一些，前天还为了抢彭冲打了一架。说是进行了一些，但是，我们看不是那么集中，就是全市人民的革命造反派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对刘邓对旧省委，你们的精力呀相当分散，不是很少的分散。我们看那些标语我们不知道，刘少奇这个我们知道的，你们那些标语上的那些人名啊，我们只有几个人知道，文凤来呀，曾邦元呀，这

几个人知道，其余的都是一个厂里边的什么某某人，那标语写那么大，比刘少奇的名字都大，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讲大批判。

那么大联合啦，同志们，我们在街上几乎没有找到一条，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一条，就是讲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样的标语。倒是这一种很多，你是老保，你是什么反革命。这些你们大家都没办法来解释吧，这个地方两派都不能上台，这是最现实的啦！今天开个会，希望你们两派的负责人到上来主持会，那么你不来主持会，如果说主持会还有个问题呀，谁来当主席呀，那一定要打破头的，那么要军管会的同志来主持，你坐在这也好，坐也不能坐，哎呀！这个无产阶级政治家都是这样子的气度，还叫无产阶级革命派呀！你们看看五一天安门上那个名单，毛主席是什么气度，什么样的人让他上了天安门么。所以，他才是毛主席呀：他才成为我们大家的领袖啊！（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你们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当权呀！同志们，夺了权掌权就是这样子掌法呀？我看危险呀同志们。现在武斗么还是不断，而且发展到绝食，不但发展到绝食，又看到一个传单，要三绝，绝食、绝水、绝医，就是不但吃饭，而且不喝水，那么如果不吃饭不喝水不是身体就不行了么，医生要来给看病即绝医，不准看病，这个传单我想念，许多单位都署了名的。我反对这个传单！（掌声）同志们你们看，我为什么要反对哪！我们毛主席率领我们红军，率领八路军、新四军，率领人民解放军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什么时候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绝食过哪！（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应该是吃饱了饭，睡好了觉，喝足水，有了病要好好看。如果是敌人，咱们就和他斗，拚死的斗。（众：对！）何况你们，

我下面还要讲，你们现在绝食已经发展到不是对敌人！（众：对！）这样一些现象能够说我们江苏的首先是南京的斗争符合党中央所规定的革命的大方向吗？能够说这是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吗！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革命的大方向的，这不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轨道上的前进的。（掌声、口号声）同志们，革命的大方向，这不是我们自己随随便便来决定的，不是我认为这一个就叫革命的大方向，或他认为这一个就叫革命的大方向。确定革命的大方向，是根据客观的实际，根据社会的基本矛盾来决定的。

我们江苏地区和全国一样，江苏的基本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革命的人民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掌声、口号声）同志们，就是说这一个矛盾，我们如果大家都共同的承认这是基本的社会矛盾。江苏并不特殊，上海的矛盾也是这一个，新疆也是这一个，黑龙江也是这个矛盾，这是全国的共同的矛盾，江苏难道说例外呀！说江苏这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不是革命人民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什么文凤来同曾邦元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你们能够得出这个结论来吗？（众：不能！）这一个基本矛盾它就决定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它本身就提出来究竟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革命的对象，要打倒谁，要联合谁。离开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没办法来分析问题，我们就不能确定正确的方向，就不能够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就不能够把我们的队伍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现在看起来，你们这里好像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同志头脑里边淡薄啦，模糊啦，混乱啦，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刘邓，

不是指向旧省委，而是两方面互相指向。两派交给我们那么多材料，这些材料里边，揭发省委的有一部分，不多。揭发刘少奇在江苏的罪恶的一本没有。大家都知道么，刘少奇在华东地区，首先是在江苏地区，影响是很深的呀！同志们，他在江苏工作了很久，在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影响很深啊！可是我们大家不管，你北京啊，你批判刘少奇你批你的，我的兴趣不在刘少奇，我是在文凤来，曾邦元。给我们绝大多数的材料，都是这一派揭发另外一派的。那些材料，同志们，我在这里在我们同志之间我可以这样说，要是过去江渭清搞这么多材料，哎呀可宝贵啦！他搞不到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搞你们的黑材料搞不到这么多啊！但是，现在我们彼此之间就揭发，我说他背后有什么人是后台，他说他后台是谁，他干了什么坏事。

究竟那些事实是不是事实，老实说，我们两个不愿意查，我们不愿意听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觉得这离开了大方向。革命同志之间，下面我还会讲，就是对方犯了严重错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用这种办法互相揭发，都弄到街上，贴到街上，究竟谁高兴啊！老实说，我们开了几天会，看了这几天的材料，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心里很痛心啊！怎么两个革命派会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看，我们根据这些材料还不能够证明两派中间那一派是保守派、保皇派，我们认为三月五号中央在接见江苏省两个代表团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作的评价，就是两派都是革命组织，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口号声）当然，同志们，现在哪，我们当然也需要仔细的分析一下，特别是因为两派的组织都不是原来最初那个时候啦，也甚至于不是后来在三月那个时候，因为后来都有

些发展，在发展中间有没有一些问题，那个需要具体的分析，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一点，因为基层组织有了一个问题，或者某一个组织有了问题，甚至于说某一个大组织他的某一个负责人出了问题，那么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一个组织整个是坏的。如果根据这样的逻辑去推论，那么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一看，说你们中国共产党出了那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原来你们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就是个坏蛋，因此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个坏的党，那你们同意吗？（众：不同意！）所以不能够这样形而上学的不作阶级分析，不作具体的分析，这样子来判断一个组织，以至于从这里得出结论进行互相攻击。根据你们给我们的材料，我们刚才说啦，我们的判断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认为现在两派互相攻击的作法是正确的，而是认为两派应该根据中央的指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间，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众：对）

同志们，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段语录，我们同志们大概在各种会场里边，或是在日常的学习里边念了至少几十次，几百次了吧！但是，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恰恰忘记了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恰恰不是去看一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在三月五号中央的同志接见江苏的两个代表团的时候就已经很严肃的指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在北京，中央只是把谈话的要点告诉了我们。这一次到了南京，互相告状揭发中间就把这个记录，说这个本子和那个有什么不同，说传达的本子如何有差别，都给我们啦。那好吧，我们就把这个本子，也看一遍，那个本子也看一遍，我们看的结果，我们觉得大家争论的都是些细枝末节

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争论的问题。但是，中央所指出来的最关紧要的问题，你们都不争论，都不重视，中央那讲话里边最关紧要的东西，都丢在一边啦，枝节问题争的一塌糊涂，争的面红耳赤。总理也讲啦，康生同志也讲啦，其他同志也都讲，里边着重的说过一个就是敌人朋友的问题，特别是康生同志讲的时候，根据记录上讲，有的加了注解，说当时康生同志非常严肃的很生气的讲了这一段话。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两个说，要我们讲话我们讲什么，我说就把过去总理和康生同志讲的话再念一遍就够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同志们，我们希望今天这个会后，你们不管那个本子，你们把两派自己的记录本都拿出来看看，你们看一看中央同志讲话的要点究竟在哪里，是劝你们大联合哩，还是劝你们大分裂，是劝你们回来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哪，还是要你们各自攻击对方。就是讲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自己批评自己，不要去批评对方，着重的要批评自己，这个是我们不但是对江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最近接见了十几个省的代表团，统一的方针，话都是一样的，就是那几句话，都是要凡是发生这样的两个革命组织之间的问题，中央的方针，都是要他们回去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这是行之有效的。历史的教训，就是拥军爱民。抗日战争时期，四三年和四五年，毛主席那个时候就规定啦，军队和地方发生了问题，怎么办？就是开这种会，军队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地方开会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军队，双方进行自我批评，一个拥军，一个爱民。现在我们解决当前，下边我简单的会说到，解决当前的拥军爱民问题，也采取这个办法，革命组织之间，革命人民之间，革命的同志之间，发生了问题，用这种办

法最好，中央给你们方针也是这样啊！希望你们回来批评自己，中央给我们打的电报里边，同时也是给江苏军管会的电报，也是这样说的，这一段话我还可以再念一下，这个不是你们的记录，这是中央正式的文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自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原则一致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枝节问题的分歧，应求大同存小异，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革命派团结起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中央给我们的谈话要点里边的第五点就是这一点。这个是中央正式通知我们的。也通知了江苏。

但是，看起来，从北京回来以后，你们双方恐怕都没有坚决的按照中央的指示来作，相反的据说憋了一阵，不是进行自我批评，而是憋着，憋了一个月，到后来说是憋不住了，还是干吧，这样子搞来搞去，就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没有能够端正。在这里我们就想说几句，有这样的意见，我们感觉到，本来江苏的形势是很好的。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在一月三号事件以后，那个时候的形势比上海还可能好一些，因为我们看一看历史么，你们南大在全国大学生站出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最早的啦，最早的几个学校中的一个吧。总理上一次接见你们的时候不是也讲过吗，那时候就是三个大学站出来最早啊！北京大学，南大，西安交大。你们南大比上海的大学生站出来早，南京、江苏的工人建立大的组织也比上海早。大概是早成立了三天，晚批准了一天，因为早么还是这里先建立，建立啦江苏没批准，上海建立啦也未批准，但是后来上海因为中央那时候派我们先到上海的，上海就先批准啦，上海批准以后，江苏才批准的，

那也只是差一点，差一天的时间么，但是，建立还是你们江苏的早。江苏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发动起来的数量比上海不少，你们同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斗争进行得也很英勇，很艰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在和赤卫队作斗争的时候，那是一场非常大规模的战役啦，几乎是从杭州、上海、苏州、无锡过来到南京，一直到蚌埠，整个全线大战，十二月底一月初哇，那个时候是这样一条铁路线上的革命造反派和赤卫队同时进入了战斗，肩并肩的互相支持，互相援助。十二月底我们还在北京，接到的电话，不只是上海的同志给我们打电话、打电报、苏州、无锡、南京，我们都得到了，一直到蚌埠，我们就看到是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斗争，当时革命派团结得多好啊，多么大规模的联合啊！（掌声、口号声）

我希望同志们冷静地听听我讲的话。应该说，我有许多话是给你们领导人说过的，但是没有效果，所以在今天，在这里再一次讲！那个时候，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肩并肩的在一块儿斗争，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们是对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不管遇到多么艰苦的环境，我们相信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任何困难都能够去克服，所以不管你是杭州的也好，你是上海的也好，你是安徽的也好，你是江苏的也好，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够联合起来，就能够站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共同的斗争。但是，这种形势现在好像同志们都忘记了，为什么不再回忆一下我们共同在一块作战的时候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呢！为什么会忘记了我们战斗的友谊哪！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众：对！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在十二月底，一月初，那个时候的形势，我刚才讲，老实说，南京的形势不比上海差，我不能说我在上海工作就说上海的好话，同志们不是这样，我现在也在江苏工作，我没有这个本位主义。（掌声）但是，现在我们比一比同志们，你们是不是承认南京比上海落后了一些呀！

（众：对！口号声）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比江苏前进了一些，当然，我刚才讲现在形势比你们好的地方，如果自己不小心，自己骄傲啦，也可能出大纰漏，将来落后你们，走向反面，那是上海的事，到上海我们再去算那个账，今天在这里不讲那一面。上海所以形势好一些，据我们看，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和赤卫队作斗争中间所形成的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遭到破坏，相反的，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引导之下，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之下，巩固和扩大了在战斗中间形成的革命的大联合，而且他们实现了革命的联合的夺权。在这个过程里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虽然也有几个组织，个别的组织，有的是比较大的组织，曾经从他们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鼓舞之下，他们干了一些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样的事情，但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的捍卫了这个大联合，使大联合没有遭受破坏。

上海的夺权，也不是那么顺利，同志们大概如果从报纸上看，好象上海一次就夺下来了，实际上我们算了一下，上海夺权，大概夺了五次，就这个中间，我们认为处理的比较正确，第一次两个单位去夺的，两个单位，一个工人组织，一个学生组织，他们两家突然在一天晚上，一月十四日，比你们早，到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这几个机关，宣布夺

权，他把华东局也夺了。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就找了他们，我和姚文元同志就找了他们，就说你们这样子两家夺不行吧，你能够夺得下来呀，我们是劝了他们，他们这两家说，那怎么办哪！他们一看是夺不下来，只占领了几个电话机子。第二次哪，又有四个组织，这四个组织都是大组织，四个最主要的组织，他们也是深更半夜，去夺啦，夺了以后呢，而且通告都准备好了，但是报社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们，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通知我们的，打电话给我们说要登这一个通告。我们就说，这样不好，通告坚决不登，由我们来说服他们，我们就说服他们，说无论如何你们四个组织固然已经代表了上海的革命派的多数，按人数来说，但是你们这样子，权夺不下来，夺下来以后也掌不了权，掌不好，要搞还是搞大联合，还是把一切能够参加夺权的单位都参加，这一些同志总算好，听了我们的话，没有搞。又一次，又是另外两个大一点的组织，还有五、六个小组织，他们又去夺了一次市委和市人委的权，那当然还有几十个组织去夺华东局的权，这些我们都说服啦，我们说只能大联合夺权，不能够一部分单位夺权。一直到二月二号，这一次总算是夺了，就是三十八个单位已经联合了，三十八个单位联合，他们把宣言也搞好啦，委员也搞好啦，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和姚文元，说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们报喜。我们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呀，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们说明天开成立大会，你们来参加，现在我们就向你们报喜。我说这个事情要报告一下中央才行啊！我们就给中央打电话，说上海三十八个组织今天晚上宣布夺权，宣言、委员都弄好啦，要向我们报喜，我们准备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谈一谈，去接受他们

的报喜，同时请中央考虑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这个就是第四次啦，我们到那里当然大家很高兴，我们也祝贺了他们，然后就回家。回到家，中央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这样子不好，就这样子没有三结合，他们搞得成啊？我们说三结合市委没有人站出来啊！中央当时就做了一个临时决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好了，为了支持革命群众，因为我们原来也在上海工作吗，也算上海的革命干部。然后我们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三军，请他们参加，由我们来邀请了。然后我们再把三十八个单位的负责人找来，跟他们协商说，请你们明天不要开大会。先通知他们，中央决定要我们参加，他们当然欢迎。我们说，既然你们要我们参加，宣言总要让我们看一看吧！你们的委员咱们还可以协商一下吧！大会是不是明天不开，迟几天。不过因为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革命的大联合没有破坏，所以事情好商量，立刻就决定推迟，我们就连忙连夜地忙着几天，给他们搞宣言，搞委员名单，筹备新的成立大会。那个时候就发现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市一级的革命组织就有一百多个，那么现在只有三十八个，其余那些组织怎么办？而且已经有个消息，他们要成立第二个公社，你不是叫上海人民公社吗，那我们再成立一个公社，那就两个政权怎么办呢？这个矛盾就很尖锐啦！我们当时是这样处理的：一方面，说服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三十八个单位，说把你们这三十八个单位，不叫做组成单位，不是说我们三十八个单位组成了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其余的各个革命组织，都可以参加，我们不过是发起。这样子不就是处于主动地位了吗！就不是我们独占了。他们就同意了。就是说：不是组成单位；另外，我们又去说服剩下的要组织第二个人民公社的几

十个单位，找他们代表来，就说：你们是不是不要另外组织一个了，因为已经有一个吗，上海只能有一个政权，怎么有两个，他们那三十几个单位。叫做发起单位，你们稍后参加，因为还有争论吗，有的说你是老保组织，有的说你是什么大杂烩，那么人家不接受你，需要讨论一下。这个理由不能完全说服他们，他们就要求无论如何当时要参加。后来有两条，他们在这两条下同意了，一条我们就说，那你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我和姚文元参加这个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不能参加两个啊！我们参加这一个，你们再成立一个，我们不参加，中央不批准，你们怎么办呢？你们不是很被动吗？他们想一想这个是。第二吗，我们这个成立大会你们都可以参加，成立大会都可以来吗！包括那些有名的老保组织，我们说他们的群众可以来参加庆祝会，有什么不可以呢？上海人都可以，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因为是庆祝吗，所以，这样子没有再引起大的波动，还是保持了革命的大联合。所以说，上海的形势为什么比较稳定，发展的比较顺利，不是波浪那么多，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那里的革命大联合，是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虽然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缺点错误很多，但是因为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扩大，所以形势就比较好。这是在一月十一号中央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的贺电里面明确地讲到的。我们上海就是根据中央这个贺电，一月十一号的贺电，那是给我们指出了方向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把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团结起来，这个贺电讲了嘛，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

自己的手里。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的贺电，成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个革命行动里面遵守的原则。

那么，江苏今天的形势，我们觉得问题也就在这儿。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巩固这个大联合，相反地你们的联合发生了破裂，你们不是联合夺权，而是一派夺权。在中央对这个问题上作了耐心帮助以后，在三月五号中央的同志讲话以后，在实行了军管以后，我们感觉到，你们没有能够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弯子转过来，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缺点和错误纠正了，走上正确的轨道。我们感觉到这个状况是不好的，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我们建议你们把中央的讲话再好好地学一学。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同志，可能不是少数同志，现在头脑里面敌人的观点淡薄了，甚至忘记了，好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睡觉了。同志们，你们要知道他们没有睡觉，他们是不甘心下台的，他们还是想复辟的。我们不能够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抱有任何的幻想，不经过斗争，胜利果实到了手里面是不牢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桃子吃起来也是不甜的。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全国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江苏的、南京市的、无锡市的、苏州市的……统统把它打倒，那样子我们才能够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我们感觉到，在南京、江苏，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方针，两个前途，一个方针就是中央所规定的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江苏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如果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我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准备以后，我们就可以建立省一级、市一级和各个单位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那么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方针，一个前途。

另外一种方针，一种前途，那就是违反中央的指示，不按中央的指示办，离开斗争的大方向，你打倒文凤来，我打倒曾邦元，就这样干，不批判刘少奇，不批判江苏省江渭清等等这些人，不去搞大联合，不去经过斗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就使得我们一天天在这里两派之间斗来斗去，不把对方打垮，不把对方打倒，就誓不罢休，那么这样子很可能两败俱伤。你们两派，同志们我们想到的一点，这个话我们可以不说，但是我们为了请同志们清醒起来，我们跟你们讲，有危险，搞的结果，你们两派，如果那一派希望把对方打倒，我们的判断是做不到的。（掌声）但是，同志们，你们要看到，这样的斗争中间，你们两派斗，保守势力就要抬头，就要利用这个形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利用这个形势，那么，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我们相信，南京和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两派的同志，会选择第一个方针而反对第二个方针的。（掌声）我们相信，你们会选择第一个前途（掌声），而绝不会走第二个前途的。当然，你们已经选成今天这个局面，马上解决相当困难，要想一致联合起来不容易。那双方就应该有诚意，有团结的愿望，有联合的愿望，凡是对革命不利的事不做，凡是对革命的大联合不利的话不讲，想一切办法，促进双方的接近。有一些事情既然不可能一次都解决吗，先从局部解决也可以，或从一部分解决也可以啊。比方说，批判刘少奇，这一条我看没有理由反对吧！打倒刘少奇，这个有什么能够说不

能联合，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说我打刘少奇是为了另外的一个目的，没有嘛！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我看都找不出来，只能找出一个，可以联合起来批判刘少奇嘛！这个有什么不能联合的呢？批判江渭清是可以联合的吧？

我现在提一个问题，在这里今天不要求你们马上答复，江渭清在北京，前天总理写个信来，给我和姚文元，就问，你们这里有些要求江渭清回来开斗争会。总理要我们在这里看一看，现在回来，究竟是否适合时宜？我们两个看一看，觉得不是时候，你把个江渭清搞来干什么呢？看你们打架啊！看你们在打架，他才高兴呢！开个斗争会，也不是两家开，一家开一个，开的时候说不定另外一派来了，要抢他走。那个，江渭清高兴啦。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联合有点眉目，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吧。这个事，不要你们马上答复，请你们想一想。我们现在也没有答复总理。还有嘛，比如说，在某些问题上，在这些大的问题上，可以完全采取联合行动嘛，在一个单位里面也可以吗嘛。一个工厂里有两派，我们共同来批判江渭清，可以不可以？我们共同来批判刘少奇，可以不可以？甚至于在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两个组织看来去完全没有理由分裂，而应该联合。为什么不可以联合？如果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机关，原来属于两派的，或者属于几个组织的，现在要联合在一起，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应该得到他们上级组织的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呢？如果大家主张大联合，下面要求联合了，我这个上面组织本来就应该促进你们联合，而你们真的联合了，我应该支持。我可以在这里说一下，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的态度，我们支持你们各种形式联合，包括你们基

层自己的联合。（掌声、口号声）因为只有这样的联合，你们才有希望开工代会，开红代会。否则的话，那好，将来你看，大概是两个或三个工代会，两个或者三个红代会。那最后怎么办呢？两个三个革命委员会呀？省、市可以几个政权吗？我们建议你们考虑这些问题。为了创造联合的气氛，我们建议你们能够首先停止武斗，不要再打嘛！你们要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拳头打倒啊？那个是打不倒的，他的影响，黑“修养”的影响是在人们的头脑里边，你把人头砸烂了，影响在另外一个人头脑里还存在，这个只有经过批判，而批判呢，就要花脑筋，就要动脑筋。现在同学们啦，我看你们也是这个神气，反正屁股坐不住，就是想斗，手就是痒，你要真批判一下刘邓啊，就艰苦一点儿了，就要好好地看点儿东西，写一点象样的批判文章。

刘少奇上个月还说，现在发表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能够驳倒他的。南京的同志们，你们听到这个话，你们很高兴啊？你们服气啊？（口号声：打倒刘少奇！）我们希望你们这里写几篇能够把他批倒的文章出来。你们南大是有名的大学嘛，为什么不应该写几篇好文章啊？那个比拳头困难噢，另外，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各个组织，都要警惕一个问题，或者说要正确处理 and 干部的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发现这样的现象，一是有些干部，现在不敢站出来，说站出来，你们两派，要站在那一边呢？站在这一边，那一边就要揪。这个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发现过。到你们这儿一看，你们这儿特别尖锐，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这个问题你们如果不大联合呀，使得要造反的干部不好站出来，站出来日子也不好过。这个当然希望你们大联合，同时现在你们如果有联合的愿望，就不

要把某一个干部拉在自己这一边儿来，说只准他在我这边，不准到那边去。你们也不要希望哪一个干部站在我这边，给我撑撑腰，我就有力量了。那个不好，同志们，革命群众组织最大的撑腰的是我们的毛主席！

（掌声、口号声）我们也希望革命领导干部，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局势下边，也要站出来革命，在表示站在那一边这个问题上，要十分谨慎。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可能两种或三种情况都有，有的确实是要站出来造反的，那么，他要站在一边，就要加深你们的分裂，这不是他原来的愿望。但是，也可能有这样的人，他稀里糊涂就站在那一边，造成你们的分裂。也可能有的人就是故意地要加深你们的分裂，就宣布站在那一边。所以，我们希望所有革命的领导干部，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要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否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还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任何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只有促进革命大联合的义务，没有破坏或妨碍革命大联合的权利。（掌声）

中央明确地规定过，不能够在两个革命组织之间，支持一个，排斥一个。有人想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那我们就明确地劝告这些人，这种办法保护不住你的，最后革命的小将们会识破你们的面目的。（掌声）我们希望南京和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好地考虑一下中央三月五号给江苏的那些指示，也参考一下我今天提出的这些建议，好好地研究研究，冷静下来，你们用那么三五天，不要出去打架，就在家想想这些问题，好不好呢？（众：好！）如果你们想要的结果，说张春桥今天讲的都是胡说八道，我们还是要干，那我们没有办法，你们打你们的。这是关于大批判、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问题。

我再说一点，关于拥军爱民的问题。这就很少了，因为这一方面报纸上的社论，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了。拥军爱民的问题，我们觉得南京部队从老早，实际上不是现在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老早就介入了，而且创造了比较好的典型。（掌声）他们是从左边介入的，那就是最早梁、杜、吴在南大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掌声）而他们的这个行动得到许司令员、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南京部队的光荣，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光荣。（掌声、口号声：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在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以后，在林彪同志的坚决支持下，整个南京地区的部队积极地参加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掌声）当然因为时间短，没有经验，也有缺点错误，有的地方出的错误也不小，也不少。但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看，应该像对待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一样。（掌声）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不是也常犯错误吗？也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十六条是怎么写的呢？是说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为什么对老红卫兵就另外一个标准啦！我们应该是一个标准。（掌声）咱们都是兵，老红卫兵，小红卫兵，都是一样。错误有，下决心改了就行了，改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他们现在也在改，而且我们这一个时期和部队的同志接触，他们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方面，还是像我们解放军的样子。

我们应该记得，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离开了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是搞不成的。（掌声）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开会啊？包括你们武斗吧！（掌声）没有人民解放

军保卫着祖国，你们怎么能够在这里武斗啊？！国民党能给你们自由吗？可以打呀、闹呀，可带劲儿啦！如果人民解放军出来干涉，一个一个都抓起来，你们就没有这样自由了。因为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毛主席讲过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是毛主席的领导，一个就是人民解放军，保护着我们在这儿搞革命。这样一个条件，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有缺点，我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一样，热情地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来改正，不要把这些东西弄到街上去。（掌声）我不是不要你们批评，对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你们尽可以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当面谈都可以，就是不要上街。（掌声）还有对军管会，既然是军管了，同志们这就是个严肃的事情，军管了的地方那就不能够那样随便地冲了。因为那是军管了吗？它是带强制性的，它是军事管制，是强制性的，这一点希望小将们碰到实在忍不住的还是忍一下。忍住嘛，有意见还是要讲，要批评，包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你们也可以批评。你们这里不多，北京的街上很多啦！”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那个口号嘛，我们当然不能叫他取下来，不过我们一再声明过的，对我们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都可以批评。今天我和姚文元在这儿讲话你们也可以批评，欢迎你们批评。批评有好处，如果听到你们批评，我们会高兴的，不会不高兴。

同志们，你们大家要知道，江苏这个地方，特别是南京这个地方，是很复杂的呀，是蒋介石的老窝。同志们，这一点，头脑里不要忘记。你们刚刚纪念过南京解放十八周年，不要以为十八年，这个地方就都是我们的啦！这个地方有坏人，有敌人，他们会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

错误，利用我们的不当心，利用我们的疏忽，来挑拨，来制造事件。我们无论如何要警惕！我们相信，不管道路怎样曲折，你们中间对立多么严重，我们看这都是暂时的现象，你们会好起来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会把你们联合起来的。（掌声、口号声）跟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掌声）我们希望整个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声）也希望你们和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声）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联合起来。（掌声）这样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正变成按照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掌声）我就讲这一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狠狠批评。（掌声、口号声）

姚文元同志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向你们问好！（掌声）向你们学习！（掌声）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南京和江苏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掌声）刚刚张春桥同志已经带来了毛主席对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心！（掌声、口号声）

我们的讲话有一点分工，刚刚春桥同志讲了两个问题，斗争的大方向的问题，拥军爱民的问题。我这里再讲一个问题，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

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掌声），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讲这么一个问题，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我们的一切胜利，归根到底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掌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的伟大的成就，包括南京、江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下面取得的。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调动了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性，团结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地开火，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地进攻，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战斗的旗帜！（掌声）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是在集中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当中，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发展。我们看全国一些运动搞得好的地区，好的单位，好的组织，根本的一条，都是因为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得比较好，比较坚决，这是我们一条根本的经验。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拿毛主席的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为我们区别是非，判断争论，指导方向的根本的标准，不是小团体主义，不是宗派主义，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所有的新的指示，新的精神，我们要学得快，跟得紧，要执行得全面，要执行得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

同志们，我们回忆一下过去的一年，如果从去年五月十六号起，今天是五月十四号嘛！中央发出那个重要的通知，揭露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揭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是五月十六号发出的，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嘛！再过两天就是一年啦。如果从去年六月一号毛主席批发和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来，那么也很快地要到一周年。当然要从搞京剧革命算起，那就更早一些了。我们是讲群众运动。这一年，我们经过了冲锋陷阵，这一年斗争是非常丰富的，是不平凡的，是充满了很多宝贵经验的，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我们希望共同的回忆一下，在这一年当中，毛主席给我们的，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给我们的关键性的宝贵的指示。拿毛主席这一些指示来对照一下我们的工作，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因为南京啊，也是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早起来的地方嘛！一个北大，一个西安交大，一个南大，都是全国文化大革命起来比较早的嘛！那么这样子哪，来促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促使我们搞好当前的工作，用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来统一我们的认识，我觉得是很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红旗，使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这一条轨道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前进！因为这个里面啊，我们假使回想一下就可以发现，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主席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都给我们指出来了。我这里下面讲的还不完全，为了我们共同学习，我们回忆了一下。

从去年毛主席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来，全国各个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在这个时

候，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这一些人，他们在北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这一个时候，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专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了下去，在全国大搞白色恐怖，一批革命的小将被打成反革命。同时，他们在干部路线上，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主持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亲自制定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毛主席亲自写的起了划进代的那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鼓掌），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的面目，揭露了他镇压群众的反革命路线，这样子使得这一条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彻底破了产。毛主席热烈地支持了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了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新生事物——红卫兵。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出：造反有理，再一次指出“造反有理”。同时，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里面，就指出了：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争取团结的人们，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还是很早的时候。从这以后，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两条路线激烈地反复地斗争当中开展了起来，一批批红卫兵小将勇敢地起来造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激烈地斗争。

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忆一下，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什么哪，他们搞了一个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很快地就看出了这一阴谋，所以在去年九月七日，毛主席就发出了一个指示，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中央发出一个指示，要人民日报发一个社论，不要挑动工农整学生，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这

是对于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是在全国范围内一个重大的回击。毛主席这一个指示大大推动了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反扑，从那个时候以后，不但全国的学生运动起来了，而且全国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在这一种形势下面，在去年的十二月，毛主席提出了，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全面地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各条战线上，我们向资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个总攻击。在这样的形势下面，不甘心灭亡的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又搞了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新反扑就是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同时，用各种办法来分裂、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想分别击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面前，也是毛主席给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了方向。毛主席肯定了上海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亲自决定向全国播发，同时毛主席高度评价了当时上海文汇报的夺权斗争。指出了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一月九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贺电里面，就把毛主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写进去了，就是刚刚张春桥同志也念过的。指出了，你们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因为当时主席在北京指出了，上海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当时在上海听到了主席这个话。基本的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主席肯定了这个基本经验，后来又亲自批发了黑龙江的基本经验，又把革命的大联合发展成为革命的三结合。这样子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一

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啊，就有了重大的发展，就是矛头紧紧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粉碎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提高自己队伍的觉悟。这一条路线，就指引了全国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保证了这一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全国范围以内，对毛主席的这一些重大的指示，执行得好，执行得坚决，运动的发展就比较快，就比较顺利。如果在这个当中，那一个方面忽视了，或者对主席这一些指示不是执行得很全面，不是执行得很坚决，那么我们这个运动的发展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回忆一下，临近到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哪，也出现了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个就是小团体主义呀，无政府主义呀，宗派主义呀，个人主义呀等等。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把夺权斗争搞好，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在斗争当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假使没有这一个条件，就不能够实现毛主席上面讲的这一条路线，夺了权也是不巩固的，也是会发生分裂的。这里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矛头是不是对准主要的敌人，是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个，是搞不搞革命的大联合，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放在前头，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还是把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放在前头。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队伍的问题提出来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连续地批发了很多文件，譬如说，当时北京三司有一篇文章叫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红卫兵小将自己提出来的，毛主席看到以后很赞扬，马上就在人民日报登了，而且在全国广播了。这个时候，毛主席还向全国红卫兵发了一个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派开门整风的经验。毛主席又支持了上海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边战斗边整风，边战斗边整风。接着又批发了延安中学的搞军训的这一个经验总结等等。同志们，为什么前一个时期毛主席连续的支持了这样的一些群众当中的创造呢？因为毛主席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临近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必须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整顿自己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当前这一场大决战搞好。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做了很多报告、指示。对于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有的同志，有的单位，有的组织接受的比较快，但是也有的同志接受的比较慢，甚至有少数人、个别人思想上有抵触。那么现在看来，凡是这一方面搞得比较好的，夺权斗争都搞得比较好，夺权以后掌权比较好。凡是对毛主席这一系列指示，领会不深，不是很深刻的去领会他，夺权斗争就遭到了挫折，夺了权之后又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后再回过头去再学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领会就比较深刻了。

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要不要、能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是半途而废，还是进行到底？要进行到底就要把我们队伍的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要提高。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东西要去掉。我觉得这一些指示，对于我们当前，江苏和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非

常重要的，是值得我们同志们很好地再来学习毛主席这一些指示。（掌声）

在这一段时候，毛主席还抓了什么问题呢？毛主席抓了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批判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必然的发展。我们各地都揭露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总根子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抓了这个革命的大批判，同时，毛主席还指出了要批判在干部路线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毛主席在这个大批判开展之后，又进一步肯定了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一个方针。这就把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就是把当前的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各地对本省、本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结合起来。在这个大批判当中，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带动斗批改。毛主席的这一个思想，希望同志们要很好的学习，很好的领会，很好地接受并坚决地执行。（掌声、口号声）

在这一个时候，主席还抓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支、二军”的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各地都参加了，积极地支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一月二十八号军委的八条命令，一个是四月六号军委的十条命令，还有最近毛主席又提

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掌声）毛主席的思想是很明确的。毛主席批发的军委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怎么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着重讲拥军呢？因为有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冲击人民解放军的这样子一股苗头，有一些左派组织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一些错误，所以制定了八条，特别讲了一下，重点是讲拥军。在八条出来以后，我们军队“三支、二军”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个主流。同时在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在支左工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四月六号军委发布的十条，毛主席批准的十条，他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该怎么对待群众，是讲爱民。在十条出来以后，左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受到了很大的支持。后来，人民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在纠正一些缺点错误的时候，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否定解放军一切的错误。就是把解放军支左的成绩都否定了。这了完整地执行八条和十条的精神，主席提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掌声），这就把八条和十条的精神完全地正确地、全面地统一起来了（掌声、口号声）。

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的时候，就说了，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指拥军爱民的问题。一个是怕同志们犯错误，另外是怕坏人利用。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过程，就知道拥军爱民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就是说革命造反派，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应该在毛主席的伟大路线，伟大旗帜指引下，肩并肩的共同战斗，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掌声）。我上面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一个回顾，就是把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怎么在斗争当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引导我们运动前进，把一些关键问题我说了一下。我们都是拥护毛主席革命

路线的，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执行这一条路线是不是很彻底呢？是不是很完整呢？是不是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拿毛主席这一条革命路线作为我们行动的标准呢？做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我看不见得。刚刚春桥同志讲的那许多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明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在处理两个革命组织相互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他的一些具体的指示、具体的政策，做为我们争论的一个基本标准。不然你怎么解释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透？怎么解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虽然中央三月五号的指示、三月九号的电报说得非常明确，还没有实现呢？怎么能够解释整风搞了一段又搞不下去了呢？

我们应该看到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他的矛头始终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始终是支持革命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始终是要团结各方面的广大的革命力量，包括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的革命干部，始终是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特别是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左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始终是要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这一条路线，是在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就是同镇压群众，欺骗群众，用什么物质刺激来毒害群众的反革命的经济主义，还有分裂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正确地认识毛主席的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东西，我们

要认识得比较深刻。历史告诉我们，胜利的历史和暂时一段挫折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只有把毛主席这一些指示领会下来，把毛主席这条路线坚决贯彻，好好地、反复地学习毛主席这一些思想，我们的运动才能取得胜利。由于离开了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或者在某一些问题上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那末革命运动遭到暂时挫折的事情呢，也不是一个地方。我又看了一下中央关于安徽问题指示，曾经指出了，根据两个月实践的经验，从安徽的夺权，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而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组织，革命干部。我想了一下，为什么毛主席这些指示已经发出好久了，还是一月革命时候嘛，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同志总是不能完全的接受，不能用这些东西来自觉地改正一些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东西呢？还是因为我们头脑里有一些“私”字在作怪。

不要紧，任何人有了缺点，改就是了。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毛主席这些指示多么重要，离不开这些指示的。有了这些指示我们就能够根据这些指示，来去掉我们头脑里的“私”字。犯了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发现了就改，并且接受教训，防止再犯，我们自己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大革命运动当中，不犯一些错误，问题哪，不要不接受教训，不要只看到别人的错误，不从别人的错误中吸收教训，不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吸收教训。如果我们这样的话，那就可能重犯自己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要力求不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志们在这几天把毛主席这些指示好好地回忆一下，重温一下，拿这个东西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段

的工作，至少是这两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看看我们那些地方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那些地方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我相信，只要是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一定可以使江苏和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踏步地前进！（掌声）因为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战无不胜的。（掌声）谁掌握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这一条路线，就一定能够胜利，这是不必怀疑的。（掌声）

这里，我想再简单的说几句，革命的大批判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搞好当前革命斗争，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因为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我们对这个大批判的认识需要提高，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当前的一场群众性的、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因为多年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同刘少奇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最近中央的会议上，很多负责同志，以大量的材料揭露了历史上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的罪行。（口号）

当前这个批判首先是在批判黑《修养》，批判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问题上展开，它已经并且正在深入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党的工作各个方面上，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巨大

的动力。同志们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革命，就是要批判，就是在革命，在批判当中，在斗争当中发展。不搞革命，不搞批判，马列主义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关键的时刻都充满了毛主席的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激烈的斗争。这一种斗争，总是为我们各个革命阶段实现这个任务扫清道路。所以当前这一场大批判，绝对不仅仅是写几篇文章的问题，它要深入到各个方面去，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巨大的动力，成为推动我们斗批改，成为推动我们各个单位斗争的一个巨大动力，所以这是一场很大很大的革命，这是对于我们党内多年来，修正主义的一个总清算。这个批判，大大提高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斗争，譬如说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标语，这是从北京传来的了，打倒刘少奇写成打倒刘少狗，但是你这样子写一写很容易的，把刘少奇这个字丑化一下啦，我们不提倡这样子。真正地要把刘少奇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货色，丑恶的灵魂，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批透，这就要花一点功夫，这就不象写一张标语那样简单，那样省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这个大批判的问题上，准备花很大的力量去搞，大家不是已经看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篇文章吗？这仅仅是一个开头，还要继续地搞一些这样的文章，要把他那一套批透、批臭、批垮，使他永世不得翻身。（掌声）

这个大批判，还会接触到一些保守派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摧毁保守派的思想基础。（掌声）过去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组织的什么赤卫队，还有什么反动的血统论啊，总根子就是刘少奇！（掌声）所以把这一些东

西摧毁，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人觉醒过来，会大大促进我们争取中间派，瓦解保守派的工作。（掌声）这个大批判，会使我们更深刻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一个总的问题，就是从各个方面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他是无产阶级的背叛，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口号）所以我们批判这个东西，批判他那一套，什么外交啦，统战啦，还有什么宣传啦，组织啦，一整套的东西，可以大大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你对照一下么！毛主席的思想是什么？毛主席的路线是什么？刘少奇的东西又是什么？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去掌握毛主席的路线。刚刚张春桥同志已经说到了，刘少奇在华东、在江苏是有他们影响的，包括他的历史上的影响，我们江苏的革命造反派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刘少奇在江苏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把他彻底肃清、消毒。（掌声）要把毛泽东思想插遍我们南京、江苏的每一个阵地。（掌声）这个大批判也一定会促使我们更彻底的揭开，揭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和幕后活动彻底揭出来。（掌声）在这样的斗争当中，有大量的、繁重的工作要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因为要中国不变颜色，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下去，走到底，当前这一仗就一定要打好。

我们为什么不能搞革命的大联合呢？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共同搞这一场战斗呢？为什么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这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影响我们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呢？我觉得不能。只要我们认

识到这一场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在这个斗争当中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同志们能不能做到？（众：能！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刚才张春桥同志已经念了三月十日中央电报当中的指示，我就不去念了。用毛主席的思想检查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革命的大联合？同志们想一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执行中央很明确的指示？想一想。如果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用毛主席的思想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解决好，我看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有了保证，或者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吧！这个问题不想清楚，不解决，那是不行的。最近我们看了很多材料，也和一些同志交谈过，我觉得有这样三个原因在妨碍着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妨碍着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有外因也有内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别有用心的一些坏人，在利用局势挑动和扩大革命造反派的矛盾。包括有一些保守派，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分化瓦解左派的力量。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个问题只要认识了就好解决，我们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江青同志说，不要上当，不要被坏人利用。我希望同志们不要忘记这一句话。

第二个原因，觉得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中央的指示指出，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辩论，要求大同存小异。这是符合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的。毛主席从来就告诉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对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

解决。如果我们方法不对头，这个矛盾就不能解决，甚至就要扩大。看了这几天的“大字报”，有这个感觉，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对，用了些什么方法呢？有的是用打架的方法。打架的方法能够解决头脑里的矛盾吗？还有一些就更不是了，我看了有一些送给我的，有这一派把那一派画一个乌龟，那一派把这一派画一个“袁世凯”。同志们，这一种斗争方式，我很坦率的讲，是比较低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要进行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采用这一种办法。我不希望看到这一些东西，毛主席有一句话，我们应该很好地想一想，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句话是矛盾论里面讲的。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性质方法才能解决，倒过来说呢？你不是用这样一些办法，你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另外一种办法去解决，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美帝国主义要侵略我们，我们就要保卫祖国，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用打倒的办法去解决；我们革命组织同保守组织，比如说，与赤卫队之间的矛盾，我们用争取、教育、瓦解及孤立极少数坏人的办法去解决。但是，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怎么样呢？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解决。刚刚在会场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吗，大家这个情绪，火一上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了大方向。如果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不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而是用武斗的办法，或者用其他一些办法，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头脑里有不同的认识，拳头怎么打得掉呢？或者把电话砸掉，把杯子砸掉，把玻璃通通打碎，这样的办法

还是解决不了分歧，只能把分歧扩大，甚至于原来不是对抗性，硬是把它扩大到对抗性的，即是真是原则分歧，用这个办法也是解决不了的。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我们要看一看北京，同志们，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之间也有矛盾。最著名的革命造反组织之间也有矛盾吗，大家到过北京的同志都知道的吗，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不是还闹过一场吗，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能够一致，就是说，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北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一点上他们一致，在这一点上一致了，他们就能够联合起来，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之后，有没有矛盾呢？还是有矛盾的，还是有争论的，天下哪里有没有矛盾的，没有争论的事情呢？两个人还有不同的意见吗，何况两个派别呢，总是有点差别的吗，这个人抽烟，那个人不抽烟，不也有一点差别吗？假使我们忘记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不能在解决主要的矛盾问题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而是在另外一些矛盾上，纠缠不休，或者认为，只有这些矛盾解决了，才能实行革命大联合，认为我们革命造反派之间，没有一点矛盾，才能实行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那得出的结论啊，就是永远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你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呗，不永远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吗？假使不是这样，根据中央的指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用求大同存小异的办法，原则分歧也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那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不同的意见可以来辩论吗，就是辩论暂时不能解决，放一放吗，我们在当前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呗，这样的

话，我们就能够逐步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解决桥或船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我希望同志们在处理革命组织之间的问题时，能够掌握正确的方法，不要用对待赤卫队的办法，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拚命去搞，挖空心思地去搞那些材料，那不是对待敌人的办法吗？只要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用正确的方法处理，这个矛盾是能够解决的，是能够促进对敌斗争的，是能够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这一点也希望同志们能够想一想，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妨碍我们革命的大联合，没有很好执行中央指示的，就是我们队伍内部的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比如说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这一点我们谈的时候，双方面也都承认的，有这些东西，被这些东西分散了共同的斗争目标，分散了我们的精力，使我们联合不起来。我认为这是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央指示要大家回去，当时不是要大家自己批评自己，回去整风，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整风，不是整一次吧？！不是整人吗？！是边战斗边整风吗！小团体主义的最大坏处在哪里？首先是在于，他使我们看不见大的斗争目标。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对我们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有一个根本的指示，就是刚刚大家念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小团体主义呀！就使我们不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于不关心省里面的大事，市里面的大事，而只是关心我这一个团体的事情。你们这里的团体很大，不是小团体，而是大团体，但是这个大团体哪，也是很容易犯小团体主义

的。我们看到过一些街头的争论，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去了，发生什么“五·八”事件，还不晓得五九事情，两派在这里争论，我们就去听了，我们觉得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谈问题的时候，总是以我这一方，八·二七这一方怎么样，你那一方，红总一方究竟怎么样，如何如何？而比较少的听到，究竟是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方。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我们要分，首先是这样分，就是说拥护毛主席，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凡是这样子，我们都要支持，都要拥护，都要赞成。凡是不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就要批评。不要因为那个地方发生了纠纷，而这个纠纷发生在我这个基层组织，就肯定我这个组织一定是对的，你怎么能这样肯定呢？而首先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衡量一下。我们觉得有这样一种情况，一听到两个组织的基层组织发生了纠纷，先没有问一问是非，眼睛就红了，一红啊，就闹起来，就是昨天晚上，我这里也不回避吧，我十二点以后，到原来省委那里一个地方，不晓得这两派是哪两派我就看到在那里闹，是不是有什么原则分歧呢？问了一下，问那里的战士，也没有问到，但是有这种语言，“把文风来揪出来”，“把你们的后台曾邦元揪出来”等等，我一听这种话我就想，大概总是与两派的基层组织有关系，我希望同志们眼界要扩大一点，遇到了争论的时候，首先要问一问总的是非，不要只从自己的这个团体这一个立场出发，而要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点出发。

刚刚张春桥同志讲过了，我们两个革命组织的基层组织，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基层组织是好的，但是，也难免有个别的坏的组织，因为现在组

织发展得很大了吗？我现在想讲一讲另外一方面的道理，比方说，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缔造起来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党，但是我们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因为有这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否定了我们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就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激烈的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还是放手发动群众揭露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说这一点就希望同志们考虑问题的时候，能够从无产阶级的根本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小团体主义的情绪是很容易滋长的，我们一定要坚决的警惕。我们革命造反派，对于自己的工作，要采取一分为二的马列主义的辩证方法，这是毛主席多年来教导我们的方法。就是要看主流，看方向，既看到成绩也看到缺点。中央不是讲了吗？大家要以自我批评为主嘛，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大家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很好地采取一分为二的两分法，因为我们采取了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我们就能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同时也能够对工作中的缺点，自觉地去改正。大方向正确，并不等于十全十美，假使哪一个组织认为自己的组织是十全十美啦，那就等于讲这个组织不要进步了，不要革命了。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在看到我们这个革命组织成绩、主流、方向的时候，对待自己还要看到缺点、错误，要把这些缺点错误当着我们队伍内部的灰尘，脸上的灰尘把它洗掉。我们对于别的革命组织也是这样，也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过去我们在山东的时候，提出了两个主流，两个

支流：希望革命造反派对待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二军”的工作，要看主流，成绩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支流；我们对部队的同志也提出了，看我们革命造反派，要看大方向，要看到他们什么是主流，革命的大方向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支流。两个主流，两个支流。现在，我想再增加一个，三个主流，三个支流。就是指革命组织相互这间，看对方的时候，也要看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看另外一个革命组织的时候，要看他大方向，看他什么是支流。缺点和错误如果是支流，那就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方法，积极帮助他去解决，不要只抓住对方的缺点和错误，忘掉了对方的主流。所以我想，这样子三个主流、三个支流，这样子提出来，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正确一点，把我们的成绩发扬得更好一些，把我们的缺点错误，去掉的更多一些。

这里，我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希望你们两个革命组织，中央指出不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吗？这个也可以开个小的座谈会，遇到了分歧，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对对方那些意见要听，要认真地听，同时对另外一个组织提意见的同志，也要区别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些思想问题上，逐步地解决我们的分歧，在大方向上一致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掌声）这里什么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采取调和折衷态度，这叫作折衷主义。（掌声）折衷主义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折衷主义的，我也是从来反对折衷主义的。（掌声）但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同时反对两种倾向，这叫不叫折衷主义呢？这不叫折衷主义。因为这两个东西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都要反对。这是坚持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这个不能叫折衷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毛主席前一个时期，最近吧，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批评说，无政府主义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别人的政府，只要他自己一家的政府。（掌声）这个话当然毛主席是概括地来说的啦，是说的很深刻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毛主席还引用了列宁的话来教育我们，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那么怎么领会呢？机会主义走向反面成为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走向反面，修正主义走向反面，就成为无政府主义。这两个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潮，资产阶级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经用这么两种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交替使用。

我举一个陶铸的例子，陶铸开始镇压群众是镇压的很厉害的，在那个文教口，拚命镇压群众，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后来看了不行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路线行不通了，革命群众起来了，他又搞无政府主义，他就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还提出过一个什么绝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就是陶铸的东西嘛，陶铸这种思想该不该打倒呀？

（该：高呼：打倒陶铸）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希望你们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也是不应该怪我们革命小将，因为有这样一些人曾经把这样那样的东西怪我们革命小将。同志们不是的，所有这些错误思潮，包括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其根源，其出处都是那些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对！掌声）但是我们要警惕他们这种影响，就要肃清这种影响。（掌声）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上完全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群众，压制群众，搞白色恐怖，也批判了他们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目的都是为了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支持革命的左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高呼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所以我们对这种思想，我们也要反对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过去在中国是没有多大市场的，只有在欧洲比较多，特鲁泡特金等等这些人，搞一套无政府主义，还写书。中国过去这种无政府主义从来是抬不起头的，这个你要算，过去上海有个巴金，此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有个小说叫“灭亡”，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里面就是描写一些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是英雄，群众都是群氓，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本来没有什么市场，就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这种思潮偶而出现一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反面教员，就说明我们革命队伍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它的出现不过是教给我们必须这样做，增加一个反面教员而已。

所以我在这里说了这一些，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我刚分析了这些方面，三个原因吧，妨碍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妨碍我们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给我们的指示。你们的成绩很大，工作很多，为什么今天着重讲一讲这一些问题呢？因为我们是同志和战友，因为我们要共同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讲一讲这些问题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拿毛主席那些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的指示，作为我们的正面教员，作为我们思想上的无价之宝，好好地学习，好好地温习，希望我们能够去掉那些不符合毛

泽东思想的东西，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这条革命路线，更坚决地更好地贯彻下去，把江苏的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月之内，能够再大踏步地前进。刚刚张春桥同志讲到了文化大革命两种可能性，今后的两种可能性我就不重复了，我相信同志们。这里我说一点，就是出现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革命的大联合还联合不起来，或者出现了打、砸、抢发展，生产上下降，甚至于保守组织也起来了，来乘我们革命派闹分裂的时候。假使出现了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三个相信，我们相信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我们相信广大的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还是要革命的，就是出了暂时的曲折，我们的运动，也一定会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的，（掌声）但是，我同大家一样，还是希望大家根据中央的指示，力争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是这样？

（众：对！掌声）

当然罗，希望同志们眼界放大一点，从整个南京市，从整个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来想一想，从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要求来想一想，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按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力争第一种可能，一定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的更好，对不对呀？（众：对！）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全国的形势是好的，江苏的形势也是好的，有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有广大革命造反派，还是很强大的呀，这里的革命造反派还是经过战斗洗礼的呀；（掌声）还有梁杜吴这样很早就和革命造反派一起杀出来的革命干部。（掌声）所以你们要很珍惜这一些好的东西，要去掉那些不利的因素，要发

扬这一些好的因素，假使我们这样做，就一定会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形成。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的红卫兵，上海的工人、农民、干部，都非常关心江苏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掌声）。我们一定同你们共同战斗（掌声）！今天的会议，虽然开得不大，还有那一边，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些同志要求见面，我们想今天就不去，我们共同在执行毛主席路线这一点上，我们随时可以见面的（掌声）。只要我们是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条大路上的战友，我们就能永远走在一起的（掌声）。如果在将来，你们在江苏省军管会的领导下，你们能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开更盛大的会，那个时候我们上海一定派出更多的同志来到这儿，和你们更多的同志、和战友见面（掌声）。最后我们一起来呼几个口号：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

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

揭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边战斗，边整风！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杜平同志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小将们！同志们！

刚才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给我们做了十分重要的讲话，我建议同志们很好的讨论，认真的执行。

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来南京，是毛主席派来的。（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江苏省、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关怀！（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敬祝我们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掌声、口号声）

江苏省和南京市实行军管以来，得到了南京市、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代表省、市军管会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江苏省、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掌声）同时，希望你们今后继续的帮助我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及时的批评！同志的批评是最大的阶级友爱，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批评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南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同全国是一样的，是一派大好形势。（掌声）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口号声：毛主席万岁！）在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掌声）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更好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集中精力打击敌人；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在干部问题上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确地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为干部站出来革命创造条件；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清除武斗，才能消除无原则的“内战”，促进生产大发展；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掌声）我们是相信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是坚决要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是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内战”的。（掌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小将们！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用最实际的行动，热烈的响应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号召，关于拥军爱民的号召，（掌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为彻底地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夺取南京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而奋斗！（掌声）

最后让我们高呼：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51)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5.24

【摘录】

张春桥：

有了权力机构就可以进行斗批改，不破不立，以后就要在破中立起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有同学说，不要）不要历史，你们怎么进行批判，不学近代史怎么批判《清宫秘史》？教学方面也要改，以前学生跟老师转，教师叫学生干啥学生就干啥，不这样就要扣分，不是象主席所说：教师跟学生转。现在没有现成的，除了课程外，还要学些什么？主席思想都提出来了，要从实践中来解决。

大批判还要搞一个时期，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继续发表，我们要好好学习。实际这些给教改打基础，这个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陆定一的一套还没有动呢。

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

姚文元：

毛主席最近在北京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规。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对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学红卫兵的最大关怀，最大的爱护。……你们这儿已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希望你们不要自满，也不要松懈，能够继续把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

好，搞下去，搞到底。因为中学生人数很多，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能不能搞到底，中学的红卫兵能不能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按毛主席的路线前进，这是关系到我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学的斗批改，就是说，教育改革，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怎样更好地成长的重大问题。……你们已知道了，毛主席批准你们这儿的经验，全国登报和广播，希望你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上加好。

52)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6.02

【摘录】

张春桥：

现在红卫兵的确面临着新的任务，斗批改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我们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即毛主席的思想没有在学校里深入下去。我们在这一方面花的代价要大一些。有些学校有共同的任务，又有不同的任务。文科与理科不一样，文科斗批改，有些不一定在学校里培养“文学家”、“艺术家”，但不等于不要学校了，有人提出是不是不办学校了。我上次也提出，文学怎么教，

历史怎么教。需要一批红卫兵包括青年教师，也要吸收一些青年人，要付出代价。要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

姚文元：

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主席讲：一种可能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能不能在下一个阶段搞好，要打硬仗了。当然，有没有反复，这也难说。上海是全国所一部分，还受全国的情况影响。当然如果有反复也不怕。文化大革命高校是个关键，下面连高中，初中，小学要与工农兵结合，怎么结合法？在全国当前还是抓革命的大批判。只有把这一仗打好了，以下几仗才能搞好，这一仗打不好，下面斗批改就动力不足，斗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对刘邓的批判是一致的。

53) 张春桥关于上海高校运动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6.17

【摘录】

现在你们就象我们去年搞文化革命初期那样，不知怎么搞下去，要在实践中想问题，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眼睛要看到新的苗子要出来，不要只看到逍遥派，不要重复过去当权派不看主流的错误。象同济、新师大联合，新的东西就会出来，目前处于两个阶段的过程中，将会出现大

量的新生事物。主要的精力，发现新生事物，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找出斗批改的道路。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们就靠群众运动，靠群众的智慧，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后边的仗是持久一点，又不是几个月就打下来了，比不得把常溪萍、杨西光拉下来，那么容易。

主席在去年七月就讲，大学怎么改？还不是靠大学里的人？主席当时指着到会的人说：“你去行吗？你也不懂物理学，不懂……”

要依靠群众，从不是当权到当权，可能我们的群众观点不当心也会出问题的，不注意群众，总想我们是高明的。现在最明显的，各个省市瘫痪了，农业收成还是很好的，可见人民决定着历史的命运。原来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收成受影响，没有估计到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我们自己实在不行，完全靠你们。

54) 张春桥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07. 12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南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张春桥同志进来时，代表们起立热烈鼓掌，首长与前排代表一一握手。

张春桥：来了很久了吧！本来今天还要参加另外的接见，因为你们来的时间很长了，所以那个会我就请假不去了，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我离开

南京两个月了，不知你们的进展怎样了！有的省比江苏还要紧张，不过无锡，徐州武斗已经相当严重了。五月又去过南京，我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不到半个月，杭州也没有去，就来到北京了。今天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主要是怎么解决问题，你们那个谈谈吧，有些已经讲过的就不要再详细谈了，谁先讲？

（葛忠龙首先汇报，谈到铁道兵问题时）

张春桥问：铁路上有几个组织，镇反是哪个镇反的？（答：南京部队。）这么大的牌子？当时南京实行军管了没有？（答：宣布军管了。）铁道兵，铁联司有多少人？（有的代表作了回答。）

（葛忠龙汇报到无锡主力军打出来了，铁道兵把他们从无锡接到南京。）

张春桥：有多少人？（葛：有两个火车约四千多人。）

张春桥：没有上海多，上海有二万多人，革委会很头疼，对上海有些影响，他们背着大刀拿了铁棍，上海不信这一套，上海工人不信这一套，上海工人不欢迎。

（汪洵之接着汇报，当谈到五·一四指示以后，南京曾出现一段比较好的局面时）

张春桥：顶多半个月吧！我有个经验，我的讲话只管半个月，我和姚文元同志在上海讲话也只管半个月啊！我现在离开上海已经一个月了，不知上海又怎样了，看来最近又得回上海了。

（接着汪又汇报了五·一四指示以后，有人说张春桥讲话是大毒草，要和张春桥辩论，抵制，缩小张春桥同志讲话的影响。）

张春桥：我也知道这个情况，我在南京就收到不少反对的来信，回到上海又收到不少，有人反对我的讲话，这也难怪！我的讲话，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呀！

（接着又汇报了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情况，南京最近武斗情况，以及杜方平的问题。）

张春桥：你们南京这个样子，对无锡也很难表态。上海就好办了，他们到上海，人家就问他，你们拿武器来上海，看看上海形势，适合不适合？就劝他们回去了。

（促联代表汇报以后，春桥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张春桥：我想跟你们介绍一下情况，你们带来的材料我们都看了。材料带来不少了，现在看来不可能一件一件地解决这些问题。无锡、徐州打得很厉害，王效禹同志去制止武斗，也被包围了，住处的玻璃窗都被打碎了。江西武斗也很严重，江苏要发展到江西这种局势也不难，到那时，局势连你们自己也控制不住了。比如说，甲方先动了拳头，乙方就拿起棍子，那么，以后甲方就不再是拿棍子的问题了。江西的情况复杂一点，区人民武装部，县人民武装部，公社人民武装部，甚至军分区有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情况，有的把枪发给农民了，这也很自然，是基干民兵嘛！结果开枪了，先是小口径步枪，接着是步枪、机关枪、六〇炮也用上了。

我不是吓唬你们，枪开起来，双方就管不住了，中央下死命令，还是那么难。现在双方都有人到北京来了，军区也有人来了，但局势就是控制不住，枪收了很长时间还没有收上来。最近好些了，枪也不开了，但晚上还会朝天放的。这样大的革命，出现这样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牺牲了一些人，革命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现在中央已把军区负责人召到北京来开会了，两派都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是也说要听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是反对武斗的，毛主席什么时候叫开枪的？南京的问题，我看南京第一位工作是制止武斗。五月份武斗规模还小一点，当时我是希望你们联合起来，现在武斗规模慢慢大了，看来南京一搞起武斗，比一·三事件更大了，以前是两派一起对付赤卫队，现在是两方面自己打了，是否双方面努力把武斗制止下来？过去是中央下命令，执行六·六通令呀，六月二十四日通知呀！六·二四通知是各人通知各人一方，但这几句话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得有个协议书。一般是搞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书，双方协议，签字，传达，双方都要真正的组织执行机构，譬如说，武器，枪支集中封存，自己制造的武器，土枪、土炮、棍棒也要收起来，双方都不制造武斗舆论，高音喇叭，宣传车都撤掉，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可以送些材料给你们，江西、河南的协议书可以送给你们参考。浙江的双方也签字了。这几个省对立情绪都比你们强，他们能达成协议，你们就不能吗？你们双方是否能派出代表，由军管会出面主持，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这可以说是第一步吧！南京的工人、农民、学生就会拥护你们。现在群众中都有人厌战了，不愿意武斗，我们的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应该应用四大武器嘛！现在有人提

出以武斗制止武斗，这是错误的。还有人提出要用农村包围城市，毛主席说现在提出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口号，历史条件不同了嘛。过去，是国民党统治，不可能解放城市，所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现在城市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你们包围城市，实际上包围谁呢？农民进城一般是打的造反派，他们都上当了，有一些人用一些煽动性的口号去蒙蔽他们，例如，去捉特务呀！把农民带进城市里，说农民去那个院子里，其实院子里都是造反派，还有用记工分拉，还有的是一天给多少钱拉，等等，动员农民进城这是错误的，不管有多少理由，都是错误的。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要向农民做工作，但也不要伤害农民，他们是受蒙蔽的，一定有人挑动，许多地方农民进城，影响了秋收。当然啦，你们日夜忙着搞武斗也不怕了，反正丰收了有得吃，要是在六一、六二年困难时期，你们武斗大概也没有这么大的劲头了。城市里是不要武斗了，更不要调动农民，因为有的农民就是农民的战斗战士吗！农民不进城，武斗好制止，就好办，一进城就难办了。希望你们在北京商量一下，能不能达成协议，把能达成协议的写进去。如果双方都有制止武斗的愿望的话，要我签字也可以在上面签字。在南京地区先做个样子，然后处理其他地区的问题才有发言权！

第二个想谈谈大方向问题。三·五和五·一四讲话还适用不适用？我看除了个别词句外，现在情况还差不多，联合问题没有解决，夺权还没有解决，还是军管嘛！我看军管会现在有瘫痪的危险。要是那样子，江苏的形势是有利，还是不利？你们没有理由不联合，我们是希望能创造联合条件的。那个讲话，我并不要求你们马上联合起来，这要有个过程，

一·二六夺权问题已经过去，不要再争论下去了可以作为历史教训吧！如果是追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还可以搞嘛！但是要划清界限。人家就是这样希望你们联合不起来。江渭清在北京搞三结合的问题，这笔帐不要再算在“红总”身上了，应该算在谭震林身上，算在江渭清身上，或者省委其他什么人身上。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划清敌我友，这个关系一直搞不正确，你们的水平就不算很高，毛泽东思想就不算学得很好。毛主席告诉我们，首先是划清敌我友的问题。要是刘、邓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时要一起杀，曾邦元、文凤来一起杀，你们在座各位也要杀，哪能这一派要杀，那一派不要杀，当然那时可能有人投降，但是有的就是投降他也不要，因为你们两派是造他反的呀！他对造反派就那么宽大吗？如果你们是坚定的造反派的话，怎么能不想这些敌人呢？当然他们上台，首先中央文革是要杀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你们这两派呢？监狱在等着你们。我们就要使他们永远不能复辟，就是要想这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打倒呢！省委就打倒了吗？没有呢！有些同志有这样一个错误观点，觉得这些都是死老虎，他们还没有死呢！你们一边忙着打内战，你们忙得很哪！他们在那里吃得好好的，很多人都养胖了。我们要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当然这次革命象上海鲁迅兵团的小将讲的那样，不是罢官革命，而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没有基础才行。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就不想这些事，我们的同志，要分析江苏的形势，看看江苏的文化大革命进展到哪一步了？省委的权还没有夺下来，我这里讲的夺权，不是形式上的夺权，而是在政治思想上，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树立起来，还没有把毛泽东思想

宣传深、宣传透。委员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是军管嘛！江苏有个很好的条件，还有梁、吴等同志，有些同志对杜方平有意见，当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他，对其他同志也有意见。如果有缺点，错误，你们可以说话嘛！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嘛！总之，你们还是有条件的，我估计你们要是不联合夺权的话，那一方也掌不了权，要不把保守派争取团结过来的话，也掌不了权。要取得多数人的拥护，如果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听群众的呼声，他们就会自己起来的。比如他们建立反内战联络站，我看很值得你们考虑，他们不信任你们了嘛，那样子你们将来的处境就很困难。至于联络站，只要你们掌握大方向，就不是什么分裂了，有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嘛！在南京有句话讲还是不讲，我同姚文元同志商量了半天，后来还是含蓄一点，不那么直接了，这句话，我原来想讲，下面搞联合，上边不支持，我赞成下面脱离总部。上海当时也是这样，当时上海工厂里都叫工人造反派，但是总部常委下去，我支持这部分，他支持那部分，下边要搞联合，上边不支持，我就赞成他们脱离总部，他们当时意见可大啦，但是后来这样做还是促进了大联合。无论南京也好，无锡也好，工人阶级没有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当然我不反对学生跟工人相结合，但是知识分子不能左右工人运动，加上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学得并不那么好，很容易感情冲动，左右摇摆，当然我不赞成学生马上脱离工人运动，我是说要多尊重工人阶级，发挥他们的作用。上海这一点就比较好，上海的学生，到上海的北京学生，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写宣言都是把工人摆在前面，召集会议都是由工人主持，尊重工人，虽然工人也有缺点与错误，正因为这样，上海工总司的威信是比较高的，

夺权以后，局势也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整个城市决定因素是工人，北京也是这样。南京在这个方面是弱点，虽然南京工人运动比较早就开始了，但是没有能领导整个南京的革命运动。要依靠工人、学生、干部共同努力，不是由我们包办代替，工人阶级天然的最终得要联合，这是由先进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他们感到联合的必要，比如一个工厂一分裂，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煤矿一停止生产，发电厂就不行了，铁路一停止行驶，其它工厂就不行了，这是其他人所理解不到的。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也就在这里，工人不能老是跟着学生左右摇摆，我希望，学生与机关的同志应当尊重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我们应该承认自己有弱点，承认了这点有好处，才能有利于改造思想，不断进步，这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你们还提了许多其它问题，我们还要回去商量一下，当前主要解决武斗的问题，如果不先把武斗制止下来，你们提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许多事情本来不应该由中央解决，可以由当地军管会解决。很多问题中央都作了规定，中央也只能这样解决。

你们对军管会还提了许多意见，我看是正确的。军管会该坚决支持的和该坚决反对的都不够大胆，有点怕，自己的缺点纠正的也比较慢，该平反的就早些平反，晚一天解决又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当然这主要是他们没有经验。中央，主席最近也讲了，解放军支左有缺点错误，只要改好了就好了。军委十条以后，受压制的造反派起来了，但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以后又有了六·六通令。

你们蹲在这里，心挂两头，在这里头脑比较冷静一点好商量，当然不一定有用了。我们要往前看，历史上的教训应该总结，但不是采取相互攻击的办法，你们谁也保证不了今后不犯错误，可能今天批评对方的缺点，过些时候你们自己又犯了，但不要怕，某些时候犯了错误，改正了就是一个经验教训。我们要把全部力量用来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要看大局，今天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谈了，就武斗这件事先解决。

（汪洵之：我们有的同志被抓进去还没有放出来，要求对方立即放出来。）

张春桥：这些都写上，这可能都有，你抓他一个，他抓你一个，双方抓的人一律都放回。（省革总统战分部代表提出高啸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让他们揪回本单位批斗。）

张春桥：我觉得这些问题一定要我们中央表态，也没有什么必要，当然可以回去商量，这事不妨碍制止武斗，其它省还有比这更严重更尖锐的，他们都能达成协议。

（葛忠龙：武斗主要是高啸平策划的，高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高啸平不回去，武斗就制止不了。）

张春桥：那我不相信，现在两派后面都有干部出主意，武斗不会只是高啸平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是高啸平一个人，弄走后能制止南京武斗的话，

那我明天就可以把高啸平弄到北京来，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情况很复杂，我就不相信高啸平会有那么大的能力。

（“公革会”的一个代表两次站起来要汇报“公安联总”的问题。）

张春桥：今天不谈那么多问题，就武斗一件事能不能达成协议？（双方答：能。P派代表表示完全拥护首长指示，回去后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首长指示，要把首长指示的主要精神向南京的同志传达，立即制止武斗，还表示希望能约好时间，地点按照首长指示和红总方面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最后又提出李士英的问题。要求康老接见解决李士英的问题。）

张春桥：李士英的问题，我问过康老，康老讲对他那段情况不很了解，因为时间久还要回想一下，前一段时间他比较清楚，后一段他离开了。

李士英是哪年被捕的呢？

（P派代表答：是一九三二年五月。）

张春桥：是不是那段时间康老已经离开上海了，我再问问康老。

（P派代表提出还有很多代表团，如“六·二七”常州事件代表团等，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并简单汇报了常州情况。）

张春桥：武斗全部都要制止，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好谈，很多东西都是由武斗所引起的，再发展下去你们就控制不住了，湖南湘江风雷是很有名的，但也有缺点错误，以后大规模镇压就错了。

（省革总统战分部代表再次要中央支持他们把高啸平揪回去批斗。）

张春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回本单位，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高啸平不是你们一个统战部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另一个群众组织的问题。

搞成两派组织的对立，这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有些光为一个人的争论就形成两大派。老实讲，你们那一个组织后面都有革命干部和非革命的干部，问题很复杂，不要想得太简单，请你们认真考虑。

（P派代表谈到六·二七机校纵火事件。）

张春桥：这件事中央都知道了，当时军管会处境也很困难，都不敢去，因为牵涉到两个群众组织的问题，后来杜平同志给林总挂了电话，林总亲自批准派军队去，因为是放火嘛！

（省革总统战部分部代表又提出高啸平问题。）

张春桥：你们现在是两派，联合起来，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你们（指红总方面）把这个问题作为第一个要求提出来一定要我回答，也得让我回去研究吗？你们给我那么一大堆材料，很多都是我在南京看过的，只有很少才是以后加上去的。主席最近还问我，你看究竟什么时候江苏才能搞出个局面来？我是想在东南沿海几个省早些打开局面。五月十四号

的时候，我说你们回去讨论一下，如果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你们就干，果然不错干起来了。我对军管会也有意见，很多问题都抓得不紧，大方向也没有好好的抓。把双方都找来开会嘛！那方不来就是他的事了。你们武斗的水平也差不多了，再提高就要动步枪，机关枪了，应该提高一些文斗的水平。我们觉得江苏差不多了，因为已经闹了半年了嘛！其他有的省闹一闹还可以，如果你们象上半年一样，再闹半年那也可以，那就迎接一九六八年去吧！到时候就由群众自己去干，群众还是要革命的呀！他们看到生产搞不好，老是搞武斗，自己要起来干的。不要脱离群众，今天你们是负有领导责任的。现在不早了，今天就讲这些。能否双方在这里达成这个协议，并且打电话回去，先把武斗停止下来，其他问题再谈。

全体代表起立，张春桥同志绕到后排和田普同志亲切握手，并和其他代表一一握手，代表鼓掌欢送首长离开。

（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P》赴京代表整理）

55) 张春桥关于农民进城问题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7.16

现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蓬蓬勃勃发展，形势很好，我不大同意形势不好，没有理由悲观，应该乐观。包括南方的省份，农民进城，开始镇压革命群众，这不能证明形势坏了，恰恰相反，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强

大了，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不能得到工人的支持，又不能得到学生的支持，只好去蒙蔽一部分农民，农民受蒙蔽也不会太久，也会起来革命的，毛主席规定了。

这说明阶级斗争尖锐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出路，没有力量了，他们虚弱，这样看问题，比较符合实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受了伤，甚至死了，在这么大的革命中，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较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小的，这样看问题就不会悲观了。

56) 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 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张春桥 1967.09.09

摘录：

对于“五·一六”的黑手现在还在查，姚文元同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现在凡是搞地下秘密活动的，都是不好的。不知上海有没有？“五·一六”专门搞秘密活动，是有组织的，一天夜里可以在王府井……等几个地方贴满标语，第二天红代会盖掉后，又贴出来，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对口的，他们野心大，但人数少，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受坏人操纵的。

57) 张春桥在空军某部祝捷庆功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张春桥 1967.09.28

毛主席还说：看样子对红卫兵也要办训练班。现在不少红卫兵也是当权派，工厂企业不少不是原来的干部当权大部分是新干部。这些同志革命干劲足，闯劲足，造反精神强是好的，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水平还不高，还必须学习。

军队，地方干部都要学习，办各种训练班，每次时间不要长，不断总结经验，毛主席说：每次最长两个月。

对这件事毛主席很重视。毛主席最近在湖北、湖南、河南视察，一些军事干部，也有一部分红卫兵、一些犯错误的干部觉得，犯了错误，改得太慢，毛主席的接见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不少同志一夜睡不着，第二天还睡不着。

这次视察，毛主席一路上了解了不少部队的情况。现在不少地方当家的是部队，军队的责任特别大，要学习、要提高，中央要依照毛主席这个指示按这个方针办。我们是否可以先办？训练班实际上是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再一点，主席在视察中，反复讲一个问题。就是军队上下级关系问题。解放军一向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是很好的，这是部队的传统。部队里

有三大民主，有正确处理内部关系的作风。从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某些单位、某些方面受到破坏、有些领导干部比较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主席问：为什么有些干部群众那样有气、气从那儿来的？

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些干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起来反他，但犯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了嘛！还有第二种，干部没有犯路线错误，群众也很有意见，这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房子好，出门坐小汽车，这也还可以嘛？但为什么要摆架子呢？见人就训、就骂，不跟人商量问题，不平等待人，这样就不行了。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骂人、训人，二年、三年，人家有气，遇到文化大革命，可找到机会了，好好地整一下。

毛主席说：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好好注意这个问题，调整好上下关系。我们部队有八个字，现在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这也是毛主席讲的。不知道你们的空×军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答：一样的）一样的，那我们就按主席指示改一改，免得有一年总爆发。

毛主席说：当连长当指导员还接近战士，营长以上就少了。

（他）对我们讲：你们的官大了。还说，做小孩的时候，听到一个连长就很大了，营长就更大了。战士跟班长熟悉，连长还知道名字，营长就知道姓，团长有的就不知道了，要特别注意上下关系。

58) 中央首长康生、张春桥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康生张春桥 1967.09.28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根据记录整理，未经首长审阅。〕

康老讲话：

同志们来自江苏，同志们身体好吗？（大家答：好！）今天晚上第一次和同志们见面，时间很晚了。张春桥同志，张政委明天要走，他对江苏情况比较了解，我对江苏情况是今年春天接见南京来的同志，才了解一点，其他如常州、无锡、苏州、南通、扬州根本不晓得。现在和同志们一道学习。是不是都到齐了？（杜平同志答：常州没有到。）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来了，就是常州没有到。部队同志，梁辑卿同志来了没有？（梁辑卿同志站起来答：到了。）很好，很好。我想今天晚上见一见面有些话以后再谈。我很了解同志们的心情，代表同志有好多问题要向中央反映，希望得到解决，这是同志们的责任，也是同志们的心情。同志们来到中央开会，基本上有两个任务：第一反映江苏各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有许多情况需要向中央反映，提出，汇报，解决。但是，还有一个任务，同志们来到毛主席身边，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线。一句话，要很好地掌握革命大方向，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没有这个，问题也解决

不了。同志们也了解，大问题管小问题，大问题解决了，小问题就解决了。同志们在这里，环境比较平静，要好好考虑问题，把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中央的方针政策好好学习。张春桥同志天明就走了，利用这个时间，请他把江苏的事情向同志们讲一讲。现在请张春桥同志讲话。

张春桥同志讲话：

首先，我想应该说一下，对江苏问题的解决，我也没有完全尽到责任。以前是一般的义务，二月份后毛主席叫我和姚文元同志关心一下江苏问题，因此五月份去了一次南京、镇江、常州、无锡没有去，离上海最近的苏州我也未去，南通，苏北更没有去。（康老：徐州有没有来？）徐州主要是济南部队管，我和王效禹同志商量了一下，他去过了。所以，我应该首先说我有责任，当然事情也不只是那一个人的责任问题，可能时机未到，矛盾还没有暴露够，你们都没有感到需要解决问题，打也没有打够，武斗没有斗够，（康老：骂架，还没有骂够。）打倒曾邦元，文凤来的标语没有刷够。在你们没有打够的时候，我们出来说话没有作用，这是实话。五月份，在南京我和姚文元同志研究，根据我们判断的情况，讲不讲话？既然来了，不讲话不行。讲了效果也不大。当时我说过，我今天讲的这些话，请你们考虑，如果有些道理，就照办。不对，你们就打，算我是胡说八道。果然，效果不大。你们认为我说的是胡说八道，我的话只管十天，没有十天就干起来了。所以，矛盾没有暴露彻底之前，问题难以解决。这不是我个人估计，主席也是这样看的。七月初六月底主席曾说江苏形势很好，大有希望。为什么？江苏军管会，无

锡，常州军管会也瘫痪了。大概可以解决了。但后来证明只是瘫痪了，武斗还没有斗够。七月中旬，我在这里见过江苏三派代表，那时候就谈到能不能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他们说可以，以后又说第一把手在南京，要到南京去谈判。实际上一边谈判，一边武斗，你们以为武斗可以解决问题。那时候有一种思潮：“武装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的？最激烈时，“八·二七”退到下关，那时候我们想出来说话，主席说慢一点，他们还可能没有打够。我们现在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打够了？（文凤来答：打够了。）（康老播话：如果没有打够，你们回去再打。）开始，我们对武斗也是着急的，但着急没有用，只好让它打。我不是提倡武斗，我是反对武斗的。但你们要打，有什么办法？你们打够了，就会感到需要到这里来谈判了。证明主席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还要干，我们有这个耐心等待。（曾邦元：群众是不愿意等待的。）是啊！群众不会同意。五月份，我谈过，这样干下去群众会抛弃你们某些人。

现在，全国形势很好，已经成立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有八个省市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基本方向定了。主席希望在年底前再解决十个省，其中毛主席提到江苏。主席希望江苏的问题能够在年底以前解决，当然到那个时候解决不了再说。主席提出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觉得你们打得差不多了。这样华东地区，还有福建也是希望今年解决。现在华东地区，山东、上海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安徽这几天发展很好，浙江基本解决了，江西也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福建，江苏的问题等待解决。这次我们到南昌看了，也是形势很好，他们那里发的枪和夺的枪有七万

枝，大多数是发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收回五万多枝。现在就剩下一个江苏，一个福建，这两个省。一个是前线，面对金门、马祖；一个面临长江口，也是前线。如果江苏问题解决了，对保证上海地区的生产和江苏本省的生产都有很大好处。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一点，而且对于战备也是需要的。我们不能忘掉敌人。既然条件成熟，又有需要，我们觉得可以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请同志们考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解决问题，今天军队的同志来了，希望军队的同志把思想清理一下。因为江苏是在军管会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如果军管会本身有缺点错误，不马上改过来，或自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有偏差，就很难把江苏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而且在这一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南京军区，省军区，二十七军这是主要的，当然六十军也有一部分，我希望这几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很好讨论一下，江苏形势，究竟有哪些缺点错误，有多少，下决心改正，不要掩盖，虚心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如这个问题解决得好，那就能够保证江苏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这是决定性的关键。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互相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很重要的。这是军队问题。

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要搞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是总的方向，应该牢牢掌握住。在目前江苏发展也很快，就我看到的一些材料，大批判开始了，有些搞大联合了，铁路局就实行了大联合。听说南京大学进展很迟缓，如果南京大学进展迟缓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使人感到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问题难办多了。毛主席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主席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造成对立的两大派。研究了上海为什么没有成为两大派。南京、上海在沪宁线两端，一月形势南京和上海是一样好的。“一·三”事件那时候你们是并肩战斗的呀！那时候是一派，如果说有两大派，另一派是赤卫队。上海赤卫队问题的解决靠江苏革命派的帮助，因为一些人逼得跑了，到苏州、无锡、常州，最后到南京。上海、南京造反派是联合作战的，大家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那时形势多么好呀！上海没有接着来一个分裂，但是南京分裂了。这一些原因，我希望同志们好好的想一想。毛主席说，为什么上海形势比较好呢！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无非是你（指我）不去搞武斗，警备区也不去挑动武斗嘛！又说，北京为什么没有武斗，就是谢富治同志，……没有去挑动。上海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干部，军队三方面关系处理比较好，所以局势始终比较稳定，没有发生比较大的分裂。内部矛盾是很多的，几次要大分裂，我们都处理得很好，问题解决得好。因此，毛主席说工人为什么要分裂，一个工厂分为两大派，而且你死我活。第一个原因就是有走资派操纵，挑拨。调查一下几个地方的情况，没有一个超出主席这个估计，都有人挑动。如果不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这些人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或者坏蛋、特务，利用你们造反派的缺点错误，利用一些不正确思想来搞阴谋活动。第三造反派的私心杂念，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什么以我为核心呀！争席位呀！受小团体主义、山头

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人就是想搞以我为核心，到处发展势力，把别人打垮。道理说不过，就动武；拳头不行，就开枪。上海有一个大学，造反派是比较有名的，但他们就是联合不起来。彼此私下都承认是造反派，但是写标语就说对方老保，目的就是要争以我为核心。主席所以说，以后不要提以我为核心，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要我去劝说他们联合起来，不要去争这个核心，争核心没有什么必要。你执行的路线正确，群众就会选举你。主席说：“人家要我为核心，我还不要呢！”遵义会议，主席领导地位已经确定，但没宣布以他为核心。遵义会议以后的十年斗争中，形成了以主席为核心。

这三个原因，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再一个是造反派存在私心杂念，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比较多，这是造成分裂的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有时在一个单位同时存在。至于江苏、南京、无锡怎么样？我们没有很好调查研究。请同志们考虑，究竟是什么情况？安徽就是刘秀山那么几个坏人，两派那么武斗，把黑手一揪，问题就解决了。证明毛主席的分析非常的正确。把这些黑手一斩断，群众很快就联合起来了。究竟什么问题障碍着江苏问题的解决？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你们情况熟悉。这是谈的原因。

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多少年来，从井冈山，从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就是采用这个方法。毛主席讲嘛，有些同志看古田会议决议，不知道那里面批

评的是谁，没有点名，问题解决了。以后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最近，主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这次坐火车，一个列车上就有三派，毛主席就找三派谈话。三派在主席面前辩论了两个小时。主席说：我看你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嘛！三派还有些不想大联合，都指责对方，不是自我批评。主席说：不要讲人家的缺点错误，你就讲你自己的。这一点可不大了。等到他们从主席那里出来，又跑到我们的这个车厢来了，还是谈这个，说对方是老保，说有原则分歧，其实没有多少原则分歧。联合以后总还有原则分歧的，是否有原则分歧就要分裂？特别搞组织分裂呢？毛主席语录一百三十五页那一段，特别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这两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先实行这一条指示行不行？（群众答：行。）不见得！这一段语录是四三年写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但是开会从来没有念这一段。念这一段就打不起来了，我希望在每次开会中，都念一念这一段，虽不能完全执行，至少知道主席有这一条语录对自己有个约束。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是不是不分是非？是非总是有的，那就看大是大非，还是小是小非。如果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观点，老是不改变，那就很难联合了。特别是要去掉私心。这次我们在毛主席谈了以后，一直同三派做工作，火车离北京还有三小时了，我说怎么样？还不能联合？又说主席跟你们讲了二小时还不能联合，那你们回去怎么交帐？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才达成了联合协议，到主席那里去报喜。主席说祝贺你们，送你们四个字：“斗私，批修”。“斗私，批修”就是这样来的。如果私字不去掉，无法达

成大联合的协议，达成了也还会分裂。就是把黑手斩断了，不把私心杂念去掉，特别是造反派领导人头脑里的私心杂念去掉，就不能大联合，三结合，联合了也是不会巩固的。有些人对三结合不感兴趣，因为他已是当权的了，不愿意解放干部，那样又要领导我们了。也不与军队结合，那样他不能独断专行了。因为私心重，派性大于党性，党性抛在一边，不看大局，不照顾阶级的根本利益，那么这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联合呀？当然总有一天要联合的。批修，就是搞大批判。这四个字是互相联系的。要把修正主义那一套，刘邓陶那一套，彻底批倒批臭。这四个字不仅是解决大联合以后的问题，在江苏能不能首先用这四个字解决大联合。联合是为了革命，为了批修。要批修就要斗私，要斗私就要批修。

和这个问题联系着的，我希望江苏的工人阶级在大联合、大批判，斗批改，就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发挥他的更大作用。江苏的产业工人的数量很大的，也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他们最懂得也是最容易接受毛主席思想的，他们私心比较少，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的。我们总感到江苏的工人阶级在这方面发挥不够，还有学生掌握局势的现象。当然，不排斥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工人闹革命有困难的。但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应该向工人阶级学习，不要老是想当老师，应先当学生嘛！上海，江苏的学生对工人运动起了启蒙作用，先锋作用，推动作用，这是不可抹煞的。去年十一月底前，陶铸压制了工人运动，那时候工人很难起来，学生帮助了工人，冲破了束缚。但当工人起来了，学生最好是当参谋，不要代替。当然，我讲的工人阶级的整体，工人内部也有坏人，有的工厂是走资派操纵，也不是那么纯洁的。

无锡“六·二六”是不是都回去了？（有人答：没有；有人答：回去一部分。）常州主力军回去了没有？（有人答：回去了。）全部回去啦？苏州那个地区相反，踢派在城里。那些地方要首先执行制止武斗协议，没有协议，要订个协议，首先要把武器收回来。常州是武装回去的，当时我在上海一听，就说糟糕，这个形式回去怎么行，非打不可。应先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把枪放下再回去。在城里那一派要负更多责任，应该敲锣打鼓欢迎他们回去，把他们请回去。被打到上海的主要是工人，少数是学生，这样搞谁高兴？还不是走资派高兴！到上海去的有的把老婆孩子都带去了，现在天冷了，没有衣服，因为人太多，没有办法解决。被打到上海去的有五、六万人，最高潮达到十万人。安徽走的早些。这一方面，希望南京军区，省军管会，各地的军管会，还有二十七军要主动帮助解决，劝说他们回来。无论如何不能采取武装打回去的办法。我们表示过这样一个意见，我已向主席汇报了，也告诉了杜平同志，……就是先达成停止武斗协议，不要武装打回去。主席同意了这个意见。只有达成协议，只有把武器封存起来，才能解决。中央决定一定要武装左派，要发枪，但有个条件，等到大联合搞好了，局势稳定了才发枪。现在枪在你们手里没有什么好处。南昌、武汉造反派说：最初都非常想枪，第二步夺枪，人家有枪去打你，就只好夺枪。现在就怕枪了。因为局势缓和了，枪没有办法放，生产带枪怕丢了，晚上睡觉放在枕头下边。最后就交还了。现在你们不交枪，武装左派就无法实现。现在有的枪流落到坏人手里。有的把枪卖了，有的把枪换东西了，谁知道你们把枪换给了什么人。你们把枪交回来了，彻底清理一次，再把队伍里的坏人清理

了，编成班排，进行军训，然后再发枪。我们过去也是带枪的，而且是来之不易的，但是也交了，现在我身上就没有枪。所以，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把枪交回来，一是为了制止武斗，一是为武装左派准备条件。

我今天只能说一般的意见，我们估计，也是主席的估计，觉得江苏的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希望在年底前解决。早一点好。一定要拖到年底吗？那也不一定，我看拖得也够长了，差不多了。解决问题，大家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多想一想自己的缺点错误，多想一想对方的长处，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实现大联合。对军队的意见可以提，也希望军队的同志在这一期间，应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有了错误，改了就好了，这是主席的方针。大家看到今天的报纸，毛主席昨天晚上接见军队干部就是这么样嘛！那里有些干部犯了错误，情绪很低，主席，中央首长看望了他们，中央首长谈了话。只要他们认识了错误，改了就可以了。军队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过去打仗有战功，今后打仗还要靠他们。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说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准备开大会，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说这不符合实际，如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个问题我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没有反对过我嘛！至于四方面军的问题，那是张国焘的问题。是过去的事，张国焘负责。我看了你们的传单，完全是胡说八道。在延安罗瑞卿把许世友同志押起来，是主席下命令放的。我看了传单，说许世友同志反对毛主席，被关起来，是彭德怀放的，这是

胡说。这完全是颠倒事实，颠倒了是非。是罗瑞卿关了许世友同志，主席放出来的。（康老插话：许世友同志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打淮海战役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同志们要我介绍的话，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在抗日战争，在山东，以至于反对彭德怀、罗瑞卿，他一直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当然许世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有些可以说是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有正确的认识，他向中央表示，南京军区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负主要责任，愿意作检查。最近他身体不好，中央要他休息。（康老插话：文凤来同志、曾邦元同志要分析一下，你们是知道的许世友同志是一贯的反对江渭清的。）梁吴杜起来造反是他支持的嘛！那时候，他能站出来反对江渭清，支持梁吴杜是不容易的。在浙江问题上他提出的三点是完全正确的。（康老插话：在安徽问题上，许世友同志对严光同志保李葆华压八·二七，许世友同志提出的批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看全部的传单，有些传单是很坏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攻击田普同志是“南京的王光美”，说他到北京搞夫人外交。这样把叶群同志骂进去了，把江青同志骂进去了，而且把我也骂进去了。我不知道是谁搞的，这样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给主席、林副主席送材料嘛！那么我们向中央送材料就是搞夫人外交，这不是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也骂啦！这些，南京的造反派没有人出来抵制，被派性压倒了。这样把我们党说成什么呢？我看了很生气，那里象个造反派讲的话。我希望同志

们对许世友同志的问题要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敌我不分。那时有一股风嘛，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而且不去调查，道听途说，又没有历史知识，根据自己的想象就一定要打倒。最后，我给文凤来同志打了电话，北京给军事院校也是打了电话的。我当时讲一是会不要开，二是口号撤销。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当时文凤来表示坚决照办。中央调查组做了工作。这证明造反派是听话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是算这个帐，只是说一说，当作一个教训就是了，利用这个机会说一说，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当然，这不排斥同志们对许世友同志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同志式的批评，我们是欢迎的。这对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就说这些，天亮以后，我还要回到上海，国庆节以后可能回来，回来再见面，要是不回来，以后再南京去见你们。

康老讲话：

同志们，我觉得张政委讲话对解决江苏问题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提出解决江苏问题纲领性的建议。同志们照办不照办？同志们考虑。我觉得这个讲话是根据毛泽东思想提出的，是解决江苏问题的一个纲领性的讲话，希望同志们好好的研究思索，好好地考虑一下。到这里来开会，首先要把思想整理一下，使我们的思想合乎毛主席的思想，合乎毛主席的指示，合乎毛主席的路线。各代表同志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做一个代表，每一个代表如何能使得我们这会议开得好，每一个代表团以及成员的任务是什么？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

其次，我们这次会议怎么样进行？到中央来解决问题的有十二个省市，事情很多，同时又面临着国庆，许多外宾，许多兄弟党的代表都来参加我们的国庆节，中央的时间是很紧张的。拿我来说，我一方面不大了解江苏情况，刚才我讲了需要向同志们学习，要靠派到江苏的调查组和军管会的帮助，各个革命组织的帮助。我了解江苏问题是四十年以前的情况。我是在江苏上海加入共产党的，当时的地委有徐海蚌，南通、如皋地委，镇江、常州地委，松浦地委，无锡地委。无锡是我比较了解的，那也是以前的情况。南通地区有个红十四军。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而且已经换了人间了。另外我自己还管五个省（安徽、江苏、宁夏、辽宁……），因此，这个会议怎么才能开得好，希望各方面的同志考虑。首先靠同志们发挥积极性。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同志们来到这里以后，首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的讲话，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特别是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同志们录音放了没有？（大家答：放了。）放了几次？（大家答：放了四次。）这不够，应该每隔一天放一次。我建议每个同志每天少则二小时，多则四小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副主席讲话，中央的文件等，端正自己的思想，清理脑子，不必天天往外跑。到外地去串连，你对北京的情况又不了解，三串两串串到“五·一六”里就糟糕了。（众笑。）每天学习二到四个小时行不行？（大家答：行。）两派能不能达成协议？（大家答：能。）

第二、你们有没有带打伤打死人的材料，照片，传单啦？就是说你这一派把我这一派打死打伤了多少人，用很好的纸印成传单，在马路上贴，这样，谁高兴？美帝国主义，苏修特务高兴，不知不觉地出我们的丑。美帝国主义拿一百块美金来买一张。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到马路上去贴。现在过国庆，你搞那些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不可以在街上贴大字报，贴标语，但是要慎重些，不要写刺激对方的，对革命大团结不利的，有些口号也不一定准确。北京现在已经变了，希望你们同北京配合一下，不要搞那一套东西，但不是说有好的意见不能张贴。这一条不晓得大家赞成不赞成？（大家答：赞成。）

第三、你们各派来北京有没有带武器带枪的？如果带了武器，带了枪，赶快交给北京卫戍区。在中央开会不能带武器，开会带枪是很危险的。

（张春桥同志插话：北京革命委员会已有通知。）北京革命委员会已有通知，各个代表团要严格检查一次。（张春桥同志插话：不然到天安门有问题了。）那就没有资格了。你们带没有带？（大家答：没有带。）我倒很愿意听到没有，但下面还要加一句话，彻底检查一下。要辩证一点，不然话说出来就被动了。同志们，你们告诉我，北京到南京去的学生有没有还没回来的？（有的答：还有，大多数回来了。）他们有没有带枪回来的？（有的答：不大清楚。）要做好工作，有的人带枪回来还说是胜利品，那是什么胜利品啊？缴美国的，还是缴国民党的？还不是咱自己的，把夺的解放军的枪当胜利品，是什么胜利品？希望同志们帮忙查一查，各代表团要向各代表讲清这个问题，彻底查一查，好不好？（大家答：好。）检查以后，说话就过硬了，“确实没有”。

第四、大家来开会千万不要再搞打、砸、抢、抄、抓。你们在家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嘛！刚才张政委讲了，如果你们没有打够回南京去打嘛！北京不愿意接受你们这种（张春桥同志说：国庆献礼。）（吴法宪同志插话：据说军队院校，外语学院二十多人还冲到了总参。）军队院校，外语学院二十几个人冲总参谋部，这是违背中央的指示的，违犯中央的命令的，在中央三令五申之后，尤其是国庆节前夕，搞这种事情是完全错误的。你们是代表，要代表正确方面，不要代表错误方面，你们要做一个模范。你们能不能不搞打、砸、抢、抄、抓？（大家答：能。）能不能达成协议？（大家答：能。）怎么说的劲头不大？应该响亮一点嘛！我不是说你们家里都这样做到，家里全都做到还有困难，但在北京不要搞这些东西。

第五、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有意见尽管讲，但是不要骂架，因为那样不仅耽误时间，而且不能解决问题。过去开会，一个人没有讲完，就说人家是完全造谣。我说，你何必那样急哩，人家造谣不是对你有好处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大民主，开民主会，不是开吵架会嘛！当然，这不是说有意见不可以辩论，你要让人家把话讲完嘛！摆事实讲道理嘛！

第六、最后我希望这个会议作出一个模范，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前看不是说在原则问题上不分是非，而是不要在小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这样使我们这个会议逐渐走向分清是非，走向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会议，不是吵架的会议，分裂的会议，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会议。

希望你们保证这个会开成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会议，而不是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会议。

我们在这里讲这一点，希望你们考虑一下，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相信，在革命的大联合高潮中，大家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我们有这个信心，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江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今天上午还要到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那里去会谈哩！（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中央首长身体健康！）

（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整理）

59)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铁路局系统代表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9.29

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在九月廿九日晚 20 时 40 分接见了上海铁路局系统包括上海、南京、蚌埠、杭州四个分局在上海谈判大联合的全体代表，张春桥同志一开始谈到铁路系统联合的重要性时，曾沉痛地说：“我说出来同志们会感到很痛心，毛主席原计划坐火车从南京走，结果无法走，常州不通，不能走，你们不痛心吗？”联指破坏铁路真是罪该万死。

张春桥同志讲南京的大联合：

我们很高兴，南京问题解决了，当然还有问题，解决了内部矛盾还是存在，内部矛盾总是有的，没有矛盾生命也就停止了，问题是内部矛盾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主席讲没有理由一定要搞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今天存在今后还存在，甚至代表名额，席位现在有的组织争得厉害，争名称、名次、名额、这是“三名”主义，三名主义总是有点不好，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是作默默无声的，这是工人阶级的光荣，看那个同志毛泽东思想水平高，分清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少奇的路线，不管他哪个派，选他来当头头。当头头只能说明他的责任重大，没有其他好处。有些人私心杂念很重，想弄个长当，我觉得我们无产阶级不应该为个人为小集团去争名额、争名称、争地位、应该为整个无产阶级去争地位、争利益、不是争山头，不管你是那个山头的，希望你们搞好联合，所以希望你们顺利地联合。以后的问题，当然联合后还可能有反复，不过我们希望反复不要太大，要掌权就要代表整个阶级来掌权，小团体放前面的人是不对的。要把很多人团结起来，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认错了已经改了就要团结他，这不是调和主义，是讲原则的，只要他对吕正操、武竞天和你们铁路局最大“走资派”。我们就应该联合起来，不要为名次地位。谁当第一把手，不要到这方面去争，因为群众是会判断的，有的人一定要干，我看也可以上台以后一定也搞不好的，这是要垮台的，有的人可能勉强争了第一把手，我看做不好无非是他垮台，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在这方面多花时间了，我希望你们包括杭州的同志要很好正确处理，局势稳定了也还会出现分裂，如果没有这样准备分裂了就

难办，刚刚联合起来的单位应该搞好大批判，从斗争中巩固。敌人会挑拨，利用我们的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来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上海局的运动，反反复复，总是后面一定有黑手，肯定有坏人，我不相信工人阶级内部那么喜欢打内战，蚌埠的问题正在谈，我们希望你们联合，早一点联合好。蚌埠斗得很凶，当然你们那里有很多方面矛盾，但比起刘邓陶的矛盾，比起“走资派”的矛盾还是次要的是第二位，还是以大局为重。那么过去的事情要不要谈？过去的事情是非总有的，有时在这个问题我是你非，有时在那个问题他是我非，是不是不讲是非了呢？过去的事情我是他非，但是这笔帐都应该算在“走资派”身上，“走资派”弄分裂，我们工人是要联合，那么工人阶级内部问题谈不谈，可以谈，谈的主要方法是自我批评，不是一般的自我批评，我有缺点我向你们检讨要采取不批评对方的方法，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并不是现在就有的，看语录 135 页就有，毛主席在 1948 年就讲了，现在读语录开始都不读这一条，但是现在联合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读一读（读语录），这是谈拥军爱民的这一条就是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这一条是不好办的，但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最好的办法。主席这次到上海及其他地方都讲了这一点。有一段路我们坐火车，车上有三派都是铁路的，他说他是造反派，他说他是保守派，主席找他们三派代表在车厢内听他们辩论两个钟头，都讲别人缺点错误，主席插话说：“别人的缺点你不讲，你讲自己的问题嘛，人家的问题他自己会讲，人家的缺点应该人家讲，你讲什么，”这样一来就吵不起来了，结果三派都检查了自己，彼此越听越感动，这三派在车上就大联合了，当然也不那么简

单，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我们也做了工作，但是联合了，蚌埠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来解决，已经联合的也可以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工人阶级，当然也可能混进坏人，但整个阶级来说，解放前受压迫，解放以后都当了国家的主人，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我们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是一个阶级有问题可以互相帮助，我讲的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在上海谈好，就在上海谈，我们欢迎你们留在上海过国庆，如果回去谈也可以，因为你们那里还有群众，听听群众的意见，也可能群众走在你们前头你们就要听群众的，群众在你们后头你们就要领导群众，我昨天回来，我回来前问江苏红总，八·二七，我们问他们打够了吗？不够我们还耐心等待，曾邦元讲中央有耐心群众没有耐心了，不要打了，我讲曾邦元的这句话是对的。要相信群众，再这样下去群众会抛弃你们的，因为群众是要求联合的，不会把个人利益小山头利益放在前面的，你们如果有条件就在这里谈，回去谈也可以，上海有些工厂头头在谈，群众锣鼓喜报却准备好了，包围起来了，谈不好就请你们出来到广场上谈，还是回去谈，你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当然不会赶你们走的，欢迎你们和我们一块欢度国庆，你们的贡献不是对你们本身，而且是对全国，我们没有别的意见，主要是希望很快的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姚文元同志谈斗私、批修：

响应毛主席革命大联合的号召，逐步实现了大联合，希望已经实现大联合的地方巩固大联合，进一步实现三结合，搞好大批判，我们向毛主席

汇报铁路联合时，毛主席提出来革命大联合以后搞什么，毛主席讲“斗私、批修”（张春桥插话：这句话是对工人阶级讲的，首先是对铁路工人讲的，也是铁路工人光荣）。我们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想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一定能够搞好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批修就是要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你们铁路的坏蛋反革命分子吕正操以及武竞天以及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斗私就是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斗资产阶级的东西，毛主席讲斗私就是要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的大联合有个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把私字斗掉，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批修、斗私是我们的大方向，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就破坏这个大方向，利用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我们就可以利用毛泽东思想来识别明的暗的阶级敌人，有的同志犯了错误，希望大家学习“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希望我们在大方向上团结起来，敌我矛盾要狠狠斗，狠狠批，内部矛盾要用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希望大家要把毛主席“斗私、批修”四个字很好执行。

（讲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供参考）

江苏常州主力军《挺进报》 1967. 10. 29

60)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谈“抓革命促生产”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 10

（生产问题）

春桥：抓革命促生产，具体时间不要扣得太紧，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大学习搞得没时间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提出后可能工业企业中的阶级矛盾会暴露出来，有时要受到压制，有些坏人当道会暴露出来，港口有积压，超过去年有困难。上海能超过去年水平，国际上就能讲话了，否则难讲话。

文元：（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要和大批判，斗批改结合起来，搞生产第一要看物质条件，需要，第二要看国家的需要，今年农来大丰收，工业要生产满足农业的产品，抓生产不能单单考虑产值，要考虑国家需要，最后需要是农业。

（节约问题）

春桥：国庆宴会，汽车如此之多，使我非常吃惊。进入上海以来，从来未看到这样多的汽车，文化革命革出这样的局面来，这不是个钱的问题，我担心在这个问题上要垮台。

文元：解放初搞了镇反，三反，五反……

春桥：难道明年就要开展三反五反吗？这不是枝节问题，而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提出问题就是要爱护青年干部，否则他们就要变修了。

（产品问题）

春桥：新产品的花布，画得都是电线杆，拖拉机，这是什么突出政治，我们要朴素大方，不搞奇装异服，电杆的线、拖拉机不是另一种奇装异服吗？

文元：要有民族风格，所说新产品已拿到展览会去了。

春桥：快些拿回来。

（工人运动问题）

文元：要王洪文同志把总工会的一套包括劳模制度问题在内，彻底批判，把毛主席的“工人日报”发刊词拿来看看，现在开会，有些搞繁琐手续，讲话，开会；外交都是这样，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

春桥：不要追求完整形式，工代会多开几次，只要路线正确就行了，过去的工会是全民的工会，福利工会，不搞阶级斗争。

（大联合问题）

春桥：工业系统大联合已达到 97.5 %，全市 8000 个工厂，只有 60 多个工厂未大联合。

徐景贤：斗私批修巩固发展大联合，革命大批判，斗批改，推动工业生产新高潮，提两个口号。学校情况，29 所大学，只有一所未联合，中学 80 % 实现大联合，小学教师 99.1 % 大联合，红卫兵十个军区已宣

布成立。卫生单位， 57 个， 70 %联合，有个学校一派保国民党少校，一个不保。

春桥：这种情况我们要出来讲话，三结合要和干部审查相结合，下一步可能在干部问题上爆发分裂。

文元：有些干部长期不讲话，谈到三结合就站出来去支持一派，实际上挑动群众斗群众。学校要搞些军队代表去。

春桥：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巩固大联合，也是阶级斗争。

文元：革命群众组织之间要讲革命原则，要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搞私人恩怨。当前首要任务是学习。大办学习班，斗私批修就要学习。

张春桥：浙江省区汇报干部五百人，工作很忙，主席说：要那么多干什么？只要二十人就够了，机构不要庞大，要精减。

（农村情况）

文元：非生产工分占三分之一。

春桥：搞武斗的人无论如何不评工分，不能农业丰产，人民减少收入。不发工资。是社会主义原则，限七天回来，支部生活要写文章批评，三秋工作要抓好，市革委会成立三秋指挥部。

（工资问题）

春桥：这是全国性的问题，现在不能解决，不要去减，有些改可以进行，如机关作风方面。

文元：机关改革要联系群众，二要搞精简，三要精神振作，市革会 3300 人多庞大。

（宣传问题）

文元：在国际斗争上要批判三降一灭，但怎样孤立一小撮，团结大多数，宣传不够。宣传要讲究方法，效果，宣传重点是阿、越。阿对文化大革命是坚决的，一月革命以来发 50 多次贺电。它这次代表团规模是十八年来是大的，主要学习文化大革命。

61) 张春桥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财贸组时传达毛泽东指示

1967. 10. 03

张春桥同志十月三日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财贸组时，说：

毛主席对陈再道问题讲：“他能够改得好，检查得好，也是高兴的。”

（王少庸同志说：“还要群众谅解。”）毛主席都谅解了，还不是大家都谅解了？

陈毅问题，毛主席讲：“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人搞，还要他来搞。”

毛主席最新指示：

这事要向小将们讲清楚，小将们现在掌了权，如果不讲政策，不讲策略，最后还要到垮台的地步。

62)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庆祝建国十八周年大会上转达伟大领袖的亲切嘱咐和无限关怀 毛主席向上海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同志们问好

新华社（1967.10.02）

参加集会游行的五十万军民表示，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斗私，批修”方针的指引下，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在革命大批判中，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据新华社上海一日电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一月革命”风暴策源地上海的革命群众，怀着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

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以无比高昂的战斗激情，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热烈欢呼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一年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决定性的辉煌胜利。

今天，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驻沪三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五十五人在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会后举行了威武雄壮的节日游行。今天的集会和游行，充分显示了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就；表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斗私，批修”方针的指引下，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在革命大批判中，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今年的国庆，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新高潮中来的。今年的国庆，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日。在这个光辉的日子里，回顾一年艰苦历程和伟大胜利，人们怎么能不千遍万次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今天一清早，满怀革命豪情欢度节日的工农兵群众，革命的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革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指战员，就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他们高举毛主席画像，

手持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擎着红旗，抬着大幅标语，高唱革命歌曲汇成汹涌的红色巨流。大会开始前，人们怀着无比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迎着朝霞，一遍又一遍地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纵情高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颂歌，歌声，锣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庆祝大会在上午九时开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和廖政国同志出席了庆祝大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其他领导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负责人以及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也出席了今天的庆祝大会。

应邀参加观礼的还有在上海的外国专家和外国留学生、实习生，在上海港口的各国海员代表以及其他外国朋友。

庆祝大会由廖政国同志主持。九时整，大会开始，全场起立，乐队高奏《东方红》和国歌，礼炮鸣二十八响。

张春桥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带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上海工人、农民，对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对红卫兵小将，对一切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各族人民的无限关怀。他说，不久以前，毛主席亲临上海，视察了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这是对上海人民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也是上海人民的最大光荣。毛主席嘱咐我们向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向上海的同志们问好！、

张春桥同志说：一年多以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打了很大很大的胜仗。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括在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之流，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拉下了马，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强大，我们伟大的祖国空前强大！

张春桥同志说：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睁大了两只眼睛，妄想从上海能够找到一点值得他们高兴的事情。那就请这些老爷们看一看上海一年来的变化吧！去年今天，陈丕显、曹荻秋之流还能够耀武扬威，镇压革命；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当时还比较小。今年今天，陈、曹之流已经陷在革命人民的包围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们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国内外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日夜梦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那就请你们看一看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上海的代理人的下场吧！

张春桥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决不可以骄傲起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正处在决战阶段。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不可避免地还会出现曲折和反复。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

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在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团结和教育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建立、健全和巩固各级革命委员会。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夺取革命、生产的双胜利。我们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最近的指示，“斗私，批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上海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庆祝大会之后，开始了气势磅礴的盛大节日游行！威武雄壮的游行队伍，在欢声雷动中昂首阔步，浩浩荡荡，向前挺进。闪耀着万道金光的巨型毛主席塑像，矗立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五百多人组成的乐队，紧跟在毛主席的巨像后面，高奏《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要千秋万代歌颂您，我们要永远跟着您，我们一定遵照您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副主席的指示，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学生、好战士！

在乐队后面的是工、农、兵、学、商各条战线的队伍。

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地参加了集会游行。无限忠于毛主席

席革命路线的驻沪三军，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以最大的热情，纷纷奔赴“三支”“两军”的第一线，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新功勋。

游行的队伍中，还有一支上海工人革命派的武装队伍。这支由工人革命派组成的全副武装的队伍，阵容威严，高举着鲜红的大旗昂首挺进，显示了上海人民决心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坚强意志。

革命小将红卫兵和红小兵的队伍，更是朝气蓬勃、英姿焕发，显示了“军政训练”的巨大成果。革命小将们向伟大统帅毛主席宣誓：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在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彻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他们决心狠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把自己锻炼成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上海工人阶级，今天，举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鲜红大旗，威武雄壮地前进。这支

拥有一百多万工人革命大军的革命队伍，最听毛主席的话，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他们顶逆风、战恶浪，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出了“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的豪迈誓言；是他们在千军万马围剿中国赫鲁晓夫的革命大批判中，当之无愧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是他们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立即化为行动，一马当先，掀起了一个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的新高潮；是他们积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支持下，使许多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产品，产量不断增长，质量稳步提高，原材料消耗不断下降，还试制成功和生产了许多重要的新产品。

参加游行的还有农业、财贸、教育、科技、文艺、医药卫生、新闻、出版、体育等各条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已经取得农业大丰收的上海郊区广大人民公社社员，也参加了今天的游行，他们决心做到农业“六好”，夺取今年农业的更大丰收。上海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光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成功地创作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革命样板戏；同时组成千百支工农兵文艺小分队深入工厂、农村，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

63) 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第八印染厂 时的讲话

姚：大家节日过得好吗？（答：过得好。）

张：听说你们厂里毛著学习班办得很好，你们是不是找几个人来谈谈，开个座谈会好吗？（好啊）

张：你们现在分几派？（答：一派。）

张：武斗过没有？（没有，我们黄浦区都比较好，没发生武斗。）

张：黄浦区没发生过武斗？铁道学院可发生武斗吗？（他们是学校，我们是工厂。）

张：武斗也没什么，斗一斗也好嘛！（在谈到北上返沪兵团时。）

姚文元笑着说：噢！对，是那个××司令，对吧？

张：后来我找王洪文，和他谈了许多，当时他们两人都有小山头，我说你们两个党员都不能团结起来，怎么能行呢？都是工总司的嘛。你们化工厂武斗起来很厉害，（是的，在文攻武卫的时候，我们想造燃烧弹，催泪弹，什么都想搞。）（汇报略）

张：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靠积极分子，发动群众来学习，现在要抓紧这两天的学习，你们这样轻视劳动，还想当干部，高人一等，你们想想，吃的、穿的还不都是工人农民劳动创造的，工人农民最光荣，劳动最光荣。

姚：这个问题要放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解决，干部应该能上能下。

张：你们也是革委会干部，你们也要能上能下，劳动，要多接近群众，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再隔几年，你们也会要犯错误，当然不一定是走资派，这不是小节问题，是立场问题，希望你们不要把矛盾上交，这种人踢出去人家也不要的，就放在车间里劳动吧，等以后再处理么（众：我们在斗这个走资派时，他还拿刘少奇的话跟我们辩论。）这样很好么，这样隔一段时期，就拿几个问题跟他辩一辩，他们就会有事做了，就不会只管生产了。

姚：资产阶级思想核心，修正主义核心就是私。

张：你们厂造反造得早，你们是否可以探索斗、批、改，我也没有经验，你们自己揭，总结一套经验。

64) 张春桥接见上海舞蹈学校大联合委员会的讲话摘要

张春桥 1967.10.10

“斗私批修”不是抽象的，你们的私是什么，修是什么？有全面一致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首先大联合委员会活动起来，意见不同就辩论。表面的统一，内部的不一致，与其那样还不如拉开阵线来搞一下。

委员开个会，征求一下意见，相信群众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要革命就得干一点事，不联合委员会恐怕不能代表，现白毛女勤务组可以开两个会，新生事物开始支持的总是少数，这是个规律，运动初期，造反派是少数，

一年多运动，现在各单位 80 %— 90 %都是造反派，革命在发展，先进分子由少变多。

有老舞蹈改革的，积极的，而又能坚持下去的，按毛泽东思想革命到底的。有多少，想一下，先团结积极分子，然后再带领一部分人，再跟上来。先进、中间、落后，在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有的（人）是随大流，演天鹅湖也可以，演白毛女也可以。

65)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示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10.11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联络站勤务组、三报一刊写作班负责人的指示】

大批判，北京、上海负有很大任务。大家可以思索一下，从各种意见中得到启发。主席提出要斗私批修，现在要坚决执行，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按着主席思想，不断和头脑里“私”字斗争的，能够思索的，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现在关键是照主席的话去做。搞大批判首先要有敌情观念，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大批判也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为小山头搞大批判也是不行的。

只有发动广大群众搞大批判，才能把彭、罗、陆、杨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他们就不能复辟，要复辟也没有市场。

这次文化大革命成绩是最大最大的，而损失是最小最小的，报刊上刊登刘、邓、陶后有各种反映，这不是文字斗争，而是政治斗争，不批判刘的东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不能确立，只有把刘彻底批深批透，才能大立毛泽东思想，现在组织上夺了权，但是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的一定要搞深搞透。

不把大批判搞好，就不能痛切感到本单位的斗批改非搞不可。有些学生只想到分配，不想到教育改革，这怎么行呢？斗私本身就是防修。私字发展起来，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老三篇，毛泽东思想就是无私的么，私字发展起来，就要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就要产生修正主义了，不能搞人人过关，自觉起来斗私，自觉革命，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相信群众的创造性。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批刘邓陶的文章，要扎扎实实充分占有材料，抓住中心击中要害，采取严肃认真态度，写一篇算一篇。”文章写好后，不要怕多修改，多征求群众的意见，毛主席对批判的文章，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的，文章应该具有准确、生动、鲜明的战斗风格。关键有三个：

1、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大批判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被敌人占领的阵地。文章的深度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深度，用毛泽东思想去揭露批判他们是代表那一个阶级利益的，把学习毛著放在第一位，重要文章经常看，在斗争中看，领会就能深刻。

2、还要联系群众，针对当前阶级斗争动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正在激烈的进行着，我们要懂得社会的阶级斗争刘、邓、陶有什么表现，国际国内的动态都要了解。主席指示要落实到文章中去，要把自己管的那一部分工作，搞清哪是主席革命路线，哪些是刘邓反动路线。……

66) 张春桥对上海的指示

张春桥 1967. 10. 12

一、全国大乱高峰已过。

二、各区武装部大部分是好的，但也不能否认有坏人。

三、今后要武装革命造反派，要有高炮装备。

四、要召开工人代表大会。

五、要培养工人干部。

六、党的建设问题：造反派中有党员，造反派也要争取入党，今后对党的工作怎么搞，要征求造反派的意见。

七、继续抓好大学习，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

67)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10. 16

〔根据录音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我和姚文元同志回来以后，好多单位都希望我们讲一讲话。但因为这一时期，没有在上海工作，有一些情况还不是直接地了解，所以，我们原来考虑还是先不要讲话，先到各个单位走一走，向大家了解一些情况，学习一些新的经验，然后，看能不能讲一点意见。在这一段时间，恰巧碰到迎接国庆，外宾很多，这样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多下去了，所以，现在直接了解到的东西还不是很多。同志们都希望我们讲一讲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也答应过的。后来看到全国到处有很多传单很多内部刊物，登了主席的这样的指示那样的指示，里边有很多是靠不住的，有一些完全是传错了的，中央随后就决定把主席的指示整理一下，发给大家，这样，就比较有个标准了。现在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三个地区的过程中的指示，已经整理成文件，发给大家了，向大家读了，因此我们就没有多少需要补充的了。这些天来，大家已经在传达主席的最近的重要指示，有的单位很快，抓得很紧，传达了讨论了，而且行动起来了。

这是多数单位。也还有一部分单位抓得不紧，传达得也不快，也没有认真讨论。据了解还有少数单位，现在还没有传达。已经传达的单位，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问题，革命委员会商量了一下，要我今天在这里讲一次话，把主席的指示，在这里再传达一下，同时，有的地方作一些必要的解释，回答同志们提的一些问题。

现在，有了主席的指示，有了林彪同志国庆节的讲话，我们的工作中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把主席的指示落实，把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中提出来的任务落实。我们现在每天事情很多，千头万绪，如果要抓住中心的话，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的落实，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中所提出的任务的落实。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都要落实。主席的指示非常丰富，包括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着的各种问题，都有了正确的、科学的解答。这是我们工作的纲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也是根据主席的这个时期的指示提出来的任务，我们同样应该加以落实，这样我们上海的工作，就可能比较快的向前发展一步。

要落实就首先是思想上的落实，就是要好好地学习。学习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是林彪同志过去提过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就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还是这条原则。我们看到两种学习态度，两种学习方法。有一些单位，得到主席指示，就立刻行动，在实践中间来进一步理解主席的指示，比如说，我们上海的工人同志，对于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一听到传达，他们立刻就行动了。主席关于工人阶

级革命大联合问题的指示，很早就提出来了，应该说第一次谈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上海，是在别的地方谈的。但是那个时候，听到的人没有领会主席这个指示。我自己对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这个指示，也不是一开头就理解的。因为主席的作风很民主，他一个问题提出来，总是反复地找人商量，最初我听到他的意见时，我以为是找我们商量的，并不一定就要下决心这样做了。所以谈了一次、两次、三次，拿我来说，总还以为是在跟我们商量。其实，主席早已在反复考虑，在作调查研究了。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在上海，因为没有出来工作，所以也没有和上海的同志谈。到九月初，我第一次出来和上海的同志接触了，找工总司同志谈话，就向他们谈，主席有这么一个指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对主席的指示接受很快，立刻就行动了。我们常常想，我自己也是这样想，对主席的指示，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并不是一开始就理解的，跟呀，也并不是一时能跟得上的。在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这个问题上，跟主席就没有跟得上。对群众呢，也并不是完全理解，群众比我们理解得快。

现在上海的同志，对主席的指示，大多数单位是在一边学习一边就执行，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学习方法。是一种什么学习方法呢？那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学究式的学习方法，抠字眼，搞概念，比如什么叫斗私批修呀？斗私是什么意思呀？下个定义好不好？批修是什么意思呀？是先斗私呀还是先批修呀？争论不休，再加上报纸登时，因为最初没有把它定下来，斗私批修怎么个说法，是批修斗私呀，还是斗私批修呀？这个问题

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开始时，报纸上有的这个放在前面，有的那个放在前面，于是有许多人就为这个议论纷纷，就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好几次，甚至于怀疑说这里面有谁在搞鬼了，篡改最高指示，罪名好大呀！其实，这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惯，整天就是抠字眼。问你到底你脑子里有没有私呀？你去斗一斗嘛！这个事他没有兴趣，他就是要在这一追追究字眼，要在这里还要发现一个什么新大陆。

我们对主席的指示应该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斗争里边，在革命实践中间来理解主席的指示。我们能够理解多少都要执行，暂时不理解，我们在斗争里边逐渐再来理解。因为主席的很多指示常常是这样，要等到我们有一段实践的经验以后，回过头来才能更深刻的理解。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说吧，我在这里传达过，那是在二月底，主席说二、三、四、五月可以看出眉目。这一句话，不晓得同志们你们是怎么理解的，我最初对这句话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就不完全相同。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就觉得二、三、四、五月看出眉目，就是指的各省各市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上海市把区、县和各基层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这就叫见眉目了。我最初是简单地这样理解的。后来看看不对，所谓见眉目，根据我现在的理解，根据主席最近他对形势分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是指的在我们全国范围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究竟是哪一方面占优势，哪一方面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问题。所谓见眉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已经可以说取得了胜利。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了，好多省虽然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但是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占了优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败

了，这个形势，就应该叫做看清楚眉目了。所以对主席的指示，我们只能够在实践中间逐渐理解，我们的理解，可能错了，那么就在实践中间再来修正，改正我们最初那种不正确的不完全的理解，这样我们就会进步；如果离开了革命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斗争，对主席的指示就根本没法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强调这个原则：要同当前的斗争结合，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在这个精神之下，来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彪同志国庆讲话。应该强调自觉地学习，应该强调自我批评为主，因为里边有斗私嘛！斗私，就是说自己头脑里有私，应该自我批评。不要形成人人过关，所有的人都要过一次关，检查一次“私”字，而且又脱离当前的斗争来检查，那就没有边了。自我批评应当围绕着当前的斗争来进行，比如什么事情，哪一种“私”障碍着我们大联合的进行或者妨碍着我们革命大联合的巩固，什么样的“私”妨碍着我们革命三结合的巩固，妨碍着我们解放革命干部，我们就围绕着这些问题来斗。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要搞无边无际的检查；要围绕当前斗争，不要离开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去整群众，当然更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这个机会来整造反派。我们造反派自己的缺点错误，我们自己批评；别人有意见，包括反对我们的人，他们有意见，我们可以听，但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整造反派那是不行的。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大方向，我们斗争矛头要始终对着刘、邓、陶，对准陈丕显、曹荻秋，对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务必注意，不要被干扰了。大方向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

这是我想在开头说的这么一点意见，下边我讲几点。

第一，讲形势。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接下去主席讲了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讲了对前一段的乱怎么看法，讲了前途，又讲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主席在这儿讲了四段：第一个是讲总的估计是大好，不是小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一个就讲好的标志；再一个就讲好，因为很多人提出一个乱，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再就是讲到前途，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我想作这样一些补充说明，主席这儿讲的大好，是讲的全国的形势，也包括我们上海的形势。这个问题，实际上几个月来是有争论的，在上海造反派中间也有争论。有些人就认为不是大好，甚至也不是小好，他们认为糟糕了，各式各样的议论都有。有的在七、八月份的时候说，当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因为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就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揪军内一小撮，就到处冲人民解放军，更有甚者，以“五·一六”这个集团为代表，到处制造舆论，搞阴谋活动，形式上是攻击周恩来同志，实际上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时制造种种的流言蜚语，又是说中央有几派，中央文革有几派，都是胡说八道，根本连个影子都没有的事，他都可以来捏造。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那么几个人造造谣，倒也罢了，他要造谣，你有什么办法呢？问题是竟然有些人相信，就相信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看，根本不是这样个形势；全国的形势是大好，是空前的好。那些已经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局势都是好的嘛，虽然个别的地方有反复，有问题，包括

我们上海，但是形势是好的。另外又有八个省、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或实行了军管，那些地方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造反派也占了优势。主席特别看重的就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因为这个革命，决定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关键还是群众是不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要看发动的程度，群众革命化的程度。而现在呢，就象毛主席说的：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主席非常重视的一个现象：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家人成了两派三派，夫妻两个是两派，兄弟姐妹几个人那就是两派、三派，一家人是一派的，也不太多。这是好事情。列宁过去看到一些最普通的工人在那儿争论十月革命的问题，他很高兴，因为这证明群众起来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那就把很多平常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统统发动起来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中间有些地方比较乱，而且乱的形式比较“高级”了，武斗的形式也比较高了，比我们上海去年十二月份呀，今年一月份呀，都高了。我们这儿大概就动拳头，这是“高级”水平，到了八月初，包围柴油机厂那一段嘛，水平稍为高了一点，但是我们这儿没开枪，那有的地方就硬是开枪了，不但开步枪、机关枪，大炮、高射炮都动了，就是飞机还没有出动。而这个，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呢？难道我们主张武斗吗？党中央毛主席从来反对武斗，但是被一些人挑动的结果，双方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武斗。我们从来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看问题都要看到两重性，武斗也有两重性，我们反对，但是，你要闹嘛，我们也不怕。无非是把一些炮

弹什么打了一通，打了一些房子，也打死了人，打伤了人。但是，我们是从积极方面来看，锻炼了群众，群众到最后才了解了，才想通了，斗够了，打够了，忽然的自己一想，特别是毛主席提出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嘛，为什么要分成这样对立的两大派呢？这些工人一想，是呀，我们究竟干什么呢？毛主席最信任群众的，象淮南煤矿，那里斗得很厉害，等到后来，解放军去那里支左，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说服了双方。双方在那里开枪，我们部队派两个连到双方阵地之间，徒手进去，拿着《毛主席语录》，给双方的工人念语录，宣传大联合。这样，两方面工人就想这么个问题：解放军这是干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怕我们打死他，还要跑到我们中间来呢？特别是当他们听到主席指示后，工人想通了，两派工人抱头痛哭，说我们上当了，被别人挑动着这样武斗。主席相信群众，这次不是向刚果（布）总理建议，请他去淮南看一看，说那里的武斗最厉害，你去看一看，究竟是为什么武斗，他们现在又在怎么办的。北京就打电报给淮南：刚果（布）的总理要到你们那里去，你们欢迎不欢迎？两派都打了电报来说欢迎。结果，刚果（布）总理去了那里，印象很好。工人阶级本来就不需要这么武斗的嘛！没有什么必要呀！现在他们联合起来了。当然，还会不会再有反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那个地方的群众经过这样子一场大的斗争教育过来了，可能那里的联合就会比较巩固，工人阶级的团结会更好，他们的生产虽然是受了一些损失，但会很快弥补起来。我们有些同志看问题不看本质，只看现象，不看到主流，只看到支流，这样是不好的。实际上是越乱得彻底的地方解决得越快，没有乱够的地方可费劲儿了！到那里

做工作也做不进去。乱够了就行了。我们上海自己也是这样嘛。比如说上柴问题，我们哪一个人主张要他们两家打呀？我是从来没有主张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从来是反对他们这样打的，反对他们两派这样闹的。多少次邀请他们两家谈判，主要是联司一方就是不干，特别是后来发展到那样多的支联站，它以为要得势了，就更加不愿意谈判了。非要打不行，非要在战场上见个高低，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们解放军去也不起作用，去宣传队也不起作用，甚至于到后来革命委员会派人去也不起作用，反而要把你的人捉起来。他们一定要干嘛，那就干好了，反正又不是我叫你们打的，联司的人他还有什么话好讲呀？现在有些人还同情联司，我说你少同情点吧，因为又不是我们要打联司嘛。（掌声）我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他们也没有搞个作战计划叫我们批准。他就要打嘛，那就打一场好了。我看那样子打一场也不错嘛，也锻炼了上海的工人阶级。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讲，八月四号那天我在上海。（掌声）不过，我没有和革命委员会联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上海。四号晚上我坐着汽车到南京路去看了一下，到南京路嘛，车子就有点儿难走了，因为是晚上，大概九点多钟吧，到了南京路河南路一带，根本走不过去了。不过我看到当时路上的人。路两边的人，看到过打联司回来的人，和到那里等着消息的人，脸上都是带着一种胜利的感觉，都很高兴，因此我也很高兴。（掌声）因为证明这个行动是得人心的，人民是支持的，不是反对的。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口号）所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要看一看群众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过去了，对联司的成员我们还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因为多数的人是受蒙蔽的嘛，做

坏事的是几个头头，这些少数的头头只要真正愿意改正错误，我们总是给他机会、给他出路的。我们也不会怎么样。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有些事情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你说不打，他要打，那么打一下也好。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有这个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人的精神面貌，上海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比一月份我们来到上海的时候，感觉到有很大的不同，组织性纪律性都有些不同。这个队伍看上去雄赳赳气昂昂的，很不错。如果要是美帝国主义敢于到我们上海来，碰到这样的工人阶级，碰到这样的人民，我想美国人，他的遭遇就不会比在越南好一点。（掌声）所以事情要从两方面看，不要只看到打联司这个事，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很多积极的因素。当然我希望不要再有这种事情了，不要今天一讲，你明天再干一场吧。我们是永远不愿意这样干的，这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外地有些地方也是这样，比如象武汉也好，江西也好，这次跟主席去看了一看，江西的形势非常好。那里是打得最彻底啦，造反派的代价很重呀，同志们！好多造反派牺牲了。但是付了这个代价以后，那里现在的形势很好，保守派彻底瓦解，造反派在全省一直到各个县，整个形势都是很好的。象武汉也是那样，形势很好。在武汉住了两天，看了一下，那个精神面貌也不同。

所以同志们，你看哪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呢？现在是无产阶级上台嘛，到处是无产阶级得势嘛。所以证明他们那些估计完全错了嘛，把军队就说得那么不好，现在证明，就是武汉，那个独立师，犯了严重错误，但是等到中央下命令说，你这个师要调出来，撤离武汉整训。就这样的部队呀，接到命令还是执行呀！还是全部撤出了，现在在那里学习，学得

很好。我们这个人民解放军呵，同志们，那是毛主席缔造的呀！犯了错误，但是毛主席、党中央讲了话还是听呀！到处揪，揪一小撮，你揪不好呀，就是走向反面。不相信军队，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领导。看起来极“左”，实际上是很右的。

上海在这一段，我们感觉到形势也是很好的。七、八月份上海有点乱了，我看也是好事。我跟很多同志讲过，我也向毛主席报告过，我说我总觉得上海的夺权太顺利了。你看我们这个地方，一月革命以后也没有发生过两大派的对立，也没有很严重的武斗，武斗也顶多动动拳头，也没有开枪，你说是不是太顺利了？这样子也可能有个缺点，因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好处嘛上海比较稳定，缺点可能有些毒没有放出来，不定那个时候，身上又长个脓包出来。毒没有放够，因此，一月革命，有些东西也可能掩盖了。因为上海造反派力量比较强大，什么东西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我说这一方面是个好事，但也可能是个缺点。人家要露头嘛，就让它露出来嘛，我们有点心急，刚刚露一点就把它打回去了。

联司那一回，内部争论很多，但是还好，总算耐心地等了好几个月，因此到最后解决得比较彻底，比如说这一回是八月四日，如果是七月四号动手反击呀，我看是另外一个局面。因为联司，支联站毒还没放够，到八月四号我看差不多了，这个脓包应该挤出来了，应该动手术了。是这样子，小孩子头上长疖子啊，早动手不行的，非要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动呢！现在好象还有人对这些事有兴趣，总想着，唯恐上海不乱。谁如果有兴趣，你们就闹好了，我反正有了经验了，我现在一点也不怕，（掌

声)对这种乱,要闹咱们就闹够,愿意闹多久就闹多久,愿意闹多大的规模就闹多大的规模。但是我们完会有信心,上海的造反派完会有力量解决这些问题,用不着中央帮忙,也用不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表示意见你们就能够解决。(掌声)

毛主席说,上海的形势所以这样好,主要是上海的工人阶级起了作用,因为上海的工人阶级比较强大,有斗争经验。主席还讲,现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这七个单位,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比较稳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群众、军队、干部的关系比较好,“三结合”比较好,所以比较稳定。我们这里,以造反派为主力,革命群众是比较强大,没有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不是成天打内战。我们这里的人民解放军,在支持革命委员会这一点上是坚定的,从一开始就支持革命委员会。这样他们在支左工作中,不管陆海空三军哪一军,拿具体的单位来说都有错误的,但大方向比较好,因此和造反派的关系也比较好。再一个就是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和军队的关系,也比较好。这三方面的关系比较好,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只是革命大联合的夺权,我们现在来巩固这个政权,掌权、用权,我们还继续保持这个大联合,我觉得这是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最重要的一条总结。我们应该很重视,要保持上海群众、军队、干部这三者比较好的关系,使得我们的“三结合”继续不断的巩固和加强。这对于上海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再讲前途。主席说前途会更好,我们完全有这个信心。因为现在在北京开会的有十二个省市,估计到今年年底,这十几个省市都能解决。剩下

的不多了。我们估计，最后可能新疆、西藏、云南这样的边境省分会慢一点。但是也不一定，有时候革命形势的发展，快起来就来得快，慢起来就慢得推也推不动，比如讲革命大联合，九月份一阵风都联合了。我们讲革命大联合讲了半年还联合不起来，可一个晚上它可能就联合了。革命就是这样一回事。所以形势是很好的，前途更好。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它不会自然而然地更好，还是要经过斗争的。如果我们大家都当逍遥派了，你说这形势会更好呀？形势自然而然地就好了，那不可能的。这个还要靠革命造反派积极地做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这个形势才能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也可能受到挫折。所以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够松懈下来，更不能离开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我们松懈了自己的革命意志，以为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上海的形势又这么好，全国到处说上海好、上海好，《人民日报》过几天一个社论，说上海怎么好，如果我们不当心，一天光听这个话，骄傲了，松懈了，那就要犯错误。犯错误嘛，我们的形势就可能被破坏。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存在。所以在讲大好形势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到确实是大好形势，确实取得了很大很大的胜利，但是决不要松懈，不要骄傲。

这是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形势。

第二，讲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主席的这一段话很多同志都很熟了，报纸上反复的宣传了，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

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主席分析了原因，为什么现在会分裂呢？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操纵。第二，就是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人他现在就是在那里当头头，有的不是头头，但是他起重要作用，在幕后策划，这是极少数，但是有。还有第三，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主席是经过充分的调查，他调查了很多单位。我们也向主席报告过上海几个工厂学校的情况，都是这样，基本原因都是这三种。或者三个同时存在，或者有两条，没有什么例外。现在上海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上海的任务就是巩固革命的大联合。要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就要根据主席的指示，还是要注意这三个方面，因为分裂的原因就是这三个方面嘛。所以，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警惕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现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会象去年这个时候，那样公开地来整群众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了，说话没有人听了，但是，他可以变换一种手法来挑动群众，例如群众中间的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潮，“私”字当头，他就要利用。或者某一个组织里面有地、富、反、坏、右，这些坏分子，他们通过这些起作用。我们要巩固已经实现的革命大联合，这几个方面都要警惕，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要警惕，不要上当。有些坏人想要操纵我们这个组织，我们也要警惕，不要上当。同时，要在“斗私，批修”的过程里面，消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个问题，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那就请他们

自己考虑一下，究竟为什么联合不起来？是不是这些原因？如果是，是哪一种原因占主要的？就从这一方面来解决。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单位就是联合不起来，那些“老、大、难”，很有名的单位就是联合不起来。举个例子吧，就是第二军医大的两个组织，这是咱们都很熟的了。二军医大的红纵还是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发起单位。那个地方就是联合不起来。我为了帮助他们一下，也从各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同北京三军的领导同志都交换了意见，和上海革命派，各个革命组织交换过意见，就是两条，一条承认两个组织都是革命造反派，因为他们两家就是他说他是老保，他说他是什么，就是这样攻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我们认为他们两家都是革命造反派。第二，我们希望他们革命大联合。还有没有第三呢？没有了，我们就是这两条。至于他们能不能联合，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帮呀只能帮到这种程度，就是把周围一些条件都给你创造了。我们希望这两派，你们也应研究一下究竟你们不能联合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挑动？有没有坏人？还是你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多了？你们有什么根本利害的冲突，两家非要你死我活？这件事我们相信你们军医大有那么多的革命群众，还解决不了吗？你们都是大学生了么，很有本事了么，应该能解决了。在革命大联合这个问题上，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还是坚持按系统、按单位、按部门实现大联合，在学校也是这样。这个原则是贵阳的经验，这是毛主席肯定了的经验。在上海曾经一度对这经验发生了怀疑，现在我们重申，还是按这个原则来解决问题。现在有一些跨行业的组织，他们总想恢复，我们还是劝这些同志，你们就在你们单位里加入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吧，不要再去

拉一个山头！因为拉起一个山头，过两天还是要撤掉么，何必多一层麻烦呢！据我知道中央这几天就会发一个通知，重申这个原则，中央正在起草通知。我们的革命大联合是讲原则的。就是要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同刘、邓、陶，同陈、曹作斗争，共同对敌。离开了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方向就谈不到革命大联合。我们工人阶级内部，革命学生内部，革命干部内部所发生的分歧争论，都只能以这个大方向、大原则作基础，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分清是非。是非是有的，但是是非也有大有小么，也有一些问题已经解决了的。笼统的讲不算旧帐，这不大妥当，因为第一次有些话还要讲一讲。我们觉得如果两个群众组织彼此还有意见，又不愿让人家知道，我们劝你们就找一个房间，双方坐下来，关上门自己讲好啦，讲完就算了。那有算不清的帐呢？我们总要团结对敌么！现在有些单位就是这样，有一批人说是保守派，被打了下去；有的人，说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炮打过我了，那么又不能得势，又不能活动，受压抑。好啦，那么让给谁活动呀？彼此现在还在闹，我和有些单位同志谈，都是青年，我问：你们就是这些问题吗？你们就到一个地方彼此把意见谈了，算了！”炮打”已经过去了嘛，现在不炮打了嘛，那还要算这帐干什么呢？已经过去就算了。”保”，保过几天，现在不保就可以了嘛，彼此有意见，大家到一块说一说，我们还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要让真正的敌人在那里高兴。昨天，我找京剧院的人谈，京剧院就这样嘛，把个周信芳放在一边没人管，小青年，双方的人就干呀，整天斗。那能斗出个什么结果来？你们这样”斗批改呀”？最后演来演去还是《智取威虎山》、《海港》。外宾来啦，

人家说这两个节目都看过了，新节目还没有。这样消耗了我们革命派的精力，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我们内部关系，就象主席说的：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上纲”了，说是“立场”问题，毛主席说：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犯了一次错误改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对敌。

还有个“以我为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说几句，因为上海报纸用过一个“无条件大联合”的说法，引起了一些争论，有的同志甚至怀疑，《文汇报》篡改了主席最高指示，非要“炮打”不可。我觉得《文汇报》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够谨慎，但是你要说他们完全恶意的篡改，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你说一点也没有影子吗？也有一点，只是他们的理解出了一些偏差。因为主席提“以我为核心”时，是在上海一次跟我们谈话中间讲的。讲到上海有个大学，那里两派的情况。我想就讲清楚吧，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因为毛主席对“反到底”兵团记得很清楚，问我们：这个“反到底”最近怎么样？因为“一月革命”中间他们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起草《告全市人民书》有交大“反到底”的人，主席还记得，他就问这些同志怎么样？交大文化大革命怎么样？我和姚文元同志就向他讲了。讲的中间，我们就说：交大有这个问题，别的单位也有，就是都在争以谁为核心，这个大联合，都强调“以我为核心”。就以这为条件，如果不承认“以我为核心”这条件，就不能实行大联合。主席了解这个情况就讲了文件上写的这一段话：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讲了王明、博古等等，我们党的历史。然后就劝他们“无条件的联合”。这个地方讲的是交大，

交大的条件就是“以我为核心”。那么“无条件联合”呢？就是指的不要拿“以我为核心”作条件，不能普遍地都叫“无条件”。这句话用在交大那是完全对的，用在某些单位也可以的。有些单位争的不是原则问题，不应讲这个条件。讲条件干什么，讲那种条件呀，说你要给我两个席位，什么“二比二”，什么“四比四”，争那个东西，不答应那个条件就不能联合，我说这样单位也应该无条件联合，不应该讲条件。但是不要普遍地讲“无条件”，因为有的地方要讲有条件，比如说，双方的分歧很大，有些是非如果不说清楚一点，联合起来不巩固。那与其那样急急忙忙联合，还不如双方坐下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好好地交换意见，把一些是非说一说，然后联合起来。但是这些是非也不要搞得那么彻底干净，那也不可能，彼此了解了，接近了，能联合就联合。因为在联合过程中，在今后斗争中间，还可以继续考验嘛。这是革命大联合里面“以我为核心”的问题。

再讲一讲政策，要正确对待战友、对待群众和对待干部，这样我们的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才能巩固。

只有大方向正确，而政策不正确，这个革命也不见得就胜利，很可能是失败。这一点在目前应该向小将们说清楚啦！因为我们那些小将呀，过去我们都支持你们，现在还是支持你们的，人家一攻击你们，我们就说：你们要看他们大方向！我们小将自己呢，现在也是这样：你们要看我们的大方向！这是完全对的，以后谁要是攻击你们，我们还是这样。但是，同志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掌了权啦，光讲大方向就靠不住了。毛主席不

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呀，“生命”有危险啦，就是说有垮台的危险。总理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八一”起义，人民解放军诞生，你说大方向正确不正确？”“八一”起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大方向完全正确。但是“八一”起义在当时政策上路线上是错误的，就是还不懂得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思想，还不懂得怎样创造革命根据地，如何正确处理这个方面的关系，这些政策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犯了错误，不是去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带着队伍往广东方面跑，希望到汕头一带，找个海口，打通国际路线，外国船就可以来支援。这个路线是错了嘛，但它大方向对，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最后这个南昌起义等于失败了。所以不要满足于我们的大方向正确，要很好地学习党的政策，用毛泽东思想来决定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再紧紧地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策略思想。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要犯错误。不要以为自己大方向正确，但是如果大方向都错了，那就问题更大了。现在是讲的大方向正确而如果不注意政策和策略，我们也可能要失败。比如，如果我们不正确的对待群众，不去做受蒙蔽群众的工作，不去团结多数，我们就会搞成孤家寡人。有的单位，据我知道那个造反派到现在还很小，始终没有扩大，去年是多少，现在还是多少。那样子的造反派，你说你要掌得了权啊，我看靠不住。因为你要掌权，就要靠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的支持，这个政权是没有力量的。有了群众，有了广泛的群众才有力量啊！我们不是经常读《毛主席语录》吗？主席说的，什么叫铜墙铁壁那一段话，我们不是经常读吗？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一方面读这一条语

录，一方面就不按这个办，搞孤家寡人，不去做群众工作。可是，等到搞革命大联合时呐，就拚命的争席位，有时为了一个席位，可以争它三天三夜，最后还没有结果。不要去争席位，起决定作用的，同志们，是你的路线是否正确，你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核心是一定要有的，没有核心是不行的。任何一个组织，它出现了有公认的领导核心，大家都拥护它，这个组织就比较好了。但是，这个核心也是要靠它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路线，坚决的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能靠人多。人多，可以以势压人，但是到最后，也可以垮台。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那时还不是人多势众啊，它几百万党员，几千万群众，人是多了，但是路线不正确，等到反动派一个早上起来，没有几天嘛，差不多全部垮了。所以光靠人多是不行的，要靠路线正确。毛主席上井冈山，人不多嘛，但是，路线正确就能发展。后来王明路线一篡夺，我们就受损失。还是看路线，要讲人多人少，同志们，你们去查一查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嘛，在七届中央委员里面，你们看看有多少是过去反对毛主席的啊，是犯路线错误的啊！毛主席在里面，并不是多数啊！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路线正确，最后，大家还是拥护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党中央主席呀，遵义会议以后也不是毛主席做中央主席呀，那时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嘛，但是，究竟谁起作用呢？谁胜利呢？全党全军是跟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所以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真正的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造反派的领导人，就不要去在那里争那个席位，不要去争那个第一把手，你做第二把手啊，还可能真正起作用，如果你是正确的话。你如果是错误的，

从私心杂念出发的，我看你当第一把手早一点，垮台也早一点。因为革命的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想搞私心杂念，搞个人的名利地位，搞这一套的人，最后统统不会有好下场。你们看嘛，看看刘、邓嘛，看看陈、曹嘛，你现在争的那个地位有刘、邓高啊？有陈、曹高啊？那么垮台还不是一样垮啊？所以不要为这些，还是要努力地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要去掉“私”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的对人民做出一些贡献。我相信有很多好的同志，现在他们在那里不争，什么也不争，默默无闻。每一次到工厂里去，和基层的同志接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些很好的同志，他们现在在全市谁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看，我们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反对那些争名夺利的人。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应该擦亮眼睛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来看一看究竟谁是对毛主席路线是忠实的，谁不是。我们要信任那些站在毛主席路线上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而不是只看有些人好像能说会道，其实靠不住。当然有些同志，他们有错误，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改，改了就可以。

再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主席这里讲的很清楚：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工作。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不大喜欢做这方面的工作，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不大敢见这些人，甚至不大敢往来。我说这是不好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特别是已经掌了权的领导人，应该接触各个派，不管它是左、中、右，都要接近，要团结各方面的人，思想不通的人，要向人家做工

作。我还记得上次我在这里讲过的，先锋电机厂的同志他们告诉我的，他们那里有些人，原来参加了赤卫队，后来造反派的同志对他们态度不大好，不理他们，在二三月整风的时候，人家就提意见了，说你们这些新当权派呀，还不如老当权派呐！老当权派过去我们有了思想问题还找我们谈一谈呐！造反派的同志乍一听这个话有点恼火，说你这是“老保”翻天，后来一想，人家讲得是有些道理呀！我们是不大找人家谈话嘛！过去有的支部虽然它路线错了，但是他倒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找人谈话的。所以要很好地对他们做工作，要找他们谈话。现在还有些逍遥派，好多同志跟我讲逍遥派太多了，怎么办？一方面我们劝那些“逍遥”的同志，上一次姚文元同志在讲话里面讲过的，不要当逍遥派呀！革命还没有成功，你“逍遥”不得呀！你在那里当逍遥派，可要当心啊！有人要找你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我们想到会有人拉他们，我们造反派的同志为什么不去找逍遥派的同志谈谈话？我说这个责任呀！在我们造反派，特别是已经掌了权的造反派应该承担责任，要找他们，和他们开座谈会，问一问他们，你究竟为什么不来参加活动啊？你有什么愿望吗？他们可能提出很好的建议，不要把这些逍遥派都看成不好，很讨厌，那样子，我们就脱离了群众。我总觉得现在我们有些事，干得不是那么得到这些人的同意，他们有些不满意，所以他才“逍遥”的。当然，他们里面也有各色各样的原因，有的人就是不大想革命了，或者等待毕业分配，就“逍遥”吧，反正现在发了工资了，有的人一发了工资就上饭馆，有的到苏州去逛一趟，去一趟杭州，那样的“逍遥”，也有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向他们做工作，这是我们的

责任。还有一些“老造反”，现在也当了逍遥派，那更应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嘛。因为既然叫“老造反”，（其实所谓“老造反”，不过一年嘛！也没有什么老！都是很年轻的，叫名字还是小张小王的，不是张老王老，但是因为“逍遥”，他说他是“老造反”。）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造反到底，革命还没有成功，就退出来了，这个不好。总而言之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对各式各样的群众都要做。现在不要热衷于开群众大会，要把群众大会和开小会谈心、个别地谈心结合起来。现在不大习惯于个别谈心了，有的人说那种方式是老一套，这一条不能打倒，谈心呀，这是毛主席所主张的，我们还是应该用这个办法来团结群众。

上面是说正确对待战友，正确对待群众，还有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里都讲了，我想不重复地念了。我只重复一下，主席对这个问题非常之关心，在视察过程里面这个问题谈得最多，关于干部问题，这一方面作了很多调查，问了很多，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主张，传统的政策。这个记录里面也讲了：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我们党就是自从毛主席的领导执行了毛主席干部政策以后，才兴旺起来。现在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那么我们的“三结合”到那一天才能结合起来？所以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大量的办学习班，就是受到教育的人应该很多，真正不能用的人应当很少，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现在，我们这里的干部如同全国各地一

样，大部分都是好的，比较好的，也有一大批干部解放了，但是还有一些干部没有解放，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解放更多的干部，就是按照主席的指示来解决问题。不但要解放他们，而且要使得他们大胆的工作，在工作里面来考验他们。已经解放的干部自己也应该大胆的工作，缩手缩脚恐怕主要的还是“私”字在作怪。有的人说：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了，不能再犯了。我看，越是这样想，越是要犯错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接受经验教训。犯了错误，检讨了，就应该振作起来。我们为革命，不是大家常常讲嘛，刀山敢上，火海敢下。现在我看有些人，不要说刀山火海了，连接近群众都怕得要死，这种精神面貌是不行的，一定要在实践中来改造自己，想脱离革命的实践，小心翼翼的在那儿“改造”这是不行的，不会有好的效果的。犯了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就好了，主席到处讲这个话。一路之上几乎每一次接见各地的同志的时候都是问：你怎么样？你犯过错误没有？大家对这句话，答复一般都是说有错误，没有哪一个人说我过去没有犯过错误。主席接着就问：你挨整没有？有的同志说，我没挨过整，主席说，这是你一个缺点，有的同志说，我挨过整，主席说，那你这个人可以，你挨过整，好。因为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啊，挨了革命小将一些整，到现在还一肚子气，我说，你那一肚子气应该消了，对于工人造反派，对于红卫兵小将，有什么气可以要记下来？你们在哪儿记仇啊？不要再记这个了，应该想到是大有好处，整一整，好处很多。有一个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那时被保守派关了四个月，那整他整得好苦了，现在他站出来了，那一天主席接见的时候，就问他，你怎么样啊，叫保守派关了四个月，一点好处都没有呀？那个同

志的精神面貌很好，他说好处很大，大有好处呀！我看不管是给保守派整过，被造反派整过，当干部的都有好处，至少官气小一点，这不就很好吗？应该从积极方面想，不要在那里一肚子气了，什么委屈啊，埋怨啊，完全不对的，应该很好地和造反派同志合作，向造反派学习，同时也帮助小将们，小将们有些事干起来，没有经验要犯错误，干部就有责任帮助他们，避免一些错误。现在我们就是要根据主席的指示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把干部继续解放一批，把“三结合”好好地推进一步，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或者健全起来。有一些革命委员会不够健全，比如里面缺人，或者缺少那一个方面，那末现在就加几个人嘛，加以改组好了。不要把革命委员会搞得一成不变，也不要搞得太形式，不要在那里争呀！你们也不要急嘛，这个问题总归会解决的。你那个革命委员会为什么不可以经常增加一些人，减少一些人呀，可以换一换嘛！现在有些地方就为了革命委员会，到底是打倒呀，拆台、补台呀，争论不休。我们说只要它不是被反革命把持的一个组织，我看用改组的方法较好，如果被反革命把持了，那就当然要重新成立了。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上海的各个区、县、局，工厂和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看看能否建立起来。这个要请同志们去考虑（掌声）。

现在顺便说一下，上海还有武斗现象。这也不要紧，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这里想说的，是有时候开斗争会，还有变相的武斗，变相的体罚。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彻底改过来？毛主席看了我们斗陈、曹的电视大会。看了这个会，当然有所评论。这个会还比较文明，陈丕显、曹荻秋还给他坐一坐嘛！但是还有些单位，据我所知道，并不那么文明，有时候还是

要搞喷气式。不要那样搞了，毛主席对那样搞法不满意，说有些地方一直在搞喷气式、挂牌子，这个不好。动拳头打人不好，不要打嘛，还把人家关在“牛棚”里，现在有些单位的“牛棚”还未拆掉，这个也不好。现在还有到处抓人，这个现象也没有停下来。毛主席已经讲了，对坏人呢，还是要他那个组织自己解决，不要我们去抓。这一条要看我们造反派的本事。执行主席这一条不大容易，要做工作。文斗也要提高一些质量。文斗并不表现在给他个座位坐在那里，我看还是要把我们讲道理的水平，搞得更高一点。那个斗陈、曹的大会呀，不知你们感觉到怎么样，我感觉应该允许陈丕显、曹荻秋申辩，允许他辩论。我看了几次，我们同志们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当然进步了，我看他们几位现在本事也学会了，现在一问他什么，就不象开头那个时候给你争了，现在你问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不记得了，请你们揭发。这是一个办法，他反正不跟你顶牛，辩论。还有一个办法，说什么：有这么回事，我记不太清楚。或者说有这么回事，我有罪。这样电视大会我看了几次觉得没有味道了，还是辩论才有味道嘛！真理在我们这一方面，怕什么？我看各个单位开斗争会批判会，也是要允许辩论，要让人家申辩，他说不是，事实不是如此，应该允许他讲；他说我们这个道理不对，也让他讲。这样才能锻炼我们，才能教育群众。这一条呢，也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能否把我们斗争会的水平提高一些。

关于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我就想说这一些。

第三，说一下斗、批、改。这个主席的指示很清楚了，我只补充这么一点。现在我们还是要抓紧大批判，用大批判才能推动大联合，巩固大联合和“三结合”。现在机关、学校、工厂的斗、批、改，本单位的斗、批、改，严格的说还没有搞起来，特别是批和改，有些单位斗也没有很好的斗，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也没有搞清楚，所以要认真地搞起来。同时我们要看到，如果本单位的斗、批、改不搞，有一些问题很值得注意。比如说我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机构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各级革命委员会，好多造反派的组织，脱产人员也越来越多了，这个不得了呀！铺张浪费最近有所发展，用的人多，喜欢开大会，搞得很铺张。有一个工厂，全厂才有一千人，但是开大会一定要去借一个三千人的大会场。有一个厂只有九十几个人，厂革命委员会成立，也要去借一个电影院。开个什么会也要印很多海报，印请帖，请帖印的水平之高呀，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宴的请帖。（笑）我作过比较的，我那里是经常收到请帖的，我已经向革命委员会建议，把这些请帖、海报，集中一下，很可以开个展览会了。当然也要找一些艰苦朴素的单位，他们不出海报，他们有很生动的事迹，加以对比。搞那些干什么，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嘛！九月二十二日，咱们上海的二十二个群众组织，开了一个会，开什么会呢？节约闹革命誓师大会。但是这一个会议，印了一千份海报，用硬卡纸印了精美的邀请书，在这个会上拍了很多照片留念。这个叫节约闹革命？这是自己挖苦自己嘛！（笑）有很多人可喜欢照像了，我看到一些厂报，那上面把他一个厂的造反派的负责人，把市里去的人的讲话，登了好大的照片。登他干什么！我说你那个照片，那是糖衣炮

弹，登谁的照片就是向谁放糖衣炮弹。如果自己看了照片很高兴，那就证明，这位同志也中了人家的糖衣炮弹。（笑，掌声）你看今天会场上，台上很清爽，所有的摄影记者，电影摄影师，统统没有请他们来。这个我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次，我说你们照了干什么？反正照来照去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笑，掌声）我说我别的权没有，有一个权我是有的：到最后审查电影的时候，你那个上面有我的镜头，我就剪掉。（鼓掌）除非是中央决定的，哪个电影里保留哪些人的镜头，那个我没有权，我有权能剪的我一定剪。我说你何必照呢？不要拍电影嘛！这电影机，电影胶片，应该去拍劳动群众，拍我们工农兵的劳动英雄，不要拍我们这些人（热烈鼓掌）。现在一定要严格，我们希望广大的群众，监督革命委员会，监督所有的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同志们，监督你们的那些头头，那些领袖，不要他们在那里铺张浪费！（热烈鼓掌）有一些事情，实在是看了很痛心的。刚才我举了一些例子了。明明我们的码头，积压了那么多物资，需要输送，我们的卡车不够用，我们的汽油并不是不紧张，但是很多同志用卡车用汽油根本不在乎。有一天，我到郊区去，我一看这么多卡车干什么的？一卡车一卡车的人，一看上面写着一个标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知道是到淀山湖去游泳了。就数了一下，一百多辆，就是这样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呀，距离主席思想太远了吧！（笑，鼓掌）还有的人居然除了动用卡车公共汽车去游行武斗，甚至于开了卡车到杭州去游山玩水。这些人我说是给上海的造反派丢人！要严格禁止这些事。同志们！我说起来比较重了，我说这都是搞资产阶级的一套，还这样搞法，我看用不到一年两年就出问题。我们四九年进城，五〇年、

五一年两年，你们记得我们搞过一个运动吗？叫“三反”、“五反”运动，那是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我看如果我们现在大家不警惕，资产阶级就可以从这一方面把我们上海的造反派腐蚀了，瓦解了，我们就不得不被迫开展这样一个反对贪污、浪费的运动，到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要当大老虎！（笑，掌声）我觉得我们现在如果不这样严肃地提出问题，那就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就没有对这些同志真正出于阶级友爱，不是对他们关心。我们为了关心所有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在今天这个会上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来，希望大家认真的来考虑。（鼓掌）除了这一方面的铺张浪费以外，那还多了，简报、小报之多，实在害人！如果要是根据这个小报办事，那我们非犯错误不可。希望各个造反派，你们自己清理一下。还有专门办了许多所谓动态报，内部消息，内部参考，那里边，说得不好听一点，搞了许多特务活动。明明很多话说不要登，不要记，国家机密都统统给你登了出去。你们能保险呀？你们那些东西不落到敌人手里去呀？我可以这样说，根据我们历来的经验，我们的东西，凡是印出来的，铅印的也好，油印的也好，只要印出来的，美国国务院就有。你们不要自己马马虎虎，给人家当了情报员，还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呢！干那种义务情报员干什么呀？不要再搞这些了。我们实在对有些同志有些怕，怕你们犯了大错误呀！

现在有些机关人还是比较多，这个只能逐步地来解决。我们的方向应该是精简。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很关心，问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多少委员？有多少工作人员？他觉得人还是多了，应该少。现在的困难是一下子没有地方安排。那我们逐步地创造条件。在没有安排以前，机关还要

积极搞斗、批、改，不要每天在那里想呀，“斗批走”，“斗批散”，因为你走也走不出中国，还是在中国，你走出去还是要革命。在那里一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认真地考虑一下，究竟应该怎么样斗、批、改，怎么样改，我们这样一个大的机构，还要适应上海的革命需要，哪一些是需要的，哪一些是不需要的，哪一些制度是要改的，有的是马上可以改。市一级的机关，市，区，县，工厂的厂部、车间这一些机关都应该精简，都应该接近群众，接近实际。毛主席指示中间讲了一大段，关于干部上下级的关系问题，很重要，希望同志们反复学习这一段，不要以为自己当了官了，官当大了，就可以脱离群众。机关大了势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这个不行。当然，有的人官儿不大，薪水也不高，但是，照样脱离群众。比如，有的支部书记官也不大，薪金也不高，但骂起人来也骂的响，那个也不好。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要以为现在改了个名字，就真的是勤务员啦，靠不住。革命造反派在这次大革命中的一大发明是，不叫主席团，叫勤务组，一号勤务员，二号勤务员。你不要看叫勤务员，干起来可不是勤务员了，有的人我看官气也不小了，也需要很好学一下主席这段指示，改善和群众的关系。

这是讲机关。

学校，要复课闹革命，中央这几天就会发出指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因为不复课，大家都不回到学校来，这个斗、批、改没有办法搞，大联合也根本联合不起来。“三结合”也无从结合。更谈不到批和改了。斗、批、改都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问题我想今天用不着多讲，中央

会有文件来。我只是在这里答复一个问题。因为有好多同志看到了报纸登了北京的小将到内蒙古去落户，纷纷要求出发到内蒙、西藏、新疆、西双版纳等等地方去，今天据说还有好多人在等着我，说一定要找我当面谈。我说用不着当面谈了，今天我就在这个大会上统一的答复。这些同志的愿望非常好，上海的青年应该立志到全国各地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这些愿望都是很好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支持。（鼓掌）这种现象说明文化大革命有了成果，大家考虑问题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事情不是背上背包就能走的事。你要到内蒙古，那就需要和内蒙古商量好，你到那里安家落户，在哪一家，落在哪一户哇？这个要安排嘛！你不能到了那里就说我来到你家安家落户。人家那里有没有土地，如果搞畜牧业有没有羊给你放，这都要安排呀！不然的话，你到那里粮食怎么办，粮食你又不带去，你不带去吃什么？这些事情要做统一的安排。而且新疆现在武斗还比较厉害，那里的局势眉目还不大清楚。这个时候去，恐怕首先还是已经去过新疆的人先回去的问题。我们上海还有好几千人呐还没有回去。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回去，我们又去了几万人，到那里怎么办呢？需要研究联系以后才能安排。所以我们考虑一方面支持这个大方向，另外一方面要做实际的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还是先参加本校的斗、批、改。同时我们也考虑，在上海附近也还可以找到地方，你先在这里劳动锻炼一下，然后再出发。因为你要出发，你就不能象革命大串连那样悠哉游哉，这个不行呀！到那里一看说我不行，我要回去。去了就不要回来。不要一时高兴咱们就去了，到那里一看不如意又回来，

回来以后又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笑声）那个事情就不好了。因为前一段就是这样嘛！有些从新疆回来的同志、同学，就是揪老里弄干部、街道干部来斗。说里弄干部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他们骗到新疆去了。那个当然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很热情的来对待，但是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

总而言之，不管是工厂、机关、学校，这个斗、批、改现在都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很系统的经验现在还没有。我们希望同志们要注意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要花很艰苦的劳动。我们希望出一批这样的闯将，能够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搞出几个样板来。小学的斗、批、改怎么办，有一个样板，中学的有个样板，大学有个样板。大型工厂有样板，小型工厂有样板，中等的工厂有样板。诸如此类，能搞一些样板。这就要有一批有坚强的革命毅力的人，准备在那里付出代价，还不一定搞好。这样的一些同志认真的工作，能够搞出一些成绩。主席是早就给了我们上海的任务的。希望我们能提供中学、大学、小学教育革命的样板、经验，我们还没有交帐。这个帐谁来交呢？当然我们革命委员会应该负责，但是首先是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负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用自己的实际成绩向毛主席报喜。（热烈鼓掌）

第四，讲几句生产。已经开过会，马天水同志作过报告了。工业生产我们希望能够保证比头几个月好一些。中央也全力支持我们搞得好一些。李富春同志这一次到上海来，也开了会谈过这个问题。首先是我们希望对全国生产发展有影响的一些产品一定要抓紧。维修、配件这一方面，

还有些原材料，我们要搞好。外贸方面，援外方面，都有任务。将来会开专门的会议来讲。农村，现在郊区几个县，有的局势比较紧张，可能要影响到秋收。我们希望那里的革命造反派从大局出发，很好的来掌握这个问题。所以既要抓好革命，又要促进生产。至于那里的工人之间、贫下中农之间的问题，那应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所确定的原则来解决。我们觉得问题并不是那么复杂，是可以解决好的。这是生产，就说这么一点。

五、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制定、落实计划，夺取文化大革命新胜利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办学习班，这是主席指示里边所提出来的很重要的一条。各个革命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把这个问题当作最重要的问题来抓。我们已经有了些经验，因为从五、六月份开始办起，也办了好几个月了。这些经验要很好的总结。昨天报纸上登出来的青海的经验，很好，他们的经验写得很简单，但是比较完整。我们也需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现在有青海的这个五条，再加上我们的经验，就可以把它办得更好。上海的同志不大总结经验的，一说总结么，就写个两万字，一写了两万字，那就等于说谁也不看。还是象报纸上登的青海的经验那样，千把字，够了。你们如果有什么好的经验，好的文章，要想请毛主席看，当然第一希望内容好，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写得越短越好。有一些经验送到我们这里，我们看看还可以，但就是太长，不忍心送给毛主席，占用他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呢？大家是不是

把办好学习班的经验总结一下，认真的办好它。这是群众的创造，主席加以总结，我们就要推广，坚持下去。这是办好学习班。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文件上没有的，但也是主席的指示，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就是请示报告问题，各级要向中央请示报告。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向毛主席作报告也不够。特别是书面的报告很少。那末大家是不是向市革命委员会、或者请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作报告够了呢？我看也不够。有一些小将自由自在惯了，他们用不到请示。毛主席说，要告诉红卫兵小将，说有些重大事情，还是要请示一下好。说如果你们请示了，我们可能答复的，在答复的时候也可能答复错了。主席很谦虚，说也可能我们答复错了，说答复错了末你们办错了我们也可以替你们承担责任嘛。因为现在有些人，很重要的事情不请示。希望我们大家都要考虑一下，一些重大的行动应该请示。各个局、各个区、县，涉及到全市性的重大问题，也应该向市革命委员会报告。市革命委员会应该向中央请示。这一条我想应该传达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想说几句。因为我前几次讲过，我们党组织的生活，因为已经瘫痪了，就暂时不要恢复。现在还仍然维持原议。中央现在正在做调查，要根据调查的结果来确定方针。这里就提两点，一点呐，希望各个革命委员会你们也调查一下，你们那里的党组织的情况，团组织的情况，党团员的情况，都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点呐，还是重申那一点，希望党团员不要忘记了自己还是党团员。现在有许多党员、团员，他们参加了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在

工作里边表现得很好，但是也有些党员、团员，表现得不好，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如果愿意继续做党员、团员的话，那末他们就严格的要求自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共同把那里的工作搞好，在各个方面做模范。当然，有的人他说他不愿意做共产党员了，那个是有他的自由，我们不勉强。还有一些造反派中的非党同志，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受他入党，这个问题中央也在考虑。但是我想是这样子：只要一个人，他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按照毛泽东思想去进行思想、工作、斗争，那他总有机会加入到毛主席的党里面来的。（热烈鼓掌）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在斗争里边严格的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将来会有机会从现在的非党员中间、红卫兵中间，发展一批共产党员。这一点现在就可以讲。（热烈鼓掌，呼口号）

还有一个意见，就是希望各个单位能够都抓紧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传达、学习、讨论，要逐字逐句的讨论，而且要作出你们的落实计划来。要有个计划，不要只是讨论了一番，说好啊好啊，主席的指示真重要呀？但是行动呢，是另外一回事。要逐段、逐句、逐字地学，里边讲到形势我们究竟是怎么认识，我们思想究竟还有什么问题，把它弄清楚。革命大联合怎么样，思想上还有什么问题，工作上有什么问题，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能够做出计划。比方就在今年元旦以前，我们还能干点什么事儿，达到个什么目标；到明年一月革命一周年，我们能够达到个什么目标；在明年春节以前，我们能够达到个什么目标。我们的革命怎么样，我们的生产怎么样，我们的大联合怎么样，我们的“三结合”怎么样，我们的毛主席著作学习怎么样，各个方面大家想一想，能够干多少事。这

样规划一下，心中有数，就不至于这边来冲一下咱就跟着人家干，忽然传到个消息，说现在要揪军内一小撮，咱们就跟着去揪；今天说要抓黑手，咱们就抓。主席的指示以文字为准，以这个为标准，将来都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不要听那个风。比如上海能不能开工代会，我们向工总司建议，他们认为要开，我们赞成，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开成。（鼓掌）再如红卫兵组织，现在中学嘛十个军区，据说县里还在建立。那末军区以上你们怎么样呀，还要不要搞个大军区呀？如果要的话，你们准备怎么办？中学是这样，大学要不要搞红代会，我们也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们觉得中学和大学，都可以开个红代会，也应该开红代会。（鼓掌）那末究竟怎么办？我们不包办代替，你们自己去议论，去商量，究竟什么时候能开，我们希望早一点。刚才我不是讲吗？你们自己定吧！元旦以前行不行？元旦以前不行就一月革命一周年，行不行？再不行，春节嘛！春节不行那当然明年二月三月也可以，这个要大家自己来定。

还有，上海的工人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队伍究竟怎么搞法。我们对那个名字有一点意见，就是文攻武卫四个字包括太多了，那等于文化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都要包了，那恐怕包不了。因为它基本上是个武装，武装组织你可以搞文的，也可以搞武的。总而言之，工人应该武装，这个方针是定了的。首先是工人，当然红卫兵将来也可以武装。你武装嘛，先要把班、排、连编起来，班、排、连、营、团，大学现在叫“红卫兵师”，你那个师是武装编制呀，还是什么编制呀？能不能拉得起来呀？这个也需要大家考虑一下，计划一下。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发枪？发枪的条件么，就是要实行革命大联合，还是两派在那里，那不能发枪，

发了你们两家开枪呀？我们还不赞成呢！总之联合了，全市情况比较稳定，班、排、连、营、团编起来了，进行了军事训练，会打枪啦，然后才能发枪。请你们各个方面自己考虑一下，计划一下。究竟什么时候能办到？这个都是属于主席指示落实的问题，我只举这么一些例子。总得有个计划，不然没法检查。

最后讲一下，形势很好，这是毫无怀疑的，文件上讲的，主席高度地赞扬了广大工农兵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勋，又讲了“要斗私，批修”，“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席的总的愿望，特别是提到了“要斗私，批修”，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主席的指示，认真地去做。形势这么好，我们的任务就要争取更好。同志们一定要警惕，敌人是不甘心于失败的。我开头就讲了，敌人总是想着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总是想着破坏和分裂人民解放军；总是想整垮中央所批准的这几个革命委员会。他们用各种方法挑拨离间，也包括挑拨各个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各个革命组织内部的关系，甚至于挑拨各个地区的关系。我就看到这样两种大字报：在北京，他要攻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他就夸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如何正确如何正确，张、姚两个人如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不行。他这是拉上海打北京，挑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关系。到了上海呢，为了攻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他就可以讲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如何好，黑

龙江如何如何好，那里如何如何好，就是你上海不好。这些东西你如果孤立的去看，是看不出什么问题来的，你把这些宣传品拿来一比较一联系起来看就懂了嘛。经常的从极“左”方面或者从右边来冲击来干扰我们的大方向，经常总是要炮打，炮打倒没什么，老实说一个人一个革命组织，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看实在没有味道了，还是经常有人反对一点好。毛主席曾经给我们说，你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里面要吸收几个保守派的代表参加才好，这样就可以使得你们经常听到不同的意见，考虑问题全面一点。参加也好，不参加在外面炮打一下也好，这个我们不在乎。有的人成天就想整理材料，什么材料不材料，你整理就整理好了，如果是同志整理我的材料谢谢你，因为我实在来不及整理，我也来不及清理自己的思想，如果是同志你帮助我，那谢谢你。你如果是敌人啊，那对不起，那我也不感谢你。（鼓掌）一会儿要搞这个，一会儿要搞那个，这个半年里面大概打徐景贤的人不少，我上一次说过，徐景贤总比陈丕显好一点吧，为什么一定要打倒他呢？（鼓掌）毛主席不是讲了吗？不要一下子就打倒，如果要都是这样子，同志们，以后动不动就打倒，那我看确实干工作就难了，要允许改正嘛，如果有错误可以改正嘛，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公开的贴点标语，散点传单还算好的，因为他公开的嘛。我希望同志们注意的，你们要警惕的是搞秘密活动，上海也确实有，并不是没有，搞秘密的，和“五·一六”类似，我知道一些，我今天不讲，请同志们眼睛擦亮一点就是了，要警惕。因为有些事情我们还想观察一下，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不相信上海的广大群众会跟坏人跑的，这一点我们有信心。但是有时候坏人他跟你捣捣乱，也完全是可能的。

特别警惕的是秘密活动，搞阴谋活动。你搞阴谋，你上台来辩论嘛，都可以，不要搞阴谋。我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同志们警惕，特别是我希望上海的学生组织要特别警惕，因为工人中间老工人多，他们有经验，红卫兵小将，政治经验少，容易上人家的当，是要特别警惕，不要被坏人利用。上海这个地方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国内外的敌人都不会放松上海，美帝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在这儿难道不活动啦！所以要特别警惕，不过也不要到处怀疑，坏人总是极少数，反革命总是极少数，不要因为我今天一说，又在那里东猜西猜。上一次我给红卫兵里的一部分同志交换意见，我问了两句，我说上海有没有“五·一六”啊？这完全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嘛，哎呀，于是猜测就来了，说这个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了，就来了。我说，你们看，上海那问题有没有黑手啊？好，就来了，说他讲的就是谁谁谁是黑手，提了好多“为什么”，我看了看传单那些“为什么”我也答不上来，（笑声）里边说春桥同志这样提出问题是为什么，我说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笑声）不要那样子嘛，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问那么一个问题嘛，今天我提出来就是请你们警惕，怕大家犯错误，就是这么一点意思。坏人总是极少数，只要我们大家警惕，他们不能有所作为的。至于说写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内容错了，那也不一定是坏人，完全可能是好人办错了事，那也不要轻易就说这一定是“五·一六”，那不见得，也不要搞成那样。我本来不想说这一段话，后来想还是说，因为我担心一说又到处去抓这个，抓那个。总而言之要警惕、要谦虚、要谨慎。毛主席有一次跟我们谈话说，你们不是搞了一个《智取威虎山》吗？《智取威虎山》

里面少剑波跟杨子荣说过，你要大胆、谨慎，你看少剑波是懂辩证法的，既要大胆又要谨慎。光大胆不行，还要谨慎；如果光是谨慎不大胆，那杨子荣就不能上山了，那也不行呀，又要敢于上山，又要谨慎。我们现在搞革命也是这样，现在形势很好，我们要勇敢地向前进，不要受到什么约束；但是我们又要谨慎，特别不要骄傲，真正把上海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关怀。希望我们能够用的新的成绩回答毛主席对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对上海的红卫兵，对上海的三军，对上海的革命干部，对上海的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的关心和爱护。我今天就讲这一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68) 中央首长康生、张春桥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张春桥 1967. 10. 22

〔时间： 1967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4： 20 — 6： 1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中央首长：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李天佑；安徽省军管会领导小组：钱钧、廖容标、李德生、廖成美、杨广立等同志参加接见。〕

康生同志讲话

在的大好形势下当然也有些逆流。特别在安庆、芜湖、蚌埠有，这种反复是正常的，事情有时候是有规律性的反复。但无论如何怎么反复，中央的方针、中央文革的指示，群众会逐渐了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席号召革命大联合嘛，群众是不赞成现在再分几大派，分裂嘛。这个方针是定了，这个方针是不能变的。所以你们安徽的形势，就象主席最近指示的要防止走资派不甘心失败，垂死挣扎罗，想破坏中央的方针，破坏我们的大联合，破坏安徽的大好形势。

另外一方面，也有个别的坏人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各个地区提出的突出问题，两派性质问题，武斗问题，等等问题，如果按着毛主席的新的指示，看起来容易解决的。就是说，除掉派性，除掉宗派观点，容易解决的。因此，同志们还必须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斗私批修。“私”字，一天不斗，一天还要生长的，所以，从斗私批修，大联合中来看问题，当然这里面有些问题。

张春桥同志讲话

整个的来看，安徽的形势刚才康老所说的确实很好，这种形势的到来是很不容易的，是经过长时间的斗争，一年多的斗争，才取得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当然现在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也不可能一切问题都解决，矛盾总是存在，军队不要吹自己，不要自己评功摆好。军队的成绩让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来讲，让群众来讲，自己不要讲，军队要谦虚

谨慎，多做自我批评。对别人的缺点错误，也不要去做批评指责，要让人家自己讲。

当前，许多地方都要做好两派工作，毛主席说：对受蒙蔽的群众也不要压，对小将要肯定他们的成绩功勋。缺点错误要热情诚恳，注意方式的提出来。对于保守组织也要给他们留位置，让人家进来有好处，不同意见可以争论，有对立面。不要清一色，世界上也没有绝对清一色的东西。保守组织里的大多数群众还是好的嘛。

叶剑英付主席说：毛主席的指示是“纲”，各单位讨论研究问题时，不要脱离这个“纲”。

形势问题很重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伟大成绩要充分认识，才能加强信心，总参作战部李付部长谈随毛主席视察时的体会说，看形势一要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二要有明确的群众观点，三不要带着情绪看形势。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新指示，做了一些解释，总理说：主席的指示开始落实时，要先搞典型，搞了典型后，再开全军的会议，先学习再实践。

毛主席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周总理说：刚果（布）总理要访问淮南，三日我们发了电报去，两派都欢迎，刚果（布）总理去了，还说了不少的好话。开始，我们的认识总是跟不上毛主席，总想让人家看好的，淮南出了问题还让人家看。毛主席英明，就让人家看，看了后他们还说了好话。

江青同志说把八条、“十条”合在一起就提出“拥军爱民”，当时我们重视不够，宣传不够。这次重制录音要在全中国放。

总之，我们部队在执行“八条”时过头了，“十条”下来群众回击了我们一下。“六·六通令”下早了一点，时机不成熟，群众不接受。毛主席也说太早了就不灵了。“九·五命令”就适时、就灵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几段话，是对大好形势最好最象的概括。

对于乱的问题，总理说：黑手揪出来就好了，再有几个月形势就更好了。关于站错队的问题，毛主席说站错了，再站过来就行了，但是大是大非要分清。对待群众，即使受蒙蔽的群众，也不要压，要教育，真正左派社会上承认了，问题不大，主要是受蒙蔽的群众，一定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青海刘贤权的工作就是做的好。

专政工具主要是军队，公检法受彭罗的影响太深，群众不信任了，所以还要依靠群众。战争也是这样，毛主席在陕北，胡宗南的兵临城下，当时毛主席身边只有二个连的兵力，但有群众拥护，就无所畏惧。“五·一六”只有少数黑手，群众是受蒙蔽的。如果通缉“五·一六”就易造成对立，秦化龙也是群众自己揪出来的一个组织的坏头头，也要依靠群众自己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9月26日，毛主席亲自出了场，那天的录音，各大区可以复制在全国放。

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军队出了彭罗，而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尤其林付主席提出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以来，突出政治更好了。军队干部犯了错误，是难免的，极少数是严重的，即是陈再道，毛主席还要让他参加训练班学习，让他住在京西宾馆，还允许他检查，改正。

毛主席说，对于干部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略）要办好训练班。周总理说，训练班还可以把五好战士、机关干部也找来，代表各方面的意见和你们在一块学习，听听战士和普通干部的意见。

对红卫兵小将，我们要以亲身的经历去教育他们，年轻人好说大方向是正确的，这句话，周总理说：我就和他们说，南昌起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夺取大城市的政策是错误的，政策错了，大方向也不能保证，只有毛主席的秋收起义才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自己都有革命斗争的亲身经历，应该好好地教育红卫兵小将。

69) 周恩来张春桥对全国粮食工作会议 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张春桥 1967. 10. 28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到七时半。地点：国务院小礼堂。参加接见的有李富春、李先念、张春桥、戚本禹、邱会作同志。周总理和张春桥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记录稿，未经审阅〕

（当总理，李富春等同志进入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总理讲话摘要

总理详细看了参加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的代表名单，逐一询问了上海、山西、内蒙、黑龙江、山东、北京、贵州、青海、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苏、湖北、湖南、江西、安徽、辽宁、吉林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粮食生产和收购情况。

当上海等七个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代表，向总理汇报了今年粮食获得丰收的情况以后，总理说：你们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就是好嘛！

当湖北代表向总理汇报今年粮、棉大丰收，是历史上最高水平时，总理说：王任重吹牛，他说，他在湖北，粮食、棉花都高产，好象没有他，粮棉就不能高产。现在粮棉两个数字就驳倒了他嘛！有王任重固然增产，没有王任重也一样增产。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了嘛！上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红线的领导，下有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靠一个人怎么行？毛主席把广大群众的智慧最高度地集中起来是伟大

天才的集中。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今天最高的水平。我们在主席领导下，要做小学生，要努力学习。一骄傲、一吹嘘、就垮台。

总理问了各省的情况以后，又问了赵发生同志今年全国粮食的产量和征购计划。当赵发生同志答复，今年粮食产量比去年增加，征购计划搞好了可能超过后，总理说：是啊！你们看看，我还没有都问完罗，这些情况就足以证明主席思想的伟大。

接着，总理着重讲了毛主席在粮食问题上的伟大战略思想。

第一，立足国内、搞好生产、不吃进口粮。

我们对农民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搞对了，具体的由农民自己去搞，就会增产。不需要上面事事干涉，纸上谈兵，不懂装懂。过去农村工作部瞎指挥，应该搞合作社了，他还要砍掉。当然，那是受刘少奇的思想影响。农业八字宪法是主席提出的。是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只要提纲挈领告给农民，具体怎么办，农民自己是会安排的。你说刘少奇他不干涉？他跑到京汉路，刚一走，就说地瓜好，高产。他在全国提倡大种地瓜，结果吃了大亏。种了以后，其它粮食就调剂不过来。弄得河北很吃这个亏。我们农业口子，过去就是弄得很繁琐，规定何时耕种，种什么、怎么种、等等，一年四季，总是要发指示，主席一直是反对的。过去减产，同瞎指挥关系很大。好，今年不指挥了，也没有什么指示了，只是提醒一下子三秋要做得好一点，农民自己是会搞的。农村靠的是集体，

靠的是贫下中农，积累经验，总结提高，不是靠上面瞎指挥。今年的丰产就是证明。

今年是军管年，是军队同志来领导，“三支”“两军”，对于农村来说，主要是支农。军队的同志是贫下中农出身，一到农村中去，首先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从实践中来证明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行者。他们苦干、实干、带头干。哪个地方需要劳动力，他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农村最欢迎解放军去做宣传员。去年邢台专区，还有石家庄、邯郸、衡水的一部分地区，发生两次大地震，把六十三军的一个师分下去，他们到处宣传，每个庄子都到了，农民生产情绪高涨。现在虽然房子还没有都盖起来，有的只是把地窝子稍微提高一些，但是生产连续两年都增产。这就说明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农民积极性就起来了。当然不仅支农，还要支工，特别是支左，还要军管、军训，忙不开，手腾不出来。军队在农村帮助下，比城市派下的知识分子更熟悉。城市去的只能去学习，跟人家学习，他们不会劳动，首先要学习劳动。要听贫下中农协会的。要向经过四清搞好了的支部领导学习。

农业，看起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有大的发展，比现在的数字还要高。

我们响应了主席的号召，主席的第一个号召就是不吃进口粮，进口粮食，是我们瞎指挥搞成的，本来没有进口。五九年、六零、六一年有灾荒，这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瞎指挥。没有那么多的产量，虚报数字。上面高兴虚报数字，农业口宣传虚报数字，财贸口跟着提高征购指标。我

们国务院当然要负责。那时征购比现在多得多，最高收购×百多亿斤。购到手，后来又回销。这不是农村搞坏了的，是我们上面没有实现主席在一九五九年春季告农村公社社员的信，违反了主席路线。对主席的信，有些地方根本没跟农民读，农民根本不晓得。四川李井泉就是这样搞的。恐怕不止一个地方。国务院指标定高了，征购数字高了，七千人大会上我讲了这个错误，承认了这个错误。现在看，第一，不要瞎指挥。第二，不要搞高征购。原来就不靠进口嘛，现在已经摆脱了。现在虽然还有进口，外国人也懂得，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出口，一部分用于品种兑换，进口小麦，出口大米、大豆。品种调换划得来，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小麦。一部分是为了刺激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要有一些粮食用来换购。现在棉花取消换购了，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了。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增加国家储备。国家储备很有必要。现在国家整个库存已经超过过去的库存了，

一旦国家有事，可以周转。这是过去没有做到的，现在做到了。因此，我们进口粮食完全是为了建设和战备的需要，不是市场和交换的需要。实际上，从六五年粮食年度开始，进口粮的性质就改变了，今年改变更大。主席不是要我们抓好粮食，抓好棉花，抓好布疋吗？不吃进口粮，主席的第一个要求实现了。

第二，主席要我们逐步做到南粮不北调。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初步实现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两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有余，两个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也自给有余。这是好事，这是一大转折。东北已

经自给了，辽宁不够可以从黑龙江、吉林调剂。我们还要求东北调出一些，调进关内供应北京。南粮不北调，把北京、天津都算上，就是说东北三省，加上晋、冀、鲁、豫、陕、再加上内蒙，九个省内部调剂的话，搞得好的话，七〇年可以完全自给。如果把长江以北都算北边，那就可以更早实现，现在是开始初步实现。第一，从六六年起不吃进口粮了；第二从六七年开始初步实现南粮不北调了。当然我们还要储备。这是粮食问题上的主席的两大要求。

当然主席不止这两大要求，还有第三，主席要求不要多征购，要藏粮于民，备战、备荒、为人民。主席在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要多征购，藏富于民。好处是一旦有事，农村中到处有粮食。如果大战在中国土地上发生，消灭帝国主义在我们这一代，那就应该有很好的准备。

城市人口不要多增加了，稍微增加一点，农村销售尽量减少。要逐步做到自己都能够周转，一个县的范围，一个公社的范围，几个公社的范围，能够自己周转，不需要再调粮食到农村去销售。现在农村销量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农村销量一减少，征购数字自然不需要那么多。

城市人口总要相应的增加一些。因此带来一个问题，城市人口有必要动员一部分去农村发展生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下乡，这是主席规定的方针。我们要使人口平衡地发展，这是长期计划，不能过分集中。工业也要分散到交通要道。逐步跟着铁路线的发展，到人口比较少的地方去。现在有的地方，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有

些上山下乡青年跑到城市里闹。今天在座的有造反派罗！当时他们支持了造反派，支持了你们，现在找你们，留在城市不肯走，他们想呆在城市。许多地方都有这个问题。这要做大量的工作。要用主席思想教育他们，要对他们讲清楚，这不是刘少奇的黑线，要具体分析。这个方向，是主席讲的，主席的教育方针，是要把青年训练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城市没有那么多工业，就要到农村去，做有文化的农业劳动者。问题当然是两个方面。我们送他们下乡，有组织地送下去，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要把他们安排好，使他们真正能参加生产，提高农村的文化。这还得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统帅一切。所以要大家狠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从政治思想上解决问题，不然城市粮食销量就会增加。面向农村，这是肯定的方向。

面向农村不是都搞农业，农村中也要发展加工工业，甚至一部分手工业，有些地方电力送不到，全国都电气化要相当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总还要有些手工业，手工业还是工业嘛！要在这方面发展，然后往交通沿线上发展，不仅铁路沿线，公路沿线也都要发展工业，这样就把城乡结合起来了。要使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要使城乡结合，这是个长期方向。过去不平衡的偏颇的状态，畸形状态，这是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沿海几个城市那么大，许多地区人口那么少，要慢慢发展。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经济、买办经济造成的。只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在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改变这种长期形成的情况。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工人阶级要把全民都化为工人，这是长期的任务。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拿中国来说，要解放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劳动者，剥

削阶级，游手好闲的人都没有了，剥削阶级分子逐步改造好了，这是个长期的工作。不然城市总有游手好闲的人，给工作不做，叫他到农村，他不去。

要使粮食不多征购，必须跟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跟备战联系起来，跟远大前途联系起来。备战、备荒、为人民，三者的结合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所以要减少粮食征购，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增长少，农村销量减少；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毛主席这样一个要求是远大的想法。

关于藏富于民。完全靠国家的仓库藏粮，没有那么多仓库，也不利搬运，一旦有事就被动。要分到一个一个生产队，由他们自己去藏，甚至社员也能替集体藏粮，那就好办了。这样容易转移，容易保存。他会注意保管，会注意新粮换旧粮，一旦有事，很有利。

要反对浪费。丰收年景，一定要注意节约用粮，这是中国农民的老传统，劳动人民的传统，贫下中农的传统。他们有粮食的时候，会想到没有粮食的困难。“常将有日思无日”。当然，这是知识分子把他文学化了，实际上是劳动人民的习惯，好的习惯。浪费的常常不是贫下中农，是青年人或者下乡知识分子。北京去年接待一千二百万红卫兵，就看出来了，大概到北京来的学生，浪费粮食的，大学比中学浪费，大城市学生比小城市学生浪费。上海，其他方面的名誉都很好，就是这一点。去年住在国务院里边的学生，我招待过的，就发生这个问题，粗粮他不吃，说吃不惯，说他他不听，他出去买点东西吃。农村来的，那可注意得很！剩

下一点馒头屑子，一颗米粒都拾起来吃了，看得很清楚。只要贫下中农掌权，他会节约用粮。这样把粮食藏在他们那里，是放心的，不会损失。就怕少数人，走资派或者管不好家务的那种人浪费粮食。所以藏富于民，是很重要的。尽管一时收不上来，将来还会补上来的。倒是你那个地方还局势未定，比如湘西，勉强收上来，也许会被抢掉了。你们军管会的同志有这个经验。这些新的情况，要用新的办法，要靠大家用脑筋。

总的形势大好，生产战线就证明这一点，农业战线特别证明这一点。农业战线不仅是粮食，而且经济作物在内，都是大好。

上面三点是主席的指导思想，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只要把主席的话认真实现，就是灵的。

当然啦，先念同志就怕×百×十亿斤收不上来，收总是要收的，不要那样急，还要我给你们打气吗？我是给你们打气的。我刚才把总的形势，把主席的指导方针讲了，不是打气吗？不要瞎指挥，生产大增，粮食×千×百亿斤，棉花超过×千万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是大跃进嘛！高指标都能实现了嘛。当然不是夸大数字，这是实事求是。根据主席的指导方针，而且中心的一条，是高级领导机关不要瞎指挥。我们有个经验，农林口瘫痪了，反而丰收。主席说，农村工作部取消了，这是农民一大解放。现在农林口又瘫痪了，就是少管你们，你们少管底下，就好一些。农林口不需要那么多人，现在也没管事，这倒反而好，农业一样的丰收。农业是基础，靠群众嘛！当然，到时候找你们来谈谈，开个会还是必要的。其实还要靠底下。

增产了怎么办，如何实现主席的要求。不吃进口粮，这个解决了；南粮不北调，初步解决了，藏富于民，现在是个重点。我们国家有一点储备，当然还不够，现在征购的数目不要多增长，把农村销售减少，城市销量增加很少，这是一个方向。方向不能改。只能采取少征购，藏富于民的办法。这样，备战、备荒都有准备了。我们希望明年搞得更好，估计到六九年还会搞得更好，还会有更大的跃进。这主要靠你们去把主席思想方针和实际结合起来，各个省因地制宜。江西革命搞好了，就抓征购了，是不是这样？你们比湖南快一点嘛！湖南在乱的当中，要先把乱的问题解决，不要太急，要根据具体情况解决。总的数目我看能收起来，晚一点，还是会收到手的。

到会的铁路运输部门的同志，你们是来学习的，你们来了多少人？一百九十四位。铁路运输部门的同志，这样好不好，请富春同志、先念同志和你们谈一谈，我们有别的事。（富春同志：我也有事）铁路，我还有些具体问题同他们谈的，粮食会议的同志就不参加了。我留一点时间，请春桥同志讲讲吧！给粮食会议鼓励几句。你是上海来的，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鼓励他们几句嘛！

张春桥同志讲话摘要

上海是吃粮食的地方。我确实没有什么话要讲。总理把各种问题都说了，我今天是来与大家见见面。粮食的征购，希望搞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正在作调查，还需要把它搞好。生产，包括征购，都要靠革命

来促进，来带动。刚才，总理不但谈了现在的任务，还讲了远景。这就是过去主席指出的方针，如何在这几年实现主席所指出的方针。

革命的形势很好。今年粮食生产非常好，棉花、其它农作物大丰收，今年是个大丰收年。我没有更多要讲的。

铁路，我真的希望能够搞得更好一点。我们希望铁路工人同志能够把革命的大联合搞好。刚才讲的粮、棉和其他的东西，运输搞不好，还是有问题的。这一点，在上海感觉特别迫切，特别敏感。按照上海的条件来说，工业生产还可以搞得更好一些，更增产一些，但就是运输有问题，原料运不来，产品出不去，几乎所有的码头仓库到处堆满了东西。上海的码头工人非常好，是很优秀的，他们工作效率很高。但是，现在码头上积压的东西，比一月风暴那个时候还多。这不能怪工人，因为没有人把东西运走。外国的船来了，拚命的装卸，卸下来以后还是运不走。这就与铁路有联系了。所以铁路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从来占重要的地位。在目前，对全国的生产影响更大。我们衷心地希望铁路工人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能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搞得更好。我就简单说这几句，祝同志们好！

（张春桥同志讲完以后，总理又继续讲）

总理继续讲话

有一件事。我们想，上海同志，你们带个头。上海纺纱是不是完成任务了？还有潜力没有？现在是三件事：主席要我们大抓粮食，大抓棉花，

大抓布疋。主席的话就是灵。粮食现在上去了，当然还要大抓，不能松懈，因为人口增长，需要增加嘛！棉花也上去了，还需要增加。各种工业都需要纱布，仅仅有棉花还不行。现在库存棉花超过任何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可是棉花存得很多，纱纺不出来，就不能有布，有纱才有布。看来，今年布票到年底还不能买齐，使用期限还得推迟一个季度。这不是矛盾吗？主席早就看准了。光有棉花不行，还要有布。这与粮食不同，粮食加工容易，棉花变成布，手续就复杂了。不能都用土纺、土织、那就分散了。为什么棉花不能变成布，就是运输上的问题，电力上的问题。电力又回到煤炭，煤炭又回到运输，所以铁路问题是关键。铁路差不多从去年年底就抓起，到现在为止，总还是受影响。当然不能全怪铁路上，还有周围环境和各种因素，铁路不上来，煤送不去，电就上不去。上海的纱厂，青岛和天津的纱厂，都还能够增产，但这些地方煤炭不能供应，棉花运不到，他就不能增产。他们那里本身没有棉花，是送去的。上海工人在大联合和生产指标增长方面本来是完全可以带头的，这就又归到铁路问题，归到煤炭问题。

（总理、富春和其他首长离开会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粮食工作会议秘书处整理）

70) 张春桥在江苏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11. 04

你们感到会开得怎么样？这一个半月大家有些什么进步？还是原地踏步？还是倒退了？你们是如何估计的？你们想家中打还是不打？有的人说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我看就决定于在座的同志。如果大家觉得没打够，就回家去，打够了再说。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你们看过江苏周围的形势嘛，上海比较好，浙江也不错，当然也有些问题，江西打得很厉害，现在形势很好，安徽现在也不错，可以回去了。江苏处在四面包围之中，究竟如何办？你们考虑考虑。

（当方敏同志讲到何朴等问题时）春桥同志说：赵俊，你有没有这么回事？你可以向中央查问嘛！何朴问题是容易判断的，怎能相信他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派调查组还能不通过你们？你可以打电话问中央文革嘛！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与中央文革毫无关系么，他到上海就碰回来了么！就让他这样招摇撞骗！

（当丁立平讲到有人乱通消息，说“三代会”已贴出大字报，说康老、春桥同志说的，镇江只有一派是造反派时）春桥同志说：我至今连镇江有几个组织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不要全信，不要看得太严重了，不要搞派性。那天我与安徽的讲话，他们四条就出去了，我说还是我来辟谣，还是你们自己声明作废？他们就刹住了。他派性发作了，没有办法。

（当丁立平讲到赵俊曾指挥造反派抢枪时）春桥同志说：上海没枪抢的，枪从哪来？一是浙江，一是江苏。

（当吴克明讲到江苏，徐州有人反王效禹时）春桥同志说：徐州反王效禹同志，南京反刘锦平同志。刘到南京做了很多工作，为什么要反他？！

（当杜方平讲到自己错误性质时）春桥同志说：三月五日指示时，康老已批评过你，可你并没有改！我看了康老讲话的记录。

（当杜方平讲到自己有派性时）春桥同志说：你的派性够厉害的了，不是有没有。1.26 夺权错误非常明显。如果是正确的，那为什么还要军管？军管就是否定了你们么！五月份我在南京讲过了，不要再争论了，要算账的话，算到谭震林、江渭清身上去。当然，两方面都有问题。“三·五”指示就是标准，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具体落实到江苏的几条。我们是搞联络还是搞分裂？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来贯这个方针的？为什么大方向始终受干扰？按“三·五”指示，都应做自我批评。

（当任亦山讲到现在会议对两派分裂的原因有争论和对支左应如何支未解决时）春桥同志说：这些问题中央已讲过了，没有解决辩论嘛！这样的问题，当然会牵涉到南京军区不能回避，如孤立地去看问题就解决不了。（南京）军区有（南京）军区的账，省军区有省军区的账，廿七军有廿七军的账。我觉得还是应该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标准，搞自我批评。

71) 张春桥接见第二十七军首长谈无锡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 1967. 11. 05

〔时间：下午五时。张春桥同志在京西宾馆接见 27 军王付军长，对无锡市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极其重要指示。军区杜平政委在座。〕

张政委首先说：关于 27 军问题，我准备谈几点意见，不要当指示，只是谈谈个人想法。（杜平政委说：就是作指示嘛！你是我们的政委。）

（一）对部队加强毛主席革命路线教育，张春桥说：“你们二月份取缔革命组织时，对部队进行了教育，犯了错误，部队转过来不容易，现在“626”、“主力军”来了，对部队要多进行教育。

（二）作好工人队伍的工作，先使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张政委说：上海工人联合了，没有谁能影响他的。你们无论如何先把工人队伍联合起来，可先把工代会搞起来。

（三）（提到革与保的问题）张政委说：革与保的关系是有这个问题的，但需要做历史分析。1.3 事件以前，两大派是在革或是保，在非常鲜明。1.3 事件基本上把保守派打垮了，后来造反派胜利了。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有些到造反派去了。情况就复杂了。每个大的组织，都有左中右，就是有坏人钻进了造反派，也要保护群众，把坏人揪出来，我们要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

（四）（当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时）张政委说：你们可以多想一些办法，也可以学习山西省的办法，搞个政治协商会议。你们 27 军、空军炮九师、人武部和“九·二”、“主力军”、“626”等大小组织的负责人，在一起定期开会，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72) 张春桥对上海市革委会的电话指示

张春桥 1967. 11. 16

据说上海红代会邀请外地一些人参加，共邀请了多少？为什么要邀请？而让北京只邀请了一派，是聂元梓、蒯大富。我与姚文元、谢富治三同志商量后，以三个人的名义劝他们不去参加，他们决定不去了。这个决定去告诉他们（指红代会）。报上不要提名邀请谁。红代会自己开好了，为啥要邀请，有些学生只想往外跑，这次正好是机会，工代会同样要注意，不邀请。已邀请到上海的就算了。

接到“财贸”的电报说，“工总司”直接到“财贸”基层去拉一派参加工代会，如果有一些情况，这样不好，怎么可以直接拉一派呢？可以与“财革会”协商，自己不要直接去。工总司这一点应该明确的，不是在拉队伍，只是去参加工代会，这样不会发生分裂，不影响归口，“财革会”应该考虑到这样基层的情况，下面厂里参加工代会，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他们能说服下面不参加，负责做好工作，不参加也可以，我觉得电报上面情绪不那么好，告诉李研吾同志（市革会财贸组）

工代会是工总司与财革会二个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财贸组不要插手，让二个群众组织协商。

（当市革会同志汇报工作后），春桥同志又讲：“炮轰南京路”，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些什么人搞的。

市革会核心组讨论时，王洪文（工总司负责人，市革委会常委）同志讲，开工代会不是春桥一个的意思，至少是中央文革的意思。主席也指出过这次工代会一定要开好，决不是搞全民的工会，强调要以产业工人为主，要带头节约闹革命。

73) 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11. 19

现在形势非常好，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最近不少省回去了，广东……广西明天开会后也要回去了，整个形势正象毛主席七、八月份估计的那样，是大好而不是小好。

我们上海形势也是大好，当然都那么先进也不见得，我们的工作有做得好的，也有较差的或不好的。学校中也有做得比较好的和比较差的，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家都还有着差距，但总的来讲主流是好的。在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主席提出的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一个革命的大方向，我

们的同志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如果大方向忘了，如果做了一百件事，即便有 99 件是对的，那也很难评论，摆在我们大专院校红卫兵面前的任务是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再从这里来进行教育革命。因为教育革命，要有条件，要抓教育革命就必首先抓斗私批修不行。反过来只有很好地斗私批修了，才能促进教育革命，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去争夺阵地。如果我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现在的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这一套不彻底加以批判，不根据毛主席所提出来的方向路线和政策来改造我们的学校，那么这样的学校就会继续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修正主义准备条件。那样的话，我们革命就没有办法去争取到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没法巩固。而过去在教育阵地里，特别是大学，那是资产阶级专政，解放以前是这样，解放以后也没有根本改过来。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解决不了。而这样一个责任，毛主席最新指示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定要依靠学校中广大的革命的师生，革命的教员和革命的工人。因为这个事情很艰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去年这时候市委、冲市委、冲学校党委更要艰苦。因为那时无非是把你打成“反革命”，而“反革命”在我们毛主席领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平反的。而现在搞教育革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它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比如说，58 年教育革命不是没有参考，有人就说是改良主义，但终究是对资产阶级教育阵线的一次冲击。

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很好地研究江青同志搞京剧革命的经验，上海搞京剧革命是在 58 年搞起来的，58、59、60、61、62、63 共六年时间，后来又最后……，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站不住，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大。我是 64 年才开始接触这个戏。开始，江青同志说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一开始我不大理解，经过 64、65、66 年到 67 年上半年（两年半）才基本占领了，到那时候……。（讲到这里春桥同志举了《智取威虎山》第八场中一段唱词接着说）这一段唱词从初稿到定稿，就花去了两年半时间。所以经过一段工作，这几年也不过搞了八个，就靠这八个把帝王将相赶出了舞台。我们列举这一个例子是说明教育革命不是容易的，要作反复试验。其中包括我们犯错误，为什么毛主席要说“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因为教育革命需要有影响，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但这是不容易，有许多困难，所以才需要我们化这么大的功夫去作。

毛主席非常关心教育革命，他老人家经常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各地送上来的材料大量地看了。所以在教育革命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没什么要紧！我们希望能把这工作当作当前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在这场教育革命中间继续考验我们。比如有的是老造反，“老造反”当然是很光荣的事，但是能不能搞到底，能不能把教育革命搞到底，能不能一直老造反。比如有有的同学运动开始犯了保守的错误，现在已经回到了毛主席革命的路线上来，那也要看他在教育革命中能不能一直搞彻

底，革命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包括我在内，继续受考验，更好地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我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功勋，现在需要继续发扬这种光荣的传统，而不要单单的为过去的功劳所蒙蔽，大家想想，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能老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呀，太阳要升起来嘛！党和祖国赋予我们的任务也就更多了，我们的责任也会更大了，要看祖国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嘛！因为现在我总觉得我们毕竟是在过去十几年来那种教育制度不长大的呀！一方面毛主席思想教育我们，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断腐蚀我们，不但是在过去，将来也还会继续腐蚀我们。有好多省解决问题，工人问题好谈，比如广东。中学生好多地方（不是全部）有些事也好办，大学生可难了。为什么？因为大学生无非是念书念多了，念书也有好处，也有坏处。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啊。然而他们的书越读越愚蠢，比如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走资派养得又肥又胖，而我们自己却打得头破血流。现在有的单位，有的学校在有的同志头脑当中敌人的观念少了，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很起劲，但喊起打倒刘邓陶、陈曹却不那么起劲了。难道他们都睡觉了？！陈丕显、曹荻秋就没有睡觉。当然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这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陈曹不都一个一个地垮台了么？但是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它们有它们的势力啊！比如陈丕显吧！陈丕显在当区委书记的时候，你们在座的同志们恐怕还没有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他有势力啊！在去年这个时候在安亭，他一个电话就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了。所以资产阶级有它的接班人，你打了他一批还有一批又一批，资产阶级对我们的

斗争是长期的，现在有些同志不想这个事，而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我说啊，凡是打内战的，十个单位至少有九个有坏人，甚至有反革命，这就是利用你们青年人政治上的不成熟，你们一定要警惕啊！

毛主席说现在的无政府主义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惩罚。奴隶主义走向反面就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拿不出办法，一定要靠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有了红代会是个大好事，这样能把红卫兵统一起来，能够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办法统一思想，进行学习。

国际形势大好，有人问我，国际形势怎么样了。我说国际形势很好，你们中间是否有人担心打仗啊！同志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发展着，我们的国际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广泛，毛泽东思想是这样的深入人心，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的，特别是东南亚的形势很好，我们把刘少奇的那一套批透了，对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你们看过没有，马来亚武装斗争很好，包括印度的武装斗争也开始了，国际形势一片大好，而美帝苏修特别是对越南拿不出什么办法，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他那个调子最最低！最低！！最低！！！有人担心会打仗，究竟美帝怕我们，还是我们怕美帝！？当然是它们怕我们，它那几十万会动啊！它们就是不会来动我们的，我们有的同志开了个玩笑！如果它在福建一登陆，福建的大联合也就搞好了！

主席在想“九大”怎么开法，有人问我最近干什么？我最近在考虑一个问题，要往前看，在想明年的事。毛主席在想开“九大”怎么开法。

主席在九月份就提出来了。主席一提出来，我们就感到主席在想明年的事了，今年的问题解决了，没问题了！大家都很关心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中央文革的同志，现在每天差不多有 3 — 4 小时学习毛著，我们希望能比较早点选出稿件请主席最后审查。第一条是如何从政治上、思想上开展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出版毛著，教育广大革命人民，革命红卫兵，同时做好组织上的准备，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要使我们党经过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更加伟大，更加正确领导全国人民、全国红卫兵，把祖国建设得更富强！

74) 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11. 19

【地点：原中苏友好大厦小礼堂。摘要】

华东化工学院一同志发言说：他们学校也有封、砸情况，并有人说这样痛快。

春桥同志说：“痛快”？！那 1949 年 5 月我们大军开进上海时用大炮轰平好了，痛快嘛？为什么我们还必须用很大的代价来保护上海城呢？要知道这是人民的财产嘛！

本单位的事情要相信本单位群众，外单位不要插手，目前要你们作分析：不要什么事情都笼统地说，上海各单位文化大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好的一部分，中间的不少，还有一部分单位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不要笼统，这样就糟糕了，对本单位的形势你们自己作个分析。这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有些文艺单位就是这样，造反派队伍混入一些坏人。造反，造什么反？文艺界一些青年犯有两种错误，开头一些保守的，打下去了，一二月份又炮打，就是炮打我吧！我劝这两家要和十七年文艺界黑线作斗争，否则你们两家干起来，敌人放走了。有些人（指牛鬼蛇神）利用青年的无知给他平反，受黑文艺影响的青年发挥不出作用，对本单位要分析，没有一个革命队伍没法搞，你们要下去，先是到工农兵中去，这当然是好的，目前不是下去不下去的问题，而是屁股坐得下坐不下来的问题。教育革命又是怎样搞，要作艰苦的工作呀！要依靠下决心搞到底的人呀！把教育革命搞到底！现在文艺黑线还没有搞清，有的人历史还没有查清，这样子我下去有什么作用？

75) 张春桥接见上海工总司常委时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11. 22

最近我接到许多信，阶级敌人在搞我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敌人会利用我们弱点，各个击破。最近我在北京听说什么戚本禹不行了，由姚文

元代替了，我又听说什么徐老三……北京说上海，上海说北京，进行挑拨离间。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失败。工总司有派性？（工总司：是的，有派性。）如果真要分裂的话，我不怕！（工总司：我们保证不分裂。）不要保证了，只要提高警惕，工代会一定要以斗私批修为纲，用主席思想作指导。上海工人能搞好的话，那就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这样，文化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了。

斗陈、曹可以么！上海工人各方面考验还不多，当然不是去找麻烦。我经常在外面吹牛，说上海工总司学习很好。（王洪文：我们坚决学习）七、八月份时，主席问我：“怎么样，还分两大派呀？”我说，我看不会。理由：（1）主席健在；（2）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是不同意的。（工总司：打联司时，主席在上海呀？）春桥：在上海。（工总司：我们调兵主席看到吗？）没有。但看了电影。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就是在这时提出的。精兵简政主席很早就提出来了，

这次我到上海感到味道不对，江苏问题还影响到上海，我来到上海感到不安。精简人员到何处去？到新疆去，新疆在打内战。到内蒙、青海去，又有困难。精兵简政是斗批改的一部分。主席说：“全国性的精兵简政不能一下子扔，不能心急。这次我到上海有两个目的：（1）党的组织问题，（2）对敌斗争问题。

（工总司：提出问题来了，党员是老保、逍遥派，很气人，有的成份很有问题。）过去党员是老保，现在又作逍遥派，党籍怎么办？成份上有

问题，可以清除出去。（工总司：党员老保不批准我们入党，所以我们不参加了。）“九大”要搞一个新的党章，然后有步骤、有计划地吸收。“文攻武卫”好了吗？发枪的问题要慢一些，我在杨成武面前说要搞十万支枪。杨成武说：我给你们十万支新式武器。主席说：上海发了，武汉、北京、全国怎么办？但上海要发的，先发小口径，肯定要武装的。

（工总司：“二军大”武斗很凶，我们要插手了。）让他们自己去搞，打够了就好了。他们两方面都来告状，一个也不论。工总司要抓两个

（1）阶级斗争，（2）思想教育（王洪文：还要抓革命、促生产）打仗不能经常打，要组织一下。主席说：一月革命出来的造反派，我们很重视，通过运动，锻炼出一打人材来，这里包括犯过错误的人。

要和劳动人民联系在一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出于他的反动本性，要……搞一个什么世界上没有的，能够出名的灯，至于实用价值，他是根本不管的。事实上他也不愿意我的电光源为三大革命服务。教育革命决不是少数人搞，一定要靠大家，搞大学毛主席著作，靠大家发扬敢想、敢说、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通过学习、讨论，一定能批判旧东西，新的东西一定会出来。

76) 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谈准备九大党章草稿

张春桥 1967. 11. 25

大家都要求把第八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改，中央着手搞这工作，中央为了把工作做得好一点，前天晚上（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中央要求上海搞一个九大党章草稿。当天接到通知后，当即就召开部分革委会成员会议，大家认为中央把这样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上海，这是对我们上海广大党员，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信任。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很差，能不能搞出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党章，还要靠我们努力，既然中央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们，我们要尽一切办法把工作做好。我们考虑准备这样搞：

一、成立一个党章修改小组，十个人左右组成一个组，由这十人负责修改。这项工作由我（即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徐景贤同志三人负责，今天就开始工作。

二、现在革命委员会抽调二百多人，在修改小组的领导下，分别到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连队、商店、街道等单位进行调查，组成四十多个调查组，与那里的群众相结合成立一个修改小组，这四十个修改小组要拿出四十个九大党章修改的方案。总纲和党章从头到尾都要修改。你们认为原来的党纲要批判，就批判。那一条要保留，那一条就保留，那一条要改就改。各小组都要根据毛泽东思想来改，这样把各小组集中起来，再下去讨论。也可能有反复，这是正常现象，最终汇成一个草案。

三、修改小组不派人去，由三军、工总司、红代会自己选择一个单位，在那里发动群众，修改党章，现在七十多个单位报名了，到目前为止我收到来信很厚的一迭，这说明很多人关心党的工作。有的人虽不是党员，

但是比有些党员关心，我们都要掌握这些新动向，如有广大群众参加了，就会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

这样有修改小组拿出四十本修改党章方案，又加上三军、工总司、红代会等七十本，那加起来就有一百十本，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百十本进行综合写成一本“九大”的党章报告，这样交给中央，由中央再进行汇总，那些可以吸收的，中央再把草案发给全国进行讨论，全国可以修改讨论，经过反复讨论就可以比较完善，在“九大”通过以后，就成为我们的纲领，大家坚决遵照执行。

在对待修改党章这件事，有的人认为很重要，很关心，而有的人重视也不够，因为比较忙，要抽人，第一把手要负责。如果你那个小组提出草案是反毛泽东思想如何办？你第一把手要负责的。现在上海工作有缺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是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但是最近一个月跟得不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九大”工作不重视，认为姚文元同志在上海作了调查，报告中央和毛主席了，而没有把对“九大”准备作为带动一切工作的动力，没有把“九大”召开的准备作为一个头等重要工作来抓。

为了开“九大”，就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准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已为“九大”作了准备，从政治上把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揭出来了，批判了，从组织上清理了队伍。一大批叛徒、特务、反革命、混进革命队伍和中央的人揪出来了。这一年半对我们说来就是整党，一年半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文、

中心是党，因为党是最高组织形式，斗争还在继续，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继续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九大”作准备。“九大”不仅仅是开一个会议，从这方面来抓工作，我们就会站得高，看得远了，整天就不会被眼前的事揪住了。我们就要看看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就不会从极“左”极右方面来干扰斗争大方向。最近革命大批判就松了，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大家对刘少奇知道得多一点，陶铸也了解一点，因为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评陶铸的两本书》，而邓小平就少了，难道陈丕显，曹荻秋就批透了吗？还没有，在上月就有谣言，说陈丕显见到了毛主席，有人就很高兴。是不是有人等待陈丕显上台呀！肯定有。为什么在出现炮轰南京路时，吸引了这么多人，搞精兵简政，要整顿队伍，但现在把走资派放在一边，有人就要用此机会溜掉。同志们，陈、曹还没有死心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呀！对于这些干扰，有的人就有很大兴趣，有人总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总想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搞垮，因为垮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人就高兴了，而这个问题有反应，不在于阶级敌人在冲击我们，而在于我们没有把方向抓牢，来带动群众，对准一小撮，我要负责，有些工作，上次回上海没有着落，主席视察之后的指示没有落实。当前我们要召开“九大”，要为“九大”召开作出应有的贡献。如果不注意，上海就可能走向反面，原来比较先进，跟主席一步没有跟上，就可能落后，脱了一、二步就困难了。必须紧跟主席战略部署。当前要抓住“九大”筹备工作，那些派性就没有市场了，就可能把无产阶级志气鼓舞起来，好多单位有

问题，前进不大，有些单位比较先进，而转化为落后了，铁联就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上海反常委会与反中央一样，各个击破，而在上海也是各个击破，先反张春桥、姚文元、后反徐景贤，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徐老三，这是流氓话。在上海还有一种习气，你算老几，洋泾浜，在智取威虎山中，因为杨子荣是最后一个到山上，是第九个，所以说是算老九。这是土匪用的语言，今后谁讲这些话就是流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红卫兵是老几呀？我们工人，农民算老几呀？我们毛主席就是依靠普通工人、农民、红卫兵、革命干部，有些共产党员听了也不反对。徐景贤有错误，缺点可以批评，我有错误也可批评。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把徐景贤搞得灰溜溜的，又搞王成龙。

张春桥同志又谈到，离开阶级斗争形势就没有办法分析，打倒徐老三你可以贴吗？打倒王成龙你可以贴吗？打倒张春桥你可以贴吗？我们呢，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发动猛烈进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搞垮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否则上海就会落后了。中央关于九大问题下达以后上海没有声气，有些单位恢复党组织生活，就没有向革委会报告，你们不带动群众，就有人带动群众前进，搞了武斗，我就不相信群众想搞武斗，普陀区，武斗频繁，一定有反革命。

当前要抓住“九大”准备工作，无论如何不要把修改党章孤立起来，要与当前斗争结合起来，要与恢复党组织生活结合起来，这是不容易的，

有斗争，有人会从“左”，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有些人就不要恢复党组织生活，也有些党员尾巴翘得高高的，怎么样，搞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还要听我的，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对刘、邓不造反？对人家造反不支持，我看这样党员有问题。

张春桥同志又谈到，犯了错误愿意改与不改有区别，翘尾巴就不对，不能中央讲恢复党组织生活，有的党员就翘尾巴，这里充满着斗争，这里包括阶级斗争。

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抓紧，中央给我们一个月时间，两个星期内你们要交出初稿，第三个星期总结才能回过头来讨论一次吧！第四个星期才能总结成一份草案。这里要好好学习，如果对刘，邓和毛主席建党路线都不知道，搞不清楚那怎么能修改呢？这需要我们对毛主席建党路线指示好好地学习一下。另外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了什么问题，拥护什么？反对什么？

张春桥同志说：“九大”党章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党章，因为我们的党经历了马列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我们的党章就要表现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最新水平的党章。“七大”是刘少奇搞的。“八大”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春桥同志接着说：我们都要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这次就要看我们搞得如何，搞好了送给主席，给主席能打四十分、五十分、还是六十分刚好及格，还是不符合要求，受批评，犯错误，就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我们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了那提高也快。

张春桥同志谈到：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中，中央认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就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张春桥同志解释这个最新指示时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那就是指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象以前特务，叛徒和乱七八糟都混进了党组织。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有些组织不是朝气蓬勃，而是死气沉沉，以前有些党员干部年龄不大成天看病，没有朝气，而是暮气。有些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斗反而没病了，陈、曹放了不斗，反而胖了，你们不斗他们，将来他们要斗你们啊！

张春桥同志在谈到修改党章时说，要知道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什么叫纪律？什么叫民主？无产阶级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为何不能遵守纪律。这次修改党章要向毛主席学习，要向列宁学习，列宁有些建党理论要好好学习，特别是毛主席的，边修改边学习。我们想到的，就有这么几条。你们下去以后，每天要用最简单的语言，向修改小组汇报。

这几点我们报告了中央和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很好，也只有毛主席，相信群众，让广大群众来修改党章，那工作会搞得更好。

附带讲一下，团怎么样？现在还不能有明确答复，修改党章会碰到党团关系，到下面去要征求意见，有很多人要求红卫兵代替团，如连队没有红卫兵，解放军本身是一个兵，而红卫兵又是解放军的后备军，所以解放军再戴一个红卫兵袖章就不太好了，又如工厂也没红卫兵，农村，机

关和其他单位也没有红卫兵，所以红卫兵与共青团如何关系，希望广泛征求意见。不管怎样，团组织也要整顿，团内也混进了坏人，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就是坏蛋，当然大部分团员是好的。假如学校红卫兵要代替团，红卫兵也要整顿。

到下面调查碰到没有定性的怎么办？没有定，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没有检查好的不要参加党组织活动。有些人不愿意参加党组织，就不一定要拉他，有些人还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参加党组织。

张春桥同志最后说，现在冲向社会的风气有加强，学校还是要复课闹革命，不要在社会上，有些人还在外面，有的人还在武汉，人家不欢迎，学校有些人一到工厂，有的就闹分裂，分成两派，到农村也是这样。学校斗批改没有改好吗？不管大学生，中学生都要回到学校，如果到工厂去要诚恳学习，那还有点好处。

最后张春桥同志说：让我们在毛主席的生日的前一天，把修改的党章草案交给毛主席。

徐景贤同志讲话：

春桥同志讲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而艰巨的任务，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这项工作抓好。最近工作就要围绕着筹备“九大”来带动其他各项工作，促进我们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批判刘、邓的建党路线，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阶级敌人。最后徐景贤同志指

出，要求这次下去的同志，在斗争中学，在工作中学，到群众中去学，和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建党理论和有关指示。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南京工学院《东方红战报》 1967. 12. 10

77)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小组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11. 27

修改党章需要大家好好读书，读《联共党史》特别是头几段（第二章）、列宁《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左派幼稚病》、《关于党的纪律问题》。纪律是有条件的，“驯服工具论”是不对的，党章一定要体现民主集中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党是好好的，但是并不排斥党内有坏人，当时有陈独秀。党内生活比较活跃，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遵义会议前搞得一塌糊涂。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二年经过整顿，党内比较活跃。进城以后，又有些变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刘少奇一套越来越糟了，有些方面把权也夺去了，搞了个后十条，一九六三年就更严重了。

总纲最难写，一定要体现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国家新贡献也要写上，最好要用毛主席语录写，不在于新的说法，要每天学毛选。

“九大”开的时候，一定是很活跃的，……姚文元同志给毛主席的信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上海有的（党员）党籍要重（新）建立。这样的事曾在苏联多次发生，提出“清党”的口号是列宁提出来的，发展新党员有可能坏人钻进来，要防止。

对“八大”党章怎么估价，有人讲是刘少奇的党章，不能这样说，至少民主集中制讲到全党服从中央，这是体现毛泽东思想的。

78) 张春桥谈修改党章

张春桥 1967.12.00

摘要：

1 . 总纲里毛泽东思想这部分要与马列主义串联起来，把列宁的指导思想也写进去，说明列宁的与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

2 . “九大”要强调团结统一的方面，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斗争方面不会忘记，但团结也要讲。七大，我们能消灭蒋介石，与党的团结统一分不开。党的历史也要写，要用简单语言写，两条路线斗争一直贯穿着党的历史。民族问题，民主党派问题，都要放进去，民族问题是个复杂问题，民主党派的思想基础还存在；组织上把它搞掉，就会跑到地下去，还不如让它在地上好，毛主席的话要多写一点，这样人家谈起来，不会觉得太长。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地方出了修正主义，下面可以造反，要写进去，才有世界意义。“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

式”要写进去。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党共讨之，这样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有法律依据了。

3 .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否还会以这种形式出现，我估计可能不会，他可能不会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

4 . 三面红旗应这样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

预备期要的，年龄也要的。

79) 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12. 05

我想讲一下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为什么我想强调的讲一下落实问题，我们经常地学毛主席的这段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它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语录不知道学了多少次了，让我们根据主席这个思想，来看一看中国的赫鲁晓夫刘、邓、陶、彭这些人究竟倒了没有呢？我不知道同志们怎么想的，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吧，是倒了也没有倒。如果没有倒呢？那刚

刚不是讲了，现在陈丕显、曹荻秋还没有到这儿来讲话呀，讲话就受审判。那刘、邓、陶还没有出来讲话，把刘少奇拉到这儿来，那还不要打死。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他们是倒了，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从政治影响，从思想上来说还不能一定倒。他们的流毒很深，他们自己不甘心失败，要靠我们来制止他们。我们要看这样的人物，他们已经搞了几十年了，陈丕显这样的人到上海也有十五年之久。如果加上他在苏中、苏北地区工作的时间，加起来有卅年之久。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把他们的影响都肃清吗？他们虽然是一个人，但他们是一种势力，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在这一方面不能说是他们已经被打倒了，他有什么基础啊，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是什么毛主席上次到上海接见了陈丕显，还说得活龙活现，说什么陈丕显见到毛主席还哭了，又说什么陈丕显到北京学习去了。

我说的这些话，在上海若干地方流传，一直传到陈丕显自己那个地方，陈丕显听了很高兴。特别我觉得，这种事呵，当然你也不要太重视，特别也不能小看。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它说明了陈丕显不甘心失败，或者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陈丕显失败，愿意他复辟。不然的话，这样的话怎么流传呢？为什么不给与驳斥？陈、曹现在在大会上装得可老实，他们现在是经过一年多，现在他们的一套变啦。什么、什么、什么事件，他就说是这样，但就这么一套。他也不跟你顶，我们对他们办法多了，但要打他的要害，他也是狼狈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死心，你们不要看他们

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老实了吗？他们并没有死心，还想复辟，还想回到一年多以前的情况，还想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如果他们再上台，那就危险了，去年的白色恐怖会真的到来。

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斗争已经完了，一方面我们看了形势大好，大局已定，我们已经夺回了胜利，不要轻易的放掉。但是一定要看到，斗争还是复杂的，还是尖锐的，不过斗争的形式有所不同，和去年这个时候不一样，会使人麻痹起来。

我们一月革命夺权以后，这个风浪也不小，在上海一浪一浪的，向着革命造反派冲击，向着市革命委员会冲击。浪并不小，那些人中间，不管他们自己怎么想，他们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势力，代表资产阶级执行，代表保守势力。你们还记得“上柴联司”一个组织，秘书全向东吗？这个人啊，全向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有人说是战斗队，后来才知道是一个人。看了他的言论，有几个人才说，这个人是全向东啊！不过是立场不同，这个人是全向西，是资产阶级。我们看东边，他看的是西边。世界上的事情这么怪，我们说是革命，他偏要讲反动，因为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看一切问题都相反。他们全向东，实际上是全向西。世界上还怪呢！最近又出来一个叫“只向东”。

由于现在是革命派的天下，有人想反对我们，但不能再象去年那样干事。现在都打得造反派的旗帜，把自己的番号叫得越革命越好。最近机关里人不多，开了个一二百人的会，我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看到的材料也

不多，只是看看他们写的文件，什么“告共产党员书”。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全部的观点，他们的主要方向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方向，是保守观点，是代表保守势力的，是要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很看不惯，有一种仇视。“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掌权，这样一些人能行吗？要掌权还得靠我们。”他们很神气。还看到一些材料，也还有些组织，他们活动更加隐蔽，观点都是不知包了几层红纸，你们要把这层红纸剥开，再剥一层，再剥一层，到里面才能看到原来是资本主义，是白的。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同志们要注意，现在有不少组织在搞活动，搞秘密组织，不敢公开。

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天到晚就满足于开大会。大会开得热烈啊，大会是要开的，我们不是一般的反对开大会，但如果我们只是追求这一些，不去做比较扎实的工作，很艰苦的，做了好多天没有用的，碰钉子碰得厉害。这样的工作要很好的去做。今天的阶级敌人，他们向我们作斗争的手段花样越来越多了，我们如果不去扎扎实实的做工作，那就留给阶级敌人很多空子，这些就是利用我们的弱点，利用我们的错误，利用我们的缺点来搞他们的活动。他们有时候还是明目张胆的来搞的，用合法手段来和我们做斗争，有时候从极“左”的方向来向我们进攻，提一些非常左的口号，或者我们刚刚提出口号，他们就接过去，接过去就变了。主席提出的口号，他们就马上“用”，但他们把主席的口号，变得合乎于他们的要求，有时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

最近主席视察了上海的阶级动态，观察一下各方面的动向，现在我个人看法，这个同志们还可以再研究，我觉得是两方面都在进攻。现在有一种极“左”思潮，但不是主要的，那么现在呢？极“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除，还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公开的，或者比较隐蔽，但是可以看出来代表保守势力，它公开的对革命造反派不满。现在两种形式同时存在，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单位极“左”思想的威胁是主要的，但在另一个单位，极“左”思潮可能也有，但是从右的方面进攻，这是主要的。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对整个上海的形势，是在一个大好形势中间来观察两个阶级斗争的时候，要做具体分析，那么我们只要提一个口号，……我们革命造反派要执行，革命造反派里面的一些人就歪曲，而敌人就利用我们造反派的缺点、错误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再加上造反派内部的一些不健康情绪，利用这些东西，来干扰我们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这个问题要很好的、很冷静的、仔细的进行分析。因为最近这个动态我觉得比较复杂，这一个多月，七、八、九、以后到十、十一月份，这个形势有一个变化，要很好的观察分析。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掌握阶级斗争的大方向，矛头永远不要转移。我们的矛头要对准刘、邓、陶，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工作如果出偏差，首先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敌人要冲击，要干扰，也是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斗争矛头搞乱，把大方向搞乱。

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混进了别的阶级的人，这是正常的。因为工人阶级的前身都是劳动人民，而且主要的是贫农雇农，你们在座的工人同志不

仅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家谱，你们几代都是因为农村破落才做工人。这是主要的。但是解放后，除了我们计划的把大量的人，农民、学生动员到工厂去工作外，其他阶级的人，为了改造他们，让他们进了工厂，这本来没有什么，在工人阶级队伍里面，在工厂里面，有坏人，这是很正常的，以后还会有。我们还希望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在文化革命中查出来的那么多坏人怎么办？你说这些人统统去劳改农场啊？我看到农村能够劳动改造，为什么在工厂不能劳动改造？再加上你们管嘛，你们自己管嘛，不要给中央增加麻烦，不要给上海市革委会增加麻烦。我们厂里有几个坏人，我们厂里的造反派就要自己监督他们劳动，监督他们改造，对他又熟，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我们都知道。你送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人家又不了解他们，他摇身一变，就变成造反派了。问题就在这么摇身一变。现在就是有一些坏人混进了革命造反派的队伍，有的人甚至篡夺了个别单位的领导权，当上了头头。这是事实，也是毛主席在观察中间讲的这个问题由他们自己组织去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给×××查到啊，”不得了，造反派里尽牛鬼蛇神。”讲这种话的人不是很清楚吗，和陈丕显、曹荻秋讲的一样嘛。谁利用造反派把自己队伍中间的坏人清洗出去，向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向机关造反派、向其他革命组织脸上抹黑的话，那同志们很好地反驳他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呀，怎么和陈丕显、曹荻秋说的一样啊！”因为这种人很少很少，我们整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几百万人，就算在我们队伍里查出来一万二千算什么，况且几百万分之一有什么了不起，还是绝

大多数是好的嘛。这个完全可以反驳他们，对于这一些谁要是这样做，那倒是用得上一句话，说这个就是“老保翻天”，这倒是对的。

但是同志们我们自己一定要清醒，不能因为怕老保翻天，我们队伍里有了坏人，我们就不敢清。我们还是要清的，你看看吧，我们党，党内刘少奇都清出来了，你说是不是，全世界老保翻天啊！美国、苏修……他们会不会说什么光荣、伟大、正确的，你那个常委里都出了那么多坏人。我们说，不能人家说这种话，我们就不敢把我们队伍搞干净了。恰恰相反，我们越是把我们队伍搞干净一些，老保就越是没有办法翻天。因为如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话，他们要通过谁复辟呢？我看是要通过那些混进了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有的单位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坏人在那里盖住，你要揭盖子，他就压着。

80)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12. 06

本月六日下午张春桥同志出席了市革委会会议，听取了一、二、三线和各口修改党章情况汇报，并作重要指示。徐景贤也作了重要讲话，现将春桥在听取汇报时所作指示，整理如下：

当二线同志汇报到提工人阶级还是提无产阶级，下面有争论时，春桥同志说：不要在名词上争来争去，有时可用工人阶级，有时可能无产阶级。

我们的精力不要放在争论这些名词一面。中央委员会如何设置，这是很难发表意见的，要下面同志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有困难的。

当汇报到有些厂在批判生产好就是好党员的时候，春桥同志说：不能说生产好就不好，问题是政治要好。造反队员生产吊儿郎当的也不行。有些党员与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要分清，大多数党员是跟党的，热爱党的。

当上面同志汇报到下面同志劲头很大，但领导不支持（如上无三厂几个青年同志，因厂级领导不支持，而到康平路反映情况时），春桥同志说：要支持他们自己，还没有联合的单位，什么都等上面的布置，三天不布置也就不知道干什么了？过去的旧市委就是天天在布置，不要那样嘛，还是要群众自己搞嘛。

当有人建议市革委会尽快建立党的核心小组，以便对下面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审批时，春桥同志说：“现在就是有些同志还没搞清楚一月革命，我们究竟有没有夺权。不是我神经过敏，我是很迟钝的，就是有些人不相信市革委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市革委会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的权，旧市委最大的权是党权，市革委会为什么不能批呢？”当财贸口汇报到财贸系统小业主多，是否与职工一起学习参加批判时，春桥同志问：是否参加造反派？答：参加了，春桥同志说：让他们自己去议论吧！（意思是不一定与职工一起搞）春桥同志的这些指示是插话中作的。

张春桥同志最后做了重要讲话：

三条线的工作任务最后还是要拿出一本比较满意的修改党章的草案出来，不要群众运动搞得很好，但拿不出一个本本来。现在我们自己学习不够，学习很重要，要抓紧。有些材料党章修改小组可以看，修改小组任务很重要，要学习又要到群众中去修改批判，又要写，现在大家反映修改总纲难，但后面的也不要轻视。写在党章上面往往都是过去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不然不会写到党章上去的。涉及到党的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能只看到刘邓右的方面，假使那样写，也可能出现另外的问题。

“承认党章”，这样写好不好？第一章党员条件中就谈到这个问题。究竟如何写好。联共（布）曾经写过党员要精通党纲，主张精通的是大学教授。文字要简练，又要大家遵守。怎么写法？一边搞一边讨论，一边要看书。要看毛主席的书。

群众运动的问题，要作一个长远打算，现在工厂有 50 %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再不考虑党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再要前进就有问题了。一月革命的时候，我跟姚文元同志就考虑了这个问题。要不要一个党的核心？二月份我在主席那里请示这个问题，主席说到，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呢？常委会不可以吗？我讲这个意思是主席的意见，是不大同意搞的。党的整顿在九大前要进行一些工作，大量的工作要在“九大”后进行。等新的党章出来那就有了方向。因为不是哪一个参加不参加的问题，是一个改造思想的问题。

有些造反派是很优秀的，但并不是说就够做个党员。党员应起些什么作用都是很清楚的，所以要作长远的打算。要抓些点试一试，开始整顿几

个单位，碰到那些问题，再研究。面上要作些长远打算，把党的工作研究一下，现在的大学习、大批判对全党广大干部、广大群众都是关于党的建设的教育。可能经过教育，一些犯错误的同志提高了，改正了，一些造反派的同志具备了入党条件。

市革会许多组工作比较乱，被别人牵着走，要处理各种事够忙了，上海这样一个地方，一万个人提一个问题，一千万人就是一千个问题，那你就整天忙不过来。还是要抓政治、抓思想，而且放在第一位，才能够解决其他问题。

现在的目标很分散，昨天报纸上有消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90%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如果你带了群众往前看，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好办一些。

现在还是要抓紧一个问题，党不管党，主席已经批评多年，我们不管，刘邓就抓去了。要认认真真的抓，不要迷信大机构，不要迷信人多，机关斗批改不搞也不行，认认真真的抓，主要是发扬好的经验，组织交流，出现大的偏差提醒一下注意。可以放手让群众搞，要重视，不一定在人多这个问题上表示重视。也可能面上能够提供经验，修改小组一、二线同志要抓紧，二线已经提出来的党章、党纲先印出来看一下，作个比较。这个事不是那么容易的，浙江省的同志提出取消地委一级，我问取消了

怎么办？他们说取消地委后，没立办事处，这还不一样？有的提出什么都不要。体制不能随心所欲。有些问题，如民主集中制问题，怎样民主，怎样集中？党的领导机关怎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代表常任制等，可以多做几次设想。中央书记处要不要？中央机构大家认为多了，有那么多部。延安时，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常委。各个时期不一样。按“八大”党章规定，书记处是处理日常事务的，但到邓小平管的书记处，成了独立王国。同样一个问题，到什么人手会不一样，不在于名称，在苏联、斯大林当总书记是革命的，勃列日涅夫当了总书记是修正主义。

对基层来说，把党章的第一章党员和第六章党的基层组织修改好，一章、六章要写好。省委中央一级让修改小组来考虑。

党的委员会起什么作用，班长跟委员的关系，要不要写进去，这些条文都不简单，都是党几十年来党的生活的条文化。我坚持还要条文的，因为有的同志不喜欢一条、二条……不行的，条文可以是整人的工具，也可以是保证党的生活正常化的工具。是否可以一不迷信章程，第二，搞一个有利于革命的党章。条文还是要的。联共党章开始十条，后来发展了，到苏共十九大时一百条。多了不一定好，少了不一定不好。

81) 张春桥接见文艺出版界代表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12. 10

摘要：

在文艺界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阶级斗争在这里很尖锐，一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一直统治我们文艺界的，卅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他们老早就篡夺了。是在南京国民党的控制下，这些手把青年引到国民党那儿去。有一个时期，中央那根线断了，他们把特务、汉奸拉进来，也拉些革命青年做样子，他们矛头对着鲁迅。江青同志也在上海来找（党）的关系，就不解决关系。这样一伙人，在上海形成一股很大力量，也把这力量带进解放区。

在解放后，各式各样的电影厂都包下来了，我当时高兴，说电影行业全都国有化了。那些老板，把工作给你，又把地位给他，电影厂的人都有军衔的，戴笠曾吩咐：“这些演员穿了我们的军服，他们进来，敬礼，对他们要特别客气，这样他们就死心塌地地为我们工作了。”戴笠特别注意这些，解放之后，除了去台湾的，都留下了。周扬等也利用我们这两点。现在他们专了我们的政了。哪一个单位，你去查好了，都有。中央一再讲，但是这个队伍始终清理不了，派去的人不是被排挤，就是被溶化。（徐景贤同志：溶共政策）一些青年被培养成他们的接班人。当然毛主席的政策威力大。每次他们都抵抗，抵抗不了，暂时接受，马上就反攻。他给你搞各种政策界线，一搞政策界线，搞得你没法搞。五六年肃反，谁领导？陆定一、彭真这些大领导。他本身是反革命，”四

清”也是这样，搞文化大革命，总想可以搞彻底，呕！一转转 to 群众头上，还是保证这些人。

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成绩还很不够，斗争还相当艰苦，对冲反动路线，造反派是有功劳的，在冲垮的地方，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不能说已根本胜利，他们的班底还很全面。不要以为开个大会轰轰就行了。有些单位送给我斗批的人的名字上写这些人如何坏，写的很抽象，怎能定案？比如红旗电影厂，写的×××加入国民党，为戴笠布置灵堂，与田汉关系密切。是什么密切，是一起吃饭还是搞政治活动？所写的哪一个人都不具体。将来他可以说，没有那么回事，一个班子都没有动。出版社也是这样。当然我不是说一个厂、一个出版社所有的人都是坏人，现在的材料都是历史的材料，现行的不查清不行。

我们的队伍要很注意，是有些人混进来，曹荻秋正在攻这点。他攻这点时，我们要清理队伍没法搞。现在上海大局比较稳定，造反派也经过一年多的锻炼，不会一清队伍就垮台，现在可以清理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大方向一直受到干扰？如果坏人钻进来，控制了领导班子，照公安六条办。敌人想尽办法钻进到我们内部来，现在不能象去年那样搞些保守组织，所以要钻进来，乘造反派清理队伍就攻击。也有这种观点：造反派不能掌权，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这是“共向东”观点，你们只知道《共向东》，很早我就看到清华批驳这些观点，不能重新换班。

搞得稳一些，稳是调查研究，不是一潭死水，要发动群众，发动群众，乱不了我们，发动群众很多材料就有了。靠档案，很多档案都搞乱了，发动群众搞得准，不会搞错，要狠。过去我对这些人有意见，但是手还是软的！不是一打去就解决问题，有时想得多了一点，现在如果不立这个狠心，什么时候再下这个狠心？象过去肃反、四清，走过场。应该有我们自己的队伍，真正查清楚，学好阶级斗争的本领。你们（指歌剧院）不是没事干吗？不学好阶级斗争，以后再钻进来了怎么办？如果没斗的对象，可以拨几个。一个，要把敌人查出来，同时把我们的队伍锻炼。光是冲一冲就能解决？顺便提一提《狂妄》不要紧张，青年这个劲是好的，比如一潭死水的单位，要冲一冲，但是专门靠冲是不行的。我们大会、中会是多一些，小会就少了，光是轰，还是靠人证物证。

有些单位，有些要大乱，有些要小乱，不要笼统地提上海文艺界是要大乱特乱。一个单位有几个车间，有些车间、有些部门在历次运动中都没碰到。（电影厂插话：我们那个组织部门就得冲一冲。）你们的革委会去领导群众，群众就不会冲你这里。你不要捂着，盖着，我们的责任是领导群众。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地方好”，现在看看不对，就承认错误。领导群众去冲，委员会有坏人，自己把盖子揭开嘛！要有这个勇气。曾说过某某是好干部，现在有问题就把他揭开来，不要怕。乱敌人，不要乱自己，要看领导，领导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不是脱离群众，就不会乱了自己，当然群众也可能受坏人挑拨，受坏人利用，我们要说服群众。

82) 张春桥在 " 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 " 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 12. 19

首先让我们看看上海的形势，上海的形势好不好？上海的形势是好的，我觉得这是符合实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巩固的，革命的三结合也是逐步发展完善的，总起来说，革命群众、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处理比较好的，形势是向前发展的，比较稳的。然而反复是有的，这是正常现象，局部的武斗是存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相信那里人民群众总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制止武斗。

形势是好的，但这不能说上海形势大好，就不说上海存在一些重大问题，重大缺点，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上海虽然是一个城市，但在中国一百多年头，在阶级斗争中间，在民族斗争中间，上海总是一个重要战场，特别是这几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儿总是非常尖锐的，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把刘邓在上海的代理人推翻了，把他们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这是很大的胜利，但阶级斗争不是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在某些方面阶级斗争还是非常残酷，非常尖锐的，如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很大错误。

不要以为陈、曹甘心失败了。他们等着复辟还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还想把我们压下去，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攻。我们大家都知道，上海不止有本地的地富反坏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难道对上海就忘怀了吗？帝国主义在上海经营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一个帝国主义没有在上海呆过啊？那个帝国主义没在上海培养了一批走狗啊？美帝国主义有，英帝国主义，日帝国主义有……，苏联修正主义难道在上海就没有特务吗？王镒就是苏修特务，所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都没有睡觉，他们都不是逍遥派，都不知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当起逍遥派来，这儿逍遥派不少啊，打打扑克，平常不上班领工资来了，早上八点钟上班，十二点不到就下班，下午也不来，逍遥得很，帝国主义，敌人不是这样，他们挖空心思来整我们。

上海各个角落里面有那么一些敌人在活动，个别地区流氓阿飞非常活跃，有些地区特别女同志，女工人，女学生，晚上不敢到外面来，投机倒把现象最近也非常猖狂，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么，出现这些情况没有什么奇怪，今天有这样的事情，明天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不要相信罗瑞卿什么“十无”、“八无”、“七无”的鬼话，阶级斗争没有熄灭么，问题在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干什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强大的地方，就是群众专政，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越大，那敌人越拼命反抗，但他只能受到镇压，群众专政要和专政机关相结合，专政机关不强大，群众专政得不到帮助

得不到支持，就感到不好办，他没有规定啊，不好抓人啊，就拿中央文革六·六通令来讲，也只是说专政机关可以抓人啊，但专政机关怎么做的呢？公检法是怎么做的呢？当然不能说一年多来公检法没做过好事，大家还是很艰苦么，秩序还是大家维持了么，红绿灯还是开了么，有些事情还是办了么，你们做了一些好事，但今天会上我不想讲这方面的成绩。我请同志们想一想，公检法尽到自己责任没有，我们究竟尽了多少责任，对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支持了多少，帮了多少忙，为他们服务得怎么样，好多重大的案子破了多少，我不想说这个数字，好多案子没有破啊。譬如说，赤卫队的几个坏头头，关在那里差不多一年了，你们究竟审问的怎么样啊？

要拿他们的材料教育全市人民，走资派是怎样蒙蔽群众的，这是个很好的阶级教育材料嘛，但赤卫队这几个头头还是去年 12 月份捉起来的，去年的现在再过几天就是康平路事件了，这些人捉起来快一年了，这样久了，还没有解决，令人气愤的是竟还有些人，认为这些人没什么，可以放掉。又如联司的几个坏头头，又审问得怎么样了，负责审问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人，对联司毫无阶级观点，一点造反派的感情都没有，里边还有一个人说陈还是这个人，可以解放，我听了非常生气，这种人不应该让他做这个工作，也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我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陈、曹一派的，不是我们这一派的。我只举这么几个例子嘛，全市的革命群众都希望把赤卫队、联司的几个坏头头的问题早些解决了，但迟迟不得解决。

公检法这个系统我讲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关心这个地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有黑手，伸的很深，刘、邓、彭、罗、陆、杨，他们这一只手陈、曹等。拿上海公安局来讲，那一位局长比较好，×××是第一任，是个叛徒，后来是杨帆、黄赤波。他们是一直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在这十几年里，干尽了坏事，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在黑手控制的地方，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情况，在这个会上我不多说，他们把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毛主席，做了非常多的坏事。这些人组织上虽然已经垮台了，但政治上、思想上也不能说已经解决了，这些组织里还有他们的死党，我们并没有揪出来，为什么从一月夺权，公安局的斗争大方向老是受干扰，那里边没有黑手哇，和公联指同志们座谈，他们举了很多例子，证明有人挑动，他们不愿意失败，他们不愿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从“左”的方面来进攻，想使我们保持旧的机构原封不动，我很怀疑检察院那个革委会是否真正的革命委员会。因为这个革命委员会不是阶级斗争盖子揭透了，造反派得到锻炼了，三结合条件成熟了，不是这样搞出来的，希望检察院的同志们考虑考虑，我只是怀疑检察院的同志们没有那一股冲劲儿。

83)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文化组成员 时的讲话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1970.10.30

江青：

文化组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成立的，因为富治同志病了，总理工作很忙，所以以后就没有找文化组开会。

回顾七、八年是很不容易的，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康老的支持下，搞出这么一点东西。一九六七年、六八年搞运动很忙，照顾不上了。后来由于杨成武的干扰，在宣传队里派进一些坏人，发现后，我主张一分为二，好的留下来，但他们把人全都换了。一九六九年我们才知道，把好的同志请回来，在总理的支持下，成立了军宣队。从那个时候，我就抓得比较紧。一九六八年、六九年，今年的上半年，我陷得太深了，其它工作就受影响，照顾不上了。

文化组三月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原因是大家刚凑在一起，有的同志民主集中制注意不够，个人发号施令。今后在吴德、贤权同志领导下，实行群言堂，要搞民主，当然也要集中。八年来很不容易的，我们搞了这么点东西，主席肯定了我们。出现问题要一分为二，要细致。对缺点错误要分析，正确的意见要接受，不正确的意见其中也有的好心人提的。我这么多年是细致的，不细致是站不住的。文艺关键是树立先进的人物，中间人物大量存在，反动是少数，我们用先进人物改造中间人物。我们对反革命的攻击要顶住。

关于搞新的创作和会演的问题

我们的党史知识不足，最好用部分作题材，如《杜鹃山》，现在改为《秋收起义》，面就太大，不小心就出问题，我们还是应该从一个角落去搞，叫《杜鹃山》。《杜鹃山》原来上海的青年演得不错，我带回北京，后来彭真不让我搞，给了邓拓搞，现在我们可以搞。又如《铁道游击队》要离开枣庄，不要写真人真事，否则就有人出来认帐，也不要作为样板戏。对破坏敌人交通，党有一系列的政策，这个戏的内容就是在铁道线上打游击，名字暂不定。

总理很忙，我也忙，希望文化组靠集体力量搞起来，搞好可以试演。

《红嫂》要另起名，要脱开那个地方，原来作者有问题，你们打报告还叫《红嫂》，你们搞创作不是为了会演，你们得自己组织起来创作，排好，试演。组织几个人提了意见以后再改。

关于各团新的创作，你们另写个报告。

会演，我想得不周到，因为四届人大，地方党代会相继召开，各个单位也有整党建党，大家都很忙，因此，会演是否推迟到后年的六、七月。六、七月北京天气也好，这样地方的东西出来更多了，有些也可移植，不管什么戏，只要是革命戏都拿来。关于会演推迟，请你们再重新打报告。否则你们也累，我们也累。今后我不能象过去那样抓了，以后这些工作文化组要管起来。这次事情你们就发了纪要，中央还没有批准，你们就发那么大范围，这办法不好，要学会办工作，今后不能这样。

文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部门，文艺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同志们精神上得要准备长期的斗争，最近敌人对《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都攻击过，阶级斗争在脑子里不要忘掉了，我们自己也要改造。重大问题汇集材料可以，先不要写。《万水千山》是要的，但不能搞宗派的，主席说要写会师，后来又写了杨成武。写大战役都要慎重，原来不是重大的题材，不要用大名字。

过去法语系统的国家要求我们派剧团出去，我们一直没有去。是否拍完电影后，可以派一两个团出去，《红色娘子军》出去可以和《黄河》一起去，演奏点自己的作品，这样乐队也解决了。京剧也要出去一个。团配备强点，不光能演一个戏，另一套班子在家里。创作人员先下去，你们回来后再去生活。

你们的报告要写好，讨论得细致点，有问题，有办法，有的可以提几种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的报告我们就好批了。外交部、中联部的报告好批。你们要学习。

另外，你们要大胆点，不要怕，犯了错误也不要紧，要负起责任。以后报告统统打到总理那里。我过去，陷得很深，什么都得管，文化组成立了，就好了，你们要担负起责任来，你们大胆，我们支持，有了错误，我们给你们承担，当然发现了问题，我们也给你们指出。

我们也可以演折子戏，如《刑场斗争》、《打虎上山》舞蹈都可以演。

姚文元：

同意江青同志说的。

张春桥：

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创作人员解放多些，下去，有了剧本就好办了。

搞了几个戏，大方向不能动摇。其它意见可以一分为二。另外，我们确实取得了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有了这些经验，我们就懂得怎样工作了，还可以培养青年一代。前几年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破坏，江青同志不能不集中精力攻坚，因此，江青同志就要花极大的精力，前一阶段是需要这样做的，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实践经验，又有了队伍，形势很好。再不能象过去那样了，否则，领导同志就吃不消了。现在你们要带队伍去打仗了，靠同志们独立作战。在新的过程中，你们还会犯错误，但不要紧。一种是在错误路线下犯错误，一种是在正确路线下也会犯错误，这不怕。什么叫样板？样板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方向搞出来的，我们是讲方向，基本思想，叫毛主席路线的样板，大家根据这个方向继续搞。

会演要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才能搞好，特别这几个样板团都有点新东西时再会演，所以我赞成会演推迟。

江青：

这几个团不要翘尾巴。

这几年还要感谢北京市革委会和谢富治同志。

话剧我们也鼓励，有了话剧电影剧本就好办了，我们可以改编成别的。

杭州负责搞美术的教改，曼恬同志去看看。但不要表态。

我们几个团要小心，我们吃过亏啦！（坏作品问题）团内本身也有破坏因素，要注意。文艺队伍相当复杂啊！过去招生不招劳动人民的子女，这次上海招生，贫下中农可高兴啦，都是贫下中农子弟。过去计划又回到旧的艺术院校了。

于会泳同志住北京，到上海跑跑。

《南海长城》就是写民兵的，《红嫂》就是写军民关系的。《奇袭白虎团》赶快拍电影，武戏这个最好，如果找不到小宋的录音，就叫别人代唱，他演。这个戏拿出去好，有国际主义意义，不审查了，可以拍。

创作组赶快下去，下去越久越好。

《智取威虎山》电影付了很多学费，北京要总结经验，应该总结失败的地方，世界观的问题，总结要认真，不要回避那些失败的经验教训。样板戏，电影都要认真总结，不总结就会忘的。

最重要的是树立起正面英雄形象，就是不能丑化。发现下边好的创作要推荐，推荐再提高，大家讨论搞哪些。写典型不要写真人真事，主席进城后就提出不要搞真人真事。每个团自己讨论，然后文化组讨论。

《红嫂》有修改基础，以后改编芭蕾舞也有个基础，就是《红嫂》的基础。

明年抽两个团出国。半年搞一个戏少些。内蒙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可以改，改成敌我矛盾的。

姚文元：

在群众中，除注意发现一些大的节目，也要注意发现一些小的节目，歌舞都可以，工农兵业余演出需要这些节目。几个样板团也可以搞些小节目（江青插话：已经有的雏型的東西，不要轻易丢了。）《大渡河》小敦演的，可以搞成折子戏。

张春桥：

一般东西，由文化组负责审查。短片等都可以自己审。发现问题，你们拿不定主意的，向中央提出来解决；重大的政治活动，送中央看；重大的问题主席、林副主席都可以审查。只要没有政治上大问题，文化组审查就发行了。有好的东西你们也推荐给我们，要严格掌握政治标准。不要因为我们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就不敢推荐了。

江青：

过路电影给我们看，当敌情看。

另外，不能将上次“智”、“渡”那种问题重演，要严格政治标准。

你们先组织两三个人。看《红嫂》的原始材料，研究剧本后，指出哪些要增，哪些要减，哪些要改，然后由剧团写出修改提纲，不然，他们乱改。例如《红灯记》将来改不好不拿出来，我们不是乱改，指出那个地方有问题，给他们方向，然后让他们写出提纲，不要给人家一盆凉水，现在这个戏已经不是打补丁的问题，文化组要有人下功夫。改，是在他的基础上，重点场次是什么，这是个工作方法。

你们没有下功夫，吃不下，睡不着。内蒙《草原英雄小姐妹》可以两头弄掉，《大渡河》也可以，《红嫂》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改好。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84)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批判《园丁之歌》稿件上的批示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1973. 07. 28

江青：

《园丁之歌，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

教育路线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摆布。（剧中的）女教师热爱工农，最后又给小孩子出了难题。还是让孩子成为火车司机好。

（剧中的）教室看不出典型环境来。女教师还给男教师说好话。男教师转变也不合理。“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什么没文化就不能干革命。简直是反攻倒算。应是有文化更好革命。女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妆象少奶奶。矛盾也没有很好解决。

附件：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批判《园丁之歌》稿件上的批示

请春桥、文元同志先阅，并请提出意见。

江青七月二十八日

看了一遍，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是否要肯定教师的大多数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进步，坏人是极少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的，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

二、关于学文化的问题，在批判这个电影的修正主义观点同时，是否要肯定学生学社会主义文化及学马列、毛主席著作也是必要的。以全面说明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妥否，请斟酌批示。

（建议改后我们不再看了）

文元七月二十八日

同意文元同志意见，可以考虑先发两篇，看看反映再发别篇文章。文章不多，在质量。批周赤萍小册子，一篇文章就收效。

春桥七月二十八日

同意春桥、文元同志意见，请照办。

江青七月二十八日（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85) 张春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张春桥 1975.01.13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

一月十七日通过

各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大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发给各位代表。我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作一些说明。

二十年前，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一九五四年宪法，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总结了历史经验，巩固了我国人民的胜利成果，为全国人民规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前进道路。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宪法是正确的。它的基本原则，今天仍然适用。但是，一九五四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部分内容，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总结我们的新经验，巩固我们的新胜利，反映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共同愿望，就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主要任务。

二十年来，我国人民的新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同国内外敌人的反复较量，特别是经过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九大、十大都再次肯定了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还是改变这条基本路线。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都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国家的生命线。只要我们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也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

现在提出的这个修改草案，是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是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反复讨论产生的，是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产物。序言是新写的。条文从一百零六条，缩减为三十条。重要的修改，有以下几点：

（一）修改草案从序言开始，记载了我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现在写进了修改草案总纲。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由于不设国家主席，草案对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这些规定，必将有利于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

（二）修改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又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政策。在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的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实行革命三结合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分别写进了修改草案。这样，就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各个阶级在我们国家的地位。马克思、列宁一贯教导我们：“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的机器”。我们的草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原则立场，同孔老二的什么“仁政”，同苏修叛徒集团的什么“全民国家”之类的谬论划清了界限。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二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它是我国人民战胜敌人、保护自己的法宝。我们必须很好地爱护它，不断地加强它。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加强国家机关的建设。要继续巩固工人阶级和它的可靠同盟军贫下中农的联盟，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发展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我们伟大祖国的独立和安全。

（三）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对敌人实行专政，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修改草案规定了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

中制，又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其中特别规定了各兄弟民族和妇女的权利。修改草案还规定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同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内容。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些规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一九五四年宪法提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我国人民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规定我国现阶段主要有两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修改草案对于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对于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作了规定。这些规定，把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刘少奇、林彪包产到户、取消自留地之类的荒谬主张划清了界限。

修改草案重申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应当指出，在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象初升的太阳，还很年轻。它是在斗争中诞生的，也只能在斗争中成长。就拿国营经济来说，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许多阵地，无产阶级不去

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无产阶级的扫帚不到，这类垃圾决不会自动跑掉。修改草案关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纠正不正之风等项规定，就是要我们十分注意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阵地。

（五）根据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我们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写上了修改草案，表示我们国家今天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要永远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各位代表！

修改宪法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五年。这次大会将要完成这项工作，公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法。这是一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的大事。长期以来，为了争取和捍卫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权利，为了粉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妄图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卖国的阴谋，为了战胜国内外反动派，我国人民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千成万的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这些斗争的胜利，产生了这个社会主义宪法。我们相信，全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

员，一定会认真地执行这个宪法，勇敢地捍卫这个宪法，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日讯）

86)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 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75.03.01

〔记录稿，讲学习的部分。〕

下面我说一点意见。都已经差不多了。我看了简报，大家讨论也差不多了。我还是说一些关于学习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讲了，主席对这次学习抓得很紧。语录中特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在选这段语录的时候觉得，除了上面这句话以外，马克思的这段话本来用不着选入了，就是为了这一句。因为那段话当中，别的意思在其它选入的语录中已经有了，比如要把生产资料转为劳动者所有，以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等等，别的地方已经说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这句话，我们特别要选入。因为在讨论中同志们说，以前光想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国内反动派和国外的敌人。当然，这

两条是主要的。主席说，中国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强大的军队。帝国主义现在不敢动手，也是因为我们强大的军队。所以，把我们军队的工作搞好，这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最重要的条件。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要动摇。而过去我们在部队在任何运动里面，都是走在前面的。马克思也说过，过去新的生产方式，许多新事物，都是从军队里面出现的。不管地主阶级的武装，或者资产阶级的武装，不是讲儒法斗争史吗？奴隶社会新兴地主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军队，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中国今天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武装。因为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办法夺取政权。我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是在什么条件下改造的呢？是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产生，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出现。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道理一样。今天我不讲社会发展史，同志们可以翻一翻《国家的起源》一书，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没得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非要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打碎了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所有制的改造。这里我为什么要多说几句呀？因为就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这个问题，主席曾多次发表过指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军队的学习，过去走在前面，我们军队工作非常重要，现在这次学习，我希望还走在前面。按学习的条件，比工厂、农村都好。工厂，八个小时，机器开动，工人就要管机器。而我们的时间安排就容易得多。其实，现在

也不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不用占训练和其它工作的时间。我觉得还是屁股坐得住坐不住的问题。认真读书不要搞很多时间。还是主席说的，“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了。现在我觉得这股劲要用在多花时间学习。我们主席这样高龄，《参考资料》两大本，天天都要读，文件批得很多。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曾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不记得。主席写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庐山会议时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陈整风、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主席说：“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

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下面一段话很重要。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比如，对唯心论和唯物论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说天才，大家就跟着说天才。主席指示以后，确实读了一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也办了一些读书班。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志当时怎么样。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他不但反对学习马列，也反对学习主席著作，说学习主席著作是“捷径”。林彪高举是假的。五九年以后，对主席这段话，他再也不说了。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林彪不传达学习。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不重视理论学习问题，我这个军区，就让政治部搞一个班子，学习以后，写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一登，理论工作就算有成绩了，而不是感到，我们在革命工作中，必须学习；不学习就不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不是非常重视的。这方面，我不想多发挥。主席多次地讲，要学习理论的问题。庐山会议以后，七零年又学了一阵。”九·一三”以后，又学了。但已经变成了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主席说，首先是中央委员，以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干部。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很感动人的。群众中传达主席的指示比较晚，北京、上海的工人传达得早一些，

我们也传达得早，他们学习认真，动脑筋，联系实际学习马列。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走，阻力会相当大。

这里我再读一段，为了证明，主席说了多次，就是不听，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也是传达到支部，向党外群众念了的主席的指示，林彪一伙是不会执行的。后来我问了一些同志，他们几乎把主席的指示忘了。主席说：“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修改宪法的报告里面不是说了这句话吗？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不是我的发明。在讨论那个报告的时候，提出说那句话的范围要限制一下，说“一小部队”。我说，不改。主席说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这是主席在六九年讲的。接着，主席讲：“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是主席在六九

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七一年、七二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正如主席所说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我还给同志们念一段，主席讲要谨慎小心。主席说：“大家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主席的这些话，当时林彪是不会去传播的，但印了中央文件。许多工厂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话主席早就说过了。我看了武汉的一些材料，很感动人，他们说，进城的时候，看到地毯，觉得脚踩上去很可惜。可是后来变了，如果看到房里没有地毯就要，说明我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里不是有没有地毯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生

活上、思想感情上是否脱离了群众。我还看了一个材料，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回忆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活，深有感慨。他们回忆打土豪时，搞到了一匹布，首先不是想到自己，而是想到我这个连队那个战士衣服破了，应该给他做衣服。现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有了变化。

我念主席的这几段话的意思，是为了说明，主席的指示不是今天才偶然提出来的，而是多年来主席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是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主席还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指示，希望同志们回去翻一下，我们还准备选编一些主席的语录，不知道主席同意不同意发。

对马列主义的主要著作，从理论上真正弄通弄懂，我们是有条件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对马列的指示，不是处于对立状态。有的人很难说，对马列的指示，他都同意，不见得。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违背了主席说的党员一部分，工人一部分，他们不会接受马列主义的指示的。我觉得不下决心好好地学，搞一阵子是可以的，甚至于你可以把主席的话都背下来了，但没有真正理解、懂得。那样学下去，除了领导干部学不好，而且也没有办法领导下面的学习。下面会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我看到中国人民银行，他们在学习中钻的问题比较深，他们研究银行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他们仔细研究了，在经济领域中，银行怎样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那些地方没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银行是主要的环节。当然，有些问题究竟怎样办，以后还要研究。比如对公社的流动资金，他们管起来行不行？他们研究列宁当时是怎样做

的。你不很好学习，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你就不懂得呀，对他们提出的正确意见，可能一下子给否定了；或者他们提出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支持了。因为，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多老同志，有很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学习理论，并且能反对现状作比较系统的调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能够加深理解。其它问题比较好解决。有些问题在学习中就能够解决。有些问题，要等到将来逐步解决。当然，象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增长的问题，也象毒草一样，你年年除，它年年长，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修正主义几次上台，都垮了，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都完蛋了。如果我们学习得好，政策正确，主席的路线被我们充分理解，那么，我们的国家就非常有希望。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

我就说这一点。其它的具体意见，用不着多说，因为你们已经解决了。不对的，你们可以反驳，我们商量商量。

87)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

《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4 期（1975.4.1）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见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早在 1920 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

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

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仍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

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

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接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

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

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

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段，这三段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

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问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

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

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在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丁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

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88) 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通报》（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同志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概要）

1975. 12. 20

197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一份《外交通报》，即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人士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张春桥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估计。”这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89) 张春桥日记

张春桥 1976.02.03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引用的一首诗的出处和注释（抄自《千家诗》一九五七年版）

元日（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爆竹、山家以除夕烧竹、竹爆裂之声、山魃闻声畏惧而远避。屠苏、美酒名。瞳瞳、日初出貌。桃符、以桃木刻符于门、以御鬼也。岁去春来、春风吹暖、以助酒力醺也。一岁之始、家家换隙桃符、以贺新正。此诗自况其初拜相时、得君行政、除旧布新、而始行己之政令也。

90) 张春桥接见于会泳的谈话

张春桥 1976.02.06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晚，张春桥接见于会泳，谈话内容如下：

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以后文化部所有的事由春桥同志管。凡请示件不要往她那里送了，样板戏剧团不需要报批的件，可以送。

我和江青同志一起研究了几点：

一、看了电视中国京剧团的《夜渡》，感到很粗糙，担心这样弄下去，很快会被人赶下舞台。唱、做、念、打都很粗糙，唱腔有些地方象《智取威虎山》。象这样的戏当作试验演出都不行，影响不好。如果不注意，很危险。要研究每年总有几台站得住的、质量比较高的作品这才行。

有两个情况要分开：一般创作，演出的作品不要求全责备，免得数量太少；但对重点抓的剧目，一定要下功夫，不可忽视质量。几个样板戏剧团的东西，要求象样一些，再拿出来试验演出。

二、关于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学习和开展辩论，要真正从思想上想点主意，不要松下来，一松就要出事。柳宗元有两句话：“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些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如“以三项指示为纲”，关系到否定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到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问题，一定要搞清楚。通过对右倾翻案风的回击，加深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认识，对你们有多方面的意义；一、对各厂、团、校和机关等部门的思想建设有重要意义；二、对创作思想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写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党内走资派作艰苦、复杂、曲折斗争的作品，很重要，也很需要。现在的革命样板戏，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都是直接写与阶级斗争斗争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海港》、《龙江颂》虽然写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但是写与暗藏的敌人斗的。《春苗》等戏倒是写了与走资派的斗争，但思想深度还是差。所以现在还没有一部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不好好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特点，党内走资派的实质和他的特点，就难以写出这方面有质量的好作品。这样的作品，不仅对今天的人民有教育意义，对教育后代也有意义。当前我们对走资派还在走所作的斗争，就有教育现在和教育后代的意义。

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的精神。过去马、恩也讲过但都没有象主席提得这样明确、深刻。当初搞十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主席曾叫我引恩格斯的一段话：“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

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毛主席很清楚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所以，现在看这段语录，体会很深，很有感受。要好好学习。有人反映，文化部有人曾讲过‘三项指示为纲’的话，现在了解是在九省文化调查会上张维民同志和侯再林同志讲的。不是文化部文件上的话。这个责任不在他们，不是他发明的。不过，将来有机会让他们（指张和侯）对有关方面表个态，不要专门打电话去说。

关于五个重点电影的会，你们可以开。《四渡赤水》同意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搞，不要另搞了。这些以后都不要报江青同志批了。

你们问《三剑客》和《寻墙记》翻不翻译？同意翻。关于过路片，江青同志看片很吃力，我们讨论决定，以后推荐给文元同志看。他认为可以送首长就上送首长。文化部推荐时要说明：买不买下；为什么买下，如有敌情的和艺术的参考价值；那些买下可以上送，那些买下可以不上送。

江青同志交代，词曲音乐不搞了，人也不要集中了。唱腔音乐已在练的，可练下去，练好了以后再说。录像电影要加紧进行。”

谈到关于辽宁省要求提倡每个大队都办放映队时，春桥同志说：“都这样搞不行，总要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后解决看电影问题。文艺的发

展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不能阻碍它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粮食只能说刚刚够吃。可能有的省发展快些，这是允许的。但都发展，就成问题了。”

关于调人搞评论，春桥同志表示同意。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91) 张春桥关于“批邓反右”运动的讲话

张春桥 1976.06.28

同志们：

我受中央的委托，向参加学习班，来自中央各直属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的同志们问好，并与大家讲几句话。

暴风雨式的斗争

“四·五”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根据××的建议曾作出两项决议，及时的向全国人民指出斗争的大方向，粉碎了以邓小平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镇压了破坏捣乱的反革命份子，顶住逆流煞住歪风，巩固了社会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正乘着两项决议的革命东风，以实际行动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

“四·五”反革命事件，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发展，两个阶级在政权问题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所出现的必然结果，它和历次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以反革命的失败，革命的胜利而告一个阶段的结束。这场暴风雨式的斗争，告诉全党全国人民一个重要的课题：“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走资派仍然在走，一切革命者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了”。

当前党内必须首先认清斗争的新动向，“四、七”发出两项决议后，许多同志都只是看到眼前那个小圈子，而缺乏一个对全局、对整个形势的充分估计和认识。不少同志甚至提出：“过了这一阵子该松一口气”的论调，而想偷懒一下，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是不切实际而且有害无益，因为阶级敌人正希望我们能够松懈下来，也就是“你松一口气，他多喘口气”。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点斗志松懈，都会给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过去云南省委提出一个“把生产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真落实在生产任务中去”的不正确口号，结果不但生产抓不好，任务完不成，相反的由于忽略了抓阶级斗争，而使阶级敌人乘机破坏，资本主义倾向到处泛滥，甚至一发不可收拾，这次云南省委的负责同志在学习班中深有体会的说：“脑子里少了一根弦，工作上丢了一个纲，任务完不成，悬崖不勒马还要丧权”。小靳庄把大抓阶级斗争贯穿在各项工作中始终不移不误工误时，使革命生产更上一层楼，处处都呈现一片社会主义朝气蓬勃的新景象。这例子各地都有，我不再提，这里要提的两项决议公布后，各级干部所出现的几种情况，可以肯定的说，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对中央的决议是拥护和不折不扣的执行，而

且以身作则带好领导班子里一班人，在群众中同群众一起学习领会决议精神，认真的去贯彻，还带头展开大批判，抓好工作搞好生产，由于党委这一班人有这样的好班长，因此这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局面新气象。

领导班子怕字当头

另一种情况是干部同志特别是领导班子中的班长，“怕”字当头，对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不敢放手支持，对社会上所出现局部的乱子，看成为天下大乱束手无策，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不敢采取果断的行动，在整个运动中举棋不定，显得软弱无力，发挥不出党组织是战斗堡垒的作用。这些干部中的“怕”字归结起来是怕乱，是世界观的问题，中国有一句古话“一朝被蛇咬，一世怕见绳”，由于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或者受了一些委屈，以后又没有对自己以往在群众运动中所受的冲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态度，因此凡运动一来，就前怕狼后怕虎就怕革命到自己头上，革走自己的乌纱帽，凡有“怕”字当头的干部，在这次“四、五”反革命事件以后，就表现出敌我不分，既没有大胆出来支持新生事物，也没有敢对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群众说：“我们的干部好坏摸不清，是非不分明，墨守成规，把运动搞得冷清清”，对这一部份干部，要鼓励他们把“怕”字换成“敢”字，首先必须自己有一个自觉革命的决心好去领会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从世界观上去寻找“怕”字的原因，才能领导运动。要不，便会迟早被时代所抛弃。

反右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种情况是党内走资派在那个地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就会与那个地区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相互勾结，压制群众中不同的意见，压制民主，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大兴资本主义之风，使那地区运动受挫折，生产促不上，真正的革命群众受压，正气抬不起头来，这些地区酷似独立王国，他们对中央的决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也开了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拥护中央两个决议的大会，不落人后的打电报或写信拥护两项决议，实际上尽管他们的旗拉得多大，口号喊得够响，但始终掩盖不了他们的本质与原形 “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 ，就是指这些人，从眼前也许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中蒙蔽群众，但从长远来看，总要露出狐狸尾巴，原因就是他们的本质是反革命的。

邓小平之所以敢于负隅顽抗，就是因为有这样大大小小邓小平式的人物追随他，有公开露面摇旗呐喊的，也有躲在幕后射暗箭，放毒药的，不管幕前幕后，他们既要反革命就必然要露出其反革命的面目，现在，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 “ 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狠抓阶级斗争，把批判以邓小平为主要对象的反右倾翻案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更大规模追查反革命的高潮，今年搞不透，明年继续再搞，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必要的话五年，十年也要搞下去 ” ，我们可以少吃饭少睡觉，不必怕掉几斤肉，可以扎紧裤带，可以损失一些其他东西，但丝毫不能因顾此而失彼，放松对政治斗争的进行，这是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事关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有人说这是 “ 权利欲 ” ，这句话我们曾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 “ 告诉他们我们的权力是工农兵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共产党为这政

权的存在而向一切反夺权者实行专政决不动摇”。毛主席又说“什么叫做权利欲；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权利欲，既得权一点都不能分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欲是什么？就是一点也不给无产阶级，我们是向他们学来的，而且学得更好”，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的斗争历史，就是为了这政权，为创造这政权我们流血牺牲，为保护这政权我们也随时准备流血牺牲，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为止。

极左思潮正在抬头

目前必须注意的是在这“反右”运动中有一股左的倾向，极左思潮正在抬头。“用一种正面的倾向去掩盖另一个反面倾向”历来是反革命份子惯用的伎俩，当着革命的形势在不断发展，大大不利于他们时，为图生存他们就必然接过革命口号，你右他更右，你左他更左，干扰斗争大方向，混淆视听，在一些地区最近出现一股不正常的逆流，党内资产阶级份子退居幕后，让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别有用心的人，以反邓小平为名大搞打击一大片，提出“无官不错，无错不反”不管大干部沾着干字就唯他是问，现在弄成县委没有一个可信，地委也没有一个可信，省委、中央除了毛主席都没有一个可信，山西省、陕西省那来的这样中央指示：“大小干部驱上楼，一个一个下楼过关检查”。这不变成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假四清，桃园经验吗？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方的领导机关，遇到这些事不闻不问岂非咄咄怪事？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或者中央一些负责同志老虎屁股摸不得，反不得，同样的中央任何一个负责同志有错误，严重的有反党行为，不但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还要

把他斗倒，肃清其流毒，但必须有一个领导，有充份证据，乱轰一通，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既不能肃清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也不能通过运动肃清修正主义流毒，达到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分清什么是是非？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相反会挫伤大多数革命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反右倾、清查反革命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关人人要过，但矛头主要指向一小撮，对大多数干部要一看二帮，对群众的思想问题只能是教育，当前出现在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和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歪风，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方面各级党组织要努力去扭转，另一方面绝不能因为有这股逆风的存在而放弃当前主要的大方向。

关于“镇反”的作法

某些省市和县出现了一些问题，北京镇压了一批反革命份子，粉碎了他们的破坏和扰乱，这件事放在一些出现反革命破坏事件的地方，如郑州、长沙、武汉、南京等地方，用坚决果断的行动去处理是对的，只是必须注意掌握好政策，不要由于政策的不落实而造成肃反的扩大化，把一些不是敌人的推向敌人一边去，但做为没有出现类似北京反革命事件的地方，也是一样借中央对反革命份子进行镇压的指示，乱抓乱揪，不管有意识无意识的都是错误的“抓人”，这并不是是一件好事，只能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对群众中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出现过火的行动，经常会有，但这与反革命破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中的矛盾，如处理不当，可能导致走向敌我矛

盾的问题，这只能是利于敌人而不利于自己。不可否认，有个别地区是党内走资派篡了那里的领导权，这一小撮人害怕群众起来革命，害怕革命的东风吹走他们的“仙山琼阁”摧倒这批吸血鬼的大楼，因此当群众起来他们就怕了，他们开始时是千方百计阻挠群众运动，进而施阴风，放暗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实在日子混不过去就露出狰狞的面目，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真正革命者，以致不惜动用专政工具，用专政的办法来压制正确，扶植错误，但这一抓却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既吓不倒真正革命者，反而暴露了他们自己。对革命来说早暴露好过迟暴露，目前一些地方控告团有些来北京向中央直接反映情况，有些通过书信或其他方式向中央如实报告那些地区的情况，这些情况中央会逐个处理。华国锋同志、江青同志等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在接见各省市有关同志、学生代表或首都参加镇压“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代表时也已经代表中央一再提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要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一个地解决，“运动要搞下去；混进党内资产阶级异己份子要清除，地方的问题要解决，这是我们的决心，也应该是在座每一个负责同志，同时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和决心。”

在此我们也希望，有不自觉执行错误路线或政策，有过去因路线觉悟不高，直接或间接执行邓小平那一套，做错了事的同志，能够自觉改正，不要顽固走到错的方面上越走越远，只要是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党和人民还是欢迎的，顽固下去，那绝对没有什么好结果。

当前几项重要工作

以下和大家讲当前的几项重要工作：

（一）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保证反右斗争胜利的关键；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和支持的党，这样一个伟大的党绝不会因为有资产阶级份子的存在而有损其伟大；相反地，我们的党是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揭露矛盾，无愧于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问题上各级党组织必须向群众反复说明，指出个人的错误或者出现在党内的极少数资产阶级份子，绝不能同整个党混为一谈，而用少数人的问题来否定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必须时刻牢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削弱、抵制和破坏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的行为，而做为领导或干部本身也必须“抓好权、用好权”、要坚持一元化领导，在党内做到：“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政策，统一目标，统一行动”。老、中、青干部要互相尊重，大事讲原则，小事求大同，不计小节、不搞山头，不搞派性。

（二）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运动中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群众发动工作，继续做好整党工作，要把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借运动东风揪出来打倒，清除出党，在这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能手软和施“仁”政，混进党内的一小撮坏人，不只要揪出来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经济与各项领域里斗倒斗臭，但不要急于去处理，

事先要请示，在整党的同时也要做建党工作，把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工农兵群众，注意去培养提高，条件够时，应大胆吸收到党内，并注意提拔和培养新生的血液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七月一日是党的生日，有十数百万在运动中、在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先进份子入党，这是大喜事，正是我们党兴旺的象征，也是对邓小平最好的反击，做好组织建设首先要抓思想建设，离开党委思想建设这一条路，党组织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胸中无大计，形成漫无头绪，更甚至使党组织涣散，群言堂变成一言堂，纪律松懈而在运动中寸步难行。

（三）开展革命大批判：大批判不能越批越乱，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无的放矢，批判是马列主义的重要武器，这批判必须有骨有肉，说出道理，揭发出错误，才能使人们从批判中分清那是对的应该坚持，那是错误的应该抛掉，批判不但在理论上要说得透彻，而且要言之有物，要防止为批判而批判，把一场政治斗争引向纯学术批判的邪道上去，同时也要防止简单粗暴漫骂式的批判，要记住鲁迅的话“漫骂不等于战斗”。我现在提出几点意见请大家考虑：

1、今后的批判应该是深入的揭，重点的批，看准靶子，找好武器，要一个个问题有系统的批，每一击都要击中要害，在批判中干部党员要带头，要做到在革命大批判中领导干部要坚持同群众边学习、边批判、边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把自己摆进去，而不是光批邓不去自觉改造世界观，不要像广东黄三洞生产队贫农说的那种干部：“革别人的命是打冲锋，革自己的命就打退堂鼓”。结果越批自己的思想越搞不通，

这样搞不好大批判也带不好群众，应该做到三个结合：（1）将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结合起来，这是方向问题，（2）要开展把革命大批判同本单位的阶级斗争联合起来，把批邓反右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结合起来。（3）要把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反修防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封建主义意识、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结合起来，绝不能一面开展革命大批判，一方面仍让资本主义倾向泛滥。结果批邓批完，这单位也烂完。

2、现在大字报很多，批判文章也不少，但质量高的比较少，所见的不是通篇大论，罗列一大堆引自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语录，便是三言两语、言泛语空的文章，不少单位求数量不求质量，一枚实弹总好过一百发空炮，这次开展革命大批判不是秀才打笔墨官司，比谁抄语录背的马列著作多，也不是篮球比赛看谁投球得分多，这是阶级斗争，是一场革命，要认真的抓，不能够马虎敷衍，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战线上的新兵”讲的那几句话很好：“春雷激荡，催我走上战场”、“虎穴深入为了打老虎”，“武器要精，才能击中要害”、“不断革命坚持长期作战”，这些都说得很好，都能够说明问题，大家有空也要多看报纸，报上刊登不少工农兵的批判文章很有代表性，他们不见得是一大长篇，只短短一篇，但胜过抱卷数十载的知识分子，这些工农兵的批判文章未必在座同志们都能写得出，他之所以好就是文章本身语浅言深，而且联系到实际，不是空空洞洞，是不是这样，同志们不妨自己研究研究。

在谈到这问题时顺便提一下，人民日报很需要各地能提供一些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和能反映地区工农兵先进事迹的文章，这点做为在座同志们也应该为党的一项工作，共同支持办好党报。

（四）落实政策，开展清查反革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执行错了或出了偏差都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政策执行的好坏重要在党的领导对政策要不折不扣执行，在许多时候党的政策往往中央往下贯，中间扣一扣，到地方就走了样，当然政策执行有偏差，大多数还是由于干部对政策不很理解，是无意识的，但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造成的结果却是我们失去了群众，当然敌人也给溜走了。不少干部从主观愿望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积极工作，总想执行好政策，但由于学习不够，平时又独断专行惯了，不喜欢多向群众请教，多向上级汇报，结果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失去了民心也带给革命损失，就这样呆不下去，不是停职便是调职，这情况又怪得了谁呢？因此毛主席把政策提到党的生命这样的高度上来谈，目的就让同志们务必注意。

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全国正在掀起追查反革命高潮，在这高潮中一个政策是调查研究，凡事重证据是最重要，在处理“四、五”反革命事件时，我们始终站在主动的位置上，靠的就是政策和群众解释，开枪是反革命分子所希望我们这样做，他们想当烈士来挑动群众的情绪，我们就不上当，实践证明这一小撮反革命就是怕群众，怕批判。这次各地搞大追查，军队和公安机关非万不得已，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别轻易开枪，绝不能像毛主席告诉泰国总理，不要制造烈

士，反过来我们自己制造烈士，必要时当然可以，但也要先请示。再说开枪打死的往往是群众，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才不会拿胸膛挡子弹。原则上政策要求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详细政策界限和要求，中央除了将有关规定文件分发给各级机关外，同时汪东兴同志也会代表中央向大家做更具体的解释，现在需要防止的是“宁左勿右”的左的倾向和“无敌论”的右的错误思想，在追查过程中要全民动手，单靠公安部门不行，但只强调群众专政而不要领导和专门机关的配合是不行的，要三结合，重要的是稳、准、狠、要重视调查证据，反对逼供，不搞武斗。要给出路，讲究策略，才能有效的打击敌人。

这次北京抓的人多了些，开头还不开枪讲政策，以后就差了一些，一个北京抓了四五万人，每一个单位你斗一个他揪一个，也搞出几个人命，冤枉了一些人，还好，一经中央指出就很快的纠正，这点要当作一个教训。

“在处理人的问题应起慎重的态度”这一点在这次追查反革命运动中各单位要确实做好，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有效的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只有有效的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才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保护。

（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批邓反右中，全国条条战线呈现出一片社会主义朝气蓬勃的新景象，数十万工农兵学员走向社会，走向农村，参加阶级斗争，进行调查研究，把书本上所学的东西同实践工作结合起来，一批批大学毕业学员奔赴边疆、农村、山区、走毛

主席指引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五七干校”、“七二一工人大学”就像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结果在工业战线我们也取得很大成绩，四川省石油管理局七零零二钻井队的工人打成我国第一口六千零十一米超深井，国产自制的三十万千瓦双水冷汽轮发电机组胜利投产，一大批工矿企业进入六月份时已提前完成一九七六年上半年的生产任务，这几天来更是喜事不断，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在农业战线形势大好，学大寨赶昔阳的社会主义竞赛热潮方兴未艾；全国农村有三分之二公社，二分之一大队普遍有了电，十年全国农村建了大小五万六千多座水电站，今年春播情况良好，三麦、水稻等粮食夏收丰收在望，一句话：形势大好，这大好形势不仅给全国人民带来精神鼓舞，同时也对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四个现代化”提出最有力的反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批邓反右的伟大胜利。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而不能忽视，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滋长，使得功效不高，开工率不足，造成一年工业项目未能完成任务。无政府主义不是没有政府，只是他不要的是无产阶级政府而要资产阶级个人的政府，自己那小圈子的政府，这思潮要引导，要善于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轨道上去，这是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必须开展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保证生产，但要注意这里所存在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性质问题，不能把他和前面所讲的对敌斗争一样看待，否则非闹出大“乱”子不可。

干部中在我们批判用生产压制政治的错误作法，绝不能因此而放任生产不管，目前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工业、汽车制造、建筑、化学工业、煤炭工业和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还有一段距离，特别是机械工业母床的生产只维持在前年上半年的生产指标上，这些情况都要扭转过来。

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搞上去，相信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的任务一定会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祝同志们在学习和工作方面创造更好的成绩。

附录： 张春桥同志著作年表

《春雨之夜》，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

《为国捐躯》（3-5），春桥，山东《民国日报·潮水》，一九三二年四月廿二日，四月廿九日，五月六日，五月廿七日。

《爱痕之一》，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

《这一天》，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五月廿九日。

《漫谈》，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二日。

《学校生活素描——宿舍速写》，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廿三日。

《学校生活素描——早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

《学校生活素描——代数班》，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六日至廿七日。

《学校生活素描——放假之前》，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学校生活素描——离别之夜》，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银铃》，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创刊号。又载于《妇人书报》六十期，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

《秋》，张春桥，《华蒂》，一九三三年第二期。

《失业的人》，春桥，上海《新诗歌》二卷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另一个问题》，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

《济南文艺简报》，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

《相声》，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

《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

《关于拉丁中文的》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论诗意》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廿八日。

《答复》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印象帖》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山东底方言》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

《回读屋跟文学青年》，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

《我怎样答复他们》，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

《关于臧克家》，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折扣的说话》，张春桥，上海《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俺们的春天》，张春桥，上海《文学季刊》一卷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又见《新文学大系》续编。第八集《诗集》（香港版）。

《布的交易——用济南话写作的实验》，张春桥，上海《太白》一卷八期，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

《济南》，张春桥，《中学生》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

《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三月卅一日。

《明湖春色》，张春桥，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

《俺们山东人》，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二期，一九三五年五月。

《女性的悲剧》，春桥，上海，《新艺》二卷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

《半瓶子醋》，张春桥，上海《漫画漫话》一卷三期，一九三五年六月。

《行之端》，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林相士》，张春桥，上海《创作》一卷一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

《土枪射手》，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驱逐》，张春桥，上海《太白》二卷九期，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

《我控诉》，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讲故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明星》，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

《乡愁》，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四日。

《诉》，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

《晚秋》，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

《窘》，张春桥，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五日。

《金线泉边》，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

《老人样的少年》，张春桥，上海《申报月刊》四卷十一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家的生活》，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老鸦与胡适》，狄克，上海《知识》一卷五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

《八月的乡村》，（书评），水晶，上海《书报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

《漫画是图画的武装》，狄克，上海《漫画与生活》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一二十日。

《我还有一双眼睛》，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

《草原之歌》，张春桥，上海《申报?每周增刊》一卷八期，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狄克，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

《革命的诗歌》，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

《也是文学的管见》，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读者想不到的》，张春桥，上海《漫画与生活》一二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五月。

《把孩子领向哪里》，狄克，上海《文学青年》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光明〉》——文艺新刊集评》，张春桥，上海《东方文艺》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五日。

《纪念高尔基》，张春桥，上海《生活知识》二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

《吃饭之外》，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潮》，张春桥，上海《今代文艺》创刊号，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

《加速度，列车！》张春桥，上海《现实文学》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海燕》，张春桥，上海《文学界》一卷三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自己与群众——评臧克家的诗》，狄克，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

《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纪念九一八》，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

月。

《一个土匪》，张春桥，上海《文学大众》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九月。

《多作些连续图画吧！》，张春桥，上海《漫画世界》二期，一九三九年十月。

《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从洋人打死人力车夫说起——“骄子”和“下等人”》，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

《论通讯员运动》，张春桥，上海《时论》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小说家座谈会第二次记录》，张春桥记录并发言，上海《小说家》一卷二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要求作品的通俗化》，张春桥，上海《大晚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雨》，张春桥，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五日。

《先行者，你安息吧》，张春桥，上海《热风》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炮台》，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一期，一九三七年一月。

《明天的太阳》，狄克，上海《民族文艺》一卷二期，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速写红萝卜》，春桥，上海《热风》终刊号，一九三七年三月。

《关于语言》，春桥，上海《语文》一卷三期，一九三七年三月。

《生活吧迎着春光——写给你跟我自己》，张春桥，上海《申报周刊》，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要有计划地工作》，张春桥，《通俗化问题讨论集》第二集，一九三七年七月。

《用武力回答武力——纪念八一反战节》，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七月八日晚上》，张春桥，上海《中流》二卷十期，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

《枪毙间谍》，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

《别动队来了》，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

《怎样对付汉奸》，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一日。

《武装民众》，张春桥，上海《立报》，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

《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张春桥，上海《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十六期，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

《血火中的上海》，张春桥，山东《民国日报》，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

《韩复榘》，张春桥，汉口《战地》一卷一期，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

《汉奸吉恩恭（延安通讯）》，张春桥，汉口《抗战文艺》一卷五期，一九三八年五月。

《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张春桥著，七十八页，一九三八年延安出版。

《秋天在平原上》，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

《对目前边区文艺工作的意见》，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三年三月廿四日。

《为王老栓全家复仇》，张春桥，《晋察冀日报》，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

《毛泽东之歌》的作者对批评的答复，张春桥（1951.03.11）《人民日报》

《我所领会的〈真理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张春桥，《人民日报》，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又见《新华月报》一九五四年五期。

《报纸是作家接触生活的一个基地》，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四年六期。

《访苏见闻杂记》，张春桥著，华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目录如下：

- 一、工人报刊的榜样
 - 二、报纸和作家
 - 三、访波列伏依
 - 四、“给小孩子们大文章”
 - 五、人——骄傲的称号
 - 六、“战士”集体农庄
 - 七、在列宁格勒
 - 八、难忘的夜晚
- 后记

《在红星照耀着的地方》，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五年二期。

《我们的期望》，张春桥，《文艺月报》一九五六年一期。

《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上海南京路印象》，张春桥，《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二期。

《数字的诗》，张春桥，《新民晚报刊》，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

《半夜鼓声》，张春桥，《处女地》，一九五八年九期。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张春桥，上海《解放》一九五八年六期；又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为之加了按语。

《今朝集》，张存桥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一七八页，共收杂文卅三篇。这些杂文散见于各报刊，主要是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目录如下：

序

在新的高潮面前

新年的期望

南京路上的杂感

一把钥匙

把文化艺术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要像鲁迅那样生活

关于“火种”

闻早有感

在重重困难面前

把根扎深一些

只能“放”，不能“收”

坚持工农兵方向

一个好传统

论“雅量”

论算旧账

从“借东风”想起

“今天天气……”

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

质问彭文应

从盛夏想到锄草

杂谈帽子

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

在大风大浪中的杂感

灵魂工程师的灵魂

看大字报有感

看大字报有感（之二）

看大字报有感（之三）

“唯唯诺诺”辩

愈远就愈明显

论志气

续论志气

偶然想到

论十年树人

《新时代的新谚语》，张春桥、《读书》一九五九年十期；又见《解放日报》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

《在苏联“造船城市”作客》张春桥《长江文艺》一九六〇年三期。

《龙华集》，张春桥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出版，一八二页，共收杂文四十篇。目录如下：

序

东风颂

“外行”质题

我们的常规

看橱窗有感

“四无”户答客问

一个被遗忘了的故事

又一个被遗忘了的故事

关于现代题材剧目的问题

让大字报流芳百世

从《老事新办》想起

要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举

更上一层楼

《大字报选》序

关于杂文

破除这种迷信

论“不落常套”

“决心大变”颂
大跃进的风格
破“假洋鬼子”
刘诗昆得奖以后
抓住真理，势如破竹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打掉低级趣味
论知足者常乐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深耕时节
劳动的节日
《工人的语言》序
念一念看
攀登新的胜利高峰
天安门前想上海
“第三，还是学习”
乐观
两种高度
“绿树成荫”议
赞“南京路上好八连”
喜看绿叶成牡丹
“穷棒子”精神

踏上新的行程

祝开门红

《赞“南京路上好八连”》，张春桥，《光明日报》1963年4月25日，

姚文元张春桥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 1966. 7. 27

张春桥接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来京同学时的谈话 1966. 8. 6

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1966. 8. 27

《在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张春桥，1966年10月6日，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一集

张春桥关锋在接见福建部分赴京同学时的讲话 1966. 10. 7

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座谈纪要 1966. 10. 9

张春桥在《西北地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 10. 14

张春桥关于长征问题的讲话 1966. 10. 28

《在政协礼堂的讲话》，张春桥，1966年10月28日，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一集。

张春桥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的讲话 1966. 10. 29

张春桥戚本禹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6. 11. 1

周恩来对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电话指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
1966. 11. 2

《接见北航红旗的谈话》，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二集。

张春桥戚本禹与北航“红旗”五名战士谈话 1966. 11. 11

张春桥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讲话
1966. 11. 13

张春桥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全体战士时的讲话 1966. 11. 15

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分工人讲话 1966. 11. 16

张春桥接见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北上控告第一兵团的讲话
1966. 11. 21

张春桥接见上海和外地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6. 11. 22

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1966. 12. 6

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1966. 12. 9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北京广播学院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1966. 12. 10

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谈话 1966. 12. 11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中央广播事业局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1966. 12. 13

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红色造反团》的谈话 1966. 12. 15

张春桥等在接见部分归侨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6. 12. 18

对张春桥上海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1967. 1. 0

张春桥对上海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 1967. 1. 0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讲话摘录 1967. 1. 0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的讲话 1967. 1. 9

张春桥姚文元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人员座谈 1967. 1. 11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1. 11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欢呼中央贺电大会上的讲话 1967. 1. 12

张春桥谈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夺权斗争 1967. 1. 18

张春桥在接见上海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 1967. 1. 20

张春桥姚文元谈上海高校“红革会” 1967. 2. 1

张春桥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67. 2. 5

张春桥姚文元与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等谈话摘要 1967. 2. 10

张春桥姚文元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7. 2. 24

张春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 2. 24）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 3. 12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1967. 3. 20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1967. 3. 26

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1967. 4. 13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 4. 14

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67. 4. 20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舞蹈学校部分师生的讲话 1967. 4. 22

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军区机关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 5. 5

张春桥在山东省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7. 5. 7

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
1967. 5. 14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 1967. 5. 24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 6. 2

张春桥关于上海高校运动的讲话 1967. 6. 17

张春桥接见南京地区三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1967. 7. 12

张春桥关于农民进城问题的讲话 1967. 7. 16

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1967. 9. 9

张春桥在空军某部祝捷庆功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 9. 28

中央首长康生、张春桥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1967. 09. 28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铁路局系统代表的讲话 1967. 9. 29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谈“抓革命促生产” 1967. 10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庆祝建国十八周年大会上转达伟大领袖的亲切嘱咐
和无限关怀 毛主席向上海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同志们问好
新华社(1967. 10. 02)

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第八印染厂时的讲话 1967. 10. 4

张春桥接见上海舞蹈学校大联合委员会的讲话摘要 1967. 10. 10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示 1967. 10. 11

张春桥对上海的指示 1967. 10. 12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1967. 10. 16

中央首长康生、张春桥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1967. 10. 22

周恩来张春桥对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
1967. 10. 28

张春桥在江苏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 11. 4

张春桥接见第二十七军首长谈无锡文化大革命 1967. 11. 5

张春桥对上海市革委会的电话指示 1967. 11. 16

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 1967. 11. 19

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 11. 19

张春桥接见上海工总司常委时的讲话 1967. 11. 22

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谈准备九大党章草稿 1967. 11. 25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7. 11. 27

张春桥谈修改党章 1967. 12. 0

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1967. 12. 5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1967. 12. 6

张春桥接见文艺出版界代表的讲话 1967. 12. 10

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1967. 12. 19

《代表五省市革委会代表团的讲话》，张春桥。见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书。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文化组成员时的讲话 1970. 10. 30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批判《园丁之歌》稿件上的批示 1973. 7. 28

张春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1975. 1. 13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5. 3. 1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 《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4 期（1975. 4. 1）

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通报》（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同志介绍当前“教育

“革命大辩论”的谈话）（概要） 1975.12.20

张春桥日记 1976.2.3

张春桥接见于会泳的谈话 1976.2.6

张春桥关于“批邓反右”运动的讲话 1976.06.28